

科学技术文

第7典

宗教与民俗

第9典

历代文化
沿革
地域文化
民族文化
制度文化
教化与礼仪
学术

第1典

第2典

第3典

第4典

第5典

第6典

第8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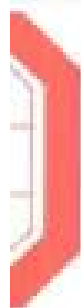
中华文化
通志

第10典

【中外文化交流】

中国与北美 文化交流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冯承柏 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10卷

【中外文化交流】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与北美
文化交流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图书馆藏

K203
Z669
:10(8)

中华文化通志·中外文化交流典 (10-098)

姜义华 主 编

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志

冯承柏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70毫米 32开

字 数 359,000

印 张 14.625

插 页 1

版 次 199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208-02351-4/K·570

141636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FG84/04 141636

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志

作者简介

冯承柏,1933年生。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合著有《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美西战争资料选编》;主编有《亚太地区经济与中国》。发表论文数十篇。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本志是作者在较充分地利用国内外研究成果和独立研究基础上写成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全面地描述近三百年来中国和北美地区文化交流状况。作者阐述了北美文化特点,介绍了国内外对本课题研究的情况。作者试图从大文化的角度来观察文化交流现象,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和大众文化四个层面。强调要注重观察文化交流引起的社会变迁。作者概括介绍了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的沿革。在此基础上就传教士、华人移民、留美学生运动、北美人与国共之争、企业管理制度、教育、私人基金会、文学、中国人的美国观等专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大体上涉及了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北美文化的特点	1
第二节 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	10
第三节 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状况	32
第二章 传教士——文化交流的开拓者	38
第一节 早期活动	38
第二节 北美宗教、世俗团体参加中国的社会改革	53
第三节 教会大学	65
第三章 北美的华人移民	82
第一节 早期中国移民	82
第二节 北美华埠社会文化的发展	88
第三节 北美华人的新贡献	94
第四章 留美学生运动——文化交流的桥梁	101
第一节 开端	102
第二节 庚款留美	105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的留美学生·····	113
第四节	留学北美的高潮·····	115
第五节	留美学生的作用和影响·····	117
第五章	北美人与国共两党·····	126
第一节	北美人与国民党·····	126
第二节	北美人与中国共产党人·····	145
第三节	五十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	161
第四节	“谁丢掉了中国”·····	169
第五节	解冻·····	178
第六章	北美企业管理制度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影响·····	184
第一节	中国企业管理改革产生的背景·····	184
第二节	北美企业管理思想和制度的输入·····	190
第三节	文化融合的一例证——东亚毛纺织公司·····	206
第七章	杜威的教育思想与中国的学制改革·····	215
第一节	杜威的教育思想·····	215
第二节	中国学制改革的历史回顾·····	218
第三节	杜威教育思想对 1922 年学制的影响·····	222
第八章	美国私人基金会与中美文化交流·····	249
第一节	美国现代私人基金会·····	249
第二节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	256
第三节	福特基金会与中国·····	299
第四节	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	327

第九章 北美文学在中国	345
第一节 北美文学开始传入我国.....	345
第二节 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对北美文学的引进.....	349
第三节 一九四九年以来我国对美国文学的研究.....	373
第十章 中国文学艺术在北美	400
第一节 中国古典诗歌与庞德.....	400
第二节 中国古籍善本在北美.....	403
第三节 中国文物在北美.....	408
第四节 梅兰芳访美.....	413
第五节 华美协进社.....	417
第十一章 “美国,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新时期中国人 眼中的美国(1978—1990年)	423
第一节 中国的“美国通”.....	423
第二节 为美国画像.....	427
参考文献	452
后 记	453

第一章 导 言

中国和北美的文化交流是一个时空跨度大、内容丰富多采而又十分复杂的研究课题。在中国文化发展和长期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北美文化作为世界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中国文化的交流开始较晚,但产生的影响与日俱增。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从科学技术到日常生活,都可以看到北美文化在中国文化生活中的影响。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北美公众也不能不正视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注意它的新发展并从中吸收养分。

第一节 北美文化的特点

北美洲的地理范围有两种划分方法。一种是以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划线,以北为北美洲,以南为南美洲。另一种是以墨西哥的南部边界划线。本志取前一种方法。就文化地理而言,本节所要描述的是所谓“安格鲁—美洲”(Anglo—America)。这个术语只在语言区划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居住在这 2422.8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大部分人口说英语。从历史上看,加拿大和美国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对北美的影响决不容忽视。然而

新大陆并不像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年)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99—1975年)所说仅仅是欧洲文明的分支,或欧洲文明边缘的民族国家。许多研究者认为,它首先是多种文明的汇合,不了解这一特点,很难窥北美文化之全豹。

一、多种文明的汇合

北美的最早居民是印第安人,来源于亚洲。他们在距今6万多年前从西伯利亚东部经白令海峡迁入美洲。他们到达美洲时尚处于以渔猎为主的石器时代,过着游牧生活。北美印第安人没有创造出像玛雅、印加那样高度发展的文明。在使用金属工具方面进展甚微,运输和商业均不发达,在这方面同非洲相比尚有差距。欧洲人来到美洲时,在今加拿大和美国境内印地安人的人口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学者们的估计数,少的90万,多的1800万。詹姆斯·穆尼在1928年估算的数字为118万余人,有一定的可信度。

表1 墨西哥以北土著印第安人口

地 区	年 份	估算人口数
北大西洋沿岸 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州	1600	55 600
南大西洋沿岸 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	1600	52 200
海湾诸州 佐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阿肯色、田纳西、路易斯安那	1650	114 400
中央诸州 俄亥俄河谷地带,从阿拉贡尼山至密西西比、加拿大的齐佩瓦	1650	75 300
大平原(加拿大至墨西哥湾)		

(续表)

地 区	年 份	估算人口数
北部	1780	100 800
南部	1690	41 000
哥伦比亚河谷地带		
华盛顿、俄勒冈大部、爱达荷北部、蒙大拿	1780	89 300
加利福尼亚	1769	260 000
中央山区		
内华达、犹他、部分周围诸州	1845	19 300
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	1680	72 000
美国小计(阿拉斯加除外)		879 900
不列颠美洲		
加拿大东部、中部、不列颠哥伦比亚	1600—1780	
不列颠美洲小计		221 000
阿拉斯加	1740	72 600
格陵兰	1721	10 000
总 计		1 183 500

资料来源:James Mooney;“*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of America North of Mexico*”. Smithsonian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 Vol. 80, No. 7, (1928)

欧洲白种人是随着哥伦布航行而成群结队来到美洲的。他们来到美洲后,以为北美是一片荒无人烟之地,有待开发。在他们的心目中,印第安人“非我族类”,是“野蛮人”,但在日常生活中又不得不向土著民族学习。研究成果表明,从对美洲自然环境的认识,种植技术,语言,直到独立奋斗的精神和民主制度,白人从印第安人处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人甚至认为北美人和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是欧洲人在北美不同的自然环境里印地安化的结果。白人来到美洲后,印第安人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为了夺取世代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白人殖民者威胁利诱、驱赶屠杀,无所不用其极,使他们的后代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也不无歉疚之情。北美印第安人长期实行氏族部落的财产公有制,宗教信仰崇尚万物有灵论,有丰富的民间传说,造型艺术(如陶器、面

具、图腾柱)精美,音乐、舞蹈很有特色,一直流传至今。欧洲移民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宗教信仰和文化各异,初到美洲时,各国政府的政策也很不一样。大致说来,西班牙、葡萄牙志在攫取贵金属;法国人热衷于皮毛贸易;英国人迫于自然环境,将主要精力用于所在地的开发。攫取贵金属和开发土地都需要大批劳动力,奴役印第安人的尝试失败了,转而求之于贩运和奴役非洲的黑人。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数以百万计的黑人被劫往美洲。在残暴的奴隶制统治下,黑人失去了国籍、祖籍、家园、姓名和民族语言,只是把音乐、舞蹈、习俗和部分宗教信仰保存了下来。到了十九世纪,亚洲(印度、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向美洲移民的浪潮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达到高峰,其文化特质也在北美生活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欧、美、亚、非四大文明的汇合构成北美文化的一大特色。

在北美文化中,加拿大文化别具一格。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单一的安格鲁文化,而是英法双语文化。所谓“加拿大拼盘”是由两大文化(英、法)和两小文化(非英法和土著)组成。在英国夺去新法兰西之后,英国当局力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同化法语居民,将英国的政治、法律和宗教机构强加于他们。然而这种同化政策因遭到强烈抵制而以失败告终,形成了两种文化并存的局面,而且种下了两种文化冲突的根子。英法文化冲突的主要表现是,法语居民要求承认魁北克以外地区法语文化的地位,而英语居民则要求承认在魁北克境内英语文化的地位。操法语的居民占加拿大人口总数的27%,处于少数。在魁北克地区,法语人口占当地人口的80%。由于法语人口外迁,大量英语人口迁入,魁北克地区法语民族主义者感到其多数地位受到威胁。双方各持己见使这一矛盾更加尖锐。加拿大保守党政府于1987年12月通过《加拿大文化多元主义法》,确立了加拿大政府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

美国文化虽然没有加拿大文化中英法文化的尖锐冲突,其多样化的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族际关系紧张,文化冲突遍及全国各地。白人安格鲁—萨克逊新教文化居主导地位。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白人的行为准则来规范其他族群或移民群体的活动,要求他们放弃原有的文化特质,接受白人文化。这样的同化过程被称为“美国化”。一般认为这个过程要经历三代人。在移民高峰年代(1901—1921年),美国曾发生过半强制性的美国化运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和批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多元文化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这种观念强调尊重移民原有的文化,鼓励他们继续保持原来的文化传统,带着本民族的文化特点,投入美国文化的主流,认为多样化是美国文化有生命力的表现。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而且有碍国家的认同。

二、没有封建的过去

北美文明是欧洲革命和封建制度解体的产物,因此,没有封建的过去就构成了北美文化的又一特点。“这里没有显贵的家族,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教阶统治,没有授予少数可见者的无形权力,没有雇佣数千人的大制造业,没有穷奢极欲。”^①这就是说在政治上,没有贵族分封制;在宗教上,没有教皇制和教阶制;在经济上,基本上没有地主庄园和农奴制;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门第等级观念的束缚。就基督教文化而言,新教文化居统治地位。北美文化的这一特点意义深远。北美的大部分居民虽然来自欧洲,但他们并不以传统

^① ST. John de Cre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Letter II — What is an American?" *American Reader*. edited buy J. A...Leo Lemay, Washington D. C. 1988, p. 118.

的欧洲自豪,他们来到美洲为的是建立新的家园,以便和欧洲的传统告别。他们引以自豪的不是他们的过去,而是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在回答北美人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声称:“他既不是一个欧洲人,也不是一个欧洲人的后裔,……在这里,所有国家的个人融为一个新的人种,他们的劳作和他们的后代有朝一日将给世界带来伟大的变革。”^①他们所遵循的新教伦理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而不是相反;认为每个人竭尽所能就是履行上帝赋予的使命。这不仅是一种信念,一种尺度,而且成为一种社会机制,鼓励人们奋发图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的才能比家庭出身、社会地位更重要。标新立异受到鼓励,墨守成规为人们所不取。在边疆生活和西进运动中得到发扬的拓荒精神和冒险进取精神成了北美人的性格特征之一。这并不是说北美文化没有保守、落后的成分。盛行于南美洲,在北美南部持续了三百多年的种植园黑人奴隶制是接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上的一个赘瘤。其所散发出的腐朽气息至今还在困扰着北美的社会生活,种族歧视就是表现形式之一。

三、物质文明发达、崇尚技术决定论

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利用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北美人民经过百余年的不懈努力创造出丰裕的物质文化,使美国和加拿大先后跻身于发达的工业国家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美的生产和消费水平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年人均产值在两万美元以上。1980—1991年间经济增长率为1.7—2%。家庭消费结构最能说明消费水平。据

^① ST. John de Cre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Letter 1 — What is an American?" *American Reader*, edited by J. A. Leo Lemay, Washington D. C. 1988, p. 120.

世界银行的统计,九十年代初,北美家庭的衣食消费仅占全部消费的16—17%(我国占74%);住房、燃料和电力消费占18—21%(我国占8%);教育和医疗消费占22%(我国为2%);交通和通讯费用占14%(我国为3%)^①。科技文化是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美地区的幸运之处在于,殖民地的建立过程恰好与宗主国的科学革命同步。跨越大西洋的科技移植为北美的科技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惠特尼(Eli Whitney 1765—1825年)到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1847—1931年),北美地区的技术发明和创新层出不穷。缝纫机、打字机、联合收割机、电话、电报、电灯都产生于这片沃土。可换部件和流水装配线构成的美国制造体系是北美对世界工业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抽象思维,理论上的创新不是北美民族的长处。应用科学、实验技术、动手能力是他们引以自豪的事。两次大战之间,世界的科技中心从欧洲移至北美。美国和加拿大以丰厚的资金、优异的工作条件和科学家之间的细致分工吸引了大批科技人才,他人之所失,正是北美之所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备受人才流失之苦,北美国家则有坐享其成之乐。二战以来,在战争和军备竞赛的影响下,主要由政府和国防部门支持的大科学应运而生。国家标准局、国家宇航局、国防部、能源部、农业部和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属和资助的科研机构遍布全国,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大公司和科研机构和实验室则侧重于应用和开发。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计算机网络则承担了科学技术知识推广和普及的任务。由于科学技术发达、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人们相信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源泉,甚至认为是唯一的源泉,使技术决定论成为占居主要地位的思潮。

北美物质文化的另一个支撑点是在数以万计的私人企业基础上

^① 参阅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56—257.

形成的企业文化。北美的私人企业由业主所有制、合伙制和股份公司所有制等法定形式组成,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经营、销售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发展迅猛。各类企业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都把获取利润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锐意图新,肯定一切能够发财致富的行为,把白手起家、创造万贯家财的人们视为英雄。北美人在崇拜科学技术的同时,还对私人企业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深信不疑。认为这种被他们称之为自由企业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进行自我调节,增强企业效益。

四、政治文化——联邦制与分权制

北美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出以联邦制和分权制为特点的政治文化和相应的政治制度。中央政府是在分散的强有力的地方政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众对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抱有先天的反感,这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一笔遗产。一方面,北美人民在启蒙思潮和新大陆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将多数人统治、民主、公民自由作为政治上的理想;另一方面,开国元勋们对权力又采取了非常实际的态度,设计了一个旨在限制多数人掌权同时也防止少数人大权独揽的中央与地方(州或省)分权制和中央政权内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分权制,同时,又把这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最高法院通过对宪法作出新的解释和通过宪法修正案等办法使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制定的国家大法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这样的政治制度保证了数百年来政权平稳过渡和全国政局的稳定,而没有像南美国家那样,军人专政不绝于史,政变频仍。然而,北美人“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并未能坚持下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一段较长时间内,为了渡过经济危机和适应战争和冷战的需要,联邦政府大大地膨胀了,经济方面的功能变得十分重要。尽管科学技术进步和企

业的多样化和小型化加强了分散的趋势,新保守主义也在鼓吹分权,联邦政府的地位并未动摇。随着区域合作的加强,中央政府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五、务实精神

新教伦理强调履行世俗义务,从事专业劳动是上帝对每一个信徒的要求。北美严酷的自然环境则迫使早期殖民者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生存。这两者的结合造就了北美人民特有的务实精神。集发明家、科学家、政治家、外交家于一身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年)用他的言行体现了这种务实精神。他倡导勤俭节约、诚实而又精明地聚财致富,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①。在整个北美文明史上,人们总是忙于工作、忙于事业、忙于建设,无暇顾及纯理论的探讨。清教徒和后来几代北美人一样,他们更关心的是实际起作用的体制,而不是华而不实的空谈。他们重视《圣经》,不仅把它当作信条和准则,而且把《圣经》中的故事当成可供参考的先例。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详细地讨论经验,而不是详细地去阐明真理。在北美人看来,许多真理都是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无需论证,也无暇论证。“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宣言》的第二句话就是这样说的。一开始就受“看不见的手”支配的北美人认为,任何学术上的争论都不如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更有价值。这是因为在北美人们思想的解放不是用新的思想体系来代替旧的思想体系,而在于把哲学的全部内容赶入了市俗的竞技场。美国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3页。

Wendell Holmes 1846—1933年)在1919年写道:“对真理的最佳考验就是那种能在市场竞争中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力量。”^①北美人自始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接受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的概念。他们把现实的事物拿来作为尺度,来衡量事物发展的情况。不仅用以衡量现在,而且用以衡量过去和未来。

由于北美幅员广阔,自然资源丰富,移民先于探险家到达北美,对于北美的认识是在开发中形成的,或者说是在自然中形成的。新世界的许多知识往往是为了特定的实用目的从旅行中得到的副产品。有关北美的全部知识是由零星点滴、五花八门的知识积累而成,而不是像旧大陆那样,早就有了亚理士多德,或圣奥古斯丁的体系。北美人对知识作出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是他们对日常生活经历和实况的记录,即博物学。到了二十世纪尽管有大批欧洲科学家移居北美,北美人引以自豪的仍然是让他们着了迷的实验科学和技术科学。在北美文化生活中到处可见的这种务实精神,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就是主张有用即真理的工具主义哲学,这也是北美唯一土生土长的哲学。^②

第二节 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

一、文化交流的开端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与古代和中世纪不同,它是在资本主义文明

① 转引自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中译本,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1987年版,第175页。

② 参见Henry Steel Commager: *The American Mind,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Thought and Character Since the 1880'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8.

向全世界各地扩张的过程中发生的。北美文化晚于欧洲文化进入中国。在中国和北美之间发生直接接触前,欧洲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和他们留下的记载、著述、译作是相互了解的主要来源。中国是在明清之际,通过耶稣会士的史地著作得到有关北美的信息的。

表 2 来华耶稣会士的学术著作对北美情况的介绍^①

编 著 者	书 名	对北美的描述
利 玛 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年)意大利人	《万国图志》(1601年刊印)	天下分为五大洲,亚墨利加为五大洲之一
庞迪我(Jacques de Pantoja 1571—1618年)西班牙人	《万国图说》	同上
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年)意大利人	《职方外纪》书首有一幅《万国全图》(1623年刊印)	第四卷亚墨利加、墨瓦拉尼加,介绍美洲地理及龙阁(哥伦布)发现美洲历史
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年)德国人	《坤輿全图》	同上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年)比利时人	《坤輿全图》及图说(1674年刊行)	上卷总述自然地理,下卷分五大洲叙说

这些耶稣会士的著述,被当时中国人贬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乾隆年间的学者庄廷敷在其所著的《地图说》(乾隆五十三年,1783年)中肯定了利玛窦、南怀仁等“分輿地为五大洲”的说法,并指出,“亚墨利加者是中国后面之地,全是海围,亦有数大国……分南亚

^① 据陈胜麟:《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辑),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5—416页;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提供的资料编成。编著者原文姓名根据Webster's *New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ass., 1983订正。

墨、北亚墨二洲”。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航海家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在广东出版。该书简略地介绍了美国和南美各国。这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远航见闻叙述美洲的最早记录。

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北美的知识界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对东方发生兴趣。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在旅居法国期间,从沙龙的闲谈中获得了有关东方的知识。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上刊登过孔子语录,并在英国福音主义者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年)面前称赞过这位东方圣人的教导,而且希望北美的知识界认真研究中国。富兰克林注意到中国的土壤和气候与北美近似,引进中国的产品和生产技术有益北美的经济发展。“如果美国能够成功地引进中国的工业、生活艺术并改进耕作技术,美国将会同中国一样成为人口众多的国家”^①。1783年,富兰克林还发表过一篇介绍中国造纸技术的文章。总的说来“十八世纪时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欧洲人对中国看法的移植和翻版”^②。北美人能够获得有关中国的资料也极为有限。著名的哈佛大学魏得纳图书馆从1700年到1809年间所藏有关东亚的图书仅一种,1830年以后才逐渐增加。^③

1801年,美国女作家汉娜·亚当斯(Hannah Adams 1755—1831年)所著《宗教观》一书出版。该书对亚洲的宗教有所介绍。这位女作家对未曾谋面的儒家学说颇有好感。她写道:“这一种发自内心深处尊崇上帝或天帝的宗教,在实践上以德行为指导。儒教既无庙宇

① 转引自 Cadl T. Jackson: *The Oriental Religions and American Thought, Nineteenth-Century Exploration*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1981, p. 14.

② 费正清:《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与中国》,欧内斯特·梅等编:《美中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③ 同上书,第24页。

也无传教士,每个人都以自己喜爱的方式尊崇上帝。”^①汉娜所在的新英格兰地区是北美的学术活动中心。著名的学术刊物《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于1815年在波士顿出版。这是一家与哈佛大学和当地唯一神教派有密切联系的文史杂志。十九世纪上半叶该刊发表了一批关于中国的文章。早在1823年,该刊编辑亚历山大·埃弗雷特(Alexander Everett 1790—1841年)就力主吸收中国文化成果。他指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形成了另一个文明世界。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不研究中国,就是只研究了问题的一半。该刊的另一位编辑,马萨诸塞唯一神教派的牧师安德鲁·皮博迪(Andrew Peabody 1811—1893年)所写的《中国》一文,高度评价中国文化取得的成就。逐一列举了中国在科学、技术、水陆交通、教育制度、政府机构取得的成果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可以看到“在基督教文明之外独立达到的文明最高阶段”^②。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年)通过直接阅读东方文献的欧洲文字译本认识到东方文化的重要性,这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学者中是比较罕见的。他仔细地阅读了戴维·科里(Davie Collie)翻译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和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e, 1815—1897)译注的《中国古典》,并作了认真地摘录。爱默生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印象并不好,但对孔子的评价很高。他把孔子同苏格拉底、柏拉图、穆罕默德相提并论,誉之为人类精神的领袖。他特别重视孔子在思想史上所起的“调节者”的作用:努力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保持平衡。他写道:“孔子,各国的光荣。孔子,绝对主义东方的圣人。”“他是哲学上的华盛顿。”^③

① Carl T. Jackson: *The Oriental Religions and American Thought, Nineteenth-Century Exploration*, p. 18.

② 同上书, p. 16.

③ 同上书, p. 55—56.

二、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的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与北美的直接文化交往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 早期接触(1784—1860年)

中国与北美大陆的直接交往是从北美人参与的探险事业和商业活动开始的。文化交流关系也随之开始。中国与北美大陆的直接交往始于十八世纪下半叶,要比同南美的来往晚一个多世纪。一般认为探险家约翰·莱德亚尔德(John Ledyard 1751—1789年)是第一位亲身访问中国的美国人。他生于康涅狄格的格罗顿城,曾就读于达特默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1774年投身航海事业,参加了1776—1779年间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 1728—1779年)船长领导的勘查太平洋航行。1776年的航行途经广州。莱氏对广州物美价廉的皮货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鼓吹开展对华贸易,著有《库克船长最后一次太平洋航行历程》(*Journey of Captian Cook's Last Voyage to the Pacific 1783*)。虽然他未能说服本国商人立即开始对华贸易,但他的宣传活动对于早期中美贸易无疑起了促进作用。美国独立战争后,在财政家罗伯特·摩里斯(Robert Morris 1734—1806年)的倡议和支持下,载重360吨的“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于1784年2月22日驶离纽约港,8月25日抵达广州。1785年5月10日回到纽约。“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开辟了中美交往的新纪元。从1784年到1812年间,有400艘美国商船来到广州。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开始得更早,十八世纪初叶,加拿大的法国移民就把当地生产的人参运到中国。十八世纪末,中加之间进行了大量皮毛、木材贸易。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北美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制造品的数量急剧上升。迄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北美向中国出口的大宗商品是人

参、皮毛、棉花、木材。北美的商人在广州卖掉皮毛等商品后,从中国购进的商品是茶叶、丝绸、土布、瓷器。

最早到达北美大陆的中国人是华工。据研究,早在 1571—1746 年间,西班牙人就在南加利福尼亚雇用华人作造船工。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材料说明,1785 年,有三名华人水手阿新、阿全和阿官受雇于“智慧女神号”(Pallas)。因船长约翰·奥顿奈尔(John O'Donnell)弃舟结婚,三人与其他水手流落巴尔的摩街头。他们向邦联国会申请生活费,后来得到一位专营中国货的商人的照顾。1788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英籍船长约翰·米尔斯(John Mears)在广州招募了一批造船工、木匠、铁匠和水手到温哥华岛上建造船只。1789 年,美国船长梅特卡夫又带来了 29 名华工移民。这就是说,在刘易士(Meriwether Lewis 1774—1809 年)和克拉克(William Clark 1770—1838 年)的探险队到达北美西海岸之前,华人已经开始在那里定居了。有关记载还告诉我们,两名在西班牙探险队中工作的华人先后于 1774 和 1793 年间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受洗皈依天主教。1818—1825 年间,五名华人青年就读于康涅狄克州的康沃尔学校。其中一名叫作廖阿希的皈依新教,据说这是北美华人中第一个新教徒。

中国和北美之间的直接交往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而且为此后扩大交往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当时相互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带来的社会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原因之一在于往返的人数有限。1837 年,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人数为:英国人 158,美国人 44。同期,在北美的华人不会超过百人。其次是语言障碍,1828—1830 年间,在广州的外国人只有三人懂得中文,其中一人是传教士。他们在中国的活动范围有限。中国传统文化轻视商人,北美商人对中国文化缺少兴趣,更削弱了双方的文化交往。中国劳工,无论是造船工还是家庭佣工均限于文化水平,同北美社会的接触范围有限,也没有留下文字记载。

1840年以前,清王朝对北美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往往将英国人和北美人混为一谈,因为他们的相貌、语言、服饰相似。只有个别有经验的商人,才会提出“你不是英国人吧?”或称美国人为“新国民”。美国人到达广州十年后,清朝官员还不能区分英、美,以致英国商人不得不抗诉,指出美国人“另有旗号”,不要把英国人和美国人混为一谈。受理抗诉的两广总督长麟还算是个明白人,答称“今后遇有事件,自应查明旗号办理,不致牵混影射”。1804—1805年间,美国商船来到广州已达34艘之多,美英在广州的矛盾开始尖锐。美国驻粤领事和商人要求广州当局行使权力,主持公道,中国政府拒不受理。美国总统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1—1826年)曾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希望中国政府了解“我们和英国人之间的不同”,从而在政策上有所区分,但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在此期间,北美对中国的认识也很有限,且有不少偏见。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年)于1785年得知中国人不是白种人竟然大吃一惊。早期来到广州经商的北美商人中有不少人对中国的印象不佳。曾任美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的山茂召(Samuel Shaw 1754—1794年)在日记里用“不诚实”、“偶像崇拜”等字眼来描述他对中国人的印象。他认为“在世界上的文明国家中难以找到比中国政府更暴虐的政府”,对百姓层层盘剥,搜刮的钱财全落入官僚与皇帝之手;在宗教方面盛行偶像崇拜;婚姻生活实行多妻制;艺术缺乏创造性。山茂召对中国商人的观感颇佳,说他们“坦率”、“随便”,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对别人的观察很仔细,讨价还价很顽强^①。除了贸易之外,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和北美虽然有了直接来往,但各自对对方社会生活的影

^① Samuel Shaw: *Knavery and Idolatry 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 ed. By Benson Lee Grayson New York, 1979, p. 72—77.

甚微。北美方面,就物质生活而言,少量建筑受到中国模式的影响。有些家庭藏有中国工艺美术品,受到中国造型艺术影响的艺术被统称之为“中国艺术风格”。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雇员,后定居美国,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在费城东北的克劳伊顿建造的住宅,以“中国式的隐居处”闻名于世。该住宅除了有一个中国式的圆顶外,看不出别的受到中国建筑影响之处。1838年,费城商人和收藏家南森·邓恩(Nathan Dunn)举办了一个东方展览会,又称中国博物馆,展品包括身着中国服装的人物肖像、街道模型、手工艺制品。这个博物馆仅维持了三年,后房屋被卖掉,展品运往欧洲,下落不明。^①

这个阶段北美人在中国活动的范围集中在沿海的开埠口岸,来华人员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早期中国移民集中在北美西部,务农、采矿,参与铁路建设。因双方直接接触的人数和地域有限,交往不深,相互的影响甚微。

(二) 初步发展(十九世纪下半叶)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基督教传教事业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向纵深和横广两个方向发展的时期。北美来华的传教士大多属于新教各差会。从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信徒的人数看,新教传教事业的成就远远不如天主教。1900年,中国天主教徒总数为70余万人,新教教徒只有10万多人。天主教的传教人员则要比新教少得多。1870年到1900年间,天主教神甫的人数从250人增加到886人,新教传教士的人数在1864年至1904年间则从189人增至3445人^②。从传播西方非宗教的文化科学知识角度来观察,

① 参阅 William J. Brinker, *Commerce, 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The Beginning of Sino-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Since 1784* Edited by Thomas H. Etzold. New York, 1978, p. 12.

②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596—600页。

新教的影响相对要大得多。其原因恐在于新教传教士更注重教育和医药等非传教性质的事业,以及参与救荒、赈灾、残疾人教育等社会福利事业。基督教文化,特别是新教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基督教在明清之际传入中国时,就被视为异端邪说予以排斥。利用不平等条约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北美新教传教士举步艰难,只能在中国社会的下层活动。他们对中国崇敬祖先、迷信偶像的攻击和指责,更激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抵抗。如果说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民族主义心理的反抗使新教传教事业进展甚微,而非宗教文化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所说的非宗教文化主要指新教传教士带来的政治文化和科学文化。由于这两种文化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它们与中国文化中相应的成分相结合,逐渐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年)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年)等人著书立说、出版报刊、组织社团,宣传在中国进行政治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对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戊戌变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他们在学校里开设外国史地、国际法、数学、自然科学课程,翻译和编纂教材,“使整个一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概念。”^①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是中美两国通过政府关系进行教育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次留学活动在进行了几年之后虽然夭折,但播下了留学生运动的种子。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另一项政府间的重要来往就是交换出版物。自1867年起,美国政府的三个官方机构——史密森博物院、农业部、土地总局先后提出与中国交换出版物的要求。美国政府将50份有关农事、机器及旧金山地理方面的官方文件赠给中国政府,希望得到中国户籍、税收方面的资料。中国方面并未根据美

^①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第624—625页。

国要求提供相应的资料,而是将《皇清经解》、《农政全书》、《本草纲目》、《针灸大全》等十种图书及植物种子回赠。这些书籍于1869年运往美国,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第一批中文藏书。1876年美国在费城举办美国建国百周年纪念国际博览会,清政府派代表团参加,带去的中国客厅陈设、手工艺品(包括风筝)成为史密森博物院最早的一批中国藏品。风筝则是该博物院最早的一件航天藏品。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对北美社会的影响不像北美对中国的影响那样明显。认真分析一下历史事实,就可以发现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地区和加拿大商人使用“飞剪船”(clipper ship)贩运中国丝绸、茶叶、瓷器、漆器和鸦片取得的高额利润是北美原始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资本于美国内战前后投入北美交通、工业建设。在北美西海岸矿山、农田、铁路修建中付出血汗的华工为北美西部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对创造十九世纪北美工业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家范力沛教授(Lyman P. Van Slyke)说得好:“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些贡献是因为飞剪船和中国贸易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中,而且因为华工只是使现有的铁路和采矿技术付诸实施,而没有影响到它们的形式。”^①

(三) 交流的扩展(二十世纪上半叶)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中国对外来文化采取了主动吸收的态度。为了自强,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了更为激进的内容——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武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

^① Lyman P. Van Slyke, "Culture, Society, and Technology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 edited by Michel Oksenberg, Robert B. Oxnam, New York, 1973, p. 138.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主动地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表现。在这个前提下,一方面,已经在中国存在的北美基督教文化,继续有所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 8300 名新教传教士中,美国人占 5000 人,与此同时,也受到不少挫折。经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在华传教士的人数降至 3000 人。另一方面,贸易、外交、军事方面的交往大大增加,美国商人的人数在三十年代增加到 8000 人。美国在华的军政人员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达 6 万人之多^①。这就是说,世俗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值得注意的是,北美传教士为了适应中国发生的变化,也越来越多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

由于北美国家采取排斥华人入境的移民政策,中国向北美的移民在数量上有所减少。在种族主义的高压下,北美的华埠成了华人逃避迫害的避难所。华人融入北美主流文化的趋势减弱了。另一方面,中国留美学生则因美国政府决定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于教育交流人数显著增加。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体,中国留学生通过华美协进社之类的民间友好组织和其他有组织的和个人的活动使中国文化得以在北美传播。与此同时,也把北美文化中科学和民主精神带回祖国,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耐人寻味的是,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倾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北美文化中崭露头角。它是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吸取养分为特点的。英美意象派的诗人不仅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中得到意象的启示,而且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凝练、含蓄、精美中学到了创作方

^① Lyman P. Van Slyke, "Culture, Society, and Technology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 in *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 - 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 edited by Michel Oksenberg, Robert B. Oxnam, New York, 1973, p. 139--140.

法。很可能也是在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下, 审美的情趣和标准有了变化, 中国的艺术品继日本的艺术品之后受到北美收藏家和博物馆的垂青, 成为他们的收藏对象。

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化交流中的另一个新现象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兴趣增加, 一批专业工作者通过不同途径来华讲学和从事科学考察。

表 3 二十世纪上半叶北美来华知名科学技术工作者

姓名	生(卒)年	来华时间、途径	主要业绩	备注
亚当斯·乔治(Adams, George I.)	1870—1932年	1908年应聘来华	1908—1910北洋大学地质学教授、1915—1920年北京大学教授	1920年以后在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任教
塞维廉(Adolph, William Henry)	1890—1958年	1915年来华在齐鲁大学任教	1915—1926年在齐鲁大学任化学教授。1926—1948年在燕京大学任教。1948—1951年任协和医学院生化教授。1946—1948年曾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	主要从事有关中国人营养化学和营养生理方面的研究
安得思(Andrews, Roy Chapman)	1884—1960年	1916年首次来华, 旅行西藏	作为美国自然博物馆研究人员于1916—1930年间曾七次率队来华考察。1928年在张家口因收集中国文物触犯刑律被扣	著有《穿过蒙古大草原——一个博物学家对中国大西北的报道》(1921年)等书
卜凯(Buck, John Lossing)	1890—1975年	1915年通过美国长老会国外传道会来华在安徽从事农业传教活动	1920年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建农业经济系, 任该系主任、教授迄于1934年。1935—1940年任美国财政部驻中国代表、中国财政部顾问, 1940—1944年回金陵任教。其前妻即美国作家赛珍珠	著有《安徽芜湖附近120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1924年)《中国的土地利用》(1929—1933年)等专著多种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来华时间、途径	主要业绩	备注
葛德石 (Cressey, George B.)	1896— 1963年	1923年来华 任教	1923—1929年在上海沪江大学任地质地理学教授。同期曾在蒙古、西藏和中国内地进行田野考查	著有《中国地理基础》(1934年)、《五亿人民的国家:中国地理》(1955年)
晏文士 (Edmunds, Charles Keyser)	1876— 1949年	1903年来华	1903—1907年任广州基督教学院(岭南前身)物理学教授,1908—1924年任岭南大学校长	著有《中国人中间的科学》(1911年)
祁夫锡 (Gee, Nathaniel Gist)	1876— 1937年	1901年来华	1901—1915年任苏州东吴大学自然科学教授。1915年创办生物系,为我国最早的生物系,任该系教授、系主任迄于1920年。1922年起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医学委员会任职,长驻北平。1932—1935年任燕京大学美方校长	著有《植物学教程》(1915年)、《被社会遗弃的阶级——略记中国的乞丐》(1925年)
葛利普 (Grabau, Amadeus William)	1870— 1946年, 逝世于 北平	1919年由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聘请来华(因亲德,为哥伦比亚大学所不容)	1919年任地质研究所顾问,主持古生物研究工作,1920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主持古生物调查工作。二战期间被日方拘留	著有《中国地层学》(1923年)
格拉汉 (Graham, David Crockett)	1884— 1961年	1911年由美国浸礼会海外传教会派遣来华	1911—1948年在四川宜宾地区传教,1919—1939年间曾14次率领夏季考察队至川藏边境考察,1929年为史密森博物院收集到最早的一张大熊猫皮	著有有关四川宗教、少数民族专著多种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来华时间、途径	主要业绩	备注
兰安生 (Grant, John Black)	1890— 1962年	出生于宁波加 拿大传教士家 庭	1922—1933年任协和医 学院公共卫生学系教授、 系主任。1918—1960年 在洛克非勒基金会国际 公共卫生部中任职	
格里弗因 (Griffing, John B.)	1885— 1962年	1919年来华	1919—1927年在金陵大 学任农学教授。1922— 1927年任农业技术推广 部主任。1920—1922年主 持改进植棉的研究项目	
格罗福 (Groff, George Weidman)	1884— 1954年	1907年来华	1907年起任岭南大学园 艺学教授。组建岭南大学 农学院, 1921—1924年 任院长。1937年曾率领美 国国家地理学会—岭南 考察队到广西西北考察	著有《美中农业 的交互作用》 (1911年)
哈克纳斯 (Harkness, Ruth)	1901— 1947年	随夫动物学家 威廉·哈克纳 斯来华, 1935 年其夫因追捕 熊猫负伤在上 海去世	卢斯决心完成其夫遗愿, 组建一支考察队于1936 年在川藏边境捕捉大熊 猫。其本人捕获一只刚出 生的大熊猫运回美国, 1938年, 又获得一只大 熊猫标本	著有《淑女与熊 猫, 历险记》 (1938年)
胡恒德 (Houghton, Henry Spence)	1880— 1975年	1906年来华	1906—1911年任芜湖总 医院医师。1912—1917 年任上海哈佛医学校主 任。1918—1928年任北 京协和医学校代理校长、 校长。1937—1944年任 协和医学院院长。1941— 1945年为日军囚禁, 1946年回国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来华时间、途径	主要业绩	备注
胡美 (Hume, Edward Hicks)	1876— 1957 年,生于印度 美国传教士家 庭	1905年通过 雅礼会来华	1906年参与建立雅礼传 教医院。1906—1923年 任高级医师。1914年在 长沙组建湘雅医学院。 1914—1927年任院长。 1923—1927年任雅礼学 院院长	著有《道—风同 ——一个美国 医生在中国的 生活》(1946 年);《中国式医 学》(1940年)
娄德尔米克 (Lowder- milk, Walter Clay)	1888— 1974年	1922年来华	1922—1927年任金陵大 学林学教授。1942—1944 年在重庆中国政府任职	著有《中国、以 色列、非洲、美 国的土壤、森林 和水土保持》 (1969年)
莱曼 (Lyman, Richard Sherman)	1891— 1959年	1931年来华	1931—1932年任国立上 海医学校神经病学副教 授。1932—1937年任北 平协和医学院神经病学 副教授,在职期间组织了 首次汉语失语症测试	编有《中国神经 精神病学的社 会心理学研究》 (1939年)
麦克卢尔 (McClure, Floyd Alonzo)	1897— 1970年	1919年来华	1919—1927年在广州基 督教学院(岭南大学前 身)讲授园艺学,1928— 1932年任植物学教授。 1936—1940年任经济植 物学教授。1924年以后 建竹子标本室,成为世界 研究竹子的权威	著有《对竹子的 新看法》(1966 年)
莫尔思 (穆尔思) (Morse, William Reginald)	1874— 1939 年,生于加拿 大	1909年经美 国浸礼会国外 传道会来华在 四川叙州府 (今宜宾)	1914—1938年任成都华 西协和大学解剖学和外 科学教授。1919年任医 学院院长,1935年任医 学和牙科学院院长	著有《中国的医 学》(1934年)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来华时间、途径	主要业绩	备注
罗克(Rock, Joseph Francis Charles)	1884—1962年, 出生于奥地利	1920年来华	多次率探险队来华进行生物学考察(1920—1921年, 1923—1924年, 1924—1927年, 1927—1930年, 1930—1932年, 1932—1933年), 卜居云南迄于1949年	除生物学论著外, 还著有《中国西南部的古代纳西王国》(1947)并发表了关于纳西族论著多篇
陶德(Todd, Oliver Julian)	1880—1974年	1919年来华	1919—1921年在山东勘察大运河, 任华洋赈济会工程师迄于1935年。曾参与治理黄河工程, 在西北建设灌溉系统, 在汉口组织防汛工作	著有《在华二十年》(1938年)
塔克·玛格利特·埃莫莱茵(Tucker, Margaret Emmelin)	1907—1975年 生于山东	1935年通过联合美以美会全球牧师委员会来华	1935—1941年在福州医院工作。1945—1950年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放射学、医疗物理学教授	
魏利斯·贝莱(Willis, Bailey)	1857—1949年	1903年来华	作为美国地质调查团成员于1903—1904年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	著有《友好的中国, 在中国人中步行两千英里》(1949年)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人名辞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Shavit, David: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199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结盟关系使中国和北美国家之间的关系空前密切, 文化交往更加频繁。1943年, 英美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

条约,取消在华的治外法权,美国开始大规模援华。美国军官、士兵、军用物资、药品和其他商品(如尼龙袜)飞越“驼峰”到达大后方。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方面(美国电影大量涌入)的交往都是空前的。但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作为盟友和战友美国的形象在普通的中国人心目中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这首先同罗斯福总统制定的“先欧后亚”方针有关。这一战略原则使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人都感到不舒服。直接来往多了,双方的文化差异变得愈益明显。美国式的傲慢无礼,使中国人难以忍受。这种情况在过去的来往中已屡有发生。中国留美学生对此感受最深。美国人往往并无恶意地发问,中国是否需要让日本将中国完全征服后才能实现统一和复兴?林语堂在回答同类问题时气愤地说:“这根本不可能!”(They won't get a Chinaman's chance)盟友关系、大国地位并没有使文化交往增值。费正清对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的中美关系有一段中肯的评述:在中美签定新的平等条约“不到5个月,另一个协定达成了,使美国在中国的军队不受中国法庭的刑事管辖。不久,美国基地、供应和运输部门、无线电网、航空线和陆军邮政局在中国领土上执行任务,其规模之大和行动的放肆是中国西南各地即使在不平等条约下也从来没有见过的。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许多个月充满了美国士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这些也都是通商口岸时代所未有的情景。对中国的新的的大国地位来说,这非常不得体”。^①

(四) 从对抗到解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中美之间在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对抗从文化角度观察有其必然性。如前所述,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曾寄希望于美国,不仅把美国看做科学、民主社会的楷模,而且指望从美国得到对

^① [美]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62页。

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帮助。这个希望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落空了。威尔逊总统没有让公理战胜强权,而是在强权面前退缩,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美国幻想的破灭使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希望转向刚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俄国。当美国政府全面执行扶蒋反共政策,用美国的飞机大炮屠杀中国无辜平民的时候,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的科学就成了杀人的武器,而美国的民主就成了一块越剪越小的遮羞布了。朝鲜战争更加强了这种印象。中美之间出现了从政治、经济、军事到社会思想文化的全面对抗。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孜孜不断追求的目标,所以就是在全面对抗的情况下,中国也没有忘记通过第三方吸取北美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争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同时还长期聘用了一批同情中国革命事业的北美专家。中国的台湾和港澳地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与北美的文化交流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在北美方面,学术界并没有因为全方位的对抗而停止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如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他们为增进北美对中国的了解,促成中国和北美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贡献。最沉重的一页是双方都有一批在改善中美关系、促进文化交流方面做出过努力的官员、学者和专家受到政治迫害。有的人流落他乡,有的人含冤辞世。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均进行了有利于关系缓和的调整,双方终于走到谈判桌前来了。在此过程中体育交流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毛泽东巧妙地开展乒乓外交,用小球推动大球,化干戈为玉帛,化宿敌为朋友,多年的坚冰终于化冻了。

(五) 新时期(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与北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的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其特点之一是双方政府都非常重视这方面的

交流,而且直接参与了交流,签订了不少政府间的合作与交流协议,并以政府拨款的形式支持交流,因此交流的规模扩大了,持续性也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行为带动了地方政府和民间,形成了全国上上下下,各行各业的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方式的大交流。从交流的内容看,文化教育交流紧紧围绕着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以及大家共同关心的其他全球性问题展开,堪称丰富多采。这种全方位的交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大众文化的异质化和多样化。只要看一看我国城市和乡村流行的电子游戏机、激光唱盘、影视盘、摇滚乐、牛仔裤、T恤衫、可口可乐、麦当劳快餐、好莱坞电影和时装模特儿的表演,就可以了解到北美的大众文化有多强的穿透力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北美大众文化的渗透力必将更不可挡。我们当然不能因噎而废食,再走闭门锁国的老路,然而,在发展同北美地区教育、科学、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注意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提高全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和鉴别能力,则是应该着重强调的。

中国与北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属于不同质文化之间的交流。所谓不同质,是指两种文化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形成的,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价值观、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表意系统、社会习俗不同之处远远超过相似之处。中国与北美之间的文化交流不同于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之间的文化交流,因为后者交流的双方均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它也不同于北美与欧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因为交流的双方同属于基督教文化范围。中国文化与北美文化不仅有着不同的起源和传统,而且有着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和差距。就整体而言,北美文化是一种现代文化,基本上没有封建的成分。中国则不然,恰恰以自己的古老文化自豪,以漫长的封建文化著称。当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北美已经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完成了工业革命,逐渐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当中国的经济开始起飞,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初步实现工业化时,北美社会已经

进入后工业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和差距造成了文化交流中的矛盾和冲突：互补和兼容、不平衡和曲折。

中国与北美的文化交往是从冲突和对抗开始的。这是由北美文化的进取性、扩张性和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所决定的。当北美传教士凭藉不平等条约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与中国文化有了更直接、更深入的接触和碰撞之后，中国文化的封建性质和北美文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暴露得更为清楚。崇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一神教与崇敬祖先儒、道、佛合一的多神教的冲突，自由、民主、平等观念与封建专制等级观念的冲突，以个人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同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伦理观之间的冲突，崇尚科学与耽于封建迷信之间的冲突渐次展开。中国现代文化诞生后，在内部出现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的论争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反映和内化。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北美文化中绝少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它与生俱来的资本主义性质同有较多封建主义痕迹的西欧文化相比，同中国以封建主义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反差更大、冲突更尖锐。中国的君主立宪派宁可以英国和日本的“虚君共和”为楷模，而不愿接受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文化交往中的冲突与对抗，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兼容与互补。中国在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后，有识之士认识到北美文化中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对中国文化有积极意义。中国留美学生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做出的最大贡献恰恰在“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方面。五四运动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面大旗，至今仍不失其实效。从北美社会文化演进的历程看，当它面对着高科技发展和经济发达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失业、贫富不均、犯罪、吸毒、爱滋病，环境污染而感到束手无策时，就不得不转向东方，在古老的东方文化中寻求答案。克林顿总统在一篇重要讲话中引用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名言来说明大政府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要减少政府干

预^①。在北美的书店中,《易经》、《道德经》以及其他儒、道、佛经典的英译本琳琅满目。图书馆中这类著作的出借率很高,而且留下了读者仔细阅读的标记。近年来,北美国家从政府、企业到教育部门,都在强调家庭本位、合作、伙伴关系和团队精神。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东西方文化、中国与北美文化互补的表现。

社会性质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的差距对文化交流的另一个影响是交流的不平衡性。既然是交流,理应是双向的。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与北美的文化交流中存在着势差。大量的科技知识、信息及其各种载体:书籍、报刊、影片、电视片、磁带、光盘和各种仪器设备从北美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从中国流入北美的文化商品数量有限、品种不多,主要是中国的动植物标本、古典艺术品、工艺美术品。近年来,因中国工业化水平提高,情况才有所改变。在人员交流方面,中国赴北美的留学人员主要是理、工、农、医等领域的专业人员和学生。北美来中国的留学人员大多来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广大公众而言,普通中国人掌握的有关北美的知识要比普通北美人掌握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多得多。从交流的后果看,通过交流引起的社会变迁,在中国也要比在北美表现得更为明显。

正因为如此,政治干预文化交流的现象屡屡发生。它往往起着激化矛盾的作用,造成了文化交流中的一波三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的曲折性。如果我们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视为一个长波段,在一百年间至少经历了三次大波折。北美的排华运动和中国义和团反帝运动是第一次大波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反帝高潮是第二次大波折;1949年以来中美的全面对抗是第三次大波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Clinton, at 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 Dinner Sheraton Washington Hotel, Washington, D. C. Thursday, May 16, 1996. Foreign Policy Background, May 21, 1996.

折。一位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变化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1)服从时期(1784—1841年)；(2)藐视时期(1841—1900年)；(3)家长制作风时期(1900—1950年)；(4)心怀畏惧时期(1950—1971年)；(5)尊重时期(1971年至今)。著名美籍华人哲学家杜维明用六个字总结了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羡慕、矛盾、对峙^①，也可以用闯进来、赶出去、请进来概括这一波三折。最严重的波折会使正常的文化往来为之中断。这当然是人们不愿看到的。然而从全局看，从文化交流的全部历史看，有波折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有助于双方更全面地了解对方。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中国与北美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而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与北美的文化交流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参与其事的人数之多、涉及的方面之广、渠道之多样、层次之深入、影响之广泛，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信息技术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它可以克服过去难以逾越的时、空障碍，通过计算机互联网进行文字的、语言的、声音的、动静图像的单项与综合的直接交流。它对于文化交流已经带来了很大的便利，长远的影响难以估量。加拿大、美国都是信息技术发达的大国，从技术知识、技术装备、管理制度到信息社会的理论，中国可以吸取的养分很多，与此同时北美方面也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手段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古老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交流的广泛性和深入性一定会大大加强。

^① Warren I. Cohen, "American Receptions of China"; Du Weimi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America" in *Dragon and Eagle* edited by Michel Oksenberg et al. p. 55, 92—106.

第三节 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状况

一、本志的叙述范围和框架

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所提供的资料,中国与美洲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晚期或新石器早期。中国人何时到达美洲与美洲的发现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感兴趣的问题。为了明确分工、突出重点,本志的叙述范围限制在十八世纪以来我国与北美的文化交往。古代中世纪部分列入本通志的中国与拉美文化交流志撰写范围。

本志由十二章组成。第一章导言首先对北美文化特点作出介绍。然后将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的沿革分为五个阶段来介绍,即:早期接触;发展阶段;交流的扩展;从对抗到解冻;新时期。本书作者认为,中国与北美的文化交流是不同质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有长期积淀的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交流。这种质的差异决定了文化交流具有冲突性、互补性和曲折性。北美传教士和华人移民揭开了中国与北美直接交往的帷幕。到北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对于促进北美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北美人与国共两党的接触、交往构成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双方文化关系的主要内容。这四个专题划定了双方文化交往的格局,分别写成第二、三、四、五章。以下六章分述文化交往的不同侧面。先从制度文化入手介绍北美企业管理制度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影响(第六章),然后叙述杜威教育思想与中国学制改革(第七章)。第八章介绍私人基金会在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私人基金会是大企业的派生物,对北美教育文化事业和国际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其实力至今不衰。第九章、第十章的主要内容分别是北美文学在中国、中国文化艺术在北美,力求说明交

流是双向的。第十一章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美国看法的变化,较多地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中国与北美,特别是中美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工作的热点,成果累累,不胜枚举。相形之下,文化关系方面的论著为数有限,总的情况是专题研究多,综合性论著少。像罗荣渠的《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输入中国》^①和范力沛的《中美关系中的文化、社会和技术》^②,这样的文章是较为罕见的。中国台湾学者汪一驹用英文发表的专著《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论述中国知识界与西方关系的专著,取材相当丰富,分析也有独到之处,可惜作者站在国民党当局的立场上观察问题,未免失之于偏颇。美国学者韩德(Michael Hunt)著《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迪安(Hugh Deane)的《善行与炮舰,美中邂逅两世纪》(*Good Deeds & Gunboats, 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Chinese Encounters*, 1990),主题虽然是美中一般关系,但是作者在文化关系方面落墨不少,很有参考价值。沃伦·科恩(Warren I. Cohen)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美中关系史》(*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90)一书也应作如是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年)的《美国与中国》(*The Unit-*

① 《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② Lyman P. Van Slyke: "Culture, Society and Technology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1978, p. 124-159.

ed States and China), 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 12—15 卷都有不少篇幅涉及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文化交往关系。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史新编》(*China A New History*, 1992) 较充分地吸收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最新成果, 对于美国基督教和慈善机构介入中国的改革有颇为中肯的论述^①。最值得称道的是费正清夫人威尔玛女士(Wilma Fairbank)的专著《1942—1949 年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实验》(*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1942—1949*), 是一部美中文化交流史的断代专著, 根据大量档案资料写成, 作者本人又是当事人, 有切身经历可作佐证。

专题研究发展很不平衡。讨论思想文化、制度文化交流的论著汗牛充栋, 关于物质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为数寥寥。传教士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媒介, 西方学术界一向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耶鲁大学教授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884—1968 年)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虽然出版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但该书取材丰富, 史料翔实, 至今仍有较高参考价值。哈佛大学于 1966 年出版的论文集《美国传教士在华言行论丛》(*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Paper from Harvard Seminars*), 对北美传教士参与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改革, 传教士对于反帝爱国运动的反应有较深入的研究。美国亚洲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组织专人为北美新教差会在华创办的 13 所大学一一树碑立传, 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在美国出版。其观点有可商榷之处, 其资料有较高价值, 是研究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专著。汤姆森著《当中国面向西方: 美国改革者在民族主义的中国》(James C. Thom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和史景迁的《改变中国: 中国的西方顾问 1620—

^① 参阅《中国史新编》, 第 260—262 页。

1960》(Johnathan Spance, *To Chang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勾画了美国人对中国近代化所作的贡献。近年来,我国学者发表了不少关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论文和专著。这些文章与五六十年代批判美帝国主义,指责传教士是侵华急先锋的论著不同,基本上肯定了传教士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所起的误导作用^①。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和《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②是比较有分量的两部专著,引用了大量教会文献。宋家珩等编的《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利用了加拿大的档案,并在河南进行了调查,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③。留学生运动也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留学生》、《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④。美国学者更注意当代留学生问题与教育文化交流。兰普顿等著《一种关系的恢复:美中教育交流的趋势,1978—1984》以留学人员为主体全面研究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教育交流的状况。利奥·奥林斯著《中国学生在美国,政策、问题和数字》是《一种关系的恢复》的续篇,根据美国移民局的统计资料 and 没有正式出版的调查报告对八十年代中国留美学生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⑤。卡尔格伦与西蒙合编的《关于中美教育交流经验论文集》对于了解美国方面对中美

① 梁碧莹:《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陈绛:《林乐知与〈中国教会新报〉》,《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85年版。

③ 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④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⑤ David Mand Lampton et al: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es, 1978—1984*,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 C. 1986; Leo A. Orleans: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Policies, Issues, and Numbers*,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 C. 1988.

教育交流的看法及其历史根源很有帮助^①。加拿大学者许美德女士(Ruth Hayhoe)研究中国教育多年,著有《中国的大学与开放》(*China's Universities and the Open Door*),其中有关中国留学生和美国、加拿大政策部分颇具参考价值^②。此外,关于美洲和美国华侨史的研究近年来也有长足的进步,不少论著和译著陆续问世^③。用英文写成的美国华侨史很多,Shih-shan Henry Tsai 著《中国人在美国的经验》是其中较好的一种^④。中美文学的相互影响是文学工作者深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围绕着马克·吐温、海明威、奥尼尔在中国,中国文化在美国流传和影响等课题都发表了一些有一定质量的研究成果^⑤。从文学研究引发出来的形象研究也被应用到中美文化关系上来。华裔学者杜维明和陈依范均撰有“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的论文。美国学者以“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为题的论著也屡有所见。如戈里森(Benson Lee Grayson)编《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伊萨克斯著《心上搔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形象》、沃伦·科恩(Warren I. Cohen)的论文《美国人的中国观》。本志第十一章就是在这些著作启发下写成的。此外,还有一大批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中重要人物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比较重要的如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① Joyce K. Kallgren and Denis Fred Simon ed: *Educational Exchanges. Essays on the Sino-American Experienc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7.

② *A publication of 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M. E. Sharpe, Inc, 1989.

③ 如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美]宋李瑞芳:《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陈依范:《美国华人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版。

④ Shih-shan Henry Tsai: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⑤ 如常耀信:《中国文化在美国文学中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1985 年第 1 期;龙文佩:《奥尼尔在中国》,《复旦学报》1988 年第 4 期。钱满素著:《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09)、祁兆熙:《游美洲日记》(1874. 9. 19—1875. 1. 8)、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胡适留学日记》、汉密尔顿的《斯诺传》(John Maxwell Hamilton; *Edgar Snow, A Biography*) (1988)、孟志(Chih Meng)的《中美理解,六十年之追求》(*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A Sixty Year Search*) (1981)、蒋梦麟的《西潮》(*The Tides from the West*) (1947)、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7年)的《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 (1954)、费正清的《对华回忆录》(*Chianbound*) (1982)、拉铁摩尔的《中国回忆录》(*China Memoirs*) (1990)等。这些传记作者和当事人的观察、体验,以及所进行的综合、概括,不仅是珍贵的史料,也应看做专门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迄今还没有见到过一部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和北美洲两大文化特点,阐述两者之间的交流,并揭示对双方社会发生影响的历史学专著。本志所承担的这项任务不仅仅是继承而是必须有所创新和发展。

第二章 传教士——文化交流的开拓者

第一节 早期活动

一、初到中国

十九世纪初,基督教新教开始传入中国。最早的是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他们热衷于把《新约》译成中文,经多年努力于1811年完成。全部《圣经》是在1822至1823年间译成中文的。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于1805年起筹划在中国的传教事宜。1807年派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经纽约,越过太平洋来到广州,1814年吸收了第一个新教徒蔡高。美国国外布道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Countries)步伦敦传教会的后生于1830年派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年)等人来华传教。这是十九世纪初美国东北部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的产物。这个运动的目的之一是在基督教影响未到的地区传播福音。早期派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是在虔信主义影响下成长

起来的。他们深信原罪说,把自己看作上帝旨意的工具,肩负着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使命,具有一种坚韧不拔的奉献精神。广州的美国传教士花了七年时间,才赢得了第一个信徒。1847年来到我国福建传教的美以美会(属卫斯理宗)则用了十年时间。这种情况促使他们探索新的有效的传教方法。

通过办学校,向青少年灌输基督教义自始就是新教各差会扩大其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马礼逊学校是英美传教士在中国境内最早创办的学校,1839年11月建于澳门,其宗旨是“让当地青少年受到中英两种语言的教育,以此为手段使他们接触到西学的各个领域。圣经和基督教的书籍应作为学校的课本。”^①耶鲁大学毕业生萨缪尔·布朗(Samuel Brown 1810—1880年)受聘为专任教师。学校开设的课程除中英文外,还有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地理等。布朗认为学校教育应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一个“完人”。这所教会学校存在的时间不到十年。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最早的西医和训练有素的英语翻译人员都是该校的毕业生。继马礼逊学校之后,美国长老会先后在宁波、广州创办崇信义塾和寄宿学校。美以美会、圣公会则分别在福州和上海创办主日学和女塾。

行医治病、创办医院是北美传教士扩大在华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纽约长老会传教医师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9年)于1834年来华,在商界的帮助下于1835年11月在广州开办了一家眼科医院。三个月内就有925名患者求诊,其中妇女270人^②。伯驾通过做外科手术,诊病治疗,广泛结交各界人士,乘机进行宗教活动。至1837年底,接待病人累积达4575人,年开支1692.24美元。为了取得美国和

^① George H. Danton: *The Culture Contacts of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p. 52—53.

^② *Chinese Repository*. 1836, p. 409.

欧洲教会的援助,伯驾与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g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于1838年2月21日共同组织“广州医务传教会”(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有了充分的资金来源,医疗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到1844年7月来院就诊的患者累计达3万人,包括清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林则徐的小肠疝气就是靠伯驾的疝带治愈的^①。1853年,毕业于杰弗逊医学院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医师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年)来华,在伯驾创办的医院中工作。伯驾出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后,眼科医局的工作全部由嘉约翰负责。传道活动与医疗活动逐渐分开。医局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

出版书刊是北美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的又一重要方式。

表4 十九世纪上半叶英美来华传教士出版主要书刊

年份	编著者	书刊名称	宗旨及内容
1815	马礼逊、米怜	察世俗每月统纪考(中文)	灌输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
1832	裨治文、卫三畏	中国丛报(英文)	报道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况以及中外关系
1833—1837	郭实腊、裨治文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文)	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特别是西方各国在亚洲的殖民地
1834	裨治文	广州市及其商业介绍	
1834	裨治文	美利哥国志后改名为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第三版(1861)定名联邦志略	全面介绍美国史地及政治制度
1842		中国广东话注解文选	分17目用中英文相互注解
1842	卫三畏	简易汉语教程	
1844	卫三畏	中国地志	
1848	卫三畏	中国总论	

在这些报刊中,《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连续出版近二

^① Danton: *The Culture Contacts* p. 51.

十年,颇具影响。裨治文在该报第一期中说,尽管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交往时间很长,但在智性和道德方面的交流甚少。《丛报》出版的目的是要填补这一空白。他指出,“中国提供了世界上最广泛和最有兴趣的研究领域”。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该报刊登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和风土人情和自然地理的文章和资料。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裨治文的《中国的刑法》,伊拉·特拉希(Ira Tracy)的《中国妇女状况》,卫三畏(Samuel Well Williams 1821—1934)的《中国的农业》、《中国的祖先崇拜》,摩理逊的《中国政府的结构》,劳瑞(W. M. Lowrie)的《中国诗歌》,爱德温·斯蒂文斯(Edwin Stevens 1802—1837)的《中国的神学》等^①。其他像中国妇女缠足的历史、中国的军事技术、中国的对外关系也都有专文论及。

二、北美传教士与太平天国

传教士同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的直接接触发生在1836年。当时洪秀全正在广州参加乡试。他走出考场,碰到一位传教士向他说教并把教会出版的由英国伦敦会的华人助手梁发执笔编写的《劝世良言》送给他。洪秀全七年之后才认真阅读此书,从中得到启发,自行“洗礼”,成立“拜上帝会”,在广西境内传教。洪秀全于1845—1847年间先后撰写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三篇文章。为后来太平天国制定其政治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

1837年3月,洪秀全、洪仁玕同往广州,从美国浸礼派传教士罗孝全(Issacher J. Roberts 1802—1871年)学道两个月。浸礼宗是新教的一个教派,1608年在流亡阿姆斯特丹的英国分离派教徒中成

^① *Chinese Repository* 2 (November 1833):310—12;18(July 1849):363—84;1(July 1832):102—3;and 2(November 1833):318—24.

立。美国浸礼宗由罗吉林·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 1603—1683年)于1639年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创立。1814年成立“美国浸礼宗宣教协会”,1826年又组成“美国海外布道会”。1836年该宗传入我国。该宗认为,实行全浸是洗礼的合法形式,符合圣经原则;教会应是教徒的自治团体,实行公理制;主张信仰自由,父亲亦不能强迫儿子入教。坚信教徒可以与上帝直接沟通,不承认圣礼,否认神职人员和教会的中介作用。罗孝全于1837年自费来华,后成为浸礼传道会正式成员,1842年迁至香港,1844年转至广州。1846年开始与洪秀全通信。1847年,洪秀全、洪仁玕应罗孝全的邀请来到广州,住在罗的寓所。洪秀全在罗处首次接触到基督教文献——《圣经》的汉译本,阅读了传教士写的劝世文,参加了礼拜,对基督教的礼仪和组织有所了解,但并未受洗。1847—1848年洪秀全继续在广西传道,又先后编写了《原道觉世训》、《太平天日》。他把基督教的“十诫”改为“十款天条”,确定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之弟,下凡人间,拯救人世,杀灭阎罗妖。

太平天国于1853年定都南京。罗孝全闻讯后由广州赴上海打算去南京会见洪秀全,为当时在上海的美驻华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 1812—1872年)以不符合中立国侨民身份为由劝阻。接替马沙利的麦莲(Robert Milligan McLane, 1815—1898年)于1854年在裨治文陪同下乘军舰由上海至南京访问,准备执行美国国务院关于承认既成事实的训令。麦莲的访问被太平天国当局看成是“效忠”的表现。太平天国的代表对他说:“如果你们真正尊敬上天和承认我们天国的主权,那么视天下为一家,将各国联为一体的天国政府可以肯定你们的忠诚,允许你们年年朝贡,从而成为天国的臣民。”^①这种

^① 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9 p. 293; John W. Fost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Boston, 1903 p. 210—211.

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态度使麦莲大为失望,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无论世界各文明国家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期望是什么,他们显然并不相信也不懂得基督教义。无论他们的政权是以何种真实的判断为基础建立的,不容置疑的是,同他们的交往无法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①麦莲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造反者不宜给予事实上的承认^②。随同麦莲访问天京的裨治文在回上海后写的一份报告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信条虽也承认《圣经》全部或大部分教义,但由于无知或刚愎自用;或者兼而有之,因而错误甚大。报告认为,也许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③

1860年10月13日至1862年1月20日,罗孝全应洪秀全的邀请在南京住了15个月。罗孝全被封为义爵,任外务大臣,辅佐洪仁环。罗在一封给差会的信里说:洪秀全“要我到这里来,但不要我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劝化人民信奉上帝。他是要我做他的官,宣传他的主义,劝导外国人信奉他……我相信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是实在反对耶稣福音的,但是为了政策的缘故,他们给予了宽容。可是我相信,至少在南京城内,他们是企图要阻止其实现的。”^④罗孝全确信洪秀全已接近精神错乱,并说任何传教士如果在天京不承认洪是上帝的代表就会有绝大的危险^⑤。他在《北华捷报》发表的文章对太平天国不许外国传教士传教极为不满,攻击太平天国只宣传“政治的宗教”。

在众多访问过天京,或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当中,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Martin 1827—1916年)一直对太平天国持肯定态度。

① Foster. 上引书 p. 211.

② 欧内斯特·梅等编,齐文颖等译:《美中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③ 参阅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④ 同上书,第75页。

⑤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p. 293—294.

1856—1857年间曾三次写信给当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的顾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年),主张承认太平天国政权。在他看来“这个革命运动的成功,对于基督教是大有用处的;反之,它的消灭却是大有害的”。对于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不同于西方,丁韪良为之辩护说:“或谓他们的基督教是假的,因之形势不同,然而基督教在开始时期,其形象几时不是假的呢?……今所指为假的基督教,又有谁敢说它将来不会极有助于真正的基督教的发展呢?”直到太平天国失败后,他还在为西方列强失去了变中国为基督教国家的这一次“千年不可再得的好机会”而感到惋惜。^①

传教士和基督教义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趋于极端的回答:一种回答过分夸大了传教士的作用,认为没有英美传教士在两广地区的传教活动就不会有拜上帝会和金田起义。另一种回答,完全否认北美传教活动的作用,强调没有清政府与农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就不会有太平天国起义,“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②这两种看法都未免失之于偏颇。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很难完全抹煞基督教的影响。太平天国奉《圣经》为要典,肯定上帝与教徒直接沟通,反对崇拜偶像,允许成人受洗,废除传统丧葬仪式,每七天有一个安息日,所有这些,无疑是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影响的结果。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全过程中,天主教损失惨重。这是因为太平军和清军双方都把天主教会当成敌对势力。天主教堂的神龛被太平军视为偶像崇拜而加以破坏。仅1853年在南京、扬州、镇江等地被处死、逮捕和失踪的天主教徒有600人。传教士被杀的也时有所闻。清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93—94页。

^②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军认为太平军渊源于天主教,对传教士抱怀疑态度,经常将他们投入监狱。清政府还命令北京南堂将屋顶的十字架拆掉;在广西曾将一名传教士以通匪罪名处以极刑。^①

三、“新天定命运”在中国

(一)“新天定命运”

十九世纪末,随着美国西进运动的完成,边疆地区的消失,美国扩张主义的目光从北美大陆转向海外。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为美国囊括北美大陆张目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说,以新的面貌出现,被称为“新天定命运”。其特点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安格鲁—萨克逊种族优秀论,主张美国向海外扩张,以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在这股扩张主义势力的影响下,宗教界也出现了向海外传教的新浪潮。

在此期间,北美的新教差会发生了几件引人注目的事情。首先是基督教青年会运动的兴起,并由英国扩展到美国,在美国大学校园中纷纷建立分支机构。向海外传教是它们所关注的一项重要活动。其次是1866年在美国开始的海外传教学生志愿运动,数以千计的学生奔赴海外投入传教事业。“为了让上帝的王国占领中国人的心灵”,传教士把办学校、建医院、参与中国的社会改革(办洋务,维新、变法)作为传播福音的重要手段。由传教活动和办洋务的需要所引发的留学生运动也开始影响中国的文化生活。

(二)北美差会深入中国内地

1844年中美签定的《望厦条约》为传教活动提供了保障。条约使传教士获得建立礼拜堂的合法权利,并责成中国政府保护包括教士

^① Lalow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in China*. p. 300.

在内的所有美侨的身家安全。有关领事裁判权的条款使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这就为以美国为首的新教传教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使十九世纪下半叶成为新教差会在中国的影响迅速扩大时期。

1856年只在南方四个沿海省设有传教站,到1898年传教站遍及十八个省和东北地区。北美传道会与英国传道会的扩展路径不同,后者沿长江而上,自东而西,深入内地。美国传教士则是由南而北,从广东、福建北上至山东、河北,分别在北京、通县、保定、烟台、登州、济南等地建立了他们的传教站。然后,以上海为基地,步英国传教士的后尘,沿江而上,在武汉建立传教站,进而在四川立足。加拿大传教士进入中国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他们先在台湾北部地区传教,然后进入河南。九十年代抵达四川。从传教士的人数看,美国来华传教士1845年20人,1848年44人,1855年46人,1858年55人^①。1872年以后增至150人,1898年967人。1900年超过1000人。1930年达3000人^②,85年间增加了150倍。这些传教士来中国前大多学过中文,但对中国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所知甚少,相当一批人对中国文化抱怀疑、批判态度。当他们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据统计,传教士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平均为六年半至七年半)^③,对所在地区的生活有了较多的了解,有的对中国古典文化产生了兴趣,成为北美地区最早的一批中国通。

传教士与本国商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既有相互支持、通力合作的一面,也不乏相互攻讦的例证。有些商人和官员并不同情传教事

① Morse, Hosea Ballou;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1910, Vol. 1, p. 565.

② 参阅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wang-Ching Liu (刘广京)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66 P. 1, 欧内斯特·梅等编:《美中关系史论》,第100页。

③ Latoura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409.

业,认为传教是经商的障碍,因为传教活动经常激发民变,并认为传教士偏狭狂热。传教士则因遵循清教禁欲主义的传统,对商人、官员的奢侈生活颇有微词。

(三) 传教站

传教是教会的基本活动。传教站是差会的基层组织,通常由布道堂、教会建筑、附属医院或学校及住宅组成。其造型往往取西方的建筑形式。传教站的对外宣传联络点是临街教堂,设于通衢大道。新教差会对中国教徒的要求包括:承认圣经是信仰的最高准则,信徒不分民族,只要信仰教义就可以得救,即所谓“唯信称义”,以区别于天主教的“圣礼得救”和“善功赎罪”。新教差会还反对偶像崇拜(包括祖先崇拜),反对占卜迷信;反对多妻制、赌博、吸食鸦片(包括种植鸦片),要求教徒严守安息日制(星期日不得劳动);禁止早婚,不得休妻;不识字者要努力学会阅读,识字者应坚持阅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文献。成为基督教徒实际上是要同许多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决裂。

培育和组织中国人自传、自治、自养的教会组织是部分北美教会的一贯主张。尽管在如何实现“三自”方针方面的看法不尽一致,实行“三自”方针的中国教会机构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数量显著增加。1877年有18个教会完全自治,243个教会部分自给。1893年有137个教会完全自治,490个教会部分自给。在筹集资金方面,以厦门为例,1882年750名教徒捐赠1877.32美元,1886年804名教徒捐赠2076.29美元。1892年1008名教徒捐赠3894.80美元^①。实行“三自”方针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有一支中国自己的传教队伍。1866年,英国长老派在厦门建神学院,十年后,中国境内已有20所神学院,学生231人。倪维斯(John L. Nevius 1829—1893年)早在1862年就向美国长老会建议在中国成立神学院。1864年长老会教士

^① Latoura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424.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年)创文会馆于登州,以培养传教士为该馆创办宗旨之一。美国圣公会于1879年在上海创建圣约翰书院,第二年附设的神学院就有了13名学生。

重视直接阅读圣经和大量散发宗教文献一直是新教差会传教的一个特点。圣经中译本的出版和发行长期受到教会的关注。到1856年已有多种版本问世。1877年有11种方言的圣经译本。用书面语言翻译的圣经有1860年译出的《使徒行传》,1862年翻译的《马可福音和使徒行传》,1850—1866年间译成的《新约》,1870年译出的《使徒书》,1874年译出《约翰福音》,1875年译出的《诗篇1—40》、《克罗西安人书》和《希伯莱人书》等。这些译本都不尽如人意,直到中国人自己的传教队伍成长起来在他们的参与下才有了较好的圣经汉译本。英美传教士在出版罗马拼音与汉字对照本方面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四) 教会学校的发展

教会学校在此期间也有长足的发展。自马礼逊学校成立以来,沿海城市都陆续有各种类型的教会学校出现。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传教士大会是教会办教育的一个转折点。来自山东的狄考文在会上发表《基督教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的讲话。他认为教会办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土生土长的专业传教人员和师资”,“通过他们使中国接受西方优越的教育制度,以便把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和艺术引进中国”。狄考文认为,“这是同中国上层接触的最好办法,因为西方科学在中国上层中有很高的声誉,他们渴望把它学到手。”这样做就可以使中国教会自力更生,对内防止迷信,对外防止受过教育的怀疑派的指责。狄考文认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提高办学层次,不能停留在只办中小学的水平上。狄考文的讲话是有所为而发的。1840年以来,新教差会把宣传福音看成是教会头等重要的任务,办教育被视为俗务。狄考文企图扭转这种趋向,但大会对他的讲话反应冷淡。只有两人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有四位传教士坚持办教育是俗务的观点。

尽管观点不一致,1877年以后教会学校的发展还是加快了。1876年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学生共5917人,1889年增至16836人^①。开设的学校较著名的有1864年在山东登州创办的蒙养学堂,1876年改称文会馆,1877年杭州的育英义塾,187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1882年上海中西书院,1888年北平汇文书院等。

教会创办的学校与中国的传统教育机构大不相同。首先是办学的目的不同。中国旧式学堂基本上是科举制度的一部分,教育目的是为封建统治培养人才。教会学校以培养教士和新式教师为目的。其次,课程不同。旧式学堂“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教会学校则按照西方近代教育的模式设置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要比只学四书五经的中国学堂课程内容丰富得多,使学生眼界大开。英语课在多数教会学校是必修课。再次,教会学校在教学方法上重讲解,重练习,注重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使学生从死记硬背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除了正规教育外,教会还办了盲人学校、聋哑学校和职业学校。教会在办学校方面取得的成就对清政府官办的教育事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文馆的创办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五) 同文馆

建于1862年的同文馆是清政府为了培养外语翻译人员而设的,是官办新式学校的开端,是洋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清政府不能不借助于传教士的力量。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美国北长老会教士丁韪良于1869年出任同文馆总教席,兼授国际公法。丁韪良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长老会传教士家庭。自幼受到正统的古典语言训练,入大学后,对自然科学的重要学科均有所涉猎,经过三年神学院的严格训练,于1850年来华,先在宁

^① Latoura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442.

波传教,用罗马拼音从事扫盲教育颇见成效。太平天国起事后,他一直以同情的目光注视其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William Bradford Reed 1806—1876年)的译员。丁韪良在同文馆任职的25年中,延聘合格的教师,制订新的教学计划,编译教科书,增添教学设施,改进招生办法,使同文馆的教学工作步入正轨。在原有的语言课程之外,丁韪良坚持增设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他认为进行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是改变中国决策层迷信天人感应,把天象与人事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的有效措施^①。经过一番努力,同文馆陆续开出数学、天文、地理、各国史略、化学、格物、富国策(经济)、公法等课程。在他的建议下,同文馆还设立了天文台、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科学博物馆和图书馆。以西方高等学校为楷模的高等教育机构终于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同文馆为我国培养出一批最早的翻译人才和自然科学人才。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丁韪良又被任命为总教席。传教士办教育不可能不夹杂着宣传宗教等动机,但他们传播科学知识、建立新式学校的功绩不可磨灭。

(六) 医疗事业和医学教育

举办医疗事业一直是新教传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医的诊断和治疗是以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为基础。传道士中的医师更把治疗人体的病痛和拯救灵魂结合起来,让医疗工作服务于传教事业。在客观上则起到将西方医学科学移植到中国来的作用。1856年以后,传教士中医师的数目稳步增长,1874年10人,1878年19人,1881年34人,1887年60人,1890年近百人^②。医院的数目1876年有16家,诊所24个,就医患者41281人。1898年增至医院61家,诊

^① William A.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1896, p. 313—314.

^② Kwang-Ching Liu(刘广京)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6, p. 103—104.

所 44 家,就医患者约 35 万人。这些医院规模不大,设备有限,诊治与传道活动掺杂在一起。

表 5 1900 年以前北美传教士在我国建立的医院

年 份	地 点	医 院 名 称	创办人或差会
1859	广 州	博济医院	嘉约翰、黄宽
1867	上 海	同仁医院	美国圣公会
1881	汕 头	盖世医院	大美浸礼会
1883	苏 州	博习医院	美国监理会
1885	上 海	西门妇孺医院	美国公理会
1886	通 州	通州医院	美国公理会
1892	南 京	鼓楼医院	美国基督会
1892	九 江	生命活水医院	美国美以美会
1894	成 都	成都男医院	加拿大联合会

一些专门医院如麻风医院、戒烟医院也在此期间陆续出现。

为了培养中国医务人员,医院最早承担了医学教育的任务。1877 年有 30 名中国学生在教会医院中学医。这种学徒式的医学教育是从广州和天津的教会医院开始的。1866 年,博济医院成立附设在医院内的“博济医校”,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学学校。山东文会馆由聂会东 (James Boyd Neal 1855—1925 年) 创办医学系,是为齐鲁医学院的前身。此后上海(1880 年),天津(1881 年),登州(1883 年)和香港(1886 年)均建成医学院。到 1890 年学习西医的中国学生人数达到 100 人。

为了满足专业教育的需要,一批西方医学文献被译为中文,包括普通医学、解剖学、外科学。专业组织“中国医学传道会”(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也于 1886 年成立。由克尔医师 (John Glasgow Kerr 1821—1901 年) 出任首届会长。该会宗旨是在

“全中国传播医学科学”。翌年开始出版刊物,1890年召开首次代表大会,1925年更名为“中华医学会”(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一切合格的医师不分种族和信仰均可入会。”^①

传教士还在不同程度上倡导和参加了反对中国传统社会陋习的活动。早在1867年汉口的一所教会女校就要求学生不得缠足。北平的美以美女校和温州女校也于1872和1874年先后作出了同样的规定。1874年传教士和中国妇女在厦门成立反对缠足协会^②。北美传教士还参加了戒烟、禁赌、救灾、济贫、反对纳妾等方面的社会改革活动。

传教活动深入内地和介入中国社会生活,带来的后果是很复杂的。首先它使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和少数中上层政府官员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部分西方文化(如科技文化),产生了变革的要求;从师夷一技之长,中体西用到维新变法,甚至在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倾向。其次,有些传教士与本国侵华势力沆瀣一气,依仗军事、政治力量收罗华人败类,横行乡里,强占土地,为非作歹,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愤慨。第三,中国社会中的保守势力,冥顽不化的封建士大夫和清朝统治阶级中的腐朽保守势力,对外国势力深入内地深感不安。他们利用农民对侵略势力的不满,进行抵制。从七十年代开始,教案迭起,排外情绪日益增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终于酿成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是从反洋教开始的。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固然是清朝统治阶级顽固派执行“宁赠与国,勿与家奴”投降路线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自身固有的愚昧无知和迷信造成的。洋教不但没有被反掉,进入二十世纪其影响继续增强,文化渗透愈益深入。中国人民只能从西方思想武器库中找出更先进的武器与之对抗。

① Kwang-Ching Liu (刘广京)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p. 109.

②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462.

第二节 北美宗教、世俗团体参加中国的社会改革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与社会进步的界标。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社会改革活动纷纷亮相。北美的一些宗教团体和世俗团体也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各自的利益与需要参与了中国的社会改革活动。

一、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根据青年特点进行宗教宣传和道德教育的组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建于英国,五十年代传入美国。1876年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青年会组织。1895年美国 and 加拿大的青年会联合组成“北美协会”,派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1870—1949年)牧师来华,在天津的五所官办的学校中建基督教学塾幼徒会,即青年会(以下统称基督教青年会),并成立市会。进入二十世纪,基督教青年会发展更快。1901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170名代表与会,中国人占四分之三。采取由华人担任领导职务的方针,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特点。他们除了在学校中发展组织,还特别注重在外国企业任职的中国青年中开展工作。1901年,该会分别在天津和汉口建立了市一级的组织。1908年又派王正廷在东京的留日学生中进行工作。

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约翰·莫特(John R. Mott, 1865—1955年)在塔夫特总统的支持下于1910年10月在白宫举行了一次有200多名企业家和社会名流参加的会议,讨论扩大基督教青年会在海外活动的问题。塔夫特在会上强调指出:“有些基督教青

年会的会员……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中……很容易获得重要地位。通过这些人的努力，我们就能使这些落后国家最后接受我们的文明和道德标准。”穆德通过会议募得 200 万美元，用以建造青年会会所，重点放在中国。1912 年 6 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大会，成立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会”。同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基督教青年会第六次全国大会，将总机关定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组合（即协会）”，并得到北洋政府的正式承认。协会下设总务、庶务、城市、学生、编辑（即书报）、体育、演讲各部，以美国巴乐满为总干事。从此基督教青年会在华活动日益规范化，其组织发展情况如下：

表 6 在华基督教青年会发展情况

年 份	市 会	会 员	校 会	会 员
1914	34	10 000	120	7 000
1920	34	32 330	174	15 555
1925	43	44 550	208	27 487
1931	39	36 215		
1935	40	37 648	122	8 424

资料来源：杨富森编著：《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77 页。

从 1915 年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由华人担任，王正廷为第一任华人总干事，只作了一年就由余日章代理，并于 1917 年正式接任。余日章（1882—1936 年）出生于基督教徒家庭，1910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回国后任武昌文华大学附中校长。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组织红十字会，自任总干事，并在黎元洪手下任幕僚和英文秘书。1912 年加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连任总干事达 17 年之久。余日章认为，中国积弱是道德退化造成的，只有皈依基督教才能修养道德，富强国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

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体现了他的基本思想。青年会的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也是基督教精神的具体发挥。

基督教女青年会于1890年传入中国。1922年有市会12个,校会80余个。1923年成立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以丁淑静为总干事,出版《女青年报》和宗教妇幼读物。

基督教青年会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和广泛的发展,除了它善于借助官方的力量(袁世凯是该会会员),能够针对青年特点开展活动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学校里,青年会主张“学生宜具纯正之道德”,“应有交谊之乐趣”,“应有服务社会之工作”,“宜受宗教之范围”^①。查经布道是青年会最重要的活动。各校均设有查经班,组织会员和会外青年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英文版圣经,由牧师负责讲解答疑。这项活动因有助于提高英语水平,发展很快,1911年全国有2732个查经班^②。布道的主要形式是举办布道大会,邀请国内外“布道家”演讲。布道的内容和形式都注意结合青年特点和人们当时所关心的实际问题,如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基督教与劳工问题、恋爱与婚姻、青年道德修养等等。大多数布道者口才出众,很受听众欢迎。针对青年长身体、长知识的特点,青年会还从国外引进流行欧美的体育项目,多次在各地举办运动会,同时还建立各种夜校、补习学校,开展平民教育活动。三十年代民族危机加深,有不少青年会的成员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会在二三十年代的布道活动中,有过一些反共喧嚣,这显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当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之后,青年会往往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团结群众的工具和隐蔽自己的场所,这也是基督教青年会创始人所始料未及的。

① 王揖三:《学校青年会与学生之关系》,《青年进步》1917年11月第七册。载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357页。

②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588.

二、中美在医学和医学教育领域中的合作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麻醉技术和消毒技术的发展将外科手术置于全新的基础上。疟疾、黄热病和伤寒的治愈为传染病学、病原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X光的发现提供了新的诊断和治疗手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开创了心理治疗的先河。现代医学正在开拓化学疗法、免疫学、内分泌学和营养学这四个崭新的领域。医学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美国开始了一场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的医学教育改革运动。朝着现代化方向缓缓前进的中国则因现代医疗机构在各地纷纷建立而面临着急需现代医疗、护理人才的问题。兴办医科院校成了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地兴办的西医院校达50所之多,外国人在中国各地创办的院校占五分之二。其中,由北美教会创办的占半数。具体情况如下:

表7 外国人在华设立的医学院校

校名	地点	开办时间	创办机构 主持人	备注
博济医学校	广州	1866—1870	美长老会	后改为博济医学院,又改名为华南医学院。1886年孙中山曾在该校读书
圣约翰书院医科	上海	1880	美圣公会	1914年改名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	杭州	1884	苏格兰安立干会	1926年停办
香港西医书院	香港	1887	伦敦传道会	1912年并入香港大学,改名香港大学医学院。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该校

(续表)

校名	地点	开办时间	创办机构 主持人	备注
苏州女子医学校	苏州	1891	美国监理公会 女子部	1919年停办
广东女子医学校	广州	1899(1901)	美国长老会	1902年改名夏葛女子医学院
大同医学校	汉口	1903		
协和医学校	北平	1906	英美五教会及 伦敦修道会	1916年洛氏基金会拨巨款资助扩建,改名为协和医科大学
同济医工专门学校	上海	1907	德人宝隆氏	1917年由国人接办
金陵大学医科	南京	1908	美国基督教会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医科	山东 青岛	1908	德国	
共和医学堂	山东 济南	1909		
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四川 成都	1910	英、美、加拿大 8教会团体	
协和女子医学校	北平	1911		
南满医学院	辽宁 沈阳	1911	日本南满铁路 株式会社	后改名南满医科大学
中国哈佛医学院	上海	1912	哈佛大学校友会	因缺乏资金于1917年停办
沈阳医学院	辽宁 沈阳	1912	苏格兰长老会	爱丁堡大学承认其毕业生资格
震旦大学医学院	上海	1911	法国耶稣会	中法庚子赔款资助
湘雅医科专门学校	湖南 长沙	1914	湖南育群学会 与美国雅礼会 合办	1916年设本科,1924年改为湘雅医科大学

(续表)

校名	地点	开办时间	创办机构 主持人	备注
齐鲁大学医学院	山东 济南	1916—1917	英、美、加拿大 等 13 个教会 合办	由济南共和医学堂、北平 旧协和医校、金陵大学医 科、大同医学校合并建立
上海女子医学院	上海	1924	美国女公会、 监理公会等	由苏州女子医学院等合并 而成
中法大学医学院	北京	1931	法国	以庚子赔款为基金设立
岭南大学医学院	广州		美基督教会	

资料来源: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1 页;John I. Bower: *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 Peiking Union College, 1917—1951*. New York, 1971. p. 20—25.

北美教会兴办的这些医科院校其中特别是协和、齐鲁、华西和湘雅四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为 48 位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和著名医学专家立传,其中毕业于国人所建医学院校的共 10 人,其余均毕业于外国教会所办医学院校,或国外学校。其中北美教会在华设立的医学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达 24 人之多,占立传总人数的一半。这里我们还没有把曾在这些院校工作过的人计算在内。具体情况如下:

表 8 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和著名医学家

姓名	性别	生(卒)年	专业领域	毕业年份及学校
伍连德	男	1879—1960	公共卫生	1924 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
颜福庆	男	1882—1970	公共卫生	1904 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1909 美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
杨崇瑞	女	1891—1983	妇幼保健	1917 年协和大学
金宝善	男	1893—1984	公共卫生	1919 年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硕士

(续表)

姓名	性别	生(卒)年	专业领域	毕业年份及学校
侯宝璋	男	1893—1967	病理学	1920年齐鲁大学医学院,1926—1930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
薛愚	男	1894—1988	药物化学	1925年齐鲁大学理学院
胡正祥	男	1896—1968	病理学	1921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
汤飞凡	男	1897—1958	病毒学	1921年湘雅医科专门学校,1925—1929年在美从事研究工作
孟继懋	男	1897—1980	骨科	1925年芝加哥拉什医学院
张孝骞	男	1897—1987	内科	1921年湘雅医科专门学校,1926年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
陈克恢	男	1898—1988	药理学	1922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生理学博士
谢志光	男	1899—1967	临床放射	1922年湘雅医科专门学校,1923年起在协和医学院放射科工作
诸福棠	男	1899—	儿科	1927年协和医学院,1931—193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
刘士豪	男	1900—1974	内分泌学	1926年协和医学院,1928年赴美国纽约洛氏医学研究所进修
李涛	男	1901—1959	医学史	1925年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29年到协和医学院工作
林巧稚	女	1901—1983	妇产科	1929年协和医学院,曾赴美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留学
钟惠澜	男	1901—1987	内科、热带病	1929年协和医学院
胡传揆	男	1901—1986	皮肤、性病	1927年协和医学院,1932年赴美进修
毛燮均	男	1901—1979	口腔医学	1930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35—1936年,1941—1942年两次赴美进修
聂镜禅	女	1903—	护理学	1927年协和医学院护校,192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

(续表)

姓名	性别	生(卒)年	专业领域	毕业年份及学校
冯兰洲	男	1903—1972	寄生虫学	1929年齐鲁大学,后在协和医学院工作
谢少文	男	1903—	微生物、免疫学	1926年湘雅医科大学,1932—193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攻读研究生
魏曦	男	1903—1989	医学微生物学	1933年上海医学院,1937年赴美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
粟宗华	男	1904—1970	精神病学	1924年入湘雅,1932年上海医学院毕业。1935赴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
刘思职	男	1904—1983	免疫化学	1929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博士
许英魁	男	1905 1966	精神病学	1934年协和医学院,曾在美芝加哥大学学习临床精神病理学
罗宗贤	男	1905 1974	眼科	1932年协和医学院,1940—1941年赴美进修
苏德隆	男	1906—1985	流行病学	1935年上海医学院,1944年留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学院获硕士学位
方先之	男	1906—1968	矫形外科	1933年协和医学院,曾赴美波士顿大学深造
张昌绍	男	1906—1967	药理学	1934年上海医学院,1941年哈佛大学留学
黄祯祥	男	1910—1987	病毒学	1934年协和医学院,1941—1942年在美普林斯顿大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进修
吴英恺	男	1910—	胸部、心血管外科	1933年协和医学院研究生,1941年美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进修
曾宪九	男	1914—1985	外科	1940年协和医学院

(续表)

姓名	性别	生(卒)年	专业领域	毕业年份及学校
宋鸿钊	男	1915—	妇产科	1943年协和医学院
张涤生	男	1916—	整复外科、显微外科、淋巴医学	1941年中央大学医学院,1946年赴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进修
吴阶平	男	1917—	泌尿外科	1942年协和医学院,1947年在美芝加哥大学进修
祝寿河	男	1917—1987	儿科、微循环障碍性病	1946年上海医学院,曾在协和医学院工作

资料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应该指出的是,协和等医学院校的办学模式对我国现行的医学教育也有很大影响。毋庸讳言,教会医学院毕竟是由外国人创办的,未能结合中国国情甚至侵犯中国主权和触犯中国刑律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三、介入农村改革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年)于1931年出版了以中国农民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名噪一时,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一些公众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要推传教士,他们在十九世纪末的反洋教运动中就认识到农民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1917年华北地区发生大水灾,河北省103县被淹。1920—1921年华北五省旱灾,都得到以美国红十字会为首的慈善机构的捐助。捐款和救济物资主要由在华传教士分发。为此在北京、天津、济南、开封、

太原、汉口、上海等地分别成立了救济组织。1921年,这些组织在上海集会,建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会址设在北京。由北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爱德华(Dwight W. Edwards)任执行秘书。该会董事多为传教士,各地工作人员也由传教士充任,美国圣公会居主导地位。总会的经费和赈灾费用由中外各方募集。1936年该会报告15年来共收到捐款5000万元^①。华洋义赈会自始确定了救灾与防灾并重的方针,声明“该组织不是慈善机构而是服务机构”,奉行以工代赈的原则。到1936年为止,义赈会在14个省共修筑新路2000英里,修补旧路1300英里,掘井5000口,完成大型水利灌溉工程3座,修筑排水河道300英里。此外,还修筑沿河堤坝1000英里^②。从1924年起,义赈会投入很大精力在农村组织信贷合作社。为此,他们筹集贷款,培训专业管理人员。到1936年,有2万农民加入信贷合作社,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省份。

北美传教士在从事赈灾工作的同时,还全面介入了中国乡村建设活动。在1922年5月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上,建立了一个旨在“将福音用于社会问题”的组织——“全国基督教理事会”。大会要求该理事会为教会制定一个在农村地区开展工作的纲领。理事会在首次会议上就组成了农村问题和农村教会委员会。委员会在第一年的年度报告里强调了基督教会农村开展工作的必要性,并就教会如何开展乡村工作提出下列建议:(1)教会和教会学校应改变以西方和城市为中心的态度,以适应农村的需要;(2)提倡在大学生和中学生中组织到农村去的志愿者活动;(3)在神学院和圣经学校成立乡村教会部并开设有关农村的课程;(4)进行乡村健康调查,开展乡村卫生

① 《华洋义赈会年度报告》,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95页。

② James C. Thomson Jr.; *While China Faced the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46.

工作；(5)终止鸦片贸易；(6)用拼音系统辅助识字教学。该理事会农村委员会成立后的前几年里，因缺乏资金，开会多，行动少。直到1927年在耶鲁和佐治亚大学受过专业训练的张福良出任农委会负责人，农村工作才有了转机。1929年理事会开始实行其在农村的五年活动计划。包括传播福音增加信徒，进行宗教教育，举办识字班和开展青少年活动。同晏阳初(英文名:Y. C. James Yan 1893—?)在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实验相配合，理事会于1930年成立了乡村生活和识字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建立千字文识字班和出版基督教农民报，在五年活动结束时造就一批能直接阅读圣经的信徒。理事会另一项活动是针对中国农村自然灾害频繁、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特点，再加上世界经济处于大萧条，求助无门，决定资助农民生产自救，建立工业生产、信贷、市场和消费等方面的合作社。它还先后对北平郊县的羊毛工业、山西的冶铁业以及张伯苓与司徒雷登合办的华北工业服务同盟提供了资金支持。此外，还发放乡村重建贷款。为了协调新教各差会在农村的活动，在理事会倡议下，成立了华北乡村服务同盟和江西乡村服务同盟。选择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作为实施乡村建设计划的试验区。在江西则以黎川县为试验区。与河北定县“实验”形成鼎足相峙的局面。此外还陆续在河北的潞河、保定，山西的太原、新德，江苏的唯亭、大场，山东的福山，湖南的汉寿，四川的成都、重庆、璧山、潼南，浙江的上虞以及福州、上海等地设立了“乡村建设”的实验区。实验活动包括采用办报、编书、办学校、办识字班等进行文化建设；从训练农民科学种田与组织合作运动入手开展经济建设；提供多种医疗服务，建立乡村医疗制度；有些地区还与地方当局合作进行县政建设。

乡村建设需要有各种专业知识、热爱农村的人才。早在1922年由美国传教士组成的中国教育委员会在一份题为《中国的基督教教育》的报告里就提出了“建立农业教育系统以满足中国农村技术、经

济、社会需要”的问题^①。该委员会建议农业教育应在不同层次的教会学校中进行,包括三所大学、五所中学、各省的初中和所有的小学。高等院校中农科实力最强的是金陵大学农林学院。在美国纽约中国赈灾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金陵的农林学院有很大发展。到1930年,该院设有十个系,覆盖的学科包括:农学、农业经济、林业、乡村教育、蚕丝、和农业技术推广,入学学生人数1914年为29人,1930年增至163人^②。根据农村实际需要,还增设了农村师范班和一年制的农学班。农业技术推广系在全国各地举办了145次农业技术推广会议,与会者超过6万人。1931年大水后,该系在农村推广棉花和小麦良种,组织修筑灌溉渠道和粮仓的工程。农业经济系则侧重在南京周围地区组织乡村信贷合作社,代基督教理事会的农村委员会发放贷款。该院还从事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工作,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和《中国的土地利用》,成为这些领域的基本参考书。

从1922年算起,北美教会介入中国的乡村建设工作约15年,大多数实验活动均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处于内地的实验点如四川的璧山,抗战期间还开展过一些活动。北美教会的中国乡村建设活动是基督教“中国化”和“本色运动”的一部分。其本意是使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广大农村扎根,从而使整个中国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以及在大城市特别是高等院校中掀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基督教各差会更下定了与国民党合作、同中国共产党争夺农村的决心,这一点在1932年举行

①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New York: Commit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1922)", p. 207 转引自 William A. Brown: "The Protestant Rural Movement in China (1920-1937)", 载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wang-Chung Lin,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66, p. 227.

② 同上书, p. 229.

的关于“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牯岭讨论会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北美的中国乡村建设计划不仅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带有强烈的反共情绪。福建和江西在红军长征后推行的乡村重建计划尤其如此。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就整体而言是失败的，因为它未能触及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国民党当局无意解决这个问题，传教士们即便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从主观方面看，北美教会人力不足，资金匮乏，目标不统一，各差会各行其是，缺少强有力的领导和协调，许多活动又是同一个已经逐渐失去民心的政权联合进行的，以彻底失败告终是不可避免的。从实验活动的内容看，有些是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的，也是中国农村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应该予以相应的肯定。

第三节 教会大学

一、概 况

教会大学是在中国土地上最早出现的一批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创办时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其主要目的是培养中国的传教人员。二十世纪初叶，教会大学有较大发展，1920年达20所之多，当时我国国立大学仅3所（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私立大学5所。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开拓作用。经过二十年代的非宗教、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教会院校或收归国有，或由国人出掌校政，面貌为之一变。三十年代是教会大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整顿合并隶属于新教差会的大学 and 文理学院共13所。此外还有天主教创办的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工商学院以及专门、专科院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部分沿海地区的学校西迁，集中在四川

成都地区,胜利后返回。13所院校的基本情况如下:

表9 北美新教差会在华创办的大学(含文理学院)

校名	建校时间地点	新教差会背景	办学沿革	1952年院系调整情况
1. 金陵大学	1910年,南京	美卫理公会、浸礼会、长老会、中华基督会,由汇文、宏育两书院合并而成	1911年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得纽约大学认可学士文凭由该校校董会签发。1914—1915年始办农林科,1917年医科移交齐鲁。1921年与美农业部合作编制中国古农书索引。1924年成立农业推广部。1930年得美人霍尔资助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设文、理、农三学院21系4个专修科,以农科见长。陶行知于1910年考入该校	校名取消,哲学系调入北大,经济系调入复旦,政治、社会二系入华东政法,文、理两院并入南京大学,农科入南京农学院,体育系入华东体院,音乐系入中央音院华东分院
2. 燕京大学	1919年,北京	美长老会、美以美会、伦敦会、美公理会联合创办,由汇文大学与华北协和大学合并而成	最初男女分校,1926年迁入西郊新址后合并。1929年董事会在教育部立案。设文、理、法3学院16个系,另有历史、政治、化学、生物4个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专为促进东方学术研究而设,出版《燕京学报》编制我国重要典籍之引得,对我国学术贡献良多	校名取消。工科并入清华大学,心理、教育、音乐并入北师大,经济并入中央财经学院,其余系并入北大,新闻、家政二系停办,神学院和6个研究所取消

(续表)

校名	建校时间地点	新教差会背景	办学沿革	1952年院系调整情况
3. 岭南大学 曾用名广州基督教大学	1888年, 广州	长老会	成立时有文、理两学院,1920年纽约大学承允授该校学士文凭。1921年建农学院。1922年设香港分校。1928年设上海分校。1929年设海南分校。1937年设澳门分校。迄于1938年共设文理、农、医、工、商、神学6学院20个系。1927年收归中国人办理	校名取消,工科并入华南工学院,农科并入华南农学院,文理系科并入中山大学。原岭南大学董事会改名为岭南基金会
4. 东吴大学, 英文名苏州大学	1901年, 苏州, 1938年 迁上海	美卫理公会,由博习书院与中西书院合并而成	1900年在美国田纳西州注册。1915年增设法科于上海,1927年更名法学院,1929年立案。共设有文、理、法3学院11系及法律学研究所	校名取消,社会系并入复旦(1951)中文、物理、化学、生物与苏南文教学院组成江苏师院,化工系并入华东化工学院
5. 沪江大学, 原名浸会大学,英文名上海大学	1906年, 上海	美南、北浸礼会柏高德等,由浸礼会大学与神学院合并而成	1915年改名沪江,1917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注册。1929年在教育部立案。1931年成立商学院。共设有文、理、商3学院1个专修科	校名取消,文科各系并入复旦,理学院、教育系并入华东师大,工学院并入同济大学
6. 圣约翰大学	1879年, 上海	美圣公会	前身为圣约翰书院旨在培养传教士,190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区注册,抗战期间,仍在原址上课。设有文、理、工、农、医5个学院17个系。1947年在教育部立案	校名取消,外文、新闻并入复旦,经济并入上海财经,政治并入华东政法,理科、教育并入华东师大、工科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与震旦医学院合并组成上海第二医学院

(续表)

校 名	建校时间地点	新教差会背景	办 学 沿 革	1952 年院系调整情况
7. 武昌华中大学	1924 年, 武昌	美圣公会, 由文华大学、博文书院大学部、博书学院大学部合并而成	初设文、理、商、图书馆学 4 科。因武汉政变停办, 1929 年恢复。湖南雅礼大学、湖滨大学相继并入, 将原有四科改为文、理、教育 3 学院, 10 个系。1931 年在教育部立案。1938 年内迁桂林。战后返回	校名取消, 1953 年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
8. 华西协和大学	1901 年, 成都	美浸礼会、加拿大并卫理公会、英美会公谊会	初设文、理、教育 3 科, 1913 年设医科。1914 年设牙科, 1933 年在教育部立案。1934 年在美国纽约州注册并与纽约大学缔约, 凡该校毕业生同时得受对方学位, 藉谋出国深造之便利。自此毕业或留学返国服务者日众。牙、医两科成绩尤著。共设文、理、医 3 学院 13 系, 牙、医 2 科, 农业专修科	校名取消, 医学院独立改名四川医学院, 其他院系并入四川大学
9. 齐鲁大学	1917 年, 济南	美长老会、南长老会、信义会、公理会、卫理公会、英浸礼会、加拿大长老会、循道公会行教会	前身为登州文会馆。1917 年在济南建成新校舍, 青州之共和医道学堂、神道学堂迁入合并为齐鲁大学。1929 年, 神学院脱离。设文、理、医学院。1924 年在加拿大立案。1931 年在教育部立案。抗战期间迁成都, 复员后仍设文、理、医 3 学院 11 系 2 个专修科	1951 年中文、史地迁青岛并入山东大学, 1952 年天文、数学并入南京大学。物理、化学、生物并入山东师院, 制药并入南京药学院。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

(续表)

校 名	建校时 间地点	新教差会 背景	办 学 沿 革	1952 年院系 调整情况
10. 福建协和 大学	1915 年, 福州	美国国外 传教委员 会、卫理公 会、归正会 及三家英 国教会	1917 年美国纽约州立大 学承任该校为合格大学, 授予该校毕业生以学士学 位。1918 年在美国纽约州 注册。1919 年美国洛克菲 勒基金会捐助科学馆建筑 设备及常年维修费,并设 科学讲座 6 名。1928 年得 何氏中国文化基金之助, 扩充文学院各系。1931 年 在教育部立案。1936 年得 福建省政府补助设农业及 农业经济 2 系共设文、理、 农 3 院 15 系	校名取消。 1951 年与华 南女子师院合 并组成福州大 学。1953 年撤 消。文理各系 并入厦门大 学,农学院并 入福建农学 院。教育系独 立,成立福建 师范学院
11. 金陵女子 文理学院	1915 年, 南京	浸礼会、 南、北卫理 公会、长老 会、使徒会	中国最早的女子高等学 府。美国斯密司女子大学 认该校为姊妹校。1924 年 增设附属实验中学。1925 年上海体育师范并入。 1930 年在教育部立案,设 文、理 2 科、10 系 1 专修 科	1951 年并入 金陵大学
12. 之江文理 学院	1911 年, 杭州	美长老会, 前身为宁 波崇信义 塾,建于 1845 年	1920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 区注册。1931 年在教育部 立案。设文、商、工 3 学院, 12 系。马叙伦、朱经农曾 在该校任教	校名取消,工 学院并入浙江 大学,文、商两 学院解散,文 理学院与浙大 文理学院组成 浙江师范学院

(续表)

校名	建校时间地点	新教差会背景	办学沿革	1952年院系调整情况
13.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1907年, 福州	美卫理公会、妇女服务会、女布道会	192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特发证书许该校有授予毕业生以学士学位权, 1936年在教育部立案。该院设文、理两科, 6系	校名取消, 1951年与福建协和合并组成福州大学, 1953年福州大学撤消, 文理各系并入厦门大学

资料来源: 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 David Shavit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A Historical Dictionary*, New York, 1990; 陈学恂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 季啸风主编: 《中国高等学校变迁》,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2 年版; 高时良主编: 《中国教会学校史》,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二、办学条件

兴办高等教育事业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同中国土生土长的高等院校相比, 教会学校有一些优越的条件。首先是外国教会可以依仗不平等条约, 用较少的代价取得校园建设所必需的土地; 其次, 教会能够以在国外传播福音、拯救灵魂为由, 向本国的善男信女募捐, 筹集资金; 第三, 二十世纪以来, 随着大企业的兴起, 基金会发展迅速。教育事业是他们捐助的主要对象。有些学校的董事会也采取了经营性基金会的组织形式进行资金管理; 第四, 欧美各国政府的对外文化政策和文化交流机构形成后, 也把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作为其工作的重要内容。由于天然的联系, 教会院校比较容易从本国政府取得资助。所有这些都为教会学校提供了有利的办学条件。

表 10 教会院校的办学条件(以 1946—1947 年的数据为基础)

校 名	校园与校舍	教职员数	学生数	图书设备	经 费
金陵大学	校址在南京鼓楼, 面积 2340 亩。教学科研用楼房 15 座, 学生宿舍 8 座, 教职员宿舍 2 座。住宅 56 座	教员 216 人, 职员 80 人 (1947 年)	1084 人	中文 230667 册, 方志、丛书占三分之一。 外文 177734 册, 温室、实习工场各 4 座、大礼堂体育馆各 2 座	169250 万元 (1946 年)
燕京大学	校址在北京西海淀, 占地 20 余顷。有校园本部、燕东园、燕南园、镜春园、蔚秀园、燕勺园、朗润园、高丽园。教学科研用房数十栋	教职员 267 人 (1947 年)	901 人	中英文书在 15 万册以上, 显微镜近 200 台	抗战前每年经费约合国币百万元, 战后每年开支约近 30 万美元。其中大部分为基金利息, 次为各基督教会捐助
岭南大学	广州康乐校址面积 1800 余亩(校外农场在外), 校舍 79 座。有马丁堂(大学教室图书馆)、格兰堂(全校办公处、银行)、怀士堂(礼堂)、十左堂(农学院、博物馆)、哲生堂(工学院)等	教员 140 人, 职员 109 人 (1947 年)	1056 人	中、日、西文书 146341 册。自然标本 24 万件。博物馆藏品 2475 种, 另有人类学藏品 476 件	1927—1928 年总预算为美金 32 万元。1929 年预算百万元。战后校董事会拨款 3.5 万美元修缮校舍

(续表)

校名	校园与校舍	教职员数	学生数	图书设备	经费
东吴大学	校址在上海	教员145人, 职员45人 (1947年)	376人	中外文图书5万册	建筑设备费由美教会捐助。经常开支主要靠学费收入。1947年美教会拨校舍修理费国币3.59亿。行政院拨助4.6亿,因修理费浩大,收支相抵尚不敷2.8亿元
沪江大学	校址在上海,占地380余亩,有校舍及建筑40余座,体育馆、科学馆、图书馆、医院等	教员67人,专任48人,兼任19人。职员44人 (1947年)	1064人	56461册,其中中文34723册,西文21738册	1946年下学期预算为国币8.8亿元
圣约翰大学	校址在上海苏州河右岸,面积240余亩,校舍大小40所,教职员住宅29所	教员156人,职员50人 (1947年)	1865人	中文108854册,西文35137册,中西文杂志204种。附设同仁医院	1946年经费为国币23亿
华中大学	校址在武昌,面积300余亩,校舍20余栋	教员58人,职员20人 (1947年)	537人	23780册,其中中文13530册,西文10250册	1946年预算薪金及行政费约7亿元,修缮设备费8亿元

(续表)

校 名	校园与校舍	教职员数	学生数	图书设备	经 费
华西协和大学	校址在成都市南门外,面积 1000 余亩。重要建筑有事务所、图书馆、博物馆、生物楼、化学楼、大礼堂、体育馆等	教员 255 人, 职员 110 人 (1947 年)	1784 人	中文 137199 册, 其中以四川方志最为完备, 新旧志 260 种。西文 7.7 万余册, 共计约 24 万余册。博物馆藏品 2.7 万余种, 西南民族器物尤为完备。有大学医院、口腔病院、麻风病院、精神病院及耳鼻喉医院各 1 所	1945 年经常费 2.2 亿元
齐鲁大学	校址在济南新建门外千佛山麓, 有地数百亩	教员 64 人, 职员(含附属医院) 70 人 (1947 年)	442 人	中文 103038 册, 西文 22943 册, 未装订中西杂志 12360 册, 医院参考书 13000 余册	1945 年经常费约 3 亿元
福建协和大学	校址在福州魁岐乡。有林场 1000 余亩, 农场 150 亩, 园艺场 135 亩。校舍有新式洋楼 30 余座	教员 63 人, 职员 51 人 (1947 年)	587 人	136857 册	1946 年经费 12 亿元。大部分由美国教会及美国援华服务社捐助。学费收入仅占十分之一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校址地处南京清凉山与鼓楼之间。主要建筑有中大楼、文学馆、理学馆、图书馆、礼堂	教员 81 人, 职员 23 人 (1947 年)	440 人	34729 册	1947 年预算 65 亿元。教会经常捐助占 45%, 学费约占 20%

(续表)

校 名	校园与校舍	教职员数	学生数	图书设备	经 费
之江文理学院	校址在杭州	教员72人, 职员32人 (1947年)	889人	抗战前中西文书43602册, 战争期间大部被毁, 战后, 逐渐恢复	1946年经费近7亿, 其中教会津贴约占28.5%, 学杂费约占一半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校址在福州	教职员55人 (1947年)	222人	英汉藏书数万卷	多半由美国女布道会捐助。另由教育部补助一部分

资料来源:《第二次教育年鉴》第二章公私立大学概况。

教会院校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教会, 世俗捐赠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电解铝法的发明者、美国制铝业巨子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 1863—1914年)的遗赠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赠在燕京的经费来源中举足轻重, 据统计1936—1937年, 霍尔资产的捐赠占该校所得全部赠款的68%, 占年度预算的31%。同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赠占全部赠款的11%, 年度预算的21%。前者主要用于人文学科, 后者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具体情况如下:

表 11 燕京大学主要世俗资金来源

来 源	年 份	捐 赠(US\$)	设 备(US\$)	年拨款数(LC\$)
霍尔基金	1921年	5万	248500	5000
	1926年			
	1928年	100万		
	1928—1937年	50万哈佛燕京学社专项		
				哈佛燕京学社各年不同, 1926—1927年41630, 1930—1931年高达128750

(续表)

来源	年份	捐赠(US\$)	设备(US\$)	年拨款数(LC\$)	
洛克菲勒基金会	1921年	5万			
		9万中国医学委员会			
	1922年				22656 中国医学委员会
	1925—1930年				28000 CMB(每年)
	1928—1936年				US\$ 14万劳拉 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基金(7年)
	1932年	25万			
	1934—1937年		206300 华北乡村建设委员会(3年)		
中国	1923年	LC\$ 32万, 百万美元募捐运动	宿舍(LC\$ 50000) 墙和门。来自私人捐赠	5000个人	
	1924年			11万个人	
	1927年				
	1929				
	1934—1937年			约6万教育部(每年)	
	1934—1937年			1.5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庚款, 每年)	

资料来源: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p. 110—111.

学生的学费是私立大学经费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学校的学费与中国私立大学相比,一般偏高。而且随通货膨胀而上升。燕京大学的学费在1927—1937年间翻了一番,从每年50美元增至110美元。同期住宿费则稳定在40美元的水平。与其他院校相比,燕京大学的学费显然贵得多。1930年北京大学的学费相当于40美元,清华大学的学费相当于20美元。

三、办学特点

有了校产和资金并不一定能将学校办好。教会院校之所以能够办出些特色,主要是因为有一批高等教育的行家里手。来华北美传教士大部分受过很好的现代高等教育,不少人除神学之外,还以专业知识见长。其中有些人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利弊得失有比较中肯的看法。早期有狄考文。他不仅对教会在中国办教育的必要性有较清醒的认识,而且对如何在中国办教育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二十世纪则有燕京的司徒雷登和岭南大学的钟荣光(1866—1942年)。他们二人的共同特点是在教会大学的中国化上下功夫、作文章。其实,这并非他们的发明,而是有识之士的共识。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伯顿(Ernest D. Burton)任团长的中国教育调查团于1921—1922年间访华。提出了一份长达450页的报告,题为《基督教教育在中国》。报告要求教会学校“在性质上彻底地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地中国化”、“把效率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应付中国的挑战。报告认为:“前15年中国人设立的学校已在数量上获胜。今后教会学校必须把基础唯一地放在质量上。”中国教育调查团非常重视教会大学,指出教会大学的主要问题是:“这些大学从性质上说是由西方传教士所创立,由西方捐款所维持,由西方列强的条约所保护,并以同样的理由容许那些负责人索取任何权利和保持任何标准,而且往往是按照西方的法律在外国注册的。不管过去的真实情况怎样,教会学校正是由于这些状况而阻碍了人们衷心的欢迎和予以承认,妨碍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支持,倒不是因为特殊的宗教性质而不受欢迎。”^①这份颇有见地的文件为教会大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许多院校根据报告陈述的观点

^① 《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纽约版),第109—134页。

陆续在中国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登记立案,改组董事会,由中国人出任校长。只有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1864—1947年)坚决不肯让位,任职半个世纪,直到抗战胜利后,董事会改组,聘涂羽卿为校长,该校方才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获准立案,这已是1947年10月的事了。

为了提高效率,教会学校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合并,一是加强校际分工。如前所述,专科以上的教会学校从二十年代的20多所减少到三十年代的10余所就是调整、合并的结果。当然,合并决不是一撮即合,往往要经过许多曲折和反复,不少教会院校早期的历史就是一部由分到合的历史。凡是以协和命名的学校,都是多个差会与学院的组合。分工表现在学科建设方面。燕京主要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兼及生物学(植物、遗传);齐鲁、华西以医科、牙科闻名;岭南的化学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圣约翰以英语教育著称;金陵以农学见长。

在提高办学质量方面,教会院校采取的办法是:

1. 加强外语训练,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语言的环境,除中文课外,专业课均用英语讲授,要求学生用英语做作业,用英语回答教师的提问。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燕京的学生“一入学就能听懂无论用哪种语言讲授的大学课程,教师们也可以随便讲哪种语言,或两种语言都讲。外来的讲学者从来不用翻译”。^①

2. 注重师资队伍和课程的建设。主要作法:(1)充分利用同国外交流之便,进行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例如,燕京的法学院就是在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普林斯顿的教授或毕业生常到燕京讲课,燕京的优秀生也有机会到普林斯顿攻读学位,然后回校任教。华西协和大学在1910—1952年间聘用任期在5年以上的

^①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3页。

外籍教职员 118 人,其中有博士学位的 51 人,占外籍教职员总人数的 43%。有硕士学位者 20 人,为外籍教职员总人数的 17%。两者合计,占总人数的 60%^①。这在我国现有的高等院校中也不多见。(2)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因袭欧美大学培养通才和领导人才的传统,注重基础宽厚。一般地说,这些学校前 2—3 年上基础课,文理并重,第 3 或第 4 年才有系科之别。在专业课程方面,因师资力量充沛,设置较为完备。(3)严格管理,成绩不佳者留级或淘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教会大学中途辍学者在一半以上。

3. 尽力实现中国化。燕京、金陵、岭南、华西等校都非常重视校舍建筑的中国化。他们先从校园环境开始,要让中国人在校园内没有寄寓他乡之感。这同建筑师茂旦(Henry Killam Murphy)的个人爱好有关。茂旦不仅对紫禁城的建筑叹为观止,对中国的园林布局错落有致也赞赏不已^②。燕京、金陵、湘雅等校建筑的设计均出自他的手笔。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受到许多教会院校的关注。1928 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注册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是一个以哈佛和燕京为中心,“在美国兴趣和批判方法的激励下,促进中国东方研究”的机构。“培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以利于中国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是该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所有这些,都“将在西方学者和哈佛大学教育资源的帮助下完成”^③。学社的第一任社长是著名史学家陈垣,继任者是古文字学家容庚。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国学、西学都很有造诣的学者如陆志韦、聂崇岐、许地山、侯仁之、齐思和等。这批年富力

① Lewis C. Walmsley: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ennonite Pres, Inc. North Newton, Kansas, 1974. p. 173—182.

② Dwight W. Edwards et al. *Yenching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New York, 1959, p. 222—223.

③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6, p. 189.

壮的饱学之士利用该社的资金与设施开展研究工作,硕果累累。容庚与史学家顾颉刚合作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研究成果大部分发表在该社发行的《燕京学报》(1927—1952年)、《史学年报》与《文学年报》上。在洪业的主持下,自1930年起哈佛-燕京学社开始编纂引得丛书。到1946年,出版了64种重要古籍的引得,大大方便了国学研究工作。学社的另一项工作是资助和接待西方年轻的汉学家来华进修、访问,其中较知名的有李约瑟(Joseph G. Needham)、顾立雅(Harlee Glesner Creel)、魏鲁南(James R. Ware)、戴德华(George Taylor)、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人。哈佛-燕京学社还培养了一批能用英语写作的中国学者。如方朝英(1928年毕业)、施友忠(Vincent Shih, 1930年)、郑德坤(1931年)、杨庆琨(1933年)、费孝通(1933年硕士)、瞿同祖(1934年)、刘子建(James T. C. Liu 1941年)、徐中玉(Immanuel C. Y. Hsu, 1946年)、余英时(1951年退学)。学社的资金来自霍尔基金的赠款。该社成立之初,就获得赠款6万美元。此后每年所得到的馈赠为8—9万美元。霍尔基金后来还扩大到资助其他教会学校的国学研究:岭南70万美元;金陵30万美元;华西协和20万美元;齐鲁15万美元;福建协和5万美元。^①

4. 与中国政府合作。司徒雷登说,他到北京后不久就努力着手同中国官员交朋友,“让他们了解我们办这所教会学校的目的,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也从他们那里得到捐款,以使他们表明对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善意”。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著名外交家颜惠庆长期担任燕京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一度当过董事长。燕京的校园是用6万大洋从陕西省督军陈树藩手中买来的。为了筹款,司徒雷登还多次前往东北,会见张作霖、张学良父子。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司徒雷登通过孔祥熙与蒋介石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对燕京大学的发展起了

^①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p. 189—190.

重要作用。岭南的发展同中央、地方政府的合作密不可分。1921年建立农学院得到广东省政府的拨款补助,收用学校周围山地为校产和农场。钟荣光出掌校政后,广东省政府在1927—1928年间拨款26万元(相当10万美元)供日常开支。广州市政府则派警察接管学校警卫工作,每年节约支出在1万元以上。1929年铁道部(部长孙科是岭南的董事长)与岭南合办工学院,为铁路建设培养人才。铁道部拨专款10万元兴建教室。粤汉铁路拨助常年经费6万元。岭南的科学研究工作注重结合地方实际。社会调查以华南为目标,先从沙南水上居民着手。生物学科从事广东昆虫生活史、闽粤花植物、实用植物及海生藻的研究。

四、办学效益

办学校的目的是培养人才。办学的特点和效益最终也要在培养的人才身上体现出来。教会大学学生在学期间的成绩可以从国民党政府自1940年开始举办的毕业竞试结果中有所了解。第一次竞试,甲类(大学一年级)决选录取的31人中,教会院校8人,占25%。乙类(二、三年级)50人,教会院校12人,占24%。丙类(毕业班)29人,教会院校9人,占31%。第二、三次竞试,教会学校学生入选的比例都在20%以上,高出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在全国大学生总人数10%的百分比。^①

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并没有像学校的创办者所希望的那样,都去当牧师和教师。到1920年为止,2474名教会大学毕业生,只有361人当了牧师或教师,占毕业生总数的14.8%强^②。其他大部分进入商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552—564页。

^②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界和政界。燕京大学的情况略有不同。1917—1936年毕业的1721人中,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的超过半数。从事宗教、社会工作的占12—14%,从政者占9—16%,进入商界的占8—9%^①。全国解放后,教会大学所培养的人才有不少成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奠基人和骨干,有的跻身于国家领导人行列。这恐怕是教会大学创办者所始料未及的。

就整体而言,教会大学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培养了一批有用之才。教会大学的出版物《燕京学报》、《金陵学报》、《岭南学报》上刊登的学术论文经常为学者们引用。哈佛—燕京学社所编的各种“引得”至今还是大学图书馆和学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总之,教会大学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其所产生的世俗效益要远远大于它的宗教效益。

^①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p. 142-143.

第三章 北美的华人移民

第一节 早期中国移民

一、劳工潮

1848年1月24日,在距离今加利福尼亚州萨卡拉门托东北36英里的科罗马地方发现了金矿。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世界。同美洲和东南亚早就有联系的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三邑(番禺、南海、顺德)和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掀起了“金山热”。十年后(1858年),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也发现了金矿,吸引了大批华人前往。一股由中国南部向北美的移民流出现了。它持续了约三十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北美定居,对中国与北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发生了重要影响。

从数量看,中国移民要比闯入中国境内的北美商人和传教士多得多。迄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境内的中国人达105 465人,加拿大境内也有4 383人(1881年数字)。而在华外国传教士的数目到二十世纪初才超过千人,其中来自北美的约占一半。从地理分布情况看,早期中国移民大多居住在北美的西海岸。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修

成后,才开始大量东迁。早期中国移民多数是穷苦的农民和手工工人,商人为数极少。许多人都是只身前往,把妻子儿女留在家乡。他们最初并没有定居国外的打算,而是希望到国外发财致富,然后荣归故里,与家人团聚。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文化同以个体为中心的美国文化迥然不同。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早期中国移民以其特有的勤劳、刻苦、坚韧不拔的品质为北美大陆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根据美国采矿专家亨利·迪格罗特(Henry Degroot)的统计,1849—1870年间太平洋沿岸贵金属开发总值约为12亿美元。1871年中国矿工开采的进入流通的贵金属即达2700万美元^①。根据美国人口普查资料,华人矿工17069人,占全国矿工总人数的11%。在西部各州,华人矿工的比例要大得多,如俄勒冈州矿工总数为3965人,其中华人2428人,占61.2%。蒙大拿州矿工总人数6720人,华工占21%(1415人)。爱达荷州华人矿工3853人,占58.6%。加利福尼亚华工9087人,占25%^②。1871年一份为国会撰写的关于西部矿业的调查报告指出,同欧洲工人比较,华工在技术上绝不逊色,在忠于职守方面,他们比欧洲工人更为可靠。在调查过的所有地区,华工都因忠实可靠受到广泛赞扬。该报告在结论部分强调中国人不是“苦力”,并断言“中国劳工对于美国来说,不在于价廉,而在于物美”^③。参与英属哥伦比亚金矿开发的华工占矿工总数一半以上,他们大多来自香港,全都是年轻力壮的男性劳工。1886年,白人放弃采

① Henry Degroot, "Mining on the Pacific Coast", *Overland Monthly*, VI Aug. 1871 pp. 151—158. 转引自 Shih-Shan Henry Tsai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

②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Ninth Census, the Stat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 S.* Washington, D. C. 1872. VOL. Lpp. 692—762. Tsai *ibid.* p. 10—11.

③ Boutwell and Raymend, "Mining Statistics West of Rocky Mountains", p. 4-6. 转引自 Tsai,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p. 14.

金业,淘金工作全由华人承担,同美国西部采金业相比,华人在加拿大的贡献更为突出。

华工在修筑横贯北美大陆铁路中表现出的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品格举世闻名。1865年,当承包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克罗克公司作出招募华工的决定时,曾遭到监工人员的反对。其理由是华工身材矮小,体质单薄,难以承担如此沉重的体力劳动。该公司的负责人提醒反对者,中国人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万里长城,而且发明了火药。这个回答使反对者无言以对。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资花名册上的华工人数在1.2万至1.4万之间,占所雇工人的70%以上。工人们经过六年艰苦奋战,克服了严冬和地质条件复杂带来的重重困难,完成了1800英里的铁路铺轨工作,于1869年5月10日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的普鲁蒙托里角接轨。据统计,约有1200名华工为修筑这条铁路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不可思议的是,接轨庆典居然不让华工参加。尽管如此,最初反对使用华工的监工斯特罗夫里奇却不能不承认华工是世界上最为杰出的工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长莱兰德·斯坦福(Leland Stanford)称赞中国工人说:“作为一个集体,他们稳重、平和、勤俭。经过学习能够胜任修筑铁路的各种不同工作。其工作效率与白人工人相比毫无逊色。”

加拿大修筑横贯大陆的铁路要比美国晚十年,有美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在使用华工问题上也有过分歧。当时的总理约翰·麦克唐纳(John Alexander Macdonald 1815—1891年)说:“我们的选择是要修铁路,就必须有华工。不要华工就没有铁路。”1880年6月至1887年7月间,就有2.5万名中国劳工应募来到加拿大,相当于当时卑诗省(即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直接被铁路公司雇用的华工共6000人,有600人为筑路而丧生。

农业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在北美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华人对农业发展所做的贡献令人瞩目。华人的作用并非仅限于提供了大批可

靠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在开垦荒地、变沼泽为良田、建设排灌系统、种植谷物、嫁接果木等方面的经验、技术和专业知识对开发西部是无价之宝。许多优异的果木品种如“炳樱桃”(Bing Cherry)、“刘橙”、大无核葡萄、晚熟桃和甘甜苹果都是华人园艺家在加利福尼亚的沃土上精心培育出来的。

二、早期华埠特点

“华埠”(Chinatown)亦称中国城、唐人街。韦氏大字典把它定义为“中国以外城市的中国人聚居区”。在北美它是城市化和种族歧视(特别是排华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北美西海岸的华埠出现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东海岸华埠形成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它们都是在排华运动中得到确立、巩固和发展的。早期的华埠(迄于二十世纪初)具有以下特点:

1. 这是一个旅居者的社区。它在文化习俗上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多数人并无长期定居国外的意愿,而希望赚一笔钱,带回故乡,与家人团聚,颐养天年,因此尽量同国内亲朋好友保持持久密切联系,每年都有一批人回国。他们为生计所迫,又少家庭之累,流动性较强。

2. 男性青壮年占人口多数,女性稀少,文化层次不高。有不动产和富有者为数寥寥(这与美国法律禁止东方人拥有土地有关)。

表 12 美国华人男性与女性比例

年 份	美国华人中每百名女性相对应的男性数(1860-1900)
1860	1 858
1870	1 284
1880	2 106
1890	2 678
1900	1 887

3. 华埠内的交流工具是汉语—粤语方言。设有中文书店、印刷所,出版中文报刊。商店、餐馆、旅店等均用中文招牌,街名也用中文书写。只通汉语,不懂英语完全能在华埠生活下去。

4. 商店是华埠内人们交往、联系的结点。商店是同家庭联系在一起,相对而言收入比较稳定,有房屋可供临时食宿,也可以代转邮件和代购物品,有较固定的社会联系。通常有三五亲友忙时在店内帮工,不忙时到外面打工,仍住店内,被称之为“房口”。

5. 早期华埠最重要的华人团体是在“房口”、“会馆”基础上建立的中华公所。会馆是以地域来划分的。1849年在旧金山成立的冈州会馆是最早的华侨会馆。接着,代表大商人利益的三邑会馆和代表小商贩利益的四邑会馆陆续成立,几经变迁以六大会馆闻名于世。到二十世纪初又加上肇庆会馆,成为七大会馆。中华公所就是在这几大会馆基础上建立的全体侨胞的代表机构,负责处理有关全体侨胞的事宜:维护侨胞利益,包括慈善救济、移民、调解内部纠纷等。这个组织一直延续至今。

6. 华埠内居住的华人基本上保持着国内的生活方式,饮食、衣着、发式(留辫子)、妇女缠足、节日、喜庆婚丧都同国内一样。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仍居支配地位。

7. 传统社会的糟粕也带到北美。大烟馆、赌场、妓院是华埠生活黑暗面的代表。与此相联系的是走私和犯罪。所有这些都成为排华运动中美国人攻击华人的重要口实。

8. 华埠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工商业家在华人中只占极少数,占人口多数的是工资劳动者。就整体而言,华人资本力量微弱。旧金山华埠90家中国公司中资本在1000美元以上的仅28家。1876年是华人企业繁荣的年代。据税务部门统计,华人个人财产在5000美元至2.5万美元之间者共25人。根据加拿大的统计资料,1884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华人共计10411人。可列入工资劳动者范畴的占

62%。有雇工的商店和餐馆老板仅占华人人口总数的1.3%。其中较大的商店老板全部来自美国。个体劳动者约占华人总数的19%。

9. 一般而言,华人很少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由于大多数人都有重归故土的愿望,对中国国内发生的变化比较关心。华人富商多倾向于支持君主立宪派,小业主和独立劳动者大多同情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雇佣劳动者则寄希望于国内的改革运动和革命。

10. 许多因素使北美华人很难进入当地社会生活的主流。首先是种族歧视特别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掀起的排华狂潮堵塞了华人进入北美社会生活主流的可能。华人社会所坚持的与北美社会相抵触的社会价值观和多数华人并无长期定居的意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华人富商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大多与双方的贸易有关,其特点是,既同中国传统经济和北美资本主义经济有联系,又全然不触及两种经济的核心,具有边缘性质。他们能有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小业主和独立劳动者的经营活动范围限制在华埠之内,与白人社会更少接触。工资劳动者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受雇于白人雇主,但他们急于将劳动所得用于还债,或寄回国内,这种情况使他们饥不择食,愿意接受劳动条件恶劣、待遇菲薄的工作。这就决定了他们虽然有与白人工人联合起来同雇主进行斗争的可能,但并不具备参加罢工的条件,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雇主用来作为破坏罢工的手段。他们所参加的秘密结社(洪门、致公堂)和语言障碍更加深了与白人社会的隔阂。

第二节 北美华埠社会文化的发展

一、人口结构的变化

北美国家,自二十世纪以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变迁引人注目。然而,种族关系的改善

表 13 美国华人人口及其性别构成

年 份	总 计	男	女	男女比例 *
1860	34 933	33 149	1 784	1 858.1
1870	63 199	58 633	4 566	1 284.1
1880	105 465	100 686	4 779	2 106.8
1890	107 488	103 620	3 868	2 678.9
1900	89 863	85 341	4 522	1 887.2
1910	71 531	66 856	4 675	1 430.1
1920	61 639	53 891	7 748	695.5
1930	74 954	59 802	15 152	394.7
1940	77 504	57 389	20 115	295.3
1950	117 629	77 008	40 621	189.6
1960	237 292	135 549	101 743	133.1
1970	431 583	226 733	204 850	110.7
1980	812 000			
1990	1 645 000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870*.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5. Part I. P. 14.
Statistic Abstract of the U. S., 1991, 1992. Table 24.

* 每 100 名妇女相对应的男子数

迄于四五十年代,进展缓慢。种族主义猖獗,少数民族备受歧视的情况时有所闻。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排华运动一直继续到二十世纪初叶。排华运动的直接后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华人人口下降,一是华埠被迫变成相对封闭的社会。

加拿大的排华运动和立法对华人人口数量的影响不像美国那样明显。

表 14 加拿大华人人口及其占全加人口的百分比

年 份	数 量(人)	占全加人口百分比
1881	4 383	0.10
1891	9 129	0.19
1901	17 321	0.32
1911	27 774	0.39
1921	39 587	0.45
1931	46 518	0.45
1941	34 672	0.30
1951	32 528	0.23
1961	58 197	0.32
1971	118 815	0.55
1981	289 245	1.20

资料来源:《加拿大人口普查》有关各年人口和按民族划分的分册。

就人口结构而言,北美华人男多女少的情况长期没有改变。加拿大华人的男女比例与美国华人的情况相仿。1885—1923年间,来到加拿大的华人大多数是男性青年。1921年全加华人中男性 37 168 人,女性 2 424 人,男女比例为 100 比 6.5;到 1941 年上升为 100 比 12.7^①。与十九世纪相比,北美华人的地理分布有较明显的变化。总

^① 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8—399 页。

的趋势是由西向东迁移,从矿山、农村和小城镇向大中城市集中。这种情况在加拿大表现得尤为明显。189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华人占全加华人人口总数的98%,1951年降至49%,1981年更降至33.5%。加利福尼亚自十九世纪中叶起就是美国华人最集中的地区,198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说明,加州华人占全美华人总数的比例已降至39.99%。1970年纽约市华人总数超过旧金山跃居首位^①。随着华人人口向城市集中,其职业构成同十九世纪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主要从事开矿、务农、修筑铁路等重体力劳动转为从事开设洗衣店、餐馆和杂货店的经营活动,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提高,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

二、保持民族文化传统

从社会文化角度观察,在北美华人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逐渐融入当地主流文化的两种趋向同时并存。两峰对峙,双水分流。重视教育既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手段。北美华人于十九世纪末就在华埠按照传统办起了家塾和专馆,进入二十世纪开办学校蔚然成风。在美国较著名的有旧金山的中华学校(1909年),晨钟学校(1918年),纽约的华侨公立学校(1908年),檀香山的明伦学校(1911年)。在加拿大则有维多利亚的华侨公立学校(1909年),多伦多的华侨学校(1914年),温哥华的华侨中学(1917年)。这些学校是华人为了使子女在异国仍能学习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而设的,多在午后4:00—6:00、晚间或周

^① 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第152、400页。Diane Mei Lin Mark and Ginger Chih. *A Place Called China,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Inc.* 1982 p. 175.

末上课,便于华人子弟在地方公共学校放学后继续学习。这对于北美华人延续民族文化传统起了重要作用,也是对公共教育的一个补充,北美中文报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54年在旧金山出现的《金山日新录》。到了二十世纪,国内政治风云波及海外,康有为、梁启超访美成立保皇会,1908年在旧金山创办《世界日报》,并在纽约创办《维新报》。孙中山到美国开展革命活动则创办了《少年中国晨报》。该报几经周折,坚持到1970年,因财源枯竭被台湾当局购得,变为台湾国民党的报纸。持续时间较长的另一家报纸是国民党为声讨袁世凯而创办的《民气周刊》,后改为《民气日报》,1958年停刊。《纽约商报》1928年创刊,1943年改名《美洲日报》继续出版。在加拿大,保皇会于1903年在温哥华创办的《日新报》,是在加拿大出版的第一家中文报纸。辛亥革命后,则有温哥华出版的《侨声报》,维多利亚的《新民国日报》,和多伦多的《醒华日报》等。

维系华人文化传统的支柱是家庭。早期移民因男女比例失调,丈夫只身在北美,妻儿老小在国内的现象比比皆是。如表13所示,这种状况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生了较大变化。男女比例渐趋平衡。残缺家庭(指夫妻分居异地)的数量随之减少。北美的华人家庭和中国本土的家庭一样,是靠尊老扶幼、男尊女卑、夫唱妇随、孝亲敬上、重视子女教育这些传统的伦理观念来维系的。第一代移民家庭与中国本土家庭在规模、婚姻方式和亲族关系等方面基本相同。在北美社会风气的影响下,第二、三代人有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恋爱、婚姻较少干预,男尊女卑的传统有所削弱,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家庭的规模变小,核心家庭增加。美国的统计资料表明,华人家庭中婚配的比例要比全国高,也比其他少数民族高,而无配偶女性户主家庭的比例低于全国和其他少数民族^①。这从一个方

^① 参阅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1*, table 44.

面说明了华人家庭的传统性和相对稳定性。这也是中华文化得以在北美大陆上延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中华文化并不是经久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变化。辛亥革命的成功对北美华人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男人剪辫子,着西装。女子放脚,不再缠足。祭祀祖先、烧香拜佛的活动减少了。

三、逐渐融入当地主流文化

华人北美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信奉基督教是其表征之一。早在1852年美国长老会就在旧金山华埠设立教堂,附设诊疗所和英语夜校。1912年华人在旧金山建立了基督教男青年会,1914年成立童子军,此后又成立了女青年会。青年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举办免费的英语补习班。到1921年,美国已有5个男女青年会。二十年代以前,加拿大境内在华人社区进行传教活动的主要是美以美会和长老会。第一个向华人开放的教堂是维多利亚的美以美教堂。到二十年代约有10%的华人入教,1941年增至近30%。据调查,1955年在美国大陆共有62家华人新教教堂,夏威夷有4家。华人教堂平均人数为155人,粗略估计共有新教徒近万人^①。在华人中最活跃的教派是浸礼会和长老会。美国华人天主教堂出现较晚,但发展很快,总人数超过10万人。天主教徒多集中在费城和芝加哥地区。北美华人的社会生活入乡随俗,也有不小的变化。由重视本民族的传统节日逐渐过渡到重视当地的节日,在美国主要是感恩节、圣诞节和独立日。他们开始熟悉所在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逐渐卷入当地的社会政治生活。1905年成立的美籍华人公民联盟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

^① [美]宋李瑞芳:《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6·207页。

其主要活动是帮助该联盟的成员了解美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使自己成为一个好公民,有准备地参加选举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人逐步认识到选举权是反对种族歧视、保护自身合法权力的重要手段。加州华人使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挫败了州参议员卡米内梯剥夺华人选举权的阴谋。1932年华人组成纽约美籍华人投票联盟支持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纽约华埠近四分之三的华人投了罗斯福的票^①。华人公民联盟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力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中国时报》作为舆论工具。五十年代以来,联盟的影响缩小,其地位逐渐为1954年成立的美籍华人民主俱乐部所取代。在加拿大,类似的华人组织有华人鹿头会、华埠狮子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北美华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中、美、加都是同盟国的成员,北美华人有了同仇敌忾的感受。一方面,作为北美国家的公民,他们积极参军,奋勇杀敌,不少人为国捐躯,或在战争中负伤,履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二战期间美国华人有12 041人参军,伤亡214人^②,加拿大有500华人参加皇家军队。另一方面,他们十分关注祖国的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反对美国政府绥靖日本的政策,捐钱捐物支持中国政府坚持抗战。1943年和1947年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先后废除了排华法和禁止华人入境法,华人在北美的生存条件有了改善,华埠也逐渐从封闭的社区变成开放的社区。融合的趋势有所加强。

① Shih-shan Henry Tsai: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97.

② 同上书, p. 194—195.

第三节 北美华人的新贡献

一、新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人向北美移民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最引人注目的是数量大、增长快。1820—1992年中国移居美国的总人数为96.8万人,其中1961年以后移居的占移民总数的47.3%。

表 15 中国向美国移民的人数统计

时期	1820—1992年	1961—1970年	1971—1980年	1981—1990年	1991年	1992年
人数	968 000	34 800	124 300	298 900	24 000	29 600

资料来源: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4, New Jersey, 1993, p. 370.

1993年仅中国大陆向美国的移民即达65 578人,加上中国台湾移民共计79 907人,数量之多,仅次于墨西哥移民。^①

华人移民中来自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在北美国家新移民法(加拿大,1962、1976年,美国1965、1990年)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和资金携带者优先条款的吸引下,移民中有产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较前大大提高。据加拿大1979年的移民统计,在8 833名华人移民中,移民前的职业属实业家和管理人员的193人,科学家、工程师181人,教师、医疗人员、演员152人,一般职员、文秘人员、销售人员、服务业人员1 115人,加工业、建筑业、运输设备操作人员243人。同年,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和

^①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5, New Jersey, p. 386.

表 16 中国移民地区来源构成(1981 - 1991 年)

地 区	人 数	百 分 比
中国大陆	304 000	59.8%
台湾	131 000	25.8%
香港	73 000	14.4%
合计	508 000	100%

资料来源: Susan B. Gall et al. Eds., *Statistical Record of Asian Americans*, Detroit: Gale Research, 1993. 转引自 *The Asian Americ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1995, p. 323.

医疗人员 59 人。另据美国移民当局的统计, 1983 年来自中国大陆加入美国国籍和取得永久居民权的华人移民就业者 6 755 人,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 495 人, 管理和行政助理人员 1 438 人, 销售服务人员 2 432 人, 普通操作人员 745 人, 生产、手工艺和修理人员 626 人, 农、林、渔业工作者 19 人。

二、北美华人社会的新面貌

新移民大量涌入, 使北美华裔人口大幅度增加。据统计, 1950 年美国华裔人口为 11.76 万人, 1970 年增至 43.15 万人, 1980 年为 80.6 万余人, 1985 年超过百万人。1990 年更增至 1 648 696 人^①, 40 年内增加了 14 倍。华人占美国亚裔总数的 23%。已成为亚裔美国人中人数最多、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少数民族集团。加拿大的华人 1951 年只有 32 528 人。1981 年增加到 289 245 人, 1991 年达 586 645 人^②。

① Franklin Nged. *The Asian Americ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1995, p. 248.

② 同上书, p. 292.

40年内增加了19倍,在加拿大总人口中的比例从0.23%增加到2.1%。大城市是华人的聚居地,美国华人中97%的人口住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芝加哥、首都华盛顿、圣克利门托、西雅图等大城市里。加拿大的华裔则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等地。越来越多的华裔同白人中产阶级一样,定居郊区和大学城,而不是在传统的聚居地——华埠。北美华裔人口中长期存在的男多女少,性别比率失衡的状态随着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已得到根本改变。美国华裔的男女比例,1940年为2.9:1,1970年为1.1:1。加拿大华裔的男女比例1941年为100比12.7,1981年的资料表明,两性人数基本平衡。

与此同时,华人的职业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总的趋势是体力劳动者的比重在下降,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表 17 在美华裔的主要职业集团(1940—1970年)

主要职业集团	1940年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就业总数	36 454	48 409	98 784	181 190
专业技术人员	2.8%	7.1%	17.9%	26.5%
经理	20.6%	19.8%	12.7%	8.9%
销售人员	11.4%	15.9%	6.6%	4.3%
文秘人员	11.4%	15.9%	13.8%	16.8%
手工艺人员	1.2%	2.9%	5.2%	5.4%
操作人员	22.6%	17.1%	15.0%	14.8%
劳工	0.7%	1.7%	1.3%	2.3%
农工	3.8%	2.6%	1.0%	0.6%
服务人员	30.4%	28.8%	18.8%	19.6%
家庭佣工	6.2%	2.6%	1.0%	0.8%
不详	0.3%	1.5%	6.5%	

资料来源:U. S. Census Bureau: *Decennial Censuses* (1940, 1950, 1960, 1970).

1990年美国华裔从事管理和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36%，技术、销售和管理辅助人员占31%，服务人员16%，操作、装配和普通劳工占11%，精密产品生产者、手艺人、修理工占6%，农、林、渔从业人员仅占0.4%。妇女就业领域的变化也很明显。据1990年的统计，16岁以上的华裔妇女就业者占59%，其中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的占32%，从事技术、销售和管理辅助工作的占38%，服务人员占14%，操作、装配和普通劳工占13%，精密产品生产者、手艺人、修理工占3%，只有0.2%的劳动力在农、林、渔部门。这同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叶华裔妇女的主要职业是洗衣工、裁缝、家庭佣工有天壤之别。^①

据1990年的统计，25岁以上的美国华裔1 076 701人，获得大学以上学位的占40.6%（全国为21.9%），受过大学教育的占18%，两者相加达58.6%。华裔妇女受过中等和中等以上教育的占70%。有54%的华人妇女受过高等教育。

职业结构的变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直接影响到收入，早在1959年，美国华裔中等家庭的收入就超过了美国人中等家庭的收入。1970年美国华裔4口之家的收入为10 610美元，比全美家庭的平均收入高出1 000美元。1989年华人中等家庭收入为36 259美元，人均收入为14 877美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11%，低于全国水平（12%）^②。在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方面，华人家庭堪称北美之冠。已婚双亲家庭占85%（全国1993年为36%），女性家长的单亲家庭占9%，其他6%（全国为30%）。^③

① *The Asian American Encyclopedia*, p. 236-237.

② 同上书, p. 249;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5*, p. 383.

③ *The Asian American Encyclopedia*, p. 248; *The World Almanac*, p. 960.

三、对北美文化作出的新贡献

北美华裔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领域的人才之多和贡献之大决不亚于任何一个生活在北美的族群集团。在美国,华裔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总人数在10万以上。一流科学家和工程师达3万多人。据调查,早在1961年美国的88所院校中就有1450名华裔任职,有30名系主任,130位教授,300多名副教授。在美国的3所名牌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教师队伍中,华人就有98人^①。继1983年吴家玮教授出任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大学校长后,田长霖教授于1990年被任命为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校长。联系到中国学生遍布美国大学校园,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取得学位后不断补充美国大学师资和科学研究队伍的情况,用“无华不成校”来形容美国高等院校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在科学技术方面,最常为人们称道的是4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以及数学界泰斗陈省身。他们不仅出生于中国,大学也是在中国上的。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念念不忘养育之恩,经常来往于美、中之间,为两国之间的科学和教育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生活》杂志誉为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女性之一的吴健雄,用实验证实了杨、李两人发现的宇称不守恒定律,195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第一次授给妇女的科学荣誉博士学位。1974年被美国科学界授予当年最优秀科学家称号,1975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女性会长。休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朱经武(Paul C. W. Chu),因在超导方面的研究成果累累,1993年10月28日的《时代》周刊称他是“科学领域撑杆跳的冠军”。在生物医学方面,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化和内分泌学教授李卓浩(Choh Hao Li)因在脑垂体研究

^① [美]宋李瑞芳:《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1页。

上所作出的贡献,1962年荣获阿伯特·拉斯卡医学研究奖。这是美国基础医学研究的最高奖。几乎在所有的高科技领域杰出人物的名单中都可以找到华人的名字。在宇宙航行方面,王赣骏是第一个进入太空轨道的华人(1985年)。出生在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共和国的张福林是一位职业太空人,1986年获得为有成就的移民专设的“自由奖章”。同时获奖的还有德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布鲁克林科技学院的朱儒敬(Ju Chih Chu)教授是推引理论和应用方面的专家,多次解决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发动机遇到的种种疑难问题。美国高科技的心脏——硅谷,华人经营的企业上百家,华人技术人员数以千计。其中计算机工业的先驱戴维·梁博士、戴维·李博士和阿尔伯特·于博士(译音)都是六十年代赴美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此外,在贝尔实验室、美国商用机械公司(IBM)的中心实验室,美国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都有数百名华人科技专家在那里工作。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北美,哪里有高科技,哪里就有华人。

华人建筑师为北美大都市中林立的摩天大楼、公共建筑、纪念性建筑物增添了色彩,赢得了世界声誉。著名的建筑师贝聿铭(Leoh Ming Pei)1983年获国际普里茨克建筑学奖金。他参与的法国卢浮宫扩建工程,亲手设计的美国国家艺术馆东翼、肯尼迪图书馆和丹佛市摩天大楼是为人类立下的不朽的艺术丰碑。1982年,年仅21岁的耶鲁大学三年级学生林美雅(Maya Lin),在高手如云的角逐中一举夺魁。她设计的越南退伍军人纪念碑中选。六年后,她的又一杰作,位于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民权运动纪念广场设计入选。这些公共纪念性建筑物已成为美国人民为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沉思、缅怀前人走过的道路、寄托哀思的重要场所。

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华人也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发轫于四五十年代、形成于七十年代的美国华裔文学虽然在定义和范围的界定上还有争议,但它已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包柏漪的《春

月》以出生在苏州的女子春月为主线,描绘了一个旧式中国家庭五代人的悲欢离合,展现了一幅中国社会变迁的画面。该书被美国评论界称之为“中国的《乱世佳人》”,在美国十分畅销,而且被翻译成20种文字。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战士》(1976年)叙述了一位美国华裔女性冲破性别、种族和民族障碍成长的过程。一经问世,全美瞩目,立即获全国图书评论界最佳奖、安士费尔德—伍尔夫种族关系奖和女教师杂志奖。1980年,被《时代》杂志列为七十年代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她的第二部著作《中国人》(1980年)也是一部畅销书,获“美国图书奖”。这两部书,展现了少数民族成员溶入美国社会主流的痛苦经历,说明了美国华人的真正含义。非华裔读者认为汤亭亭是美国华裔的代表,华裔批评界求全责备,说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研究,将神话和想象混为一谈。汤回答说:“我就是要写故事,海市蜃楼的故事。”^①弗兰克·金(Frank Chin)的剧作《小鸡笼里的中国人》(Chicken Coop Chinaman)是第一个在主流剧院演出的美国华裔剧本。《龙年》(The Year of Dragon)是为庆祝美国独立200周年而作。这两个引起争议的剧本企图告诉美国公众,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进取的。另一位剧作家戴维·亨利·黄(David Henry Hwang),当他还在斯坦福上大学时,描写美国出生的华裔同在国外出生的华人之间冲突的剧本《离岸价格》(FOB)就被1979年在康涅狄格州举行的全国奥尼尔剧作会议看中,1980年该剧在纽约公共剧院上演,取得很大成功,接着又在旧金山、洛杉矶上演。后被评为全美1980—1981年最佳新剧本。

^① East-West, May 13, 1981. 转引自 Shib-shan Henry Tsai: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43.

第四章 留美学生运动—— 文化交流的桥梁

近代留美学生运动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它是中国向欧美发达国家寻找富国强兵之道,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手段,大大促进了文化交流。从北美方面看,扶植留学生运动是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扩大其在华影响,从而控制中国发展的需要。早在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埃德蒙·J·詹姆斯(Edmund J. James)在致美国总统的《关于派遣教育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备忘录》中就曾指出:“中国正濒临革命……世界上的每一个大国都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国的革命发生关系。各国将自行决定是采取友好、和善的态度还是向它炫耀武力,挥舞拳头。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毫不犹豫地作出抉择。成功地教育中国当代青年的国家,将会是在道德、智性和商业上可能对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国家,并对其所作的努力作出最大可能的回报。倘若在三十年前(当时是有这种可能的),成功地将中国学生潮流引向美国,而且保持较大规模,我们就能够在今天以最令人满意的和最巧妙的方式——通过在智性和精神上左右其领袖人物来控制中国的发展。”^①

^① Arthur H.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7. p. 214—215.

这段文字,意味深长至今仍不失其实效。

第一节 开 端

我国近代留学运动是从留学美国开始的。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1828—1912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1846年他毕业于马礼逊学校,1847年随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留学,1854年在著名的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他的个人经历使他下定决心“让中国的新一代也享受他所受过的教育,通过西方教育,使中国复兴,成为文明、富强之国”^①。为此,他多方奔走,广交清廷大员,终于在1868年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条陈。但当时并未为清廷采纳。1870年,容闳设法说服了曾国藩,由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派遣留学生的建议才得到批准。1872—1875年间,清政府分4次共派出120名学童,为我国近代公费留学生之始。1881年,清廷以幼童荒废中学、“囿于异学”为由,将他们分三批撤回。首批留美学子回国后,大多在工矿、铁路、电信、海军、教育等部门任职,为传播科学技术、发展我国近代工业作出了贡献。

表 18 留美学童名录(1872—1875年)

第 一 批

姓 名	籍 贯	出国年龄	姓 名	籍 贯	出国年龄
曾 笃 恭	广东海阳	16	陆永泉	广东香山	14
黄仲良	广东番禺	15	邓士聪	广东香山	14
梁敦彦	广东顺德	15	蔡绍基	广东香山	14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1900, p. 41.

(续表)

姓名	籍贯	出国年龄	姓名	籍贯	出国年龄
蔡锦章	广东香山	14	陈钜鏞	广东新会	13
黄开甲	广东镇平	13	黄锡宝	福建同安	13
张仁康	广东香山	13	钟文耀	广东香山	13
史锦鏞	广东香山	15	詹天佑	安徽徽州	12
钟进成	广东香山	14	曹吉福	江苏川沙	13
陈荣贵	广东新会	14	罗国瑞	广东博罗	12
石锦堂	山东济宁	14	刘家照	广东香山	12
程大器	广东香山	14	牛尚周	江苏嘉定	11
钱文魁	江苏上海	14	谭耀勋	广东香山	11
欧阳康	广东香山	14	吴仰曾	广东四会	11
容尚谦	广东香山	10	邝荣光	广东新宁	10
何廷梁	广东顺德	13	潘铭钟	广东南海	11

第二批

姓名	籍贯	出国年龄	姓名	籍贯	出国年龄
容尚勤	广东香山	不详	邝景垣	广东南海	13
王凤阶	浙江慈溪	14	黄有章	广东香山	13
苏锐钊	广东南海	14	邓桂廷	广东香山	13
陈乾生	浙江鄞县	14	梁普照	广东番禺	13
丁崇吉	浙江定海	14	唐元湛	广东香山	13
唐国安	广东香山	14	李恩富	广东香山	13
邝咏钟	广东南海	13	卓仁志	广东香山	12
方伯梁	广东开平	13	张祥和	江苏吴县	11
陆锡贵	江苏上海	13	梁普时	广东番禺	11
曾溥	广东朝阳	不详	王良登	浙江定海	13
吴应科	广东四会	14	蔡廷干	广东香山	13
梁金荣	广东香山	14	温秉忠	广东新宁	12
吴仲贤	广东四会	14	张有恭	广东香山	12
李桂攀	广东香山	14	陈佩瑚	广东南海	11
宋文翔	广东香山	13	容揆	广东新宁	14

第 三 批

姓 名	籍 贯	出国年龄	姓 名	籍 贯	出国年龄
唐绍仪	广东香山	12	祁祖彝	江苏上海	12
周长龄	广东新安	14	梁如浩	广东香山	12
杨兆楠	广东南海	13	薛有福	福建漳浦	12
唐致尧	广东香山	13	沈嘉树	江苏宝山	11
黄季良	广东番禺	13	徐振鹏	广东香山	11
康康龄	江苏上海	12	吴敬荣	安徽休宁	11
林沛泉	广东番禺	12	宦维城	江苏丹徒	10
袁长坤	浙江绍兴	12	朱锡绶	江苏上海	10
徐之煊	广东南海	12	程大业	安徽黟县	12
曹嘉爵	广东顺德	12	周万鹏	江苏宝山	11
孙广明	浙江钱塘	14	卢祖华	广东新会	11
朱宝奎	江苏常州	13	曹嘉祥	广东顺德	11
邝景扬	广东南海	13	容耀垣	广东香山	10
郑廷襄	广东香山	13	曹茂祥	江苏上海	10
邝贤侍	广东南海	12	杨昌龄	广东顺德	12

第 四 批

姓 名	籍 贯	出国年龄	姓 名	籍 贯	出国年龄
林联辉	广东南海	15	邝炳光	广东新宁	13
唐荣俊	广东香山	14	梁丕旭	广东番禺	12
陈福增	广东南海	14	吴其藻	广东香山	12
吴焕荣	江苏武进	13	冯炳忠	广东鹤山	12
黄祖莲	安徽怀远	13	陈金揆	广东香山	12
周传谔	江苏嘉定	13	朱汝金	江苏华亭	11
金大廷	江苏宝山	13	沈寿昌	江苏上海	11
陆德彰	江苏川沙	13	周传谏	江苏嘉定	11
沈德耀	浙江慈溪	14	王仁彬	江苏吴县	12
林联盛	广东南海	14	陶廷庚	广东南海	12
唐荣浩	广东香山	13	盛文扬	广东香山	12
刘玉麟	广东香山	13	梁金鳌	广东南海	11
陈绍昌	广东香山	13	潘斯炽	广东南海	11
黄耀昌	广东香山	13	谭耀芳	广东香山	10
邝国光	广东新宁	13	沈德辉	浙江慈溪	12

资料来源:李喜所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Thomas E. La 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Pullman, 1942, p. 173-176.

上述幼童当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10岁,十三四岁者占大多数。从籍贯上看,广东84人,占70%;江苏21人,占17.5%;浙江8人,占6.7%;安徽4人,占3.3%;福建2人,占1.7%;山东1人,占0.8%。而广东人中,香山县40人,占33.3%。

第二节 庚款留美

1908年7月11日美驻华公使柔克义通知清政府,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根据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咨文已于5月25日通过联合决议,将分给美国的庚子赔款减至13 655 492.69美元,将此数与原分给美国之间的差额,计10 785 286.12美元,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逐年按月“退还”中国,帮助中国“兴学”。1909年7月10日外务部、学部会奏,以美国“减收”赔款选派学生赴美留学,先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并设肄业馆一所。学生名额按各省赔款数目分摊。周自齐为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帮办。同年9月28日清政府批准所奏,建游美肄业馆于清华园。1909至1911年间,先后招生三批直接送美国留学,共180人。1911年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正式成立。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全校分为高等科及中等科,毕业期限定为8年。1921年该校改变原有制度,分为三级,最高级与美国四年制大学二年级相当,毕业生可直接插入美国大学三年级或四年级肄业。同时停招中等科,高等科亦于1924年停止招生。1925年起逐步改办为大学,1928年正式改名国立清华大学。从1909年至1928年经清华派出的官费留美学生共1 279人,领庚款津贴的自费生476人、各机关转入清华

官费 60 人、特别官费生 10 人、袁氏后裔生 3 人,共 1 828 人。^①

1917 年中美人士吁请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的余存部分一并退还,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美国国会于 1924 年通过继续退还庚款的决议。决议规定将庚款余额本金利息 12 545 438.67 美元分 20 年归还中国(1909—1940 年归还庚款总数共 16 726 614 美元)。同年 9 月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作为管理退款的专门机构。董事会由北京政府任命,中国董事 10 人,包括外交部官员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清华、南开、北大、北师大、东南大学校长周诒春、张伯苓、蒋梦麟、范源廉、郭秉文,学术界名流丁文江、黄炎培。美方董事为孟禄、杜威、贝克、贝诺德、顾临。其中既有教育界知名人士,也有在银行中和私人基金会中工作的专家。董事会成员每年均有变动。董事长始为颜惠庆,后为蔡元培,其后屡有更迭,但孟禄在董事会成立的 16 年中一直任第一副董事长,握有实权。^②

董事会的章程规定“使用该款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1925 年 6 月,第一次年会决定的用款方针是:“(1)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形之应用,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试验与表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2)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③从实施的情况看,与第一次庚款的最大不同在于大部分资金用于资助科学研究与教学,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基金会的工作之一是设置科学教席。1926—1930 年间,基金会在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大学、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四川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聘请著名科学家担任科学教席。涉及的学科为物理、化学、动物、植物、教育

①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68—69 页。

② 梁碧莹:《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插曲——论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与中国教育文化事业》,《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6 页。

③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 1924 年版,第 87、88 页。

心理。据统计,1926年至1930年共设有教席39座,其中中央大学8座,中山大学8座,北京师范大学7座,四川大学7座,东北大学5座,武汉大学4座^①。在科学研究方面,基金会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设研究教授;二是资助高等院校的应用科学部门,主要有东南大学的农科,南洋大学的工科和湘雅医科专门学校。1926年至1945年间,共补助了233所大学,139个研究机关,109个文化学术团体和38个其他机构。补助总金额24 250 893.65元(折合美金362 795.63元)^②。三是资助科研机构。最为突出的是对地质调查研究所和生物研究所的资助。前者在1926—1933年间获得资助13.5万元。同期后者获得资助19.5万元。基金会还与“尚志学会”合办静生生物调查所,并负责该所日常经费开支,迄于抗战时期物价飞涨为止,共拨款100万元。为了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基金会拨款130多万元兴建北京图书馆,聘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其所提供的历年经常费用和购置图书的费用直到1945年改由国民党政府拨款方才停止。^③

在资助留美中国学生的奖学金方面,在原有的2000个奖学金名额基础上,又提供了400个奖学金名额。政府行为带动了私人投资。1920—1949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创办协和医学院的同时,提供了600个奖学金名额。中国医学委员会(China Medical Board)也提供了几百个奖学金名额。

表 19 留美学生人数(1847—1953年)

入学年份	男	女	性别未详	总 数
1850	1			1

①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第92页。

②③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574页。

(续表)

入学年份	男	女	性别未详	总 数
1874 ^①	2			2
1875	1			1
1876	1			1
1878	4		1	5
1879	13			13
1880	12			12
1881	4			4
1883	2			2
1885	1			1
1886			1	1
1892	2			2
1895	1			1
1897	4			4
1898	3			3
1899	1			1
1900	3			3
1901	12			14
1902	7	1		8
1903	4	1		5
1904	18	2	1	21
1905	24		1	25
1906	55	4	1	60
1907	69	1	1	71
1908	64	6	7	77

① 1872、1873、1874、1875年各年派遣幼童30名赴美留学,原表未列入。

(续表)

入学年份	男	女	性别未详	总 数
1909	58	3	8	69
1910	90	6	11	107
1911	77	7	6	90
1912	69	4	6	79
1913	109	14	15	138
1914	155	16	19	190
1915	172	17	24	213
1916	143	19	19	181
1917	136	21	16	173
1918	183	26	20	229
1919	219	20	22	261
1920	322	26	47	395
1921	304	40	43	387
1922	307	49	47	403
1923	351	32	43	426
1924	322	32	29	383
1925	279	37	33	349
1926	266	42	33	341
1927	233	50	19	302
1928	237	43	26	306
1929	286	34	20	340
1930	248	40	28	316
1931	170	33	24	227
1932	121	22	15	158
1933	74	17	13	104
1934	120	29	23	172

(续表)

入学年份	男	女	性别未详	总 数
1935	147	35	30	212
1936	166	38	26	230
1937	157	38	24	219
1938	157	64	14	235
1939	104	48	6	158
1940	140	55	11	206
1941	138	64	18	220
1942	114	32	4	150
1943	158	50	10	218
1944	204	52	14	270
1945	408	82	53	543
1946	422	164	62	648
1947	780	340	74	1194
1948	846	320	108	1274
1949	672	297	47	1016
1950	422	221	20	663
1951	318	205	22	545
1952	317	192	14	523
1953	191	97	17	305
年份未详	3054	603	1472	5129
总 计	14274	3692	2670	20636

资料来源:梅贻琦、程其保:《百年来中国留美学生调查录》(1854—1953),载陈学恂、田正平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86—688页。

中国留美学生的来源就地区分布而言,大部分来自沿海各省,内地各省所占比例甚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来,迄今变化不大。

表 20 中国留美学生的来源地区分布(1903—1945年)

省份 地区	年 份								
	1903	1909	1910	1911	1914	1918	1921	1943	1945
广 东	58.0	38.1	38.0	51.2	47.2	43.0	24.2	36.9	33.6
江 苏	4.0	28.5	23.2	22.0	13.9	13.4	21.9	20.9	22.3
浙 江	6.0	11.3	11.6	9.2	8.3	9.2	10.8	8.4	7.5
福 建	2.0	4.6	5.1	3.7	5.3	8.8	7.8	6.4	5.5
湖 南	—	0.4	2.1	1.0	8.0	4.7	5.2	2.6	3.0
湖 北	12.0	1.7	3.1	1.6	2.4	3.7	2.8	1.9	3.2
河 北	—	8.4	8.2	4.3	2.2	3.7	9.7	10.6	10.9
安 徽	16.0	3.4	4.1	2.0	—	2.8	2.3	2.0	1.6
江 西	—	1.3	1.4	0.4	4.1	2.6	2.4	1.5	1.7
四 川	—	—	—	1.0	—	1.6	1.8	1.5	2.2
山 东	—	—	0.4	2.1	2.7	1.4	2.2	2.2	2.5
河 南	—	0.4	0.4	—	—	0.8	3.8	1.2	1.5
山 西	—	0.4	0.7	—	—	0.5	0.9	0.8	1.1
辽 宁	—	—	—	—	—	0.1	0.9	1.3	1.3
吉 林	—	—	—	—	—	0.8	0.1	—	0.4
黑 龙 江	—	—	—	—	—	—	—	—	—
其 他	2.0	1.5	1.7	1.5	5.9	2.9	3.3	1.8	1.7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人 数	50	239	292	490	830	990	679	1191	1972
未 知	50		292	650	847	1124	805	1295	3066

资料来源: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1966.

表 21 留美学生学科分布(1905—1952/53年)

学科领域	分布情况(%)
人文社会科学	25.3
企业管理	8.6
教育	12.2
理、工、农、医	52.4

这说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直是留美学生追求的主要目标。迄于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留美学生总数约3万人,留日学生总人数要比留美学生多10倍。但在美取得博士学位者比留日学生多20倍,超过在英、法、德三国取得博士学位人数的总和。^①

表 22 中国留学生取得学位的总数(1850—1950年)

国 别(年份)	获得学位者的总数	获得博士学位者的总数
美国(1850—1953)	13 797	2 097
日本(1901—1939)	12 000	100
德国(1907—1950)	3 500	678
法国(1907—1950)	3 000	527
英国(1911—1949)	2 500	250
合计	34 797	3 652

资料来源:Joyce K. Kallgren et al. Ed., *Educational Exchanges Essays on the Sino - American Experience* p. 30.

表 23 留美学生取得学位的学科分布(1900—1950年)

科 目	学 士(B. A.)%	博 士(Ph. D)%
工程技术	28	21
自然科学	12	40
人文学科	17	7
社会科学	13	11
教 育	12	5
商 业	8	9(含经济)
医 学	7	5
农 业	3	2

资料来源:同上书 p. 32.

① Marry Brown Bullock,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lloquium Paper,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ashington D. C. March 20, 1984. 转引自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p. 18.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的留美学生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我国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几乎完全中断,出国留学人数锐减。国民党政府于1938年6月颁布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该办法对于留学资格作出了较严格的限定。条件之一,需在公私立大学毕业后继续研究或服务二年以上并卓有成绩者,在学科方面则以研究军工、理、医各科学生为限。这是造成留学生数量锐减的又一重要因素。1937年留学生总数为366人,暂行办法公布后,1938年骤降至92人,1939年更降至65人。1942年限制办法取消。翌年10月又颁布自费留学派遣办法,要求一律经过考试,合格者方得出国。同年12月举行第一届自费留学生考试。应试学生751人,均拟赴美留学。结果327人合格,于1944年陆续赴美。美国史著名学者黄绍湘就是其中的一个。1946年7月举行第二次考试。报考人数共3817人。录取自费留学生1216人。加上公费考试落选,成绩符合自费标准者718人,实际录取1934人。由教育部发给留学证书者1163人,其中赴美者1018人。在这批留美学生中,攻读历史的丁则民、蒋相泽、李道揆、施子瑜,攻读教育的滕大春,攻读经济的陶继侃、王继祖等人后来都成为我国各学科研究北美问题的专家。在此期间(194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5所大学提供理工科41名研究生奖学金。美国万国农具公司提供农业机械方面20名研究生奖学金。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还选派理工农医的研究人员和考察人员出国,赴美者46人,赴加拿大者6人。

抗日战争末期,重庆政府为了战后复兴计划选派大批青年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赴美。1945年美国经济行政管理部门拨款450万美

元列入租借法,专供中国留学人员使用。1945—1947年间共有1200名中国铁路工程师、卫生部门官员、财政专家、教师和技术人员赴美。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美国国务院也为有志在美攻读工程、技术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美国宗教团体和大公司也竞相效尤。凡此种种,使中国留美学生人数剧增。

表 24 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中国留美学生数

学 年	中国学生总数(人)
1943 -1944	706
1944—1945	823
1945—1946	1 298
1946—1947	1 678
1947—1948	2 310
1948 -1949	3 914

资料来源: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A Sarvey of Chinese Stucdents, p. 18. 转摘自 Shih-Shan Henry Tsai: *The Chinese Experionce in America* Inoliana Unirersity Press, 1986, P. 122.

1949年全国解放后,留美学生因资助来源断绝,生活陷于困境而面临抉择。一部分人冲破美方设下的重重障碍,毅然回国。一部分人留在美国继续完成学业。为了使这批人才留居美国,美国国务院依据1948年的《流离失所人员法》(Displaced Persons Act),准许这些留学生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留在美国完成学业和寻求职业。这些中国留学生得到了美国政府、私人基金会的资助。后来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李政道便是这批在美定居的中国留学生中最杰出的两位,钱学森则是这个时期回国服务科技人才中的佼佼者。

第四节 留学北美的高潮

中国和加拿大建交(1972年)后,中国就向加拿大派出留学人员,主要是学习语言。1978年,中国政府决定加大留学人员的数量,把大量派出留学人员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高我国科技水平的一项战略措施。中美正式建交后不久,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在白宫签署了两国政府间的一系列协定,包括一个全面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一个文化交流协定、一个关于交换留学生的协定、一个单独的高能物理合作协定,还有一个中国有权购买美国国家宇航局发射民用人造卫星服务设施的协定。这些协定是中美教育、科技、文化交流的基础和出发点。由于美国和加拿大幅员广大、科技先进、教育事业发达,1978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留学人员的主要接收国。

表 25 中国政府向北美国家派出留学人员数量占派出总量的百分比*

年 份	派出总数	美 国	加 拿 大	北美合计
1978	314	16.31	10.57	26.88
1979	1 277	20.75	4.58	25.33
1980	1 862	35.60	9.62	45.22
1981	2 925	47.55	5.83	53.38
1982	2 801	50.39	3.42	53.81
1983	2 821	39.68	8.44	48.12
1984	2 913	41.31	9.13	50.44
1985	3 246	40.17	7.34	47.51
1986	3 234	47.00	8.52	55.52

* 不包括港、台地区。

1987年以后因政策放宽,自费出国的人数显著增加,美国方面给予签证的情况如下:

表 26 1988 年以来美国给予中国留学人员签证的数字*

签证种类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小 计
F-1	2000	3300	4000	9300
J-1	3500	2400	1200	7100
小计	5500	5700	5200	16400

说明:F-1 签证发给自费留学人员;J-1 签证发给由美国新闻总署接待的留学人员。

资料来源: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 Reviews of Recent Reports China Exchange News Spring 1991. p. 22.

* 不包括港、台地区。

表 27 中国派往加拿大留学人员数字*

年份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总计
人数	34	15	35	80	210	191	114	288	308	346	400	2 021

资料来源:Martin Singer:Canadian Academic Relations with P. R. C. Since 1970.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1986, Vol. II. Appendix.

* 不包括港、台地区。

中国在北美的留学生有如下特点:(1)数量大,据 1988 年的统计,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员总数为 2.8 万人(其中公派 2.1 万人,自费 7 000 人),仅公费人数一项就超过了 1854—1953 年一百年间留美学生的总和(20 636 人),已成为美国外国留学生中数量最大的群体。这个数字也大大超过了 1950—1965 年间中国派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留学人员的总和(约 2 万人)。1979—1987 年间美国发给中国留学人员的签证达 62 007 个,由此更可以看出留美人数之多。(2)留美人员主要来自我国沿海城市地区(北京、上海、广州)。(3)学习专业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主,管理专业呈上升趋势,这反映了我国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4)经费来源由中国政府资助为主转变为以美方各种奖学金资助为主。1978年,54%的公派留学人员由中国政府资助;1985年降至17%。(5)1978至1988年1月,已有12500持J-1签证和7000持F-1签证的留美人员回到中国^①。留学人员中公派的访问学者几乎全部回国,滞留不归者多为自费和攻读学位人员。

在中国向北美国家派出留学人员的同时,也有一批北美的学生来中国学习。他们主要是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有少量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和研究工作者前来中国从事与中国有关的研究工作。还有一些北美的大学教师前来中国进行讲学活动。前面提到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在上述的学术交流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79—1986年间由该委员会资助来华短期讲学的学者190人,其中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学者占53%,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占47%。^②

第五节 留美学生的作用和影响

对于留美学生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界既有基本否定的,也有基本肯定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论著倾向于肯定留美学生的积极作用。

第一批留美学童回国参加工作的共94人,在工矿、铁路、电信部门就业的人最多,共30人。他们为中国的工业化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最著名的是为修建京张铁路而驰名中外的詹天佑。从事外交、

① Leo A. Orleans;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 C. 1988. p. 9-14.

② 根据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提供的资料: *CSCPRC Visiting Scholar Exchange Program, American Scholars, 1979-1986*.

行政工作者次之,有 24 人。其中有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担任过外交总长的梁敦彦。在海军中任职的人数居第三位,有 20 人。徐振鹏曾出任海军次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参加过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技术精练,作战勇敢,壮烈殉国者不乏其人。从事教育工作的 5 人中有两人出任大学校长,分别为天津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中工作,对于我国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表 28 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奠基人

学科	姓名	生(卒)年	毕业学校	备注
数学	姜立夫	1890—1978	1919 年哈佛大学博士	现代数学早期最卓有成效的播种人
数学	华罗庚	1910—1985	1948 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伊利诺大学任教,获伊利诺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中科院学部委员
数学	江泽涵	1902—1994	1930 年哈佛大学博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
数学	陈省身	1911—	1945 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	美国科学院院士
力学	郭永怀	1909—1968	1941 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 1946 年加州理工学院博士	流体力学,中科院学部委员
力学	周培源	1902—	1928 年加州理工学院博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
力学	钱伟长	1912—	1942 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中科院学部委员
力学	钱学森	1911—	1938 年加州理工学院博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
力学	郑哲敏	1924—	1949 年加州理工学院硕士	爆炸力学,中科院学部委员

(续表)

学科	姓名	生(卒)年	毕业学校	备注
物理	李耀邦	1884— 1940?	1903年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 1914年回国	留美学生中获物理学博士第一人,对测定并证实基本电荷作出了贡献
物理	饶毓泰	1891—1968	1922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实验物理,中科院学部委员
物理	胡刚复	1892—1966	1918年哈佛大学博士	X射线,最早在北京大学设置物理学门
物理	吴有训	1897—1977	1926年芝加哥大学博士	近代物理实验先驱,中科院学部委员
物理	叶企孙	1898—1977	1923年哈佛大学博士	1925年在清华创建物理系,中科院学部委员
物理	施汝为	1901—1983	1934年耶鲁大学博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
物理	赵忠尧	1902—	1930年加州理工学院博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
物理	萨本栋	1902—1949	192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物理	吴大猷	1907—	1933年密执安大学博士	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物理	吴健雄	1912—	194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	美国科学院院士
物理	胡宁	1916—	1943年加州理工学院博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
物理	洪朝生	1920—	1948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
化学	张子高	1886—1976	1911年入麻省理工学院专攻化学 1916年回国	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化学	王 璉	1888—1966	1914年里海大学学士 1936年明尼苏达大学硕士	化学史学家
化学	庄长恭	1894—1962	1924年芝加哥大学博士	有机化学家 中科院学部委员

(续表)

学科	姓名	生(卒)年	毕业学校	备注
化学	杨石先	1896—1985	1923年康奈尔大学硕士 1931年耶鲁大学博士	曾任南开大学校长 中科院学部委员
化学	曾昭伦	1899—1967	1926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曾任高教部副部长,中 科院学部委员
化学	纪育洋	1899—1982	1928年耶鲁大学博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
化学	黄子卿	1900—1982	1935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
化学	戴安邦	1901—	1931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
化学	傅 鹰	1902—1979	1928年密执安大学博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曾任 北京大学副校长
化学	高济宇	1902—	1931年伊利诺大学博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
化学	蔡镛生	1902—1983	1932年芝加哥大学博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
化工	徐名材	1889—1951	1909年留美,获麻省理工 学院硕士学位	
化工	侯德榜	1890—1974	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侯德榜制碱法发明者
化工	李寿恒	1898—	1920年留美,获伊利诺大 学博士学位	曾任浙江化工学院院长
化工	杜长明	1902—1947	1931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化工	张洪沅	1902—	1930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1925年在美创建中华 化学工程学会
化工	张克忠	1903—1954	1928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生物	钱崇澍	1883—1965	1910年赴美先后就读于伊 利诺、芝加哥、哈佛	植物学,中科院学部委 员
生物	秉 志	1886—1965	1918年康奈尔大学博士	动物学,中科院学部委 员
生物	马文昭	1886—1965	1920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 攻解剖学	细胞学和组织学家,中 科院学部委员

(续表)

学科	姓名	生(卒)年	毕业学校	备注
生物	陈焕镛	1890—1971	1919年哈佛大学硕士	植物分类、树木学,中科院学部委员
生物	戴芳澜	1893—1973	1918—1920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	真菌学、植物病理,中科院学部委员
生物	吴宪	1893—1959	1919年哈佛大学博士	生物化学和营养学
生物	胡先啸	1894—1968	1923年哈佛大学博士	植物分类
生物	陈桢	1894—1957	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动物学、遗传学,中科院学部委员
生物	张景钺	1895—1975	1925年芝加哥大学博士	植物形态,中科院学部委员
生物	李汝祺	1895—1991	1923年普渡大学博士	遗传学
生物	胡经甫	1896—1972	1922年康奈尔大学博士	生物学,中科院学部委员
生物	蔡翘	1897—	1925年芝加哥大学博士	生理学,中科院学部委员
生物	李继侗	1897—1961	1925年耶鲁大学博士	植物学,中科院学部委员
生物	吴韞珍	1898—1941	1927年康奈尔大学博士	植物分类
生物	张锡钧	1899—1988	1926年芝加哥大学博士	生理学
机械	石志仁	1897—1972	1925年麻省理工学院硕士	铁路机械,中科院学部委员
机械	张德庆	1900—1977	1926年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中科院学部委员
机械	周惠久	1909—	1936年伊利诺大学力学硕士 1939年密执安大学冶金工程硕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西安交大副校长

(续表)

学科	姓名	生(卒)年	毕业学校	备注
机械	雷天觉	1913—	1942年赴美学习机床与工具制造	机械工程,中科院学部委员
机械	孟少农	1915—	四十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获汽车制造硕士学位	东风、红旗牌轿车设计者,中科院学部委员
土木工程	詹天佑	1861—1919	188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	铁路工程先驱
土木工程	凌鸿勋	1894—1981	1915年赴美在美国桥梁公司实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土木工程	蔡方荫	1901—1963	1929年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硕士	中科院学部委员
土木工程	茅以升	1896—	1917年康奈尔大学硕士 1921年卡内基理工学院博士	桥梁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
土木工程	赵祖康	1900—	1930年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进修	市政和道路工程学家

资料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力学、数学、物理、化学、化工、生物、机械、土木工程卷;王咸昌主编:《当代中国自然科学学者大辞典》,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大多毕业于北美的名牌大学: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康奈尔、芝加哥、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美的最高学府是培育中国科学家的摇篮。这种情况直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之后才有所改变。

现代中国科学共同体也是在西欧和北美的影响下形成的。所谓“科学共同体”是指随着科学工作者的数量的增加而出现的专业组织、专业出版物和共同的认知方式和行为准则的总称。如前所述,近

代中国最早的专业组织首推“中国医学传道会”成立于1886年,后演变为“中华医学会”,其所出版的刊物《中华医学杂志》也是中国最早出版的专业刊物。1914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立的“中国科学社”和出版的杂志《科学》是以“美国科学协进会”及其出版物《科学》为蓝本而创办的。该杂志的宗旨为“阐发科学精义及其应用”。1915—1924年间共出版9卷108期,发表介绍科学的文章在1100篇左右,引进和传播了大量科学知识。该杂志注意介绍当时国外科学的新发现和新成果,对物理学领域的革命,生物学中遗传学说的建立都作了比较完整的介绍。留美学生特别注重提倡科学研究的方法,包括近代科学实证主义、归纳法和演绎法。在确立真正意义的科学观,开创现代科学事业方面,留美学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①。1922年秋,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创办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私人学术团体设立的第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在中国科学社的影响下,各种专业组织纷纷成立。据不完全统计,到三十年代中期已有20多个学会,出版的科学刊物达200多种。

留美学生不仅给我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在传播欧美现代政治文化方面也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容闳率先引进了“公民政府”的概念。孙中山将“民有”、“民治”、“民享”的概念应用到中国实际,创造了三民主义。民生(people's livelihood)的概念来源于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说。他还从三权分立说中演绎出“五权宪法”,创造了中国民主政权的一种组织形式,至今仍在我国台湾使用。胡适则把西方民主思想的内核——个人主义输入中国,鼓吹“个性解放”。他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就是以“个性解放”为张本的。北美政治文化对中国

^① 参阅黄知正:《五四时期留美学生对科学的传播》,《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影响之大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大都把美国视为现代社会的楷模。陈独秀向青年陈述的六义:(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①。这六义实际上是对美国价值观念,崇尚民主和科学的总结。由德、赛两先生构成的美国形象在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经久不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留美高潮,对双方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最直接的影响是,为了克服交流过程中的语言障碍,中国各级各类学校都普遍加强了外语语言教学,设立专门的教学机构,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增添先进的语言教学设备,改进教学方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的考试制度,整体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另一个潜移默化的变化是,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前仿照苏联的知识等级化、学科分工过细和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结构正在转换为拓宽专业领域、组织学科集团、有利于学科交叉、有利于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相结合的体制,一批名实相符的、真正的、北美式的大学正在出现。一些被废置的学科得到恢复,一批新兴学科开始建立。比较突出的例证是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的恢复,管理学科和计算机学科的建立。传统学科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交流。派出留学人员的目的在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目的是初步达到了。付出的代价是一批有用之才外流,暂时或长期定居北美,其人数之多是始料未及的。对于北美地区来说,交流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一批优秀人才成为北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大公司实验室的有生力量,也可以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创刊号。

称之为廉价的高级劳动力。这支队伍是如此之重要，以至北美一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修改移民法，以便使他们取得合法身份，成为永久居民。

第五章 北美人与国共两党

第一节 北美人与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政党之一。国民党的创建人，伟大的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年受英美教育，曾多次到北美从事革命活动，不仅得到北美华侨、华人的广泛支持，而且赢得北美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赞助。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先后结交了美国友好人士麦克威廉士(C. E. McWilliams)、荷马李(Homer Lea 1785—1912年)、戴德律(James Detrick 1854—1932年)等人，得到他们的资助和多方支持。国民党元老中与北美关系密切者也不乏其人，廖仲恺就是一例。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与美国朝野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政治文化角度观察，国民党的宗旨、纲领、主张，以及取得政权后的政治制度是美国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奇特的嫁接。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北美人与国民党人有了更多的文化往来。

一、北美各界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美国政府采取了民族利己主义的孤立主义政策。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演说,鼓吹用“检疫隔离”的方法,来阻止“世界性无法无天瘟疫的蔓延”^①。这就是说,要限制侵略,而不是消灭侵略。在实践上,美国政府一方面继续为军事物资出口日本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则推行有限援华政策。美国文化界的一些富于正义感的人士,一直同情中国的救亡运动,要求美国政府对日实行全面禁运,对华进行全面援助。与此同时,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民主、进步的中国出现在太平洋彼岸。

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等七人因宣传抗日救国而被捕事件(即七君子案)发生后,美国著名学者爱因斯坦、杜威、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 1884—1908年)、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马克斯维尔·斯梯瓦特(Maxwell S. Stewart)等十六人曾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抗议对七人的逮捕^②。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事业,一些美国教会人士和新闻工作者于1936—1937年间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创办了《中国之声》和《民主》两个刊物。前者由麦克斯和格拉斯·格兰奇兄弟主编,用英文在上海公共租界所辖地区出版,受治外法权保护,国民党当局难以直接干扰。中国方面撰稿人主要是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茅盾、夏衍等知名的社会

① Oscar Theodore Barck Jr. Ed.: *America in the World,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in Document Ohio* 1961, p. 308.

② Hugh Deane: *Good Deeds & Gunboats, 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Chinese Encounters San Francisco* 1990, p. 106—107. 参阅沈叔平著:《爱国老人沈钧儒》,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活动家和作家,外国撰稿人则有史沫特莱、斯诺、爱泼斯坦、路易·艾黎等。该刊的宗旨是为爱国的学生和各界人士提供阵地,为“政府和民众联合起来,反对侵略,挽救民族危亡”而呐喊^①。《中国之声》第一期发行2 000份,以后很快就增加到7 500份。1937年11月1日出版最后一期,下一期已经付梓,印刷车间连同印版均毁于日本侵略军之手。格兰奇兄弟回到纽约后,接任《今日中国》月刊主编迄于四十年代。

《民主》杂志的出版更带有戏剧性。由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出版,埃德加·斯诺名满全球。1937年1月,一位浸礼派的社会主义者J·斯宾塞·肯纳特(J. Spencer Kennard)代表教友派服务委员会(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向斯诺赠款1 000美元,希望他出面主编一份在青年中宣传基督教义的杂志。这份命名为《民主》,以“应用基督教伦理杂志”为副标题的刊物于1937年5月15日问世。实际上的主编是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Helen Foster Snow)。编辑部的成员大部分是燕京大学的教师。第一期的内容包括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一篇评论日本外交政策的文章;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论中国的民主以及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的文章。这样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此刊只出了五期就因芦沟桥事变爆发而被迫停刊。

当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和第三个年头,美国舆论界支持中国抗战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仅列举一些文章的题目,便可略见一斑:纳萨尼尔·帕菲尔的《中国必胜论》,《中国每周评论》载《中国越战越强》;《外交事务》发表了署名文章《美国应断然修改中立法》;《今日中国》则有贾菲写的《中国正在为民主自由而战》。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周刊》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舆论一致主张制裁暴日》的文章。该文指出

^① Hugh Deane: *Good Deeds & Gunboats* p. 106.

美国共有 700 种报纸,异口同声地谴责日本军阀的强暴行为。这些文章的译文散见于 1938—1939 年在重庆出版的《时与潮》半月刊。为了促使美国政府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1938 年 5 月在美国出现了一个“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the American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同年 8 月,该委员会通过邮局向公众散发了 22 000 本题为《美国在日本战争罪行中应承担的责任》的小册子,并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动员起美国援华的力量,终于在 1941 年初成立了“联合救济中国”(United China Relief)组织。支持援华的人士包括社会各阶层人物,主要是一批在华传教士、外交官和企业家。如“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的发起人哈里·普莱斯(Harry Price),出生于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家庭,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曾在燕京任教五年。他同情中国的抗日事业又不愿让美国卷入战争,所以提出了不参加日本侵略这个有限的目标,随着时局的推移,日本的对美政策趋于强硬,才把消极的纲领变为积极的援华纲领。传教士周以德医生(Dr. Walter Judd)在山西目睹日军侵略暴行,认识到日军所以能够肆虐,实有赖于美国供应战略物资。他接受司徒雷登的建议,回到美国后,自筹资金奔走呼号,向公众宣传对日禁运,在这段时间里共发表有关援华的演说 1 400 次,成为“院外援华集团”的骨干,后当选为明尼苏达州众议员,以支持蒋介石政权反共闻名于世。顾临(Roger Sherman Greene 1881—1947 年)长期任美国驻哈尔滨、汉口领事,曾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由于他在美国上层社会中的声望,出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他认为应该把援华抗日与支持英国抗德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动员美国的舆论。^①

^①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ird E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0, p. 123.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2—183 页。

战争期间对美国公众影响最大的刊物是亨利·鲁斯(Henry Robinson Luce 1898—1967年)创办的几家杂志。鲁斯出生在一个很有影响的美国来华传教士家庭。他的父亲老亨利·鲁斯(Henry Winters Luce 1866—1941年)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97年来华,在山东登州地区传教,燕京大学成立后曾出任副校长。小鲁斯生在登州,1920年毕业于耶鲁。1923—1937年间先后创办《时代》周刊、《幸福》杂志、《生活》杂志。这三家杂志因分工合理、报道及时、图文并茂深受读者欢迎,销量达数百万份。鲁斯是一个典型的将基督教精神同爱国主义结为一体的美国人。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威胁着人类的文明,战争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他希望中美两国友谊长青,但把中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作为传教士的后代,鲁斯深信蒋皈依基督教是传教士在中国的最伟大的成果,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利用他的刊物为蒋张目。他的宗教信仰告诉他,决不能让基督徒控制的中国落入无神论者的手中。鲁斯的这种冥顽不化的态度到了后来使极其崇拜他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也不得不同他分手^①。然而,鲁斯利用他手中的刊物所宣传的思想在美国公众中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 1890—1958年)组织的“飞虎队”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来到中国,抗击日本空军对和平居民的狂轰滥炸,保护了后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于得克萨斯州的陈纳德,1920年参加美国空军。曾任美国空军驻夏威夷的第十九驱逐机队的指挥官,长期从事空军驾驶员的培训工作,1937年来华,任国民党政府的空军顾问。1938年冬,陈纳德组建了一支由欧洲、拉美和美国飞行员组成的国际航空

^① 参阅 Theodore H.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 1978. p. 205—211.

队,规模很小没有发挥多大作用。1941年初经宋子文和陈纳德在华盛顿的游说,美国政府同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物资,包括飞机的援助。在飞机的来源有保障的情况下,陈纳德在美国空军中招募了一批美国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建立“美国志愿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这个航空队配备了一百架P-40型歼击机,先在缅甸进行秘密训练,投入战斗后,在9个月里,击落敌机149架,投弹314吨,本身只损失16架,有效地打击了日本空军在华的作战力量,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志愿航空队别名“飞虎队”,“老虎”一词在这里并不作一般的森林猛虎解,而是指“虎鲨”(tiger shark)。志愿航空队的每一架飞机机头两侧都绘有虎鲨的头像,大口猛张,巨齿外露。飞行员们相信日本飞行员在空中看到虎鲨的这副凶相,都会吓得魂不附体,被美机击落。^①

二、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文化活动

1938年9月17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蒋介石政府是打算利用胡适的声望和在美国的影响争取美国的援助。这个目的看来是达到了。任命令发出时,胡适正在以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身分在欧洲访问,开展国民外交。同行者有钱端升、张忠绶两教授。10月5日胡适抵华盛顿就任,开始了外交官的生涯。学者出任外交使节,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消息传出,国内外均有震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除胡适以外,没有人更有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况,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日本方面也很

^① 参阅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4页。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p. 100.

注意这件事,《日本评论》说:“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祐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古。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冈则是雄辩的。”^①足见胡适的威慑力。胡适本着“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精神,在外交和学术交流两个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将两者结合起来。

1938年12月4日,胡适应邀在纽约律师事务所俱乐部以《北美独立与中国战争》为题发表演讲。他充分利用了历史学家的特长,将开创美国的独立战争同中国的抗日战争加以比较。他在演讲中指出,美国的独立战争之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英国的宿敌法国的直接支持。现今中国之抗战同样也需要友好邻邦美国的援助。他还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强调抗日战争遇到的困难同美国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当年兵败费城、退居福济谷(Valley Forge)的情况一样,华盛顿没有被困难吓倒,坚持战斗,终因得到法国在财政上和军事上的援助取得最后的胜利。结论是:“中国抵抗侵略者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一定要靠两件事:第一,中国必须继续作战;第二,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中,国际情势转变对中国有利、对其敌人不利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②。胡适在其他有关中国抗战的演说中分析了支持中国长期抗战的条件,这包括:(1)广阔的空间;(2)众多的人口;(3)全国的团结;(4)国内建设;(5)国际之援助。在对国内的广播演讲中,胡适强调:“我们的长期抗战,是现代民族起来抵抗侵略最早、又最长久的一段光荣历史”;“我们这十年的努力,五年的苦斗,在国内方面,在国际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的抗战事业,不但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还可以帮助全人类建立一个有力量而可以永久的

① 桓武:《胡适与外交战》,《东南日报》1938年10月12日。转引自白吉庵著:《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页。

② 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出版社1986年版,第553页。

世界新秩序”。胡适还认为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中日冲突的形态乃是和平自由反抗专制、压迫、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一个理由是,我们不仅反对日本帝国作风的重振,不仅反对日本在中国领土上推行其君主政体,更是反对它雄霸亚洲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所谓‘神圣的使命’。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中国人把怀疑看做一种美德,把批评看做一种权利。因此我们不愿意让一个‘视一切思想均有危险性’的民族所统治。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三个理由是,中国人民一向爱好和平,厌弃战争。因此我们不愿意在一个黠武好战、梦想征服世界的民族奴役之下苟生。”^①胡适利用他广博的文史知识和辩才,针对美国知识界的特点,进行联美抗日的宣传,同时还向美国公众介绍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四年的大使任期内,胡适还在美国的大学做了多次学术演讲,据他自己回忆说:“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美各地演讲400次之多,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如此而作,实为战时国家省外汇。”此外,他还在美国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论文,根据年谱列表如下:

表 29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发表的论著^②

时 间	篇 名	刊 名
1938年10月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摘要)》	《中国学会月报》3卷1期
1938年11月	《〈科学与人生观〉序》	同上,3卷2期
1938年12月	英文诗两首,小标题《我的母亲》	新泽西州北蒙特克兰市《妇女联合会刊》14卷3期
1938年	《日本侵华战争》	纽约中国文化协会出版
1939年2月	《中国的进步》	《世界传教月刊》62卷2期

① 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第594、595、597—598页。

② 同上书,第552—597页。

(续表)

时 间	篇 名	刊 名
1939年6月	《寄〈保卫月刊〉的一封公开的信》	《哈佛保卫月刊》3卷6期
1939年10,11月	《双十节的意义》(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的讲演)	《中国基督教学生月刊》30卷1、2期
1939年10月	《中国文学简史:1870—1920》	《人民论坛》(德文)20卷19、20期
1939年	《当代哲学流派校注》	载费德曼等编《我的信仰》
1940年2月	《我们仍在战斗》	《中国月刊》1卷2期
1940年2月	《目前中国形势》	《中国杂志》16卷1期
1940年8月	《给爱德华 H. 休谟博士的几封信》	《亚洲协会月刊》6卷6期
1940年8月	《给赛珍珠的几封信》	《美国医药援华会年刊》
1940年10月	《工具主义的政治哲学》	载《平民的哲学家,庆祝杜威八十诞辰论文集》
1940年	《中国继续抗战》	载《同盟国战争与和平的目的》
1940年	《挽救中国的民主》	载《美国第二次为自由而战》(1940年纽约出版)
1941年3月	《在中国斗争里美国的赌注》	《前线民主月报》7卷
1941年4月	《在世界博览会分馆开幕典礼上的祝词》	《博览会会刊》3卷4期
1941年5月	《一个史学家看中国绘画》	《亚洲杂志》41卷5期
1941年7月	《民主与极权的冲突》	《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年报》218卷
1941年10月	《中国为自由而战》	《生活联合新闻》36卷2期
1941年11月	《东西方的思想变迁—文化分布的专题研究》	《现代中国》1卷12期

(续表)

时 间	篇 名	刊 名
1941年11月	《意识形态之论战》	《美国政治科学院年鉴》218卷
1941年11月	《中国革命的灵魂》	《Sphere》月刊 28卷5期
1941年	《一个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	《伊利诺大学政府制度演讲集》2卷
1941年	《工具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	《政治学及社会科学研究集》
1941年	《知识储备》	普渡大学出版
1942年2月	《宣传品的小册子在中国发生力量》	《战争中的中国月刊》8卷1期
1942年1月	《我们的敌人》	《鹅毛笔》杂志 30卷12期
1942年3月	《也是微云》(诗)	《时代》39卷11期
1942年3月	《我们的共同战斗》	《美国杂志》132卷3期
1942年4月	《中国的战斗力量和战斗信心》	《中国月报》3卷5期
1942年5月	《和平必须强制执行,印度是我们伟大的教师》	《亚洲月报》42卷5期
1942年6月	《向前看》	《现代中国》2卷3期

三、拉铁摩尔、费正清在重庆

出于巧合,在胡适出使美国期间,有两位美国学者也因战争关系,弃学从政来到中国,为加强两国在战争中的合作与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工作。这两位学者是拉铁摩尔教授(Owen Lattimore, 1900—1989年)和费正清博士。拉铁摩尔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中国边疆问题专家。1902年随其父戴维·拉铁摩尔来华。老拉铁摩尔兄弟二人

均曾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他从12岁起在英国和瑞士受到很好的中等教育,特别是古典和现代语言教育,1920年起先后在上海英商安理洋行和《京津泰晤士报》任职。1922年他循“丝绸之路”到新疆旅行,写成《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一书,在学术界初露头角,1928—1929年间得以作为研究生在哈佛学习。1929—1930年他又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支持下,到我国东北研究移民问题,1932年,研究成果《满洲—冲突的发源地》出版。1932—1941年间任《太平洋事务》季刊主编,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中国学者陈翰笙、冀朝鼎(当时均为太平洋关系学会中国委员会成员)。1937年6月,拉铁摩尔等一行三人曾前往延安作短期访问。自1938年起,拉氏一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教。1941年7月应蒋介石本人之请,经总统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的安排,拉铁摩尔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蒋介石之所以提出聘请顾问的要求,是因为他对美国国务院心怀芥蒂,希望有一个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1890—1946年)式的人物往来于他和罗斯福总统之间^①。美国方面之所以接受这个想法是认为在蒋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物便于对“租借法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促进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清除“滇缅公路”沿线出现的贪污事件。拉铁摩尔之所以能被入选,是因为他既不亲日,也不亲华。在政治上,不左不右是个中间派,能为各方面所接受。中美双方出自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考虑使彼此都未能如愿以偿^②。拉铁摩尔这位通晓中、蒙、俄三种语言的东北亚问题专家虽然没有完成(事实上也不可能完成)他的政治使命,却促进了两国学者的沟通和交流,增进了两

① 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Compiled by Fujiko Ison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p. 88.

② Michael Schaller, *The U. 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 53.

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从1941年7月到1942年11月,拉铁摩尔在战时中国共呆了两年多时间,会见了大后方的各界人士,参观了许多机关、团体、企业和学校,对中国西北和西南的地方实力派和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有所了解。应蒋介石的要求,他起草了关于新疆、蒙古、东北和西藏的备忘录。拉铁摩尔还应聘为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顾问。回国后,他出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副局长,1944年5月随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访华。拉氏在1944年写道:“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从许多方面看,将成为今后一百年内最重要的国家。世界上有一半人口住在亚洲,其中有一半是中国人。亚洲人民几乎完全处于他人统治之下,只有中国人民是独立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做什么,他们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中国的事情好了,亚洲的事就好办了。中国的事糟了,亚洲的事也就糟了。在世界大战结束时,世界人口的一半情况好坏举足轻重。”^①他还一直坚持,美国如果卷入中国内战,无论支持哪一方面都必将是一场灾难^②。1945年6月,杜鲁门刚刚执政,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趋向日益明显,拉铁摩尔写信给杜鲁门要求陈述己见。7月3日杜鲁门只同他敷衍了事地谈了三分钟,便挥手告别。

比拉铁摩尔小七岁的费正清,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休伦城一个公理会传教士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925年入威斯康星大学,后转学入哈佛大学。1929年在哈佛毕业后获罗得斯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当时牛津并未开设有关中国历史和语言方面的课程,他开始自修汉语,在马士(Hosea Ballow Morse 1855—1934年)《中华帝国对外关系》一书的影响下,决心以“中国海关这个特殊

① Owen and Eleaor lattimo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1944, p. 7.

② 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 221.

的英中机构”作为研究英中关系的起点^①。他得到了马士本人的热情帮助与指导。为了收集资料,费正清于1932年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史,结识了一批中国学术界的人士,如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1887—1960年)、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丁文江(1887—1936年)、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教授等。他注重对中国风土人情的考查,遍游洛阳、开封、泰山、上海等地,在上海通过史沫特莱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有所了解。在学术上,他聘请郭毓秀先生为师,攻读清代文献,从郭处听到不少宫廷轶事。他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相识并得到了他的指导,并经他的介绍在清华讲授经济史。经过数年的努力,费正清于1936年完成毕业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返美,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1941年8月,他应召参加美国政府领导下的“为战争目的服务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工作”^②,仆仆风尘,往返于华盛顿和重庆之间,迄于1946年7月。其间在中国居住约两年(1942年9月—1943年12月,1945年10月—1946年7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卷进了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并毋庸置疑地再造了我。”^③费氏在战争期间的工作主要是为美国政府收集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和资料,先后任新成立的美国情报协调局(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 COI后改名为战略情报局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远东研究分析组工作人员、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美国驻华使馆特别助理兼新闻处主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美国出版物服务处主任、战略情报局远东行动计划处副处长、驻华美国新闻处处长等职务。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收入微薄,又因物价飞涨,过着贫

^①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1页。

^{②③} 同上书,第195、358页。

病交加、典衣卖书的艰苦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坚守岗位、教书育人、笔耕不辍。这种奋斗精神,和国民党上层的腐败、对中国文化生活的严密控制,给费正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写道:“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①为此他曾专门写报告给美国政府,要求进行干预和援助。美国文教界和公众也对此表示关切。美国援华联合会的负责人在22个大学中组织了教授委员会处理有关提供医疗、生活困难补助、子女教育等问题以改善中国大学教师的生活。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事情因此而搁浅。费正清另谋途径,他通过私人渠道运来一些营养药品由西南联大的校医在联大的师生中散发,还将一批钢笔和手表运至美国驻昆明领事馆,经陈岱孙教授散发作为薪金的补贴。经费氏的敦促,美国陆军特种服务部拨款5000美元作为聘请中国教授向美国驻军演讲的酬劳。所有这些虽然是杯水车薪,但美国知识界的这份情谊是感人的。1943年5月,西南联大的教授会议推举两位代表赴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根据米价上涨的比例适当增加生活补贴的要求,并希望对从事生产自救(生产电灯泡和无线电电子管)提供资金。这些合理要求,都被国民党教育部玩弄手段搪塞了事。其实质是施加压力,迫使不肯仰承反动当局鼻息的西南联大教师就范。费正清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番用意看得很清楚,他在7月访问昆明之后的报告中写道:“CC系下定决心要压服西南联大的教授们。”^②这些事件引发了费正清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进而对美国对华的文化政策提出建议。他认为,在美中文化关系上,不应只停止在消息报道上,而应该像中苏友好协会那样向中国的知识界

^①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69页。

^② 同上书,第304页。

和广大群众介绍美国的艺术、文学,阐述美国文化的价值准则。费正清强调,中国的留美回国学生“作为一个阶层是领袖人物”,成为美国“在中国的主要人力投资。他们构成了我们与中国之间的桥梁。”“在中国发展自由人应受的文科教育,就是一项美国的权益”^①。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和腐败,使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抗战初期对它抱的幻想破灭了。费正清对此也有很深的感受,他在给柯里博士的信中说:对于中国“在如此普遍混乱的局面中我能做些什么?结论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我想做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不激进无以成事。”^②

费正清同住在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共产党人和以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文化界进步人士也有过直接交往。周恩来、陈家康、乔冠华、龚澎等人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陈家康的才思敏捷,乔冠华的辩才,龚澎聪明而具有魅力,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事业的坚定信念。这些都被费正清写在他的日记和回忆录里^③。费正清对国民党一手操办、由郭沫若任主任的文化委员会作了如下的描绘:“这个文化委员会事实上像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集中营,把许多重要的作家监禁在里边,以防他们逃到延安去。”“……三位最主要的成员,胡风、茅盾和沈致远被以委员长邀请的方式从香港哄回重庆。为把胡风留在重庆,每月给他薪俸2 000元……如让他们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和写作自由,在当局看来,那是不能容忍的。”^④

费氏用一架莱卡照相机将从中国情报机构中获得的有关日本和中国的文件以及有关的图书资料拍成缩微胶卷送回美国。费正清的

①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81—282页。

② 同上书,第306页。

③ 同上书,第320—321页。

④ 同上书,第307页。

夫人维尔玛当时在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工作。经过她的挑选,将一批美国科技和学术著作制成缩微胶卷寄给费正清,转赠中国的学术文化机构作为回报。回赠的缩微胶卷还包括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缩微胶卷项目的全部目录和阅读指南,以及“部际国外图书征集委员会”关于美国作战情况缩微胶卷的专题目录。以缩微胶卷进行文献资料的交流是一个创举。

1943年12月,费正清任满回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于1945年10月以美国陆军情报局的驻华首席代表的身份再度来到中国。此次来华的主要任务是,在战时情报工作的基础上,组建美国新闻署驻华办事处,作为战后统筹美国在华文化新闻工作的机构。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他不但完成了包括一个总办事处和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十个分办事处的组建工作,扩建了原有的新闻报道电台网,而且让它们投入运行,编写中英文电稿,提供特写稿(背景资料),展出和散发图片和招贴画。他本人担任总办事处主任,勃雷德里·康纳斯(Bradley Connors)任业务主持人。为了使业务工作开展起来,从1945年圣诞节到1946年7月1日,总办事处向各分办事处发出了44个通报(circular letter)。在第22号通报中,费正清对美国新闻处在中国开展业务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1)提供新闻报道资料,而不是蓄意宣传。(2)既要增进理解,又要化理解为行动。“我们想要提供美国人怎样解决面临和克服现代问题的切身经验,以便鼓励中国人借鉴我国的事例,面临和克服他们自身的问题。”(3)现代化,而不是美国化。“凡是我们认为对我们有益的事物,不一定也对中国有益。中国问题的解决途径大致可概括如下: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应用于广大群众的生活。”(4)现实主义,而不是推销观点。“提供一幅有关美国现状的全面、彻底而真实的图景,切勿试图掩饰或隐瞒美国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以及所遭到的失败。为了维护我们的信誉,凡是认为对我们不利的事,我们应该首先予以报

道。我们不要过分热衷于推销我们的观点。”^①

1946年7月,费正清回国,重返哈佛讲坛,讲授中国史,同时不断发表对中国政策的意见。1946年9月《大西洋月刊》发表费正清的文章《我们在中国的机会》。在这篇文章中,费氏断言:“中国共产党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如果我们盲目地反对那里的革命,我们最终将发现我们会被一场群众运动逐出亚洲”^②。这篇文章当时在美国舆论界引起了很大争议,1974年该文重新在《中国观察》上发表。1948年费氏的代表作之一《美国与中国》一书问世。这本书较充分地利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内容紧凑,是从多方面比较中美社会文化异同,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历史的著作。此后,费正清与刘广京(Kwang-Ching Liu)、康拉德·巴兰托(Conrad Brandt)、许华茨(Benjamin Schwartz)、邓嗣禹等人合作,先后出版了《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中国共产党文献史 1921—1950》、《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这些著作作为费氏中国史权威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四、战争期间和战后学术交流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美国政府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形成时期。1938年美国国务院建立了国际文化关系司,“旨在鼓励和加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关系与学术合作。”首先在美洲国家中开展工作。1942年,在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的呼吁下,并征求了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的意见,该司制定了在中国开展活动的计划。此项计划的经费,从总统战时紧急经费中拨给,第一年15万美元,其中8万美元用于技术和文化专家的交流、2万美元用于资助部分在美学习的中国学

^①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64页。

^② 同上书,第383页。

生、1.5 万美元用于引进美国电影和有关设备、2 万美元用于购置教科书、缩微胶卷和仪器赠给由沿海迁往内地的大学。这虽然是战争期间制定的计划,大部分一直继续到战后^①。1942—1946 年间,共有 30 名专家使用美国政府提供的这笔经费访问了中国。其中到高等学校讲学的教授 8 人,新闻、通讯工作者 5 人,经济、工农业等方面的技术专家 17 人。对于美国农业部的水土保持专家劳德缪克(Walter C Lowdermilk)来说,四川农民营造梯田的技术使他惊叹不已,他认为这是多少世纪以来数百万人民热爱土地、辛勤劳作的结果,这个成果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超过了金字塔。西北的水土流失同四川的水土保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劳氏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22 项建议,都被国民党政府束之高阁。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帕菲尔(Nathaniel Peffer)是最后一位使用总统紧急基金访华的教授。当时中国的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他在写给司徒雷登的报告里谈到美国因卷入中国内战而非常不得人心,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抱怨和谴责。

1943—1947 年间,应邀由中国方面派往美国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共 26 人。1943 年有中央大学蔡翹(医学)、西南联大金岳霖(哲学)、浙江大学张其昀(地理)、武汉大学刘乃诚(政治学)、四川大学萧作梁(政治学)、云南大学费孝通(社会学)。1944 年为西南联大杨振声(中国文学)、中央研究院汪敬熙(心理学)、厦门大学萨本栋(物理)、南开大学陈序经(社会学)、金陵大学陈裕光(教育行政)、岭南大学容启柬(植物学)。1945 年则有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教育行政)、中央研究院陶梦和(社会学)、北平研究院严济慈(物理)、福建基督教学学院院长郑作新(生物)、西北师范学院袁敦礼(体育)、复旦大学林同济(政治学)。1946 年则有作家老舍、剧作家曹禺、画家叶浅予(夫人

^① Wilma Fairbank; *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1942—1949* Washington D. C. 1976. p. 16—17.

舞蹈家戴爱莲同行)等8人^①。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规定,所有应邀出国讲学或进行研究的人员,出国前都必须到中央训练团受训两周,并由蒋介石逐一进行个别谈话。上面这些赴美的学者,大部分是旧地重游,美国的变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很深。陶梦和说:“我生活在一个与以前全然不同的美国。这是指美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美国人的生活比较容易。原因是他们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他们的社会秩序健全,生产能力巨大。”^②这个评论显然不仅是把过去的美国与现在的美国相比较而作出的,而是将1946年的中国社会生活和美国相比较之后发出的感叹。费孝通说:“一个刚从中国的大后方,几天之内被飞机送到像迈阿密那种花园般的海滨胜地时,怎能不咽一口气,半天才说得出声:‘美国真富!’”。他接着评论说:“我们东方人在现在若是觉得美国的富是值得羡慕的,就应该知道美国的富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贫穷中自己打出来的天下。”^③在旅途中,学者们还就如何对东西方文化的问题展开讨论。有人主张要机器生产,不要都市罪恶。有人认为这两者不可分,这两者是一套东西,要就要,不要就关起门来。门关不住了还是要开。人们担心的是,要有西方的大工业,四五十年还不一定有希望,可是要把上海变成一个罪恶的中心,一两个月就得了。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前夕,经马歇尔将军同意,本着公平对待的政策,费正清夫妇曾赴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物色前往美国访问的人员。周扬、夏衍和两位技术人员入选,因国民党政府拒发护照而未能成行。

1946年6月,根据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的提议,美国国会通过一项以提案人命名的法

① Wiltma Fairbank: *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1942—1945* p. 217—218.

② 同上书, p. 103.

③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6—17页。

令。该法令规定,将各国购买美国剩余战时财产之所得用于美国与各该国交换留学生。以富布莱特法令为依据,1947年11月在南京签定了中美教育合作协定。该协定规定由中国政府将购买美国在华战时财产的款项中提出2000万美元供“研究教授及他种教育活动之用。”此协定因国民党政府的迅速瓦解而宣告无效。

第二节 北美人与中国共产党人

二十世纪的北美文化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症。十九世纪初,美国曾经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年)的实验基地。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传入北美后,特别是美国共产党成立后,政府当局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有增无已。1920年的帕麦尔大搜捕和麦卡锡参议员的反共歇斯底里就是很好的例证。从意识形态方面论证共产主义不合乎美国国情的“美国例外论”一直统治着美国的思想界。路易斯·哈兹(Louis Hartz)的《美国的自由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1955)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加拿大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虽然因受英国的影响而有所不同,整个说来并无本质差异。然而,北美人在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中似乎并没有囿于成见,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一、传教士

在第二章第二节中已经谈到北美新教差会曾于1932年举行会议讨论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同共产党争夺中国农村的方针。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传教士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福

建地区遭遇。由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红色政权把苏区内的基督教会当做帝国主义的代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或索性驱逐出境了事。基督教会也把共产党人视为洪水猛兽,咒之为魔鬼,不共戴天。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不同的教派和差会对待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并不一致。公理会因卷入了中国的乡村建设活动,一方面反对中国共产党人暴力革命的方法,另一方面却对苏维埃政权在农村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流露出赞赏之情。内地会的传教士的态度截然不同,在他们出版的刊物里极尽攻击辱骂之能事,摆出一副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架势。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实现团结抗日的主张,分兵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地区,与当地的基督教会有了接触。这时共产党人由于摆脱了“左”倾路线的干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教会的关系逐步改善。山西公理会的传教士在给教会写的报告和通信中报道了他们的切身感受。他们说北方的共产党人采取了与南方完全不同的政策,他们在村民大会上公开宣布,人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山东的一位美国传教士麦伦·伯尔顿(Myron S. Burton)对于当时报刊上充斥的歪曲事实的报道感到气愤。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为共产党人辩护。他说:“共产党人中不乏好战士,他们在战争的锤炼中成长。其中有些人经历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军事长征……他们的领导人中不少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人毕业于外国军事院校。他们懂得把握进攻退却的时机。他们曾无数次从包围网中逃脱。他们有很好的战略,因为他们的行动经常出人意外。”^①1936年,美国在华的大多数传教士都已通过他们自己的经历和报刊的报道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太谷传教站的查尔斯·贝茨(Charles

^① Pamphlet by Myron S. Burton, Tsianan, Shantung, Apr. 19, 1936. Kwang-Ching Liu ed.; *ibid.*; p. 268.

Bates)在年度报告中说：“共产党人对基督教徒及教会财产曾采取无情打击的政策，近来他们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基督教徒只要不进行传教活动，就可以继续保持自己的信仰”。^①

芦沟桥事变后，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活动吸引了公理会传教士的注意。首先是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要比国民党政府的正面防御有效得多。这虽然带来了日本侵略军的扫荡和报复，但从长远看，游击战略“将使日军在他们需要控制的地方，重兵把守，长期设防”，在经济上难以长期维持下去。其次，共产党在游击区进行的改革取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具有乡村建设经验的传教士在谈到这些改革时，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传教士一直感到束手无策的社会积弊：吸毒、嫖娼、抢劫，在八路军所到之处一扫而光。第三，长期困扰中国农民的地租、赋税、高利贷问题也因共产党的改革政策得到缓解。一位传教士在日记中提到了这方面的变化，主要是：地租和房租减少25%（即二五减租），实行累进税制，占有的土地越多，缴税越多；超过100美元的债务延期偿付。其后果当然是受到群众的欢迎，富有者则略有怨言^②。第四，共产党的救济工作也是传教士所关心的，包括医疗、发放赈济粮和为房舍被焚者提供住房，还有组织生产合作自救活动。第五，共产党在农民中开展的教育活动，备受传教士的赞赏。数以千计的城市学生来到农村办短期培训班和充实现有的学校。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兼及工业和技术。“在中国其方法之得当，前所未有”^③。总之，八路军“竭尽全力帮助普通老百姓，因而得到了老百姓的全力支持”^④。

① Pamphlet by Myron S. Burton, Tsianan, Shantung. Apr. 19, 1936. Kwang-Ching Liu ed. ;ibid. ;p. 269.

② Diary of Hugh Hubbard, Jan. 30, Apr. 7, 1938. ibid. p. 273.

③ Earle Ballou, Peiping, Nov. 4, 1938. ibid p. 274.

④ Diary of Hugh Hubbard, May 29, 1938. ibid. p. 275.

在传教士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人并非真正的赤色分子,至多不过是民族抗日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因素。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不同于俄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包括俄国十月革命要打倒的地主和资本家。尤其让传教士感兴趣的是共产党人中的学生,其中有一批来自教会学校,增加了他们的亲切感。八路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更使传教士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认真地考察他们的信仰和实践,根据美国的习惯用法,可以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者。”

在北美传教士中,加拿大的文幼章(James G. Endicott 1898—?年)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与众不同。他是在重庆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收集情报的过程中结识了周恩来、龚澎、张友渔等人的。经过半年多的来往,他在给美国战略情报局最后的一个报告中说,共产党人“机智聪明,坚决果断”。“他们的纲领切实可行并符合广大贫困民众的需要”。^①

二、新闻记者、军人

北美新闻记者和作家最早与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发生联系的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 1885—1970年)。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于1925年首次访问中国。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四次来到中国。1958年在我国定居直至逝世。她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革命事业始终抱同情态度,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为中国的明天讴歌终生^②。斯特朗最早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题为《千千万万

^① [加拿大]文忠志著:《文幼章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

^② 参阅李寿葆、施如璋主编:《斯特朗在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35—337页。

的中国人民》(China's Million 1928),记述了她 1927 年夏秋在华的经历。“这是中国充满幻灭、内讧、叛卖的时期”。^①

斯特朗在书中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工农大众的首创精神。斯特朗关于中国的著作还有《人类的五分之一》、《明天的中国》、《中国人征服中国》等。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有两位美国人有机会同中国共产党人有过直接接触。这就是伊尔·白劳德(Earl Browder 1891—1973 年)和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白劳德是美国工人运动的领袖、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做过美共总书记。他是作为国际工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于 1927 年 2 月至 5 月期间在广东、江西、湖北和河南访问。他将访问所得写成一本小册子,题为《民族主义的中国内战》。这本小册子生动地记录了国民党右派在各地镇压工会和农会的情况。白劳德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他相信,失败只是暂时的,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改造事业终将取得胜利^②。文森特·希恩曾在《芝加哥每日新闻》社工作过。1927 年“北美新闻联盟”派他前来中国。他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几天之后到达上海,目睹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暴行。在武汉,他访问了鲍罗廷和宋庆龄。希恩在《个人的历史》一书中写下了他的经历和感受。以上三本书是北美新闻记者留下来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最早的报道,对中国革命事业全都抱着同情的态度。

埃德加·斯诺(Edgar Parks Snow 1905—1972 年)、史沫特莱(Anges Smedley 1894—1950 年)和斯特朗一样,都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报道和专著,在世界上引起

^① 参阅李寿葆、施如璋主编:《斯特朗在中国》,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5 页。

^② 白劳德:《民族主义的中国内战》,第 19、59—61 页,转引自[美]肯尼斯·休梅克著:《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 页。

了巨大的反响,为扩大中国革命事业的国际影响,帮助世界公众了解“另一个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1928年到1941年期间,斯诺的绝大部分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1936年,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进入陕北苏区进行采访,写成轰动一时的《红星照耀中国》,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检查,中文译本取名《西行漫记》。毛泽东曾向干部推荐这本书,说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此书在美国的反响空前强烈,当时发表的100多篇书评没有一篇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说这本书是“令人目眩的新闻记者的成就”,“绝对重要的”,“今年最杰出的书”,“本世纪新闻记者最伟大的独特成就”^①。此书一经问世,一个月内就在美国售出了1.2万本,订购数每天达600册。该书有12种其他文字的译本。令人吃惊的是,只有美国共产党对此书的出版抱敌对的态度,工人书店拒绝将此书上架,《新大众》拒绝刊登此书广告。主要原因是这本书触动了莫斯科的神经,向世界革命的中心提出了挑战。这本书使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成为美国人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来源。斯诺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制造的共产党是“土匪”的论点,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这本书不仅使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刮目相待,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读了此书之后也感到获益不浅。由于在中国西北苏区四个月的冒险引起的激情和他对中国人民的热爱,斯诺终生都在关心着中国人民的事业,不断地向全世界报道新的情况和新的发展。斯诺一生写了十一部书,大部分都同中国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三次访华,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72年他在弥留之际,用生命的最后力量对中国医疗小组的人员说:“我热爱

^① John Maxwell Hamilton: *EDGAR SNOW A Biograph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5.

中国。”遵照他的遗愿,斯诺骨灰的一部分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史沫特莱与斯诺不同,她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参加美国工人运动,一直同情和支持中国和印度的革命事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广泛的联系。她在德国住了近十年,1928年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后成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她一到中国,就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政治斗争。她所写的大量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报道于1933年汇集成《中国人的命运》在纽约出版。在上海期间,她与鲁迅、宋庆龄、茅盾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向国外介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揭露国民党政府对进步作家的血腥屠杀,除了在美共刊物《新群众》1931年1月号上撰文《冲破中国的黑暗》外,还与茅盾合作将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翻译成英文,并协助鲁迅起草宣言发往国外,很快得到美国方面的声援。辛克莱·刘易士(Sinclair Lewis 1885—1951年)、辛克莱(Upton Beall Sinclair 1878—1968年)、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年)、约翰·杜威等一百多位美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向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使馆递交了声明,抗议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作家的屠杀。史沫特莱根据红军将领的叙述写成的介绍反“围剿”战斗的书《中国红军在前进》于1934年分别在纽约和莫斯科出版。史沫特莱最成功之作是她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1937年她到延安见到朱德后,就下定了为朱德写一本传记的决心,经过多年的周折,此书在史沫特莱去世前完稿于伦敦。1955年以日译本形式在日本出版。两年之后,英文版才由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发行。^①

^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原出版者序言,三联书店1979年版。

北美新闻记者和作家中并非所有人都同斯特朗、史沫特莱和斯诺一样，对中国共产党人抱同情态度，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其作品受到许多中国作者欢迎的著名作家海明威就是其中的一个。海明威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十分紧张的1941年来华访问。返美后，于7月30日写了一封长信给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 1891—1967年）。在这封信里，海明威虽然也批评了蒋介石政府的政策，称赞周恩来的才智，但他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却与国民党如出一辙。他竟然同意所谓日本侵略者是“癣疥之疾”，而共产党人是“心腹大患”的说法，结合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形成的偏见，指责中国共产党人借机扩大实力，说什么共产党人“总是试图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只有他们真正在战斗。”^①然而海明威并未到过延安。

在1944—1945年间赴陕、甘、宁边区考察的北美记者中，文章写得多、影响较大的有：《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合众国际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 1904—1978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特派记者冈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阿特金斯（Brooks Atkinson），《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 1915—？），《联盟劳工新闻报》记者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1915—？）。他们在访问延安得到的印象，完全证实了国民党新闻当局给他们提供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材料纯属虚构。在报道中他们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里，由一个受到民众拥护的政府领导农民积极开展着抗日游击战^②。

除了当时撰写的报道外，他们后来还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的论

^① 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08—109页。

^② Michael Schaller, *The U. 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9, p. 180.

著，主要有：福尔曼的《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爱泼斯坦的《未完成的中国革命》。有人作过一个统计，1943—1949年间，美国共出版了29本关于中国政治的著作，其中站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立场上的22种，包括上面提到的几种，大多出自新闻记者的手笔。无此种倾向的7种中，只有2种是记者写的。^①

美国职业军人长住中国者不乏其人，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 1883—1946年)、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 1880—1959年)是其中较著名的两位。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都同中国共产党人有过接触，但交往不深。史迪威经过长时间同蒋介石军政当局的共事，深感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失职、混乱”，而共产党的纲领则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因此提出应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军事物资援助的建议。这个建议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美国政府在蒋蛮横的要求下，不得不将史迪威召回，让这个“腐败、反民主的政权”扬眉吐气。^②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Evans Fordyce 1896—1947年)是作为美国政府代表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访问的第一个美国职业军人。这位行伍出身、说话慢条斯理、身材细高的“大老美”(The Big Yankee)^③于1937年12月—1938年2月和1938年5月5日—8月7日两次深入敌后，跋涉千里，考察八路军作战实况，

① Steven W. Mosher: *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 and Chinese Reality* A New Republic Book, 1990, p. 66.

②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1944. P. 1. 转引自 Warren L. Coh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ird E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0, p. 132.

③ 这是卡尔逊的传记作者麦克·布兰克福特赠给传主的绰号。杨基佬(Yankee)指保持老式作风的新英格兰人。参阅 Michael Blankfort: *The Big Yankee, The Life of Carlson of the Raiders*, Boston, 1947.

返美后著书立说予以介绍^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运用八路军作战经验训练美国海军陆战队,并组成海上突击营在太平洋海岛间展开海上游击战,驰骋海疆,奇袭敌后,挫败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卡尔逊还用“工合”一词来总结他从中国游击队学到的经验,意思是“合力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这词组已被收入美国英语字典,成为美国青年一代喜欢使用的形容词之一。^②

与卡尔逊出身、经历都颇为不同的包瑞德上校(David Dean Barrett 1892—1977年)出生于科罗拉多州,受过良好的教育,长期在中国任美国陆军情报官员和使馆武官。他受美国政府和军事当局的指派,于1944年7月率领一个由17名职业军人和外交官组成的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这个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观察组在延安足足呆了一年多。其任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收集敌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情报,谋求合作,为最后战胜日本做好准备。包瑞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力量的总体估计是:“他们是优秀的游击战士,但是自从百团大战之后,他们几乎都没有参加任何大规模的作战。在百团大战中,他们主要是在基层部队的武器装备方面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以致他们此后再也不能和强大的日军正面对抗并进行大的战斗了”^③。包瑞德怀着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情对待他在延安看到的一切。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那里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里面有故意做给美国人看的成分,他说:“如果我之所见及

① *The Chinese Army: Its Organization and Military Efficiency* New York, 1940. *Twin Stars of China: A Behind-the-Scenes Story of China's Valiant Struggle for Existence by a U. S. Marine Who Lived and Moved With the People.* New York, 1940.

② 参阅冯承柏、黄振华:《卡尔逊与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86—187页。

③ [美]D. 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

我之所感的一切都是一场戏,那也得承认这场戏演得相当好。”^① 这样的心情在卡尔逊处是看不到的。包瑞德与卡尔逊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态度。卡尔逊从一开始就注意到八路军的力量源泉在于道德灌输,认为这是中国游击队的秘密武器。包瑞德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对所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都极为反感。他认为美国军队中政工人员直接向国防部打报告的做法“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士气的败坏。”^② 包瑞德主张,在军事上有限度地援助共产党,美方应提供少量的步枪、机枪、反坦克炮和一些小口径炮。由于包瑞德的这种“暧昧”立场,他任期未滿就被召回,而且失去了晋升为准将的机会。

三、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马海德

在同中国共产党人有过直接交往的北美人中,最受中国人民尊敬的是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 1890—1939年)大夫。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哥拉稳赫尔斯特城一个长老会传教士家庭。青年时期当过伐木工人和农村夜校教师,白天在林间挥斧,晚上教农民读、写、算,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切身的体验。他受过良好的医学教育,1916年在著名的多伦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又在伦敦和爱丁堡接受外科方面的博士后训练。因双肺染结核病,休养数年,痊愈后决心投身胸外科研究工作。从1928年起参加爱德华·阿齐巴儿德博士(Edward Archibald)领导的外科手术队迄于1936年。在这八年时间里,白求恩的医疗技术日益精进,发表了14

① [美]D. 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13页。

② 同上书,第116页。

篇论文,发明了12种外科手术工具。白求恩从医疗实践中认识到,社会经济环境对患者的影响很大,他越来越对北美的社会经济制度感到不满。在访问苏联之后,他于1935年11月在蒙特利尔秘密地参加了加拿大共产党。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组织了一个输血队在长达1000公里的战线上抢救伤员。他在西班牙战场上表现出来的临危不惧,善于应变的才能,和他所坚持的医疗人员到伤病员中去,而不是伤病员找医护人员的精神,为他奔赴抗日前线做好了准备。^①

1937年夏,白求恩决定到中国去,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并肩战斗。他首先前往纽约国际援华委员会,为中国之行做好准备。1938年1月8日,他与帕森斯医生(Dr. C. H. Parsons)、护士简·伊文(Jean Ewen)连同医疗器材从温哥华起程,乘日本“皇后”号轮船于1月27日抵达香港。由香港转武汉,在武汉会见了周恩来,3月31日到达延安。在延安受到美国医生马海德博士(Dr. George Hatem)的欢迎。毛泽东在窑洞里会见白求恩,畅谈三小时。白求恩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5月2日白求恩从延安出发奔赴敌后。1938年7月白求恩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没有手术室,他自己动手设计和创建手术室;没有合格的医护人员,他亲自培训或帮助他们依靠自修成长;没有教材和工作手册,他亲自动手编写;没有合适的手术器械,他自行设计、制作;他自律很严,除了相当于八路军战士的定量配给,他什么也不要。他还将自己的东西给伤病员用,把自己的血输给他们。他的确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成了他自己的事业。他在松岩口村

^① Wendell macLeod and Hilary Rusell, *Norman Bethune, A Biographical Out Line in Norman Bethune, his time and his legacy* edited by David A. E. Shephard et al. Published by The Canadi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1982. p. 2--5.

创办的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所“模范医院”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永久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院迁至石家庄,被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成为一块永久的丰碑。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手术中感染,患败血症不治逝世,临终前给聂荣臻司令员的遗书说:“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①

可以同白求恩媲美的是出生在美国、把他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马海德医生。他原名沙菲克·乔治·哈特(Shafik George Hatem 1910—1988年),出身于阿拉伯移民家庭,在北卡罗来纳州长大,就读于设在贝鲁特的美利坚大学,毕业于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马海德于1933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医院工作期间结识了宋庆龄、路易·艾黎、史沫特莱等人。1936年他与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访问,后留在延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马海德就投身到中国人民革命的大熔炉里来,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先后担任过八路军卫生部顾问、中国解放区救济总署卫生顾问等职。在抗日根据地,他同战士、老百姓同甘共苦,为了改善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多次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白求恩大夫来到根据地,马海德亲自陪同前往晋察冀前线抢救伤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是中央卫生部的顾问,全身心地投入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马海德特别注意从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吸取养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探索中国消灭麻风病的新路子。马海德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全世界同行的瞩目和尊敬。1983年4月,美国达米恩松顿麻风学会将1982年年度奖授予马海德。1980年9月马海德七十寿辰,他在祝寿会上说:“五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一条真理:一个人要想做出自己的贡献,必须有一个牢固的精神支柱,……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永远同困

^① 何玉林、刘群:《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

难进行搏斗,勇敢地、不断地攀登高峰。”^①

四、《美亚》杂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舆论界对中国大多抱同情态度,有关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加。但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的新闻为数寥寥。这不仅是由于美国新闻界的成见,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当局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只有一家刊物与众不同,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以大量的篇幅、比较系统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和抗日根据地。这就是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于1937年3月在纽约创办和主编的《美亚》(Amerasia)杂志。贾菲自1930年起参与编辑左翼报纸《今日中国》,迄于1945年,是美国共产党的同路人。1937年7月曾化装穿过国民党封锁线访问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美亚》杂志编辑部早期的一个重要成员是在美的中共党员冀朝鼎,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该刊上刊登的有关远东经济的评论多出自他的手笔。编辑部成员还有欧文·拉铁摩尔和托马斯·比森(Thomas Arthur Bisson 1900—?),他们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这份刊物在创刊号上开宗明义宣布它的出版是为了向美国公众提供远东局势的可靠消息,以便展开对远东政策的讨论。这份版面朴实、篇幅有限的杂志,在抗战八年的时间里发表了数十篇曾经亲自访问过抗日根据地的西方作者的报道和文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建设根据地的情况,把活跃在华北和南方敌后抗日健儿的英雄业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那些观点鲜明、文笔犀利、深入浅出的评论文章论证了中国抗日根据地和建设一个民主、团结、进步的中国对于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意

^① 何玉林、刘群:《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第95页。

义,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独裁、反共、内战的行径,抨击了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敦促他们改弦更张。所有这些,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①

《美亚》杂志同情中国革命的立场和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揭露和批评惹恼了美国当局,从而招致严重的政治迫害。1945年5月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密谋和违犯间谍法的罪名逮捕了主编贾菲和其他几个编辑人员,还包括美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斯(John Stewart Service 1909—?),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美亚》杂志六人被捕案。美国政府中的某些当权人物本来打算把间谍罪名强加在六位被捕者头上,结果并未得逞,最后只有贾菲和一位国务院官员被起诉,罪名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秘密文件”,他们二人分别被科以2000和500美元罚金了事。但《美亚》杂志终于在两年之后被迫停刊。

五、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从斯诺进入苏区访问到抗日战争结束整整十年时间,北美人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心目中的共产党人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没有人再相信国民党当局制造的“残匪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作家、新闻记者、军人、外交官的看法并不一致,至少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大家的看法比较接近。

首先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其他与北美人有过直接交往的人物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于个人的好恶,对每个人的评价臧否各有千秋,但无一不认为这是一些不平凡的人物,是出类拔萃之辈。毛泽东是这批传奇式人物的核心,对于斯诺来说毛泽东

^① 参阅冯承柏、黄振华:《〈美亚〉杂志与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562—577页。

的精力过人,不知疲倦,天生精明,“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①。卡尔逊说,毛泽东是他所遇到过的“最无私的人”,“一位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天才。”伊洛娜·拉尔夫·休斯见到毛时,感到自己“一瞬间看到了永恒”,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化身”^②。朱德的魅力使卡尔逊对他“敬之如父”,认为朱德具有“罗伯特·E·李式的仁慈,亚伯拉罕·林肯式的谦恭,U·S 格兰特式的坚强。”^③ 在尼姆·韦尔斯心目中,朱德是“全中国少有的心地善良的人物,是一个人道主义者。”^④ 周恩来在北美人的笔下“是一位出色绝顶的外交家,温文尔雅,处世机敏。”^⑤

其次,全都对八路军的普通士兵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说他们果敢刚毅、纪律严明,是社会主义的自觉战士。尼姆·韦尔斯说:“见到红军以后,我断定,每一个红色战士都乐于战死,因为他们相信,他的死可以使他的革命事业朝最后的胜利更进一步。”^⑥

第三,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是“五无地区”即: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和无苛捐杂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取缔高利贷、实施累进税制等有利于民众的经济政策,并组织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清除社会弊病,领导干部带头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这也是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进行民主建政的结果。有不少人相信,边区就是未来新中国的雏形。

第四,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或同苏联的关系一直是北美人最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65 页。

② 休梅克:《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第 160—161 页。

③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9 页。

④ [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华文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3 页。

⑤ 休梅克:《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第 162 页。

⑥ 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第 47 页。

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不少人企图在边区找到苏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援助的证据,但一无所获。既没有苏联顾问人员,也看不到卢布支援。斯诺在1944年发表的《人民在我们一边》一书中把中国共产党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稳固地植根于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问题之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①白修德经过多年的观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了根,把自己中国化、民族化了。”^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关心和熟悉中国情况的北美人,既对胜利的到来感到高兴,又为中国的前途感到担忧。在《风暴遍中国》一书中,白修德写道:“历史要求中国进行变革”“中国政治将取决于三个壁垒分明的政治集团——国民党右派、主张走中间道路的集团以及共产党。”^③他认为中国变革的最大障碍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它是国民党军事头领、封建地主和官僚的代表。中国的左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军队从8.5万人增加到100万人,所辖地区的人口也从1500万增加到9000万,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他们懂得人民所要求的变革。白修德希望美国政府看到这种变革的趋势,改变自己的政策。

第三节 五十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

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并没有按照白修德等人的意愿改变他们的扶蒋反共政策。中国革命的狂风暴雨将美国在中国大陆上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连同他们的代理人席卷而去。出生于杭州,在中国度过了大

① 转引自休梅克:《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第204页。

② [美]白修德、安娜·雅各布:《风暴遍中国》,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③ 同上书,第350,351页。

半生的驻南京政府大使司徒雷登不得不于1949年8月2日卷旗回国。三天后,美国政府出版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文件集,全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1944至1949年时期》,简称美中关系白皮书。这是杜鲁门政府从中国脱身政策的一部分,目的是为在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公开辩论时,提供为美国对华政策全面辩护的资料。简单地说,就是为了说明,蒋介石政府垮台,是他自己不争气,不是美国支持不够。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对白皮书展开了批判。

一、毛泽东评“白皮书”

从1949年8月14日到9月16日毛泽东一气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观的破产》共五篇文章,连同新华社8月12日发表的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统称六评白皮书。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站在捍卫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立场上,对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痛加鞭挞,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附信》中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性质的歪曲进行了尖锐地批判。文章中的一些论点和提法在很长时间里对学术研究,特别是中美文化关系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个影响很大的观点是文化侵略和文化上的反侵略。毛泽东在列举了1840年以来的一连串侵华战争之后说:“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①毛泽东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而且列

^①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4页。

举了教会财产中医药、教育、宗教活动的投资比重,还点了燕京、协和等十个美国人设立的学校的名字^①。第二个重要的论点是,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之后,就无往不胜,战胜了一切旧东西。中国革命复兴了的伟大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②第三个重要论点是:“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③。第四,“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④第五,毛泽东认为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是一些“对美国存着幻想”、“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的人。“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⑤毛泽东希望先进的人们帮助教育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要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是在政治论战中、在针锋相对的辩论中产生的。在此后多次政治运动中为人们所接受,并对中美文化关系的研究发生了重要影响。

① 毛泽东:《“友谊”,还是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06页。

② 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6页。

③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5页。

④⑤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5页。

二、抗美援朝运动的文化意义

由于美国政府和军事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地威胁了中国的安全,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2日,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始进入朝鲜,一场“漫长的战斗”^①开始了,足足打了三年。这是继1900年八国联军之后中美两国第二次兵戎相见。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②。根据这个宣言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从认识上对美国进行的一次全面批判,是毛泽东评白皮书的继续和延伸。这是一场“推广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国侵略者的运动,以唤起全国各阶层人民对于美国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扫除美国帝国主义残存在中国一部分人中间的有害影响。”^③

根据《时事手册》刊登的《怎样认识美国》的解释,仇视美国是指,让广大人民群众认清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根据有二,其一是美国已经在公开侵略中国,而且准备扩大侵略。其二,从历史上看,美国一贯侵略中国。鄙视美国的意思是让人民群众认识到美国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根据是:(1)少数大资本家统治着美国,美国政府是他们手中的工具;(2)美国对内政策是压迫

① John Toland: *In Mortal Battle, Korea, 1950—1953* New York 1991.

②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7页。

③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关于当前任务的通告》(1950年11月22日),同上书,第68页。

人民和剥削人民,绞杀民主和文化;(3)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蔑视美国,旨在说明美国并不可怕,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美国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在军事上有很多弱点,如战线太长,后方太远,兵力不足,士气不高,同盟者不强。原子弹已不是美国独家所有,美国不敢轻易使用^①。这场规模空前的宣传教育活动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分别不同职业、团体或地区举行集会或游行,控诉美国侵略者,确立自己在反美爱国运动中的具体斗争目标。二是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街道举行控诉会议,控诉美国帝国主义的罪恶,检讨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并展开讨论,加深思想认识。在这些集会上,或由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研究的人进行系统的演讲;或由曾在美国留学的人,讲述其亲历、亲见、亲闻的美国反动、黑暗、腐败情形;或由曾受美帝国主义迫害的人诉说美帝暴行及其所加于自身的苦难;或由过去曾受美帝及其走狗所欺骗,抱有亲美、崇美、恐美心理的人,倾吐和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据新华社的估计,在三年里,全国有80%以上的人民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基本上扫除了美帝国主义百余年来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以及国民党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崇美、恐美、媚美等种种反动思想,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强了同仇敌忾,打退美国侵略的决心。^②

1950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新闻公报,宣布“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管辖内的一切资产置于管制之下,并颁布章程禁止在美国登记的船只在另有通知以前驶往中国港口”,由于美方采取的这种敌对行为,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2月28日发布《关于管制美

^① 《时事手册》1950年第2期;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674—690页。

^② 新华社:《中国人民三年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重大贡献》(1953年7月28日),同上书,第1102页。

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12月29日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又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郭沫若副总理在有关此问题的报告中说,美帝在很长时期中特别注重文化侵略活动。其活动方式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① 报告说,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为4190万美元,其中医药方面占14.7%,教育方面占38.2%,宗教及救济活动费占47.1%。在学校方面,在华的20所高等学校中,受美国津贴的占17所;300余所教会中等学校中受美国津贴的近200所,几乎占三分之二。受美国津贴的小学约1500所,占全部教会小学的四分之一。医院方面,受美国津贴的在华医院200余所,占中国全部教会医院的半数左右。救济事业,受美国津贴的孤儿院200余所,麻风病院20余所,聋哑学校10所,盲校30所。文化出版方面,除为数不多的图书馆、博物馆外,在电影事业方面影响最大。解放前,中国放映的影片中,美国影片占70%以上。出版方面则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出版机构如广学会等。美国在中国直接办理的基督教西差会有58个,占在华西差会总数113个的半数。受这些美国差会资助的中国基督教会15个,属于美国系统和美国有关的天主教修会有六七个。在全国123个主教区中,有13个主教是美国人。美国在华传教士的总数一战后占全部传教士的一半^②。为了肃清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影响,维护中国人民文化教育宗教事业的自主权力,对于一切接受美国津贴的机关和团体采取了下列方针:(1)在政府协

① 郭沫若:《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1950年12月29日),《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797页。

② 同上书,第798页。

助下,上述机关和团体完全由中国人自办。(2)文化教育医疗机关,分别情况由政府接办,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民自办,经费确有困难者由政府予以适当补助。(3)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全部予以接办。(4)接受美国津贴的中国宗教团体,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为了贯彻这个决定,有关部门分别召开了专门会议。1月16—22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处理接受外国津贴高等学校会议”。与会代表会后发表联合宣言,表示与会者“深刻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百余年来在中国人民中间进行文化侵略的阴谋诡计是如何狡诈、如何毒辣”。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的联合宣言,表示要揭发美帝国主义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利用基督教传教活动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间谍工作的阴谋。认为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肃清教会内帝国主义的一切影响,是中国基督徒与全世界基督徒所必须努力的方向。宣言说美帝国主义要用冻结资金的办法使依赖美国津贴的中国基督教事业陷于绝境,人民政府却帮助我们走向光明的坦途。代表们相信中国基督徒依靠上帝,并在毛主席英明领导及政府的鼓励协助下,可以完全用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更完善、更纯洁、更能服务于人民的中国基督教事业。^①

三、批判实用主义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就两位青年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发表看法,从而开始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运动。《人民日报》于1955年4月11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

^① 《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799、801--805页。

义思想批判》的社论。社论说：“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我们事业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用唯心主义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这场批判的靶子除了个别红学家、文艺理论家外，真的说得上是哲学家的是当时在美国当寓公的胡适和已经辞世两年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批判从政治批判开始，揭露杜威与胡适勾结在一起参与了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倡点点滴滴的改良主义的阴谋和公开活动。在哲学上，批判文章大多从整体上断定“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最反动的思潮之一，是马赫主义的变种——现代信仰主义”^①。当时这些文章认为，实用主义是美国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起来的道地的美国哲学。这种哲学在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较大影响的原因有三：一是它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影响大，超过了其他国家；二是实用主义比其他的反动哲学流派更狡猾，用“科学”的“最新”哲学把自己伪装起来，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后对旧文化的批评和他从事的考据工作加强了伪装作用；三是知识分子的出身、教育、社会关系都与实用主义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有密切的联系。实用主义的反动性在于，在本体论上用“实在”和“经验”的概念代替物质，而又将这两者说成是人造的，是主观要素的复合，这是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主义。在认识论领域，实用主义把科学知识和科学规律看成是可以任意摆弄的和“假定的”，其所坚持的是一种不可知的认识论。实用主义抹煞真伪的标准，鼓吹“能应付环境”、“有用”就是真理。在社会历史观上用庸俗进化论为基础的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革命论。胡适和杜威都鼓吹腐朽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在方法论上倡导主观唯心主义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

^① 杨正典：《彻底肃清反动哲学思想实用主义的影响》，《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0日。

求证”，用表面现象来掩盖事情的本质。^①

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比哲学思想的影响更大，不可避免地成了这场批判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哲学的批判一样，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批判也是以教育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为中心展开的。批判者以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讲的一段话为依据，首先明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教育青年的目的“就是要为资产阶级训练称心如意的奴仆，既能为主人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②，指出“杜威在自己的教育著作中赤裸裸地供认了这种卑污的目的”^③。杜威的一部代表作是《平民主义与教育》。批判者在分析了平民主义教育的内容之后得出结论说，实用主义的全部民主主义理论就是：向青年一代宣传：阶级调和论、世界主义、美国式的民主、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杜威的著名的儿童中心主义时，批判者认为“教育无目的”说是针对着无产阶级在教育中提出自己的阶级目的和要求而发的，否定教师作用的教育即生长说是为了禁止教师向学生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第四节 “谁丢掉了中国”

一、麦卡锡主义

正当中美在朝鲜半岛上兵戎相见，在中国大陆上开展抗美援朝群众运动之际，太平洋彼岸的北美大陆上出现了一股反共、反华的逆

① 艾思奇：《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人民日报》1955年1月22日。

②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5页。

③ 曹孚：《批判实验主义教育学》《新建设》1955年2月号。

流。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 Carthy 1908—1957年)于1950年2月两次发表演说,全面攻击美国对华政策,声称他手里有一份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中共产主义分子的名单,起初他说有57人,后来增至207人。这给已经纷纷扬扬的反共声浪火上浇油。此后,麦卡锡又不断提出新的指控,矛头所向遍及美国朝野,连马歇尔、艾奇逊也未能幸免。他的杀手锏是:民主党执政二十年是“背叛的二十年,蒋介石政府的垮台是共产党在国务院内阴谋活动的结果”。麦卡锡利用国会议员的特权和国会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进行反共煽动,收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材料,对他们进行迫害。一时间乌云翻滚,公职人员人人自危,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受到迫害。1950年9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麦卡伦法即《国内安全法》,要求美国所有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及其外围组织在美国司法部登记,禁止其成员在政府机关和国防企业中任职,也不准他们领取出国护照。1952年6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1952年移民国籍法》,规定要严格限制那些“不可靠”的外国人移民美国。这些反共法案的通过更助长了麦卡锡的气焰。1953年春,麦卡锡发动了一场查禁进步书刊的运动,他指控美国285个驻外单位的图书馆中藏有赞扬共产党和亲共书籍,要求从图书馆的藏书中清除这些书籍。美国国务院为此发出通知,禁止驻外单位的图书馆在任何情况下收藏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的著作。麦卡锡主义是冷战的产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存在于美国文化中反共思潮的继续。直到麦卡锡把他攻击的矛头指向陆军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他的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行为才受到制止。

二、太平洋关系学会案

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美国研究亚洲问题的学者首当其冲,一

个研究工作颇有成效的学术机构“太平洋关系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PR) 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太平洋关系学会 1925 年建于檀香山。发起者是斯坦福大学校长瑞·莱曼·威尔伯(Ray lyman Wilbur)、基督教男青年会的梅尔·戴维斯(Merle Davis)和檀香山商人弗兰克·阿索尔顿(Frank Athurton)。该学会的宗旨是“以改进相互关系的眼光来研究太平洋各族人民的状况”^①。这是一个国际组织。由环太平洋国家的代表组成太平洋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处理日常工作。各国在本国的全国委员会,经费自筹。美国的全国委员会是各国全国委员会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出版《太平洋事务》和《远东概览》。在它成立以后的 25 年时间里,出版了大约 1 200 部著作和总页数达 11.6 万页的小册子,还有 1.85 万页的期刊文章。^②

亚洲问题学者欧文·拉铁摩尔自 1933 年起,任《太平洋事务》主编。弗莱德里克·范德比尔德·费尔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于 1934 年起任美国委员会秘书,翌年参加编辑工作。费尔德自 1935 年起成为美共党员。前苏联也在三十年代成为成员国。所有这些都成为麦卡锡攻击的口实。这位参议员一开始就一口咬定美国太平洋关系委员会的董事菲利浦·贾索浦(Philip Jessup)“与共产主义事业有非同寻常的联系”,拉铁摩尔是“在美国的头号苏联间谍”。1950 年 3 月 8 日参议员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调查国务院的成员中是否有不忠于美国的人。7 月 20 日小组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公布调查结论,没有找到拉铁摩尔与共产党人有联系的证据,否定了麦卡锡对拉铁摩尔的指控。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因为此次听证

①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6, p. VI.

②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 410 页。

会并未以太平洋关系学会为对象，只涉及个别人物。1951年7月参议院新成立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开始对太平洋关系学会进行公开听证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是内华达州参议员派特·麦卡伦（Pat McCarran）。这位参议员在中国内战的紧要关头，曾提出向国民党政府贷款15亿美元，并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的议案，其政治倾向可想而知。听证调查要弄清的问题是：（1）太平洋关系学会是否为共产党的间谍及其追随者所控制？（2）这些间谍及其追随者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3）这些间谍和追随者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舆论？听证会是在非常不利于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情况下进行的。首先，小组委员会在五个月前以非法手段取得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全部档案，学会领导成员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被讯问。其次，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先入为主，带着偏见提问，所问问题不是为了弄清事实，而是为了证实他们预定的结论。第三，一批“前”共产党人，为了迎合调查者的需要，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造证言。第四，学术界一批对太平洋关系学会持反对意见的人在听证会上落井下石，大放厥词。1952年7月2日，听证会开始一年后，小组委员会公布了长达5000页的证词和文件。结论报告226页，列举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八大罪状：（1）该机构不是一个客观的、学术性的研究组织；（2）该组织的核心已为共产主义分子或亲共分子所控制；（3）美国共产党和苏联官方都将太平洋关系学会视为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和军事情报来源；（4）从大约三十年代开始，拉铁摩尔就已成为苏联阴谋的工具；（5）弗里德里克·费尔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员，他在太平洋关系学会中的作用与他向美国共产党政治局打报告和给《工人日报》写专栏并无二致；（6）1945—1949年间，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成员和有关人员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使之有利于共产党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的工具；（7）该学会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影响美国舆论；（8）该学会对美国舆

论的作用在于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服务^①。一本专门研究麦卡伦委员会调查方法的著作用这样一些标题来说明该报告的特点：“主观臆断的罪名；显而易见的偏见；耸人听闻的宣传；非法夺取档案材料；依靠不可信的证词；拒绝盘问核实；对个人的不公正”。^②

麦卡伦小组委员会的结论不仅大大损坏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形象，而且使它的经费来源受到影响。在股东抗议的情况下，一些大公司停止了它们对学会的财政资助。美国政府则停止了该学会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免税待遇。经过近十年曲折的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太平洋关系学会这个曾经为太平洋地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术机构不得不于1961年10月宣告解散。《太平洋事务》移交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远东概览》则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落户。一贯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竟然不能容忍一批学者经办的学术机构，主要的原因是该机构不符合那些右派议员的政治标准。这些标准在当时的条件下又得到了一些美国人恐共心理的认可。

三、被祖国“遗弃”的人

麦卡锡主义不仅毁掉了像太平洋关系学会这类学术机构，而且使不少知名的研究亚洲和中国的学者受到株连。欧文·拉铁摩尔的名字一时间在美国成了“尽人皆知的叛国通敌的代名词”。当拉铁摩尔夫妇驾车在美国各地旅行时发现各地路边汽车旅店的老板一听到他们的姓名，就表示不能租房子给他们。后来，拉铁摩尔工作过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责令他主持过工作的佩奇学院解散。他本人也被

① John N. Thomas,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sian Scholars and America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p. 93.

②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409页。

迫去职,1960年移居英国。在麦卡锡主义造成的全国性恐怖气氛的笼罩下,个别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甚至作伪证,卖友求荣。例如,在拉铁摩尔帮助下从德国移居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竟在听证会上指认拉铁摩尔是一个秘密共产党员。有人请魏为另一位帮助过他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说话时,魏说他根本不了解费正清的立场,并说费支持过拉铁摩尔,还请拉铁摩尔到哈佛讲学。根据费正清自己的回忆,在忠诚审查的过程中他本人“涉嫌”不大,没有被麦卡锡的政府委员会传讯过。同他有关的证词只有107页,而不像拉铁摩尔竟达675页之多。^①

涉嫌共产主义分子的文化人还有史沫特莱和斯诺。早在1949年,麦克阿瑟将军就发表了一个报告,断言史沫特莱在二战前就是苏联在中国的间谍。这个指控使史沫特莱先是被扣发护照,最后不得不远离祖国客死他乡。斯诺的命运要比史沫特莱稍好一些。1938年成立的、由得克萨斯州众议员马丁·戴斯(Martin Dies 1900—1972年)任主席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曾对斯诺发生过兴趣。一位妇女曾在听证会上作证,指控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援助中国委员会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证据之一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建议她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41年,斯诺刚刚从中国回美,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不断跟踪斯诺收到的中国邮件,一一记录在案。1944年联邦调查局为斯诺正式建档。这是一份共23页的打印稿,封面有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 1895—1972年)署名的说明“此件是有关斯诺的一般信息,供需用时参考”^②。战后,斯诺的活动一直处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在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他的许多在政界的老朋友不是被贬职,就是被罢黜。斯诺并没有被这种恐怖气氛吓倒。当史沫

^①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415页。

^② John Maxwell Hamilton: *Edgar Snow, A Biography* p. 196.

特莱为了躲避迫害而睡在汽车里,斯诺古道热肠不减当年,在纽约为她找到住所,并在《民族》上撰文为史沫特莱辩护。当拉铁摩尔受到忠诚审查时,斯诺也为该案接到首都华盛顿大陪审团的传讯。因起诉根据不足,斯诺和拉铁摩尔都没有出庭。斯诺虽然没有出席过任何一个国会的听证会,但他的名字不断被提到,许多证人都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斯诺对苏联的看法是什么。麦卡伦小组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提到斯诺有 120 次,在该报告里,斯诺被列入亲共分子的名单。斯诺还卷入一个很奇怪的叫作“Tawny Pipit”的案件。Tawny Pipit 是一个代号,指 1949 年国务院在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领导下,由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s)主持的一项工作。戴维斯向中央情报局建议在冷战中“利用”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特朗和哈佛大学教授许华茨(Benjarnin Schwartz)和费正清夫妇这些“亲共”的美国人为美国猎取情报。此项建议一开始就为中央情报局所拒绝,但国会听证委员会对它一直深感兴趣,多方进行调查盘问。在听证过程中,前面提到的德籍美国史学家魏特夫大谈他本人对苏联的看法在三十年代如何影响了斯诺修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苏联的论述。对于强加之于斯诺的种种头衔和罪名,斯诺发表声明说,“所有关于我是共产主义分子和亲共分子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①。尽管如此,斯诺还是被这些无中生有的攻击败坏了名声,连亲朋好友都受到连累。在谈到麦卡锡主义时代的美国时,斯诺感到,美国已成为一个他既不了解也不赞成的国家。当斯诺作为国际新闻记者长年累月在海外居住时,他认为自己是个局外人,“在外国土地上的流浪汉”。按照谢伟思的说法,在五十年代斯诺成了被祖国“遗弃”的人。^②

命运比斯诺更为悲惨的是三位美国报人:约翰·W·鲍威尔

^① John Maxwell Hamilton; *Edgar Snow, A Biography* p. 202.

^② Service, *Edgar Snow Reminiscences*, P. 26 转引自 Hamilton 上引书 p. 211.

(John W. Powell), 他的妻子塞尔维娅和朱莉娅·舒曼(Julia Schuman)。鲍威尔夫妇和舒曼都是《中国每月评论》的编辑人员。该报的前身是《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内战期间, 该报的立场明显左转, 批评国民党统治、同情共产党的文稿不断增加。朝鲜战争期间, 该报发表了谴责美国军方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文章, 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抗议、结束这场“反人类的罪行”。该刊因财政拮据于1953年6月停刊。因美国实行邮政检查的关系, 许多美国订户根本没有收到过所订刊物。在归国途中, 鲍威尔受到中央情报局的盘问。回国后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跟踪盯梢。1954年, 鲍威尔夫妇和舒曼受到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传讯。接着, 1956年4月25日鲍威尔等以煽动叛乱的罪名被起诉, 经过三年的审讯, 鲍威尔等被扣上了“叛国”的帽子。他们虽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使他们倾家荡产, 请律师和诉讼费花了4万美元。电话被监听, 来访的亲朋受到盘问和检查, 工作丢了, 年华虚度。^①

四、一代外交官的悲剧

美国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实行文官制度以来, 对外交人员也逐步建立起一套考试、录用、晋升和退休制度。1908年国务院成立远东事务司, 是国务院按地区范围建司之始。1924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罗杰斯法》, 使外交人员进一步专业化。《罗杰斯法》规定, 将原来的外交人员同领事人员合为一体, 均须经过考试择优录用, 确立了根据业绩晋升的制度和相应的授衔和等级制度。该法还规定, 外交人员的薪金高于同级的其他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在这些规定的吸引下, 大

^① Hugh Dean: *Good Deeds & Gunboats, 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Chinese Encounters*, San Francisco, 1990, p. 162—165.

萧条前后一批优秀的美国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了外交人员的行列。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驻海外的外交人员约 700 人,其中的中国通不超过 36 人。^①

这批年轻的美国驻华外交人员是真正的中国通。他们大多数人出生于二十世纪初,在国内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于二三十年代参加外交工作,来到中国。他们熟悉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人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往往因所在的地域而带有方音。这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出于巧合而聚集在一起的集体。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没有乔治·凯南式的领袖人物,共享一种由于艰苦努力而取得成就的自豪感。当美国因日本偷袭珍珠港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些中国通在中国已经有了十年左右的经历。他们在外交官中的地位并不太高,至多不过是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或参赞。出于对国家的忠诚,从战胜德、日、意法西斯的全局利益出发,根据他们自身的感受和深入的调查,他们取得了一个共识,这就是,要想取得对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战争胜利后有一和平、发展的亚洲,就应该让中国的两大政党联合起来,给他们以军事、经济的援助,进行民主改革,增强作战能力。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他们撰写了大量的电文、报告、建议,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的这个共识。不幸的是美国政府的决策人,不但对他们的建议充耳不闻,一意孤行,执行扶蒋反共政策,而且在国民党政府被赶出大陆后,倒打一耙,说什么这些中国通是共产党在国务院中的间谍,他们应该对美国“丢失”中国负全部责任。这些中国通作为一个集体在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被赶出了国务院,流落四方。一些有识之士事后叹息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我们今天一个也没有了”。^②

美国史学家在总结这场悲剧的教训时指出,外交官发现本国政

① [美]伊·卡恩著:《中国通》,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3 页。

② 同上书,第 44 页。

府在执行错误政策时,面临着道德上的选择:要么说真话,向政府提供准确的情报,这样做就要冒同官方政策对抗的风险;要么,明哲保身,缄口不言,这就违背了外交人员必须报告真实情况的原则。中国通们选择了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收集情报时还有一个向谁收集的问题,只从美国的同盟者国民党政府收集,还是也向国民党的反对者共产党人收集。采取后一种做法就会冒得罪盟友的危险,并招致不忠于盟友的谴责。中国通们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后者而不是前者。为了这一切,他们付出很高的代价。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连当时的反共急先锋尼克松总统在北京讲话里都强调美中之间有共同的利益。此后,美国几任总统陆续访华。在舆论界,一向以亲蒋反共著称的《时代》周刊于1986年将邓小平列为该年度的名人。所有这些戏剧性的变化表明,“中国通们终于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只不过时间来得太迟了。^①

第五节 解 冻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解冻和对峙一样,都是一个渐进过程,都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方面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如前所述,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文化设施和影响被中国革命的浪潮扫除殆尽。美国的一位国会议员沃尔特·朱迪(Walter Judd)在亨利·鲁斯(Henry Robinson Luce 1898—1967年)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一个机构,叫作联合委员会,旨在为从中国大陆流亡到海外的知识分子提供救济。1951

^① *The China Hands' Legacy, Ethics and Diplomacy*, edited by Paul Gerdon Laure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and London, 1987, p. 7—8, 32.

年根据一批逃往香港的教师和学生的要求,在香港建立了一座学院。失去了中国大陆活动基地的传教士于五十年代转往台湾,开展传教活动,插手教育事业。坐落在台中的东海大学得到联合委员会及其新成员奥伯林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支持,有了长足的发展。洛克菲勒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雅理学会也出资支持在港台的教育科研机构,如香港的新亚学院、台湾大学的美国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定第一个教育交流协议十年后,美国于1957年与台湾当局又签定了一个教育交流协议。在此以前,官方文化教育资金往往通过像亚洲基金会这样的私人基金会的渠道秘密地流入台湾^①。凭借这些桥头堡和在五十年代后期兴起的分散在高等学校中的研究机构,美国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文化接触和观察。

一、民间友好机构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年)在其名著《美国的民主制》一书中曾专门讨论过民间组织、各式各样的“协会”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他指出,美国人热衷于组织协会,以宣布某项真理或宣传某种感受^②。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之前,有四个这样的“协会”在加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双方友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它们是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建于1966年。由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企

① Warren I. Cohen: *While China Faced East: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1949—1971 in Educational Exchanges, Essays on Sino—American Experience* edited by Joyce K. Kallgren and Denis Fred Simon. p. 47.

②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America*, New York, 1969, p. 513.

业家、少数政界领袖和政治活动家以及个别劳工运动中的知名人士组成。原来的宗旨是评议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因成立时机不佳,正值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暴力事件的报道不断传来,原来的宗旨难以付诸实施。在1966至1971年,全国关系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情况,而且参与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和接待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工作。全国关系委员会因此名声大噪。政策评议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全委会组织的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讨论班、新闻发布会上,改变原来的遏制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讨论的焦点转到如何实现和在什么条件下实现。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全委会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动员舆论,奔走呼号,促进民间交流,功不可泯。全委会实行双主席制,最早的两位主席是查尔斯·尤斯特(Charles Yost)和阿瑟·罗森(Arthur Rosen 1987年退休)。第一任副主席道格拉斯·穆里(Douglass Murray),后由简·伯瑞斯(Jan Berris)继任。随着事业的发展,该组织的成员和经费都有所增长,1973年会员434人,1983年增至600人。同期全委会的年收入也从377 872美元增至800 098美元,会员包括福特总统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全委会工作的重点转向双方对决策有影响的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半官方的色彩明显增强。^①

与全委会相比,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宗旨也是希望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但该组织的社会基础和采取的方法、途径与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不同。友好协会是自下而上组成的,先有基层组织及其政纲。工作人员由志愿者组成,而且是兼职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总

^① Joyce K. Kallgr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Interest in Sino-American Exchanges: De Tocqueville's "Associations" in Action in Educational Exchanges*, edited by Joyce K. Kallgren et al. p. 67.

数远远超过全委会的专职工作人员。最为特殊的一点是，它在中国有相对应的组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对外友协”）。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第一批基层组织于1971—1972年间在西海岸的城市西雅图、旧金山和洛杉矶出现。此外，纽约的美中友好协会也在此期间成立。这些基层组织联合起来于1974年召开全国大会，总会会址于八十年代初从洛杉矶迁至华盛顿。各地友好协会的发起人大多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其中有些人是社会主义者，故尔反对向大公司和基金会募集资金。还有一些人当时正在攻读学位，积极参与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等激进学术团体的建设。他们大多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赞成中国的政策，希望清除美国新闻媒介对中国的错误报道，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发起者中，还有一批曾在中国长期居住过的美国人，或因其亲友是传教士而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们。友好协会的大部分成员都相信民间往来的外交。他们的活动往往是从请人介绍中国情况开始，在民间交往恢复后，有时请中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现身说法。地方组织大多出版自己的通讯、报道会务、开展友好活动情况和来自中国的消息。总会出版《美中评论》。会员可订阅中国出版的《北京周报》和《中国建设》。友好协会的一个优势是在中国有相应机构，这在中国旅游事业还不发达的时期是很重要的。中国各地的对外友协可以接待美方的访问，从办理签证到安排食宿和访问参观的路线、日程。在宣传教育方面，也因同中国有直接的交往，可根据中国时局的变化，调整主题和内容。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建于1966年。它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代表机构。它的宗旨是促进美中两国科学界的信息和知识交流。该委员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为恢复中美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工作，1972—1973年间组织了中美医学代表团的互访，1972—1978年协助

68 个代表团进行访问活动,包括确定访问时间、磋商研究课题和访问成员。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成员中既有自然科学家,又有人文、社会科学家,而且十分注意吸收后者参加全部交流计划的讨论,尽管交流项目中他们所占比重不大。中国政府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学术交流委员会开展交流工作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1978 年,中国政府决定向国外大批派遣留学人员使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进入空前活跃的时期。学术交流委员会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经济学、国际关系和法学方面的交流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

在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恢复贸易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独立组织于 1973 年正式成立。

二、乒乓外交

体育运动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男女老幼都热爱体育运动。对抗性较强的运动项目如田径、拳击、美式足球(橄榄球)和棒球尤其为广大观众所喜爱。在中国和北美的文化交流史上,北美教会及其在华设立的各类学校对于传播西方的体育文化起了重要作用。1890 年,上海的圣约翰书院开展田径运动,并举办运动会,为中国有运动会之始。1895 年前后,北京汇文书院、通州协和书院开展棒球运动,逐渐在京津一带学校中得到传播。基督教青年会在传播现代体育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1896 年前后,一位美国人在天津介绍篮球运动。他们还以“西洋体育”为题在京津各校演讲,使人们耳目一新。发源于英国、1904 年经日本传入中国的乒乓球运动,经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童子部建立球房,设九张球台,逐渐得到推广。

1971 年 4 月 6 日,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乒赛的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以便相互学习,提高球艺,促进中美两国

人民的友谊”。第二天,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哥拉汉姆·斯廷霍文(Graham B. Steenhoven)表示接受邀请。4月10日,十五位美国客人,包括九名运动员、四名工作人员、两名家属起程,经香港转北京。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4月11日,七名西方记者(包括三名美国记者),被准许入境报道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之行。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始必将受到我们多数人民的支持。”就在这一天,白宫宣布将取消实行了20年之久的对中国的禁运。《时代》周刊称赞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之行“让乒乓之声响彻世界”^①。事隔一年,中国乒乓球队应美国乒乓球协会的邀请到美国进行为期18天的访问,4月12日到达美国。当天,尼克松总统写信给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说:“美国人民期望看到一次关于中国体育技巧和优良的运动员风度的卓越表演。”他希望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将在这种增进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的努力中成为我们的大使。”^②中国乒乓球队在底特律、华盛顿、孟斐斯、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等地举行了表演赛,受到美国观众和中国华侨的热烈欢迎。

继两国的乒乓球队互访之后,中断了22年之久的中美文化交流随着中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得到恢复,其来势之猛、发展之快、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方位之全都是前所未有的。

^① *China, U. S. Policy Since 1945*,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ashington D. C. 1980, p. 6.

^② 李长久等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页。

第六章 北美企业管理制度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影响

第一节 中国企业管理改革产生的背景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势头。从外部环境看,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去掉了中国历史前进中的一个障碍,从而大大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人们投资和兴办实业的兴趣和热情,推动了经济增长。尤其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了中国民族工商业一个短暂发展的机会,使之进入了所谓“黄金时代”。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帝国主义国家觊觎和强占中国市场的趋势与日俱增。另外,东西文化的冲撞、交流和融合的趋向,时时影响到当时中国的企业界。面对险恶的市场竞争和出于自身发展的愿望,某些不甘受人控制、为人鱼肉的民族资本家,较早接受进化论的影响,迫切希望抵制外来的经济侵略,并通过改革

创新的企业活动,改变本国企业的被动落后地位。

一、封建主义管理制度的弊端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企业最初是在外国资本侵入的逼迫下,在原有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其创始时期和经营过程中,除了存在资本先天不足、投资环境不利等客观因素外,企业管理陈旧是突出的弊端。在早期洋务派兴办的各种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企业中,封建性的长官意志、浮夸习气、裙带关系、贪污腐化等等都是通病。例如汉冶萍公司的衰败就与其内部组织松散,效率低下,职员营私舞弊、贪污中饱,安插亲信,任用私人以及铺张浪费等封建衙门式管理制度密切相关。早在十九世纪后期,上海的一位曾参与洋务派企业管理的著名思想家钟天纬就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针对企业中存在的上述现象,向李鸿章提出了裁洋匠、节冗食、严考核、估材料等四条改革建议。其中,“冗食”主要指那些挂名不办事的委员,“委员官气太重,养尊俸优,不屑躬亲细务”,“诚能多撤一员,即每年节省百数十金不等”。对于考核制度,他强调“凡工匠薪资宜以技艺之优劣,做工之勤惰为殿最,而不当以资望之深浅,乡情之厚薄为去取”^①。这些见解切中时弊,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造成封建思想和传统生产方式的顽固统治,只凭少数有识之士的呼吁,根本无法触动它。相反,随着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腐朽落后的管理制度也因袭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自顾不暇,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榨,民族企业因而得到较快发展。但好景不长,不过二三年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通过直接和间接投资,倾销商品等手段加紧抢占中

^① 钟天纬:《别足集内篇·代拟禀李爵相裁撤机器局条议》,《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国市场。在此险恶形势下,管理落后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越来越明显,已成为企业与外敌竞争中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方显廷指出:“整个管理制度,悉因缺乏专门知识,引用私人及舞弊而毁坏”,所以“骤遇外来之竞争,则立感不稳”^①。例如,天津有一家恒源纺织公司,主事者是北洋军阀曹锟的四弟曹健亭,他全然不懂纺织技术和工业管理,而只知逞威风,摆阔气,把一家新式工厂办成一座变相的大衙门。曹氏家族可以任意挪用挥霍企业资金。各级管理人员也乘机分肥,对机器设备不知保养,器材物资随意糟塌浪费,造成该企业几度倒闭^②。上海的恒丰纱厂是聂氏家族独资创设的企业,那里一度也是家厂不分,制度混乱。聂家各房可以随意挪用企业资金,宕帐多至数万至数十万元之巨,又由于企业领导人无知,所用非人,故企业竞争力极弱。诚如方显廷先生所说:“纱厂之创办者,多属无经验之人,仅鉴于欧战期间中国纱厂获利独多,乃为大利所诱,起而办纱厂,故所办纱厂效率极低。”^③

企业管理落后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状况下,对国外先进管理方法茫然不知,管理者目光短浅。其二,封建传统严重阻碍了企业活力的进发。以仁、礼、中庸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伦理哲学,它的要义就是把人束缚在等级制和封建宗法关系中。在此伦理哲学浸润下的民族心态是:人与人的关系高于一切。反映在企业管理当中,就是相互依赖型的家族管理体制盛行,从上到下形成一个多维、多层次、纵横交错的关系网。进入近代以后,这种传统观念以与资本联姻的方式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得到强化。比如,企业人事安排看重的是乡谊亲情,而劳资关系则通过包身工制、养成工制

①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工业》,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77—378页。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9—460页。

③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工业》,第377—378页。

和学徒制等契约予以规定,具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性。再如,高层管理者本身忽视管理的跨度和权职相等的原则,造成全公司只听一个人的话,而不问其合理否。上海著名的“棉纱大王”穆藕初曾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企业行政体系中的工头制往往使工人的利益操纵在封建把头的手里,具有人身依附的色彩,这不仅影响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而且极大地妨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又如,工厂管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一厂之设,尚未开张交易,而某部若干人,某科若干人,冠冕堂皇,与衙署相侔伯”^①,而且,“大抵总理一缺,往往属于稍有时望之人,至于此人之于此事,有何学说,有何经验,不计也”^②。“最高职员之任用以势力,中下级职员之任用以情面,至于工人则由工头任意招呼”^③。此外,对于封建性劳资关系及工人技术素质他也颇为不满,“间有苛刻之辈,以扣减辛工为能事”,“盖刻减辛工,大非工人之所乐,工人而不能乐其业,则惰心生,惰则出货迟而成本加重,此失之于过严者”^④。“工资虽廉,其如工作之不精良何,……将来工厂林立,竞争剧烈,苟内部长此不整顿,一转瞬间,已无斯人留残喘之余地”^⑤。穆藕初明确提出,封建式企业管理不改革,不仅会拖民族经济发展的后腿,恐怕连已经存在和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民族企业也会在国际竞争中落入外人之手。这说明当时一批开明企业家充分认识到企业管理改革的紧迫性,形势催逼他们自我审视,自我更新,在困境中崛起。

① 《中国实业失败之原因及补救方法》,《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② 《中国实业失败之原因及补救方法》,《藕初文录》上卷,第101页。

③ 穆藕初:《我国棉纺织业前途》,载《纺织周刊》第1卷第1期。

④ 《中国实业失败之原因及补救方法》,《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第101页。

⑤ 《振兴棉业刍议》,《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

二、企业家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工商界一代新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黄金时代”,开始登上社会活动舞台,取代昔日由绅商阶层所占的主导地位。企业家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企业精神开始发生变化,这是管理制度改革赖以发生的另一背景条件。

近代民族资本企业诞生时,创办人绝大多数是地主、士绅,被称为“绅商”型的民族资本家。他们凭借上通官府、下达众商的特殊身份,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为消除长久以来的官商隔阂起过一定作用。但到了战后,他们已愈益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了。在知识结构上,他们童蒙时便接受儒学熏陶,成人后多潜心于章句之学或义理之学,有较深的国学根底和浓重的士大夫气质,虽然他们在经商活动中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一些西学,但往往仅及皮毛,至于近代企业必需掌握的经营手段和管理方法,仅仅是一知半解。他们主要依靠传统经验和习俗管理企业。在价值观念上,这一代资本家处于新旧两种经济和两种思想文化交互影响时期,其思想也带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资本人格化的直接体现者,他们投资经营各类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无疑具有强烈的利欲冲动,为此他们要充分利用旧有的社会联系,获得特权和便利条件,以牟取利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在当时,还没有使自己的经济力量和观念演变到能消除“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①的地步,相反,传统的社会关系观念和见解还在“绅商”人物身上继续发生主导作用,如崇尚名第、联结乡谊、信义经商、因果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应等等。这些主观因素决定了“绅商”资本家身上尚缺乏近代企业发展所必需的锲而不舍、开拓创新的精神,在企业管理中更易趋向于因循守旧,从而落后于时代步伐。

与此对照,在知识结构上,第二代民族资本家中受过各种专业的新式高等教育的人日益增多,相当一部分人曾先后出国留学深造,获取学位。另一部分人虽未读过大学,但不少人受过近代新式中等教育,或通过刻苦钻研,其素质也已大为提高。根据《中华全国中日实业家兴信录(上海之部)》(1936年编)所列资料统计(统计对象限于二三十年代上海近代工厂、银行、商号的经理或董事中1936年年龄在55岁以下者),经理、董事共计525人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共164人,占总数31.2%,其中出国留学深造者共计82人(15.7%),国内大学毕业或肄业者也有82人。受过中等教育者53人,占10.1%。值得注意的是,留学人员中,以留美者为最多,工厂、银行两项共37人,占出国人员总数45%。这些应该说是当年上海企业界知识结构更新的重要数量概念。它意味着一批学有专长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开始进入企业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提高了企业近代化水平。这一变化也为西方企业管理新思想、新知识的输入奠定了传播和应用的基础。

由于文化背景上更多更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观念的熏陶,新一代民族企业家比较完整地体现出作为经济范畴人格化的直接载体。首先,他们在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直率。荣氏兄弟就是典型的例证,荣宗敬说:“厂子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了一支枪”。而荣德生投身纺织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一本名叫《美国十大富豪传》的杂志的影响^①,知道美国许多资本家都是办实业起家,从而大受启发,数十年后他写道:“故

^①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74页。

一地必须有人提倡事业,开辟风光,人人节约勤恳。以有余之资,投入生产。如此由一人为倡,而影响一乡,由一乡而影响一县,由一县而影响一省,以至全国。如今之美国即是。”^①在企业人际关系上,这一代资本家虽不能完全摆脱乡谊和家族的影响,但基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他们的眼界开始放开,不再局限于同乡、亲属范围内的狭隘视野。而且,二十世纪初期,通过各种途径出国留学的知识青年,在二三十年代已陆续归国,成为一股可资利用的人才资源。另外,新一代企业家的名位观念很淡泊,“黎明即起,孳孳求利”是其主要活动内容,排除了许多“绅商”人物的繁文缛节。

基于上述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更新,新一代企业家就具有了“绅商”所缺乏的不断进取,勇于改革的活力,这正是各企业大胆尝试西方经验,实施各种“合理化举措的主观推动力量。”

具体说来,新旧企业家的更替是以1920年上海总商会的一次历史性改组为标志的,上海作为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地,又是经济发展较快,各业资本家最为集中的摇篮,这场以具有创新改革意识的资本家取代旧式“墨守陈规”的“绅商”人物的改组,无疑具有广泛代表意义。

第二节 北美企业管理思想和制度的输入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主要是因西方社会思想的传播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作为经济理论的可操作性层次的管理思想也是如此。前面提到的最初倡言企业改革的钟天纬,是一位曾游历西欧的改良派,他对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许多经济问题的见解,是在同欧美各国

^① 荣德生著:《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1946年纪事。

进行比较分析后提出来的。如没有对国外企业现状的考察,要认识中国传统企业管理的内在弊端,并迅速找出一条有效解决这些弊端,提高企业管理素质的道路是很难的。在这方面,穆藕初引进美国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s1856—1915年)科学管理思想的经验很能说明问题。

一、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

泰罗是美国企业“科学管理”学说(或称“科学管理法”)的创始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在世界企业管理理论发展史上是“古典管理理论”时代。泰罗学说具有代表性。工业革命、经济危机、铁路增建、市场扩大、机械化等因素使得生产集中和垄断加速,只凭经验管理的做法已经落伍。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Daniel A. Wren)说:“在十九世纪最后数十年中,随着资金的积累和技术的发展,发展、组织、控制和管理利用这些大量的资金的拙劣方式便成为阻碍提高工业生产率的主要障碍。”^①另外,从1861年到1900年由欧洲到美国移民人数多达一二千万,美国工人严重过剩,但劳动生产率却很低,人们关心如何使劳动力发挥其潜能,“管理科学”应运而生。

雷恩还指出:“管理思想不是在没有文化的真空中发展起来的。”^②泰罗就是这样。他的父亲是一位出身于贵格教徒世系的相当富裕的律师,其母出生于清教徒世系。这个贵格教—清教徒的世家对泰罗的教育为其一生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使他具备了“寻求真理

^① [美]丹尼尔·A·雷恩著,孙耀君译:《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② 同上书,第5页。

的强烈精神,观察核对事实的强烈愿望以及清教徒式的根除浪费和懒散弊病的热忱。”他“迷恋于科学调查,研究和实验……强烈地希望按照事实改进和改革事物。”^① 在他学徒期间生活十分艰苦,后来泰罗将其成就归之于这种“吃苦耐劳,寻求完美”的“性格”,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西方文化优秀成分在他身上的体现。这种文化激励他投身于生产管理研究,通过各种研究试验,总结出“科学管理”学说。从此,美国工厂的生产管理走上了科学管理的道路。

泰罗在创建“科学管理”法时,有三个基本出发点,首先谋求最高工作效率;其次,用科学管理代替旧的传统管理,这是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第三,科学管理的精华是要求管理人员和工人双方实行重大的精神变革。由此出发,泰罗设计了一系列原理制度和办法。从实质上讲,“科学管理”一方面是对劳动加强控制,为防止工人“偷懒”,借助于科学方法使意识与行动分离从而使工人丧失了工作过程中的自主权,沦为管理部门的工具。所谓“标准作业方法”,是以选择最强壮、技术最熟练的工人,进行最紧张的劳动所测定的时间定额作为基础的,一般的工人无法承受。其“精神变革”思想,强调科学管理对劳资双方有利,掩盖剥削实质以便对工人进行控制。另一方面,泰罗的科学管理又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②,反映了当时大机器工业的某些客观规律:第一,它明确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整个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并把科技成就应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在管理中,坚持采用时间研究、动作研究等科学方法和原则,建立起一套系统管理方法,代替凭个人经验、技能进行作业的旧方法;第三,强调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离,由前者管理,改变企业主和工头

① [美]丹尼尔·A·雷恩著,孙耀君译,《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

个人发号施令的旧制度,代之以由专业管理部门采用科学方法,通过组织系统进行管理的新办法。这些思想正是中国落后的企业管理制度所不具备而亟需引进的内容。

但应提出,由于历史条件和个人经历的限制,“科学管理”学说亦有其局限性。首先它在最初只侧重于劳动作业的技术过程,使管理变成了狭窄的车间管理。企业整个经营管理工作,如销售、供应、财务等;企业最高管理层的管理和决策工作,均未涉及,所以当中国经济界、企业界引进“科学管理”时,就面临一个如何真正抓住这一方法的思想实质,使之应用于企业管理各个方面,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问題。其次,泰罗只重视工人个人的作用,把人看作是孤立的经济人,其一切活动都出于经济动机,忽略了企业成员间的交往、感情、态度等社会文化因素对劳动效率的作用。诸如此类的观点决定了“科学管理”学说本身的欠缺之处,尤其是当中国移植这种制度和方 法时,必须对其加以改造和变革,使之适应中国实际。历史实践也证明了引进和利用科学管理法,必须经历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既要利用,又要发展。

二、穆藕初引进科学管理学说

穆藕初,名湘玥,字以行(1876—1943年),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他早期的学徒与小职员生涯,使他深切地认识到,我国“生产力低落的原因有三”,其中之一是“无管理方 术”^①。因此,在他于1909年赴美国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伊立诺斯大学、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学院攻读农学、棉纺和企业管理学位期间,对于“管理方法尤所注意”。他结识了泰罗等人,曾与他们就管理

^① 《论实业与教育之关系》,《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第120页。

问题“反复讨论,获益甚多”^①。从理论上,他一再披览泰罗所著《学理的管理法》(后译为《科学管理法原理》),以及泰罗的学生吉尔培所著《标准动作》等书,深受其学说影响。在实践上,他利用假期,通过对典型的托拉斯大农场“塔夫脱农场”的考察,获得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就它的管理体制总结了以下八个方面:(1)严密的计划性,场、厂之建设都经过反复研究,而且因时制宜,以求“建设也无虚耗”,所谓“计谋深远也”。(2)用人得当,讲求科学,“各场、厂主任部长皆系毕业专门人才”。(3)“事权专而不相侵越”,各个部门“各司其事”。(4)“遇办事之勤奋者奖之,怠忽者戒之,戒而不改者退之,赏罚严明”,所谓“和衷共济也”。(5)“簿记清晰”,各部簿记分门别类,不容紊杂。(6)各部门之间经济往来,都要经济核算,“其交易均依市价计算”,即“连带贸易也”。(7)“助长周备”。该农场“助长事业除电灯及自来水”外,还有医院、学堂、教堂、银行、邮电、客栈、杂货店等等,“无不毕备”。(8)“学识充足也”^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6和第8条,他在第8条中提到:“各种机器亦均系最新而最精良,以科学的知识,机警的脑力,敏捷的手段,整理全场事务,宜其勃焉而兴也”^③。而第6条实际是指工农商经济联合体形式的机械化大生产经营方法。如该农场种植棉花,还自设纺纱厂、榨油厂等企业,而农场放养的牲畜则由自设屠宰厂加工,“各部所出之货,设互相消纳之法,不仅不假手于人,耗回扣及转运之资,且无废弃之物”^④,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考察,穆藕初把当时中美两国生产管理体制加以对照,提出:“吾国实业之失败,关于管理法者,其故有三”,即前文已提及的(1)“社会名流”把持企业管理要职;(2)任意引用私人,讲究封建衙门式排场,任意安插亲戚故旧,机构繁复,办事反无有用之人;(3)对工人一味苛刻,使

① 《学理的管理法自序》,《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

②③④ 《游美国塔虎脱农场记》,《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第4—5页。

生产效率极低等三点弊病^①，从而揭示了封建衙门式管理体制及封建主义余毒从企业内部给中国民族工商业所带来的损伤。

基于以上认识，他回国以后，在创办实业的繁忙中，与董东苏先生合作，将泰罗名著《科学管理法原理》（1913年出版）一书译成中文，于1916年以《工厂适用的学理的管理法》为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不仅如此，他还率先在自己的企业中实施该管理方法，并获得显著效果。他认为“科学管理”的实质是“推究入微，凡有所利，无不力图，凡有所病，无不力除”^②。在此基本原则指导下，管理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而所谓“利”与“病”，基本的衡量标准则是“节省时间，节省精神，节省物质”^③。有鉴于此，他主要实施了四项意义重大的改革。首先，开始了行政体系上的工头制向工程师专业管理的转变。针对当时各纱厂“一切工作均由工头支配，效率颇低”的弊病，他亲自以工程师身份去指挥生产，并竭力排除一些大股东及封建把头的干扰，提拔安插了一些学有专长或确有经验的人才去各部门指挥管理生产^④。在穆氏总结的组织工厂必备的九要素中，人才位列第一，他说：“凡百事业之成败，全视人才之优劣”^⑤，由于“人才为事业之灵魂”，所以“物色人才与善用人才，实为事业家首务”^⑥。他认为有两种人才是企业所适用的，一为科学人才，一为管理人才；“科学人才，为技术家，占制造上重要地位”，“管理人才，在事业管理上所占地位，尤为重要”^⑦。这里所说的人才，除具备现代科学知识素养以外，还必须要有从事实业经营管理的专业素质，如“健全之脑力，敏锐之眼光，与灵活之

① 《游美国塔虎脱农场记》，《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第101页。

② 《学理的管理法自序》，《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第200页。

③ 同上书，第20页。

④ 同上书，第88—89页。

⑤ 穆藕初：《中国棉业发达史》，载《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5号。

⑥ 《振兴棉业刍议》，《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

⑦ 《学理的管理法自序》，《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

手腕,坚固之信用,雄厚之力量”^①。作为企业决策者管理人才还要富于改革创新意识,他强调:“管理家不能拘泥陈旧之方式,以遗削足就履之讥。”^②他认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有诸多压抑人才的弊病,必须加以革除。由此可见,他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这显然得益于“科学管理”中计划与执行职能分离的思想。其次,他针对当时我国纱厂没有必要的统计核算制度的情况,创制了一整套纱厂内部各车间各部门的生产报表格式,并实行复式记帐法,“遂为后来各厂普遍采用”^③。再次,强化质量管理,他一方面积极引进和消化美式先进机器设备,另一方面“搜集市上最佳之纱若干种,逐一检验其优点所在,并将各纱优点汇集”,使其企业产品,“脍炙人口”,“德大纱厂开工出品之佳,为上海各纱厂之冠”,1916年在北京商品陈列所举行的产品比赛中,“得列第一”^④。最后,为解决旧式企业对工人封建性的苛刻管理所造成的效率低下问题,他根据科学管理原则,努力提高工人积极性,同时明确要求提高工人技术水平,为此举办了技术培训班,开办了职业学校。

简言之,为了改善我国企业的落后状况,穆藕初充分运用自己从西方管理理论中汲取的营养,其中主要是“效率”、“科学”及“专业化”的精髓。这些也正是用以摒弃中国封建文化所浸润的企业管理中多种弊病的有力武器。穆氏强调泰罗名著“虽借钢铁业发端,用其道以施之各业,无不推行尽利。虽然,此学理管理法,岂第适用于改进凡百实业而已,诚得一般有志改进家,熟按此书所载方法,引申触类变通,变裁而妙用之……无不立收奇效”^⑤。可见,在穆藕初引进西方企业文

① 《学理的管理法自序》,《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

② 穆藕初:《纱厂组织法》,载《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一卷,第1期。

③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工业》,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77—378页。

④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56—457页。

⑤ 《学理的管理法自序》,《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

化的经验中更可贵的是,他对西方的制度文化有所发展,在横向上拓宽其应用范围,在纵向上深入中国实际,“变裁而妙用之”。这种利用外国文化的先进因素解决本国实际问题而同时并不盲目照搬的做法,值得今人认真揣摩和借鉴。

穆藕初在移植西方企业管理方法方面的一系列观点和实践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背景下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为与外国资本竞争而提高自身素质的思想趋势,获得了刚刚掌握民族资本企业群体主导地位的新一代知识型企业家的共鸣和响应。穆氏翻译的《学理的管理法》一书,越来越受到实业界的重视。据《纺织时报》记载,此书销售量,“现已大增,可见有人注意”^①。他所经营的厚生纱厂因管理方法先进而被同业视为楷模。当时“国人欲新办纱厂者,皆自参观先生之厚生纱厂为入手”^②。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某些著名企业的推广应用,科学管理思想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实业的某种质变。荣宗敬曾说:“试行科学管理法,果能增多效能,减少消耗,生产事业之合理化,已为吾国办工厂者所公认,则他日工业之蒸蒸日上,自在意中。”^③

三、科学管理法在中国

根据创办人的背景差异,当时中国实施科学管理法的企业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创办企业时就完全依据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思想进行管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其典型。创办人陈光甫出生于小商人家庭,1904年作为湖北省代表团随员,赴美国参加圣路易

① 《纺织时报》1931年1月15日,第七六四号。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57页。

③ 荣宗敬:《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惠民生计划书》,载《人钟月刊》第一卷,第3期。

国际博览会,会后得官费津贴在美国留学,1909年毕业于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财经商业学院,深受西方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的陶冶。回国后于1911年12月被江苏都督程德全任命为江苏银行督察(后改称经理)。上任伊始,他就试图运用从美国学到的西方财经知识,去改造江苏银行落后的封建管理体制,如将总行由苏州迁到上海,使之处于金融中心,放弃发行纸币权,以避免省政府随意向银行索取,而蹈过去官办银钱局的覆辙;设立货栈,创办货物抵押贷款;提倡储蓄为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等等。这些措施一反过去各省官办银钱局的旧习,为中国金融界树立一种新的风气。然而,由于江苏银行是一个官办机构,经理必须听命于省政当局。陈光甫任职仅一年多,因拒绝向都督府和省财政厅抄报江苏银行存户名单,竟被免除职务。

这一挫折反而使陈光甫对封建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落后性认识更加透彻,也使其下决心独立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引进新的管理体制。他说自己生平最深恶痛绝几种人,一种是不知节俭、甘心堕落的不识艰难之辈,他称之为“少爷”;一种是官派十足,应办之事,随意搁置,他称之为“大老爷”;另一种是工作被动应付,死气沉沉,他称之为“老大爷”。这三种人生存的土壤就是封建“官本位”文化和宗法社会,一旦他们进入近代企业,就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的巨大浪费。因此,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容他们及其沾染的落后习俗有安身立命之地,代之而起的乃是效率、专业化及科学研究的思想。首先,他要求全体职员办事讲究效率,用物力求节约。例如他倡导的“开支合理化”,便是“与业务进展有关者为数虽多,不可吝惜;若用于不当用者,即为浪费,虽一文也不可支用”^①。“每人日费一纸,数固极细,然积若干人,若干日之浪费,即为数可观。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积

^① 《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13页。

少成多,虽小处亦应注意”。除用物节约外,陈光甫更反对人事方面的浪费。受传统儒家繁琐礼教文化的影响,近代许多企业崇尚浮华、排场、虚名的事例比比皆是,导致极大浪费。对此陈光甫要求进行必要的整顿,务使“组织力求严密,手续力求简单,则人事开支,更可节省。”这些都体现了资产阶级“锱铢必较”的创业精神。其次,他极其重视职员的选择、培养和使用,他说:“做生意固属谋利,然若不先于本身上求知识,则终属空虚,欲求知识,必求每一部分均有专门人才。”^①“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因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伊始,就十分注意人才招聘,注重知识技能,摒弃任用私人。“秉大公,不论何人,苟有优秀之才能,必予以相当之地位。”陈光甫还鼓励职员“砥砺学行,奋求进取”。他鼓励青年职员“趁此青春,研究业务,研究学问,其未谙英文者,应即诵读之,未精通者,再深究之,以大好之余暇,从事研究,则将来必有良好之前途”^②。为提供读书条件,他亲自主持建立一个藏书几万册的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从国外进口大批图书,由留美学者林同济主持。再次,陈光甫重视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各种信息,以作为经营方针和计划的依据。为此采取的方法包括:(1)建立调查研究机构;(2)开展多种形式的研究活动;(3)鼓励职员从事调查研究。陈光甫最鄙视那种“日闭斗室,足不出户,惟仰屋兴嗟,徒悲路穷途绝”的人,认为实业家应该“放开脚步出外寻觅”,则“随处有可通之路”。如能“殚精竭虑,竭力探索”,即“海底芥子,亦不难获得”。从以上陈光甫兴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几条经验的粗略叙述中,可以看出所有措施办法和手段都体现着“科学管理”的精髓。这也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旧中国跃居“南三行”之首的重要因素。

第二种类型则是创办人并未直接接受欧美文化深入熏陶,但由

^{①②} 《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6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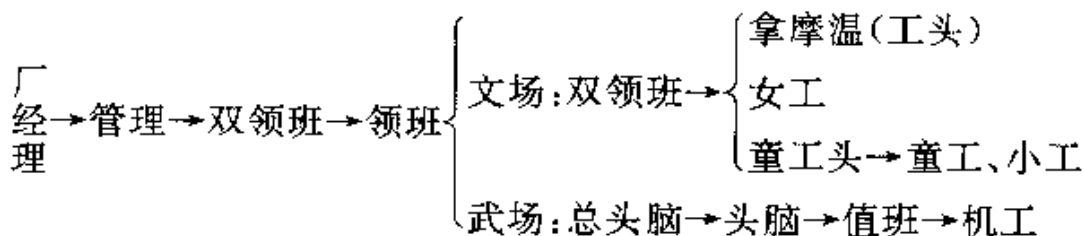
于自身努力,不但掌握了“科学管理”的要义,而且有所创新。民族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是“科学管理”思想的这一种类型,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国科学管理专家”。虽然卢作孚不像陈光甫等人系统学习过西方近代管理科学,但他非常善于吸收国外经验并进行创造性发挥。比如他在去美国进行短期考察后,将CMC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这都是应用泰罗学说最见成效的企业)的经验总结为:第一、专业化。一桩事一个机关办,一个人办一桩事,事不可常变办法,人不可常变更事,如此可以培养人与事^①。第二、分工合作,其前提为:(1)标准化,任何厂家所造者均可适用;(2)一切预定,事先计划,美国人吃饭、坐车、买票,都预定;(3)相互尊重对方立场,总经理必须尊重各部门主管者意见。罗斯福能够与英法等国结盟,而中国人在一个办公室还各自为政。(4)若干活动要有共同方法,技术管理都要用科学方法,管理且重于技术,而管理问题则必须治者与被治者双方皆明了才能办到。最后,他要求企业向这两个美国企业学习。卢作孚这位自学成才的大实业家,还写成一本《工商管理学》,不仅涉及组织管理、人事管理、部门管理等基本问题,而且还专章研究了工作人员的志趣爱好等有关当代行为科学的范畴,表明他的“科学管理”思想已跃居世界先进行列。在实践中卢作孚既强调任人唯贤,又注重工作效率。下属如未办好事情,他常说:“别的大机构办不好,我们这么小的机构还办不好吗?大的机构受别的牵制,我们这么小小的机构受什么牵制呢?怎么也这样无效率?”诚然,卢氏管理体系拥有丰富的内涵,其根源并不单一。但“科学管理”学说无疑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第三种类型,荣氏企业的特点在于它的创办人是由“绅商型”向新一代“知识型”企业家过渡的人物,其改革思想更多沿袭了我国十

^① 《全国文史资料》第74辑,转载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必循的道路》一书中《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有关言论。

九世纪末维新派变法思想中“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传统。二十年代初，荣氏兄弟为了和日本纱厂竞争，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聘用了一些原在日本纱厂搞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着手改革管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为了进一步推行改革，楼秋泉、余钟祥等人在1924年6—7月间，曾到上海找荣宗敬，请荣到在沪日本纱厂参观，并提出要辞退工头、彻底改革工头制的主张。荣宗敬当时满口应允，而后却又变卦，要楼、余“和工头之间能互相合作”，把“理论和经验结合起来，各用所长”，并以总公司的帐务为例，说总公司的帐房就是用两种人的。“因为原来的中国式旧帐簿不能适应新的企业要求，采取新式簿记，但并不抛弃旧帐簿，以新为表，旧为里，互相转抄，新旧并存的”（据申三技术人员楼秋泉的回忆）。荣还常说：“从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最合时宜。”^①事实上，荣家企业管理改革基本上都是按新旧结合的原则进行的。

荣家企业早期管理分为文场、武场两个系统，具体隶属关系是：



在工头制下，文场的职员都不懂技术，他们也不能直接管理工人，而必须通过工头去管。生产技术，工人的进退等权力都操在工头手中。另外，如车速的快慢，原料、成品的质量检验也全由武场头脑管理，文场职员也无权过问。根据新旧结合的原则，在改革中，上述一套工头管理体制基本上还保留着。改革主要表现的两方面：一是在原有的文武场中都任用一部分受过高等、中等专业技术教育，懂得管理的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研所经济史组编：《荣家企业史料》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2页。

新职员,并扩大他们的权力;二是根据科学管理需要建立了一些诸如“保全部”、“考工部”、“试验室”等新的管理部门,并统一了行政、技术的领导人员。至于原来的工头,不是采取全部辞退的办法,而是采用调离岗位或逐步减少其权力,待其年老退职,给予津贴等办法,使之自然淘汰。

荣氏兄弟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改革思想不是偶然的。当时欧美和日本许多先进企业都已采用“科学管理法”,使经济效果大大提高,利润大幅度增加。这不能不使荣氏兄弟为之向往和羡慕。但荣氏兄弟又不得不考虑到当时企业管理陈旧落后的状况,以及传统的习惯势力。他们本着“务实”精神,不急于求成,而力求稳妥。他们推行的“科学管理”,主要侧重于技术、设备和劳动管理,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1924—1926年是新旧体制并存的“半改革时期”;1927—1937年是科学管理体制大体完善时期;以后直至解放前夕,基本上是继续实行科学管理制,同时引进了一些现代科学管理的内容。

在技术管理上,各企业都委任工程师、总工程师或技师、总技师,由技术人员代替工头统一管理企业技术工作,设立质量检验试验室等部门,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试验新技术、新产品;制订和推行各工种的“标准工作法”则被列为重点,基本是仿效泰罗制原则,强制工人执行。在设备管理上,按科学管理原则整理各种机器设备,并设立专门的机器保全部门,从事设备维修保养。在劳动管理上,制订严格的《工务规则》,对工人实行严格管理,以提高效率。虽然荣氏企业在人事财会方面的改革滞后很多年,但仅就上述改革而言,其进步性仍值得肯定。有关资料表明,1924年推行科学管理后,申新三厂在1924—1926年这两年中,每万锭出纱件数增长了114.4%,车速从工头制时的110多转提高到200多转,每件纱的成本费用降低了24元。荣氏企业剩余价值率从1922—1924年的228.08%提高到1925年的319.81%。

上述三类企业的经验表明,在促使中国封建经济及其落后文化因素束缚下的企业管理向现代科学管理转变的过程中,学习西方先进管理思想和方法是一条有效途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积极方面。如前所述,“科学管理法”从其在美国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很大缺陷。它的原理,是通过人与机器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动作,以一种最可能快的生产节奏来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其实质是对人的物化管理,单纯把人看成为无感情、无知识、除经济收入外无任何其他需求的“经济人”。虽然它在提高生产率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表面上那种人与机器的协调,蕴积着劳资矛盾、冲突日益加深的潜在因素。这种不安定因素,常常会受到当时社会上一些政治、经济动因的影响而成为“工潮”的汇合部分。在美国,泰罗制以及随后福特的传送带系统引起了工人的严重不满,因为它使工人劳动变得紧张而又单调。工人的不满在1929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达到高潮。这种情况导致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的萌生和发展。西方管理学家开始把人视为“社会人”,看到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因素,除了物质条件外,还有社会的、心理的因素,从此逐渐开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

中国民族企业引用“科学管理”思想过程中,同样出现了类似问题。这一方面由于改革初期照搬外国经验,未加以消化吸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传统习惯势力及落后的封建文化长期盘踞在人们头脑深处,乍遇强调科学性、精确性以及严格规章制度的新思想,从心理上很难接受。例如,荣氏申新三厂在1924年搞改革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一场主张改革及抵制改革的斗争。当时在工程师楼秋泉及余钟祥、汪孚礼等新职员主持下,根据荣宗敬旨意,将全厂5万枚纱锭分开管理,其中2万枚生产效能较差的纱锭交给工程师实行科学管理,其余英国机器的纱锭3万枚,生产效能较高,由工头管理。分开后,一切行政、技术互不侵犯,结果实行科学管理的2万枚较差的纱锭的生产成

绩大大超过工头们管理的 3 万枚较好纱锭的成绩。在此试验基础上，申三急于全面实行科学管理，对原来的领班工头分别辞、歇、降、调，对工人全面实行严酷的管理制度。但结果欲速而不达，酿成了工头和工人殴打新职员，阻挠科学管理实行的罢工事件。后经调解方达成折衷协议，肯定和维护了已经进行的某些改革，例如技术管理制度等，宣布任用工程师、技术员是厂家的事。同时在仍留用工程师汪孚礼等一班人外，也调走部分新职员，并保留原有领班、工头的旧体制，放慢了改革步子。这实际上乃是东西方各自文化中“科学精神”与“伦理规范”之间的冲突在企业中的反映。可见荣氏兄弟在改革中采取新旧结合的原则，不无其深一层的考虑。所谓“旧学”实际是指封建的和小生产的管理方法及一套封建的伦理道德规范。它导致荣氏管理改革的不彻底性。

另一个改革受挫的实例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大亨王云五。1930 年 3 月，王云五在就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后三天，即乘轮渡洋游历日、美、英、法、德、比、荷、意八国，沿途参观工厂，访问专家、研究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涉猎有关科学管理书刊 900 种，为时半年。返回后，首先改组总务处，聘潘光迥、陶希圣为总务处秘书，并改总务处章程，以“总经理主持一切事务”为宗旨，推行“科学管理法”的计划。1931 年 1 月 8 日，宣布王云五亲自拟订的《编译所编译工作报酬标准试行章程》26 条，自 1 月 10 日起试行。章程将编译工作分为著作、翻译、选辑、校对、审查五大类，每类分级，前四类按千字计酬，审查则以时间计酬。还订出每人每日生产定额，企图把编译所的月薪制逐步改为工业生产的计件制，等于把脑力工作者当成机器看待，遭到编译所全体员工的坚决反对。印刷所、发行所职工也纷纷响应，推荐代表郑振铎等与王云五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郑振铎起草宣言云：“王云五不独为同人等之公敌，亦社会之公敌……庆父不去，鲁难未已”。邹韬奋著文对“科学管理”提出质疑。1 月 15 日编译所员工开全体大

会,资方暗中叫来军警加以阻止,斗争日趋白热化,并引起社会注意,舆论界也给劳方有力支持。最终资方宣布撤回“试行章程”,一场“科学管理法”改革就此收场。

由此可见,完全照搬美国经验,必然导致新旧体制的矛盾尖锐化,无益于提高企业效益、效率的初衷。当问题出现后上述两种态度,一是折衷主义,企图使新旧制度并行不悖;另一个便是乞灵于硬性处罚或弹压手段。它们都不是积极地创造性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相反,却阻碍了科学管理法这一新生事物有效地发挥其作用。这就促使当时企业界一些有识之士重新考虑本国国情和企业的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中可资改造利用于新时代的因素,重新审视、探索企业经营管理的模式。他们意识到实施科学管理法绝不能照搬外国经验,要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创造出一个“劳资协调”、“劳资合作”的企业内部环境,使工人以企业成员身份主动配合厂方搞好生产,接受科学管理方案。这种变通灵活地应用科学管理法的意向,就像初尝失败苦果的王云五所总结的:“我对于欧美尤其是美国盛行的工商管理,虽甚赞同其原则,却不愿整个接受其方法。一国有一国的工商背景,一国亦有一国的社会特点,善学者当师其精神,不必拘于形式。”^①著名工业巨子范旭东也说过,即使将美国大公司的管理经验方法全部移植,也绝不会产生美国公司那样的高效率,必须注意将西式近代管理科学结合本国实际,使之“中国化”,方可见成效。东亚毛纺织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① 《工商管理一瞥》,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2页。

第三节 文化融合的一例证——东亚毛纺织公司

一、东亚精神

天津东亚毛纺织有限公司(简称东亚公司)创办于1932年4月。它的创办人宋棐卿(1898—1956年),是山东益都人,基督教徒,先后在美国教会学校、北京汇文中学、齐鲁大学及燕京大学上学,未毕业即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在美国学习期间,宋棐卿与美商沙丰经常往来,并有机会到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工厂中去参观,从中亲自体验到科学管理法的堂奥。他在国外时就看出了毛线的发展前途,决心回国后办毛线厂,抵制洋商并进而打入东南亚市场。为此他把公司名称定为“东亚”,把毛线商标定为“抵羊”。

与前述民族企业一样,东亚公司也仿照西方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企业管理制度。宋棐卿的“科学管理”观就是“用规则管人”,强调“铁一般的规律”,“其概要办法系将各人之起居饮食睡眠工作游戏等均作成简易之规律,各人必须实行,另外指定专人分组考查之,使各人一律无论作何项皆有铁一般规律。”^①原因在于“多数人共同工作,必须要有组织……按照组织去实行,不但要将组织的机构成立起来,并且要有许多规律,去支持组织的存在……在大规模的组织中,一切的事非有严密的规定不可,有几种原因不得不这样。(1)节省精力;(2)增加效力;(3)维持公益”^②。基于此,东亚公司考选职工、工作定额、

^① 东亚公司编:《征集训育及管理之材料》,转引自《天津历史资料》第二十期;崔树菊、金岩石编:《天津东亚毛纺织公司史料》。

^② 《东亚声》第二期,1947年7月1日刊,第4页。

质量检查等都有制度,各种规则繁密如麻,从“厂规”到“工友须知”,共28种503条,其中有关开除的条规就有100多条。管理之严,算计之精,可谓极尽其能。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宋棐卿为了使这些科学管理规则制度得到落实,非常重视职工教育。他说:“欧西各国注重国民教育,故人民质素甚高。如今时代前进,已非昔日可比,将来如无相当学识,甚难生存于社会上,今日世界先进国家事业与生活均趋于机械化,人工渐受淘汰,凡能力高尚之人,尚可竞争图存,能力薄弱者,则甚危险。异日我国亦能进步至机械化之生活时,我职工则不得不预先充实自身学识,以备争取生存,庶几不落伍于时代。”^①在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得不到正常受教育的权利,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雇佣劳动者,大都文化程度很低,且有大批文盲。他们不但难以掌握近代技术,而且其心态表现也往往与时代节拍不相协调。因此宋棐卿重视职工教育,确实是明智之举,也是实施“科学管理”的必由之路。在《东亚声》创刊号上也有谈到职工训练目的的内容:“我们讲求效率,必须注意速度,因为效率的意思,包括节省时间。速度快,就能在规定时间内多有成绩,那就表示效率高。”^②“我们在公司中服务,对于个人的工作,既都希望效率高,就不能不注意速度……但是加紧速度并不是慌张草率,乃是要稳健彻底,并且至少要保持原有的工作质量。”可见,训练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职工工作速度,保证质量,这也正是“科学管理”的实质。东亚公司的科学管理受到美国企业管理专家的好评。据《东亚声》载:“资源委员会顾问德维迪氏(Raymond L. T. Wedy)美籍,曾莅临本公司参观,由何清儒主任陪往各厂及东亚小学参观,德维迪氏系研究工厂管理之专家,对本公司设施表示满意。谓本公司管理方法与成果,实有胜于美国一

^① 《东亚声》第二十二期,1948年2月刊,第2页。

^② 《东亚声》创刊号,第2页。

般工厂云云。”^①

当然,宋棐卿的“科学管理”也不单纯依靠规章制度。东亚公司企业管理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重视精神训练和职工福利,宋棐卿名之曰“文明办厂”。他把基督教义和儒家学说结合起来,构成“东亚”赖以成功的精神支柱——东亚精神。

当代企业文化的概念,涵盖内容甚广,诸如企业的职工教育,职工业余文化活动,成文的厂规、厂法、厂训、厂歌和不成文的价值观、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思想修养等等,均属于企业文化的范畴。企业内各种形式的文化表现,紧紧围绕企业经营管理这一中心展开。在东亚公司,精神训练的主要内容在宋棐卿主持制定的《东亚公司工友人事组织规则》中有所反映:“精神训练为增加工作效能之一要途。负责训练者必须鼓励其兴趣,振作其精神,培养其道德,使其尽心职务,努力工作,以求公司及工人互受其益。此种训练切忌空洞笼统,必须根据实际情形,加以研究,方能收益。”他还说:“我国风俗是三分理智,七分感情,应当先用感情规劝。”“一个人若不会运用感情,可以说不够当管理人的资格……感情和理智都很要紧,可是感情也不是滥用的,应在法律范围以内可以用感情。”^②显然,他的主旨是要将西方文明中理性、科学、法规意识与东方文明中的伦理规范、宗法观念相结合,共同为提高企业效益水平服务。

宋棐卿主持编印了几十种小册子和训练讲义,并于1944年汇编成书,题名《东亚精神》。该书用格言的形式,记述了东亚公司的“主义”、“厂训”、“厂歌”和做事为人的准则,以及对“人格”、“尽责”、“功绩”、“过失”等的认识和要求,被称为“东亚铭”。另有《东亚礼仪》一书,把同人的言谈举止尽入规范。可见,东亚“精神训练”的内容非常

^① 《东亚声》第九期,1947年10月1日刊,第7页。

^② 《东亚声》第二十四期,1948年5月16日刊,第3页。

丰富。若具体审视这一“精神训练”的内涵就会发现,宋棐卿等人在确立自己的企业文化体系时充分汲取了东西两种文化中可资利用的营养,以适应时代要求。

二、东亚精神中的北美文化因素

“东亚精神”中“服务社会国家”和“以发展社会事业表现公教精神”的思想均受益于宋棐卿所受的西方文化的熏陶。美国高度社会化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核心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封建社会的现代集团生活。人们普遍相互依赖的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健康向上的基础上。与此同时,新的比赛标准和道德规范也孕育而生。但在封建宗法关系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人们更多关心的是宗族和亲朋邻里关系。如卢作孚所说“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为了家庭可以披星戴月,可能手胼足胝,可以蝇营狗苟,可以贪赃枉法……为了家庭可以牺牲了家庭以外的一切”。这种双重集团生活方式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要求。宋棐卿则吸取西方经验,提出“要以生产辅助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凡是生产事业必须都有余利,没有余利的生产,就成为消耗,但……(东亚)并非专为营利而生产,乃在利用生产的出品,供给社会的需要,利用合理的生产余利,辅助社会上有益于人类的事业。”^①又说:“对于社会上一般平民……凡是对我们谋求福利的举动,都用生产的利益去资助,如捐助慈善团体,办理临时特别救济工作,创设贫民施诊所……这也是为辅助社会进步而生产的意思。”^②此外,东亚公司的厂歌等教育材料也充分体现了服务社会的精神。在《东亚铭》中就有“人若只作自私之事,生之何益!

^{①②} 《工友训练之纲要》第2号,转引自《天津历史资料》第二十期;崔树菊、金岩石编:《天津东亚毛纺织公司史料》。

人若不为大家作事,生之何益!若不服务社会,要我作什么?若不效忠国家,要我作什么?”^①的内容。当这些思想渗入到公司广大员工的内心世界之后,他们便把自己受雇于企业的谋生活动,升华到服务社会的高度。诚然,这里也存在着一个资本家借助社会—企业大家庭的宣传掩盖劳资矛盾的问题,但从企业文化的积极功能以及旧中国民族企业面临危机的现实看,社会集团的理念确实使每个企业成员意识到企业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从而把自己归属于“企业大家庭”或“民族大家庭”之一员,而不再局限于封建等级制下的狭隘圈子。这样,企业就可能形成一种凝聚力。

宋斐卿管理思想的另一个西方文化根源是基督教。他本人是一位虔诚的教徒。而上述“东亚精神”中就渗透了基督精神。东亚公司的厂训直接引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的“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职工食堂墙上油绘着中英文对照的八个大字——“军事纪律,基督精神”。还有《东亚铭》中的“耶稣圣训:不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等等,都是要借助基督教义,树立起一种秩序井然、平安和谐的气氛,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企业经营管理。例如一位神父在东亚公司讲道时就说:“我们在公司里做事,要守本分守规矩,努力地向前做去,别人能够偷懒,别人可以不守规矩,我们公教信徒不可以不守规矩。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天主都在看着我们。”^②另一位神父则更明白地说:“荣耀天主的方法就是光扬公教,光扬公教的方法就是表现公教精神,表现公教精神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发展社会事业。”^③

① 《东亚精神》甲种本,卷首,《东亚铭》。

② 《公教信友协进会成立纪盛》,《东亚声》第三期,第5页。

③ 《东亚声》第十六期,第3页。

三、东亚精神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宋棐卿的科学管理思想也是他继承了传统文化,吸取了先人管理经验的结果。中国广大农村在近代还不曾有过大的社会变动,事实上仍然沉睡在传统社会里。因此,产业工人成分相当复杂,棉毛纺织业中许多工人都是季节工,具有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三种身份。近代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也更多是生活在传统社会里。企业家的客观使命是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企业中经营管理,对传统文化不可能弃之不理。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管理——任务、责任、实务》一书中说:“管理越能利用社会的传统、价值与信念,则管理的成就越大。”许多近代民族企业家都自觉和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宋棐卿也是其中之一。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艰苦创业与勤俭办企业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办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代表人物在旧中国三座大山重重压迫下,更把这一品德作为谋生存、求发展,同困难环境斗争的有利武器。卢作孚曾说:“勤与俭是中国人的两美德,是两个有力的拳头,是两把锋利的刀。”东亚毛纺公司在其《精神训育稿》中,大量向职工灌输“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的儒家思想。这句话在封建时代主要指仕途“人上人”的含义。但在“东亚”,它是用以说明“作人必须受苦……必须不畏难而有进取心”,“想生活得比别人美满须更受苦……游手好闲,好吃懒作,只知享受,不知工作的人怎样能生存呢!……必须去受工作之苦,挣了钱来维持生存……如若想生活美满,又得去受努力工作之苦,费一番时光去研究工作的改良,私下用功研究自己工作的技能与知识。”^①“想求利得受苦中苦……唯一的方法,得

^① 《精神训育稿》第11件。

自己私下用功,努力培养自己的能力,多读书,多办事,练习口才,运用思想,发展自己的工作与地位,一面克勤克俭,受尽别人受不了的苦”^①。宋斐卿本人就是这样以身作则的。他良好的生活、工作作风,为东亚公司树立了信誉和榜样。中华民族特有的勤俭美德与基督新教根除浪费、反对懒散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见东西文化中有些东西是可以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关键在于如何吸收各自的精华,去掉落后腐朽的糟粕。

第二,“义利”统一的思想。传统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的,并且将“义”、“利”对立起来,人为地把追求“义”与追求“利”看成是高尚与低贱的分野,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这是一种偏激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但是儒家传统思想、道德修养和伦理关系对于近代企业文化的形成又是不可缺少的,有些东西经过修正,是可以保存和应用的。东亚公司就十分注重将儒家的“忠诚”意识和家庭、国家的伦理规范融入企业文化里,以激发工人的社会意识。在《东亚铭》中有关人格的部分谈到:“不忠于己者焉忠于人?不忠于夫妇者焉忠于友?不忠于亲族者焉忠于社会?不忠于家者焉忠于国?公而忘私者我们要师,先公后私者我们要征集,先私后公者我们要规劝,有私无公者我们要力戒。”当传统的“忠君”、“勤王”思想演化为忠于国家、家庭乃至企业的意识的时候,它已属于企业发展的动力,将职工凝聚在一起,为辅助社会生产的总目标服务。在讲求集团意识的同时,东亚公司也十分关心职工福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职工股东化”。这个办法就是宋氏在美国期间不断参观访问福特汽车公司等垄断企业后吸收过来的。所以在“东亚”,东西文化各自侧重的“义”与“利”、忠诚与赚钱、集团意识与个人利益是巧妙地

^① 《精神训育稿》第11件。

融合在一起的。

第三,儒家“和为贵”的伦理原则。儒家重感化,重和谐,主张“和为贵”。这也表现在东亚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宋棐卿不单纯制订详细严格的规章制度,他还要求在企业内部企业主与工人、工人与工人之间保持和谐,对外则依靠各种关系保持与其他企业和政府间的和谐和信任。这与美国“科学管理”最初实行时,那种完全由权力、义务、责任所规定的非情感化的气氛不同。《东亚声》刊载文章宣称“本公司的事业好比一只船,我们职工好比船上工作的人”^①。“上至股东董事,下至工友,各有份内责任,所进行任何事件之成功与失败各均有份,非专赖某人或某部之力也”^②。宋棐卿还说,劳方就是资方,只要劳资合作,“自然没有利益的冲突或争执,双方的关系自然调谐”^③。这种教育固然是为了维护资本家剥削的根本企图,但其中所孕含的运用传统文化调整企业劳资关系以利生产的思想和办法确有可资研究之处。另外,宋棐卿十分重视职工的礼仪训练,比如工人见到经理和职员,职员见到经理时都有规定的问候方式和语言。这也是中华文化中重视“礼”的表现。

美国的“人群关系学”理论在1940年问世,强调企业以搞好人际关系,激发职工生产热情来提高工作效益。但在中国,这个问题早在三十年代就已受到许多民族资本家的重视。科学管理法只注意应用科学方法、制度及计件工资、超额奖励等来控制职工,而忽视了工人作为“社会人”的特征,即追求安全感、友情、归属感和受人尊重等等。如前所述,当中国企业家照搬西方经验受挫后开始意识到一个“劳资协调”、“劳资合作”的企业内部环境是科学管理成功的关键。穆藕初在二十年代便说:“惟有劳资协调,始足以维持于永久,亦惟有劳资协

①② 《东亚声》第三期,第2页。

③ 《宋棐卿剥削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页。

调,我国工业始有发展之机会。”^① 而东亚公司搞“劳资合作”是既利用和改造了封建传统中“和为贵”的思想,又否定和摒除了“个人专制”的衙门式管理习俗,从而创造出一个较理想的企业软环境。

^① 穆藕初:《劳资协调与生产》,《经济学季刊》第一卷第1期。

第七章 杜威的教育思想与 中国的学制改革

第一节 杜威的教育思想

约翰·杜威作为美国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于1919—1921年间访问中国。此行正当我国教育界对学制改革展开讨论之际。他的教育主张通过访问讲学、他的中国弟子的鼓吹得以广泛传播,对1922年的学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杜威的教育学说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公共教育虽有长足的进步,但学校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因承袭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传统,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杜威敏锐地注意到,美国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的、根本的变化。我们的教育……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彻底的变革”^①。杜威继承和发扬了欧洲教育思想中既重视个人发展的内在因素,也不忽视社会环境影响的优良传统,吸收了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① John Dewey: *School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0. p. 28.

Pierce)和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发展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针对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了自己的教育理论。

一、教育即成长

杜威首先是从社会与教育的关系角度来观察教育活动。他指出,教育具有延续社会生命的功能。就是说,教育能传递人类积累的经验,丰富人类经验的内容,增强经验指导生活、适应社会的能力,从而使社会生活得到维持和发展。教育可以划分为两大类: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前者指具有严格组织形式的学校教育,后者泛指学校以外,在社会活动和相互交往中获得经验,养成道德品质,取得技能、技巧的过程。两大类教育的共同特点是,都在对人类的生活经验进行改造。经验来自生活,改造经验必须与生活紧密结合,所以杜威总结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成长”,“教育是生活过程”。杜威还强调教育的目的和过程是一致的,“因为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成长;在它自身以外,别无目的”。^①

二、学校即社会

杜威把学校与社会加以比较后,得出结论:学校能将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为青少年提供一个简化的环境,将复杂的文化分层次、分步骤、分阶段,区别精华糟粕,不受外界干扰地加以吸收。为了让学校发挥上述功能,他提出学校应该“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学校应办成社会的“雏形”或“缩影”。社会上的各种机构在学校里都可以

^①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 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7. p. 62.

模拟,使学生在学校里就可以接触到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由此塑造青少年心灵”^①。杜威将实用技术引进学校,并不是把它作为职业训练,而是让儿童对于生产过程有比较具体的了解。他想让学校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生活的真正形式,而不是脱离生活的学习场所”。^②

三、从做中学

杜威认为,传统教学实质上是“来自上面的灌输”^③,把成人的标准、教材和方法强加于儿童,这只能“败坏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智力发展的巨大障碍”^④。他认为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改革应紧紧围绕这一目的。他把教学过程分解为与思维过程相适应的五个步骤,即:创设情景、明确问题、提出假设、解决问题、检验假设^⑤。这就是著名的从做中学的五步法。杜威把教学过程看成是“做”的过程,儿童的一切学习都来自经验,而经验的获得要通过“做”。在“做”中取得经验,从而掌握知识,培养思维能力。

四、儿童中心

在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杜威的教育理想是折衷于儿童中心与社会中心之间。由于其教育思想是对传统教育的反叛,

①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p. 145.

② 弗雷德·赫钦格等:《美国教育之演进》,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1984年版,第56页。

③ John Dewey: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p. 2.

④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p. 179.

⑤ 同上书, p. 192.

所以论及儿童需要比论及社会需要时为多。他要求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尊重儿童,依据儿童的能力、兴趣和爱好安排内容、组织活动。杜威指出,由权威者把固定不变的教材传授给学生,这不是教育,而是灌输。这是与民主社会不相容的。“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是一种革命,是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类的革命。在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他们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组织起来。”^①他要求,学习的科目必须服务于学生成长的需要,教学中要以实际的操作为主。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依照儿童的兴趣组织各种活动。教师要以一个成员的身份参加到活动之中,尽可能使学生意识不到教师的存在,使师生融为一体。他的结论是:“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②

第二节 中国学制改革的历史回顾

现代学校产生于欧洲和北美,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现代学制。我国现代学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经历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引进西学“变法图强”的转变。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启迪民智、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在废科举、兴学堂、派游学过程中,现代学制应运而生。我国最早的现代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即1902年的“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即1903年的“癸卯”学制)旨在培育人才、救亡图存,都是效法日本学制的产物。前者因不够完备而没有实行。后者,则明确地规定了

① 滕大春:《外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16页。

② John Dewey: *Children and Curriculum*, p. 86.

“癸卯学制”“对于日本学制,更加抄得完备”。在其“尚公”以使人人能爱国如家,视人如己;“尚武”以倡军国民主义,鼓励儿童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尚实”以期发达科技,课以实际与实用的教育宗旨指导下,该学制使 160 万新式学生出现,淘汰了众多八股士类,直接和间接地牵动了整个社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令形式颁布并在全国推行的学制。它从小学堂到大学堂的学习年限长达 21 年之久,加上通儒院,竟长达 26 年。这一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下的学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尽管如此,它仍具重大历史意义,因为它是我国学校从古代学校走向现代学校的第一个学制,为中国教育制度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二、壬子学制

辛亥革命后民国得以建立,在改造清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同时,改革清政府的学制也势在必行。刚从欧洲归来的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马上投入了重新制定学制的工作,经多方听取意见,于 1912 年颁布了新学制(亦称民元学制或壬子学制,见图 2)。教育宗旨改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①,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和发展个性的要求。该学制是在内战初息,全国教育各行其事近乎停顿之时颁布的,使全国教育得以统一和继续。由于处于战争年代,制定学制时没有也不可能进行较深入的社会心理研究,而采取了内“递变”清末学制,外“取法日本”,兼效法德国的简单做法。但学制在制定之初是准备“遍采欧美各国学制之长,衡以本国情形,成一最完全之学制”^②

① 《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教育杂志》第 4 卷第 7 号。

② 陶行知,《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新教育》第 4 卷第 2 期,第 24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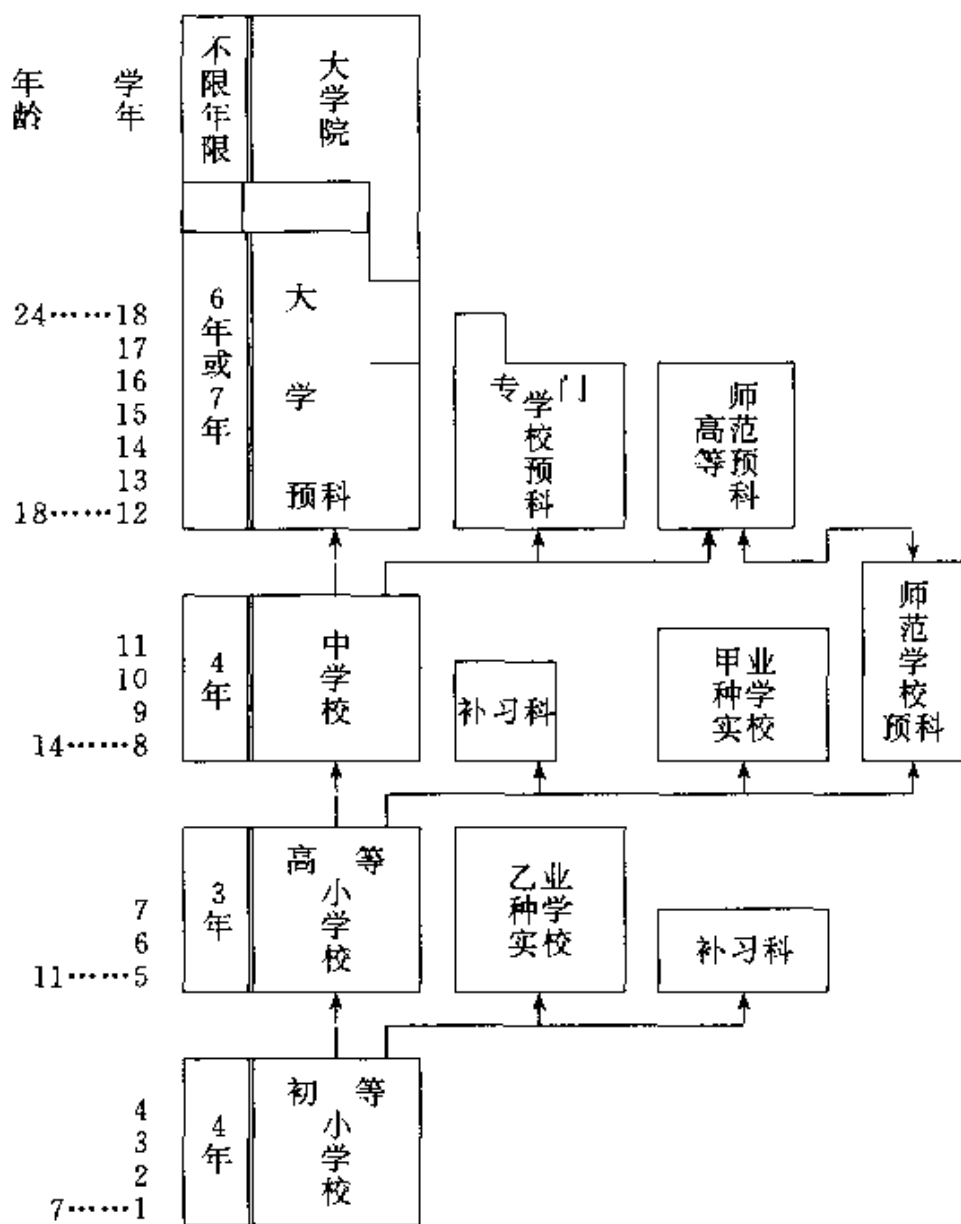


图2 壬子(1912年)学制系统图

资料来源:《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31页。

的,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从欧美归国的留学生很少有专习教育的,难以领会欧美学制的立法精神,加上欧美学制毕竟与我国实际相距甚远,结果仍是趋重于采取日本学制,而就我国实际经验,参考酌定。同时,学制还体现出模仿德国推行义务兵役制和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倾向,如教育宗旨中所谓军国民教育即是如此。这是以欣赏法德教育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为首的一批游欧归国人士引进外国先进

教育理论的结果。此学制经几年实施后,即暴露出整齐划一有余,灵活性不够的缺点。德国学制再次影响我国学制是1915年,袁世凯颁布了封建复古的《教育纲要》,仿效德国,实行中学文实分科、小学分国民学校和预备学校的双轨制,但为时很短,没有实行就随袁世凯而去了。我国学制又处于混乱状态。

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大批近代工厂的出现,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对职工文化水平、专业知识、职业训练都提出新的标准和要求。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批批中小学毕业生由于无一技之长而不断被抛进失业者的行列,正所谓“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①。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现实,要求学校为社会培养大批各级各类专门人才,要求教育授予个人谋生做事的一技之长。显然,旧学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对教育的要求,改革旧学制,建立适合新形势所需要的新学制“已成刻不容缓之势”^②,成为“教育界一致之要求”。^③

第三节 杜威教育思想对 1922 年学制的影响

1919年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后,接受北京大学、中央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和江苏教育学会的邀请,于1919年5月携夫人抵达上海,时值五四运动前夕。这次联合邀请是杜威的几个学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和《新教育》杂志的主编蒋梦麟(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等牵线促

① 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存》第1集第4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7页。

② 廖世承:《新学制与中等教育》,《新教育》第4卷第2期,第201页。

③ 汪懋祖:《对于新学制草案高等教育段质疑之点》,同上书,第196页。

成的。杜威在他的大弟子胡适陪同(兼翻译)下,在江苏、浙江、河北、辽宁、山东、山西、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州等十一个省和北京、上海作了公开讲演。他所到之处“均受教师、学生、知识分子,政府和社会领袖以及一般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名字“是中国当时每一个大城市的每一受教育的人士个个耳熟的”^①。杜威在中国活动了两年零两个月。当时,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深受群众喜爱的大量报刊杂志反复刊登杜威来华所作的报告,并向全国各学术中心散发。《新文学副刊》成为这些新刊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通常是报纸往往首先刊登杜威的讲话,于是其他各刊转载全文。继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之后,《觉悟》报及上海其他各主要副刊都报道了杜威在中原所作的学术报告。北京《晨报副刊》更是刊登了杜威在北方的几乎所有的演讲。在杜威的直接启发影响下,1919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了《平民教育》专刊^②。浙江温州一份名为《新儒家思想》的杂志甚至试图使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③。美国一记者评论道,“通过杜威一系列在华讲演译成中文,并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杜威教授及其思想深入人心。可以想见,通过这些讲演的翻译与发表,杜威教授已将其所要说的这一切传播向中国千万听众。”^④

一、杜威的中国弟子对其教育思想的传播

在中国传播杜威教育思想的主要中心有二:即北京大学和南京高师。这两座学府的校长蒋梦麟、郭秉文都是杜威亲传弟子。当杜威

① 吴俊升:《教育与文化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46页。

② 参见 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Early Republ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66.

③ 参见《新教育》第1卷第5期。

④ 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p. 30.

在北大时,其大弟子胡适使他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关系。在南京,郭秉文和南京高师教育系的同事们,尤其是陶知行(后改名为陶行知)和陈鹤琴等人在他们的学生中传播着杜威学说。于是乎,“北大成了传播杜威对中国思想影响的大本营,而南高则是他对中国教育影响的广播站。”^①

此外,还有两个学府大力传播了杜威学说,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开大学。前者后来的校长李建勋及后者当时的校长张伯苓也都是杜威的学生。经由他们及其属下逐渐扩大的师生群体的宣传和实施,杜威学说影响日益扩大。

当时,杜威教育哲学为中国所有的高等师范学校和大学教育系所接受。他划时代的著作《民本主义与教育》被采用为课本或参考书;他的主要著作有十多种被译成中文^②;更有许多期刊论文、专著和小册子专门介绍杜威的教育哲学。杜威常说的有关教育的警句,如“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教育为了生活的需要”等为中国教育界人士所熟知。

积极响应杜威来华传播其教育思想的以杜威旧日学生为主。他们大都身居教育界要职,深谙杜威理论并率先将杜威理论付诸行动,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主要有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和陈鹤琴等人。

郭秉文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杜威从教之学校)第一位获教育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于1915年担任南京高师的教务长,1919年升任为校长。在他的努力下,该校于1921年升为国立东南大学。郭

① 吴俊升:《教育与文化论文集》,第345页。

② 杜威著作有中译本的有: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School and Society*, *The Children and the Curriculum*, *My Pedagogic Creed*, *School of Tomorrow*, *Freedom and Culture*, *Sources of a Science of Education*, *How We Think*, *Ethics*, *Moral Principle in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秉文自从任南高教务长后,就注意招聘从哥伦比亚师院回来的优秀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大都是深受杜威教育哲学影响的人。如在南京高师为杜威作翻译、又积极推广杜威思想的陶行知,就是郭秉文于1917年以教育委员会主任身份访美期间直接从哥大师院新毕业生中聘请的^①。又如郭秉文为教育系聘请了陈鹤琴和郑宗海。郑曾在《新教育》杂志上撰写文章介绍杜威^②,欢迎杜威到中国来,并在杭州为杜威作过翻译^③。他在以后的十年间发表过一系列关于杜威的文章。郭秉文还聘任了曾受过杜威影响的哥大哲学博士陆志韦为东南大学心理系主任。文学系一位哲学家刘伯明受聘后,曾在《新教育》上发表了介绍杜威的文章、在南高为杜威讲演作翻译,还把杜威著作《思维术》一书译成了中文^④。郭秉文及他任用的这些人才对杜威教育思想在华传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蒋梦麟1908年赴美留学,1912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教育系,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1917年学成归国,翌年在杜威启发下,创办《新教育》杂志,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教育部长等职。他“在教学法上主张自发自动,强调儿童的需要,拥护杜威教授在他的《民主与教育》一书中所提出的主张”^⑤。通过《新教育》杂志,他向人们宣传杜威的思想,认为:“中国儿童应该从不合现代需要的刻板的行为规律中解放出来。我们应该诱导儿童自行思想,协助他们根据他们本身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大人的需要,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应该启发儿童对自然环境的兴趣。根据儿童心理学的原则,儿童只能看做儿童,他不是一个小大人,不能单拿知识来填,更不应该拿书本来填,教

① 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p. 57.

② 参见《新教育》第1卷第2期。

③ 参见 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附录 A, p. 163.

④ 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p. 163.

⑤ 蒋梦麟:《西潮》,磨剑堂香港1960年版,第151页。

育应该帮助儿童在心智、身体和团体活动各方面成长。”^① 蒋梦麟宣传杜威思想,扩大杜威影响是想以此来推进中国的新教育改革和社会变革。为此,他“公开引用杜威的理论作为他的根据”,“又经常引用杜威论述科学在现代教育中作用的文章”^②来警醒民众。他的所作所为极有影响力。

陈鹤琴,1918年在哥大获教育硕士学位后回国任南京高师教育系教授。他在革新上海租界小学教育方面颇有成效,后来又从事幼稚师范教育工作。经过长期实验和实践,在广泛深入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和儿童各年龄阶段心理特征的基础上,陈鹤琴提出了“活教育”理论。这是他教育思想的概括和核心,也是他几乎全部接受杜威教育学说的反映。“活教育”直接反映杜威“教育就是成长,在它自身之外,别无目的”的主张,以“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③作为其目的论内容。为此目的,根据杜威儿童中心课程论,陈鹤琴发展了自己的活教育课程论,即“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④。他还继承了杜威“从做中学”的儿童中心教学方法论,并发展成自己的“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教学方法,主张“一切活动一切设施以儿童为中心为主体,学校里一切活动差不多都是儿童的活动;一切教学集中在做,做中学和做中教;课程和教材都应根据儿童心理和社会需要去编订或选定,具有伸缩性;学校是社会的中心,师生集中力量改造环境服务社会”^⑤。陈鹤琴活教育理论表明,杜威教育学说对他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入的。陈鹤琴本人也不止一次地表明他的活教育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关系,他曾表示:“我提倡的活教育是和杜威的学说配合的,因为活教育和杜威学说,其出发点相同,其所走的路

① 蒋梦麟:《西潮》,磨剑堂香港1960年版,第152页。

② 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p64.

③④⑤ 陈鹤琴著:《活教育:理论与实施》,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印行,第2页。

子相同,其所用的方法也相同。”^①但如果将这里提到的几个“相同”理解为活教育理论是对杜威理论的因循,则过于简单化、形式化了。事实上,陈鹤琴认同的是杜威理论的内核,是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向旧教育挑战的精神,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辩证因素,认同的是一种教育发展的时代方向。正如陈鹤琴自己所表明的:“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儿童教育思潮的趋势和杜威的学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提倡的活教育是接受着世界新教育的思潮,并和杜威一样的创造理论,也创造方法。”^②

从二十年代开始,陈鹤琴便力图将杜威教育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求把中国传统的死教育改造成为活教育。因此,他在引用杜威学说的概念对活教育进行说明的同时,也强调自己理论的特色之处。如他在解释活教育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时说:“这一原则可说是脱胎于杜威博士当年在芝加哥所主张的‘从做中学’。但比较杜氏的主张更进了一步,不但是要在做中学,还要在做中教,不但要在做中教与学,还要不断地在做中争取进步。”^③但由于杜威理论本身就存在缺陷,陈鹤琴的活教育也因此继承下来了某些不合理因素,如对直接认识和生活经验的过分强调,忽视系统的、有充分根据的课程讲授,不利于儿童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和一定思维结构逻辑和推理能力的形成等。尽管如此,陈鹤琴的主张在幼儿教育、初中等教育和幼儿师范教育界仍得到了积极的赞同和广泛的实验^④。他是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执行得最彻底、传播得最广泛的杜威门徒之一,他使杜威学说从对初等教育至对幼儿教育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① 陈鹤琴著:《活教育:理论与实施》,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印行,第4页。

② 《陈鹤琴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50页。

③ 同上书,第366页。

④ 瞿葆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教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6页。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杜威访华期间及离华后,有许多全国性的教育团体也扩大了杜威学说的影响。中国教育促进会在杜威来华的同一年创立,创办人为蔡元培、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宣传此会主张的刊物即《新教育》杂志。该会通过蒋、陶等人领导下的活动及其会刊,为推广杜威学说起了重要作用。全国教育联合会是各省教育会的联合组织,以江苏省教育会为其核心。该会接受了杜威教育学说,并将其贯彻于对教改的建议中,由教育部公布的1922年学制实际上就是根据该会的建议而制定的。此外,中国教育改进社也是扩展杜威影响的有力团体之一,其总干事便是实践杜威教育理论最得力的陶行知。这些社团互相配合起来,为传播杜威思想打开通路,又通过各自的宣传活动,将杜威影响波及全社会,并以此掀起了新教育改革的高潮。

二、杜威的影响在新学制中的表现

(一) 壬戌学制

1922年学制改革发轫于1915年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届大会上,湖南省教育会提出改革学制系统案,开了学制改革之先声。1918年前后,大批留美学生回国,其中不少人在美国专习教育。据调查,1918年95名归国留美生中从事教育的就达49人,超过半数以上^①。而当时留美学生博士论文中教育类所占比重高达22%^②。这批人中就有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等五四时期大学及新学科的创建人。他们对美国学制及教育思想的介绍与宣传,加上杜威来华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教育制度的渲染,对我国教育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我国出现了追随美国、改革教育、改革学制的热潮。

^① 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

^② 同上书,第335—336页表。

学制改革的高潮分别是 1919、1920、1921、1922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六、七、八届大会对革新学制的大讨论。全国教育联合会经过历时 7 年的酝酿与反复广泛讨论，于 1922 年形成学制系统草案，并由教育部于 11 月正式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即壬戌新学制(见图 3)。

七条标准：

- (一) 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
- (二) 发挥平民教育精神；
- (三) 谋个性之发展；
- (四) 注意国民经济力；
- (五) 注意生活教育；
- (六) 使教育易于普及；
- (七) 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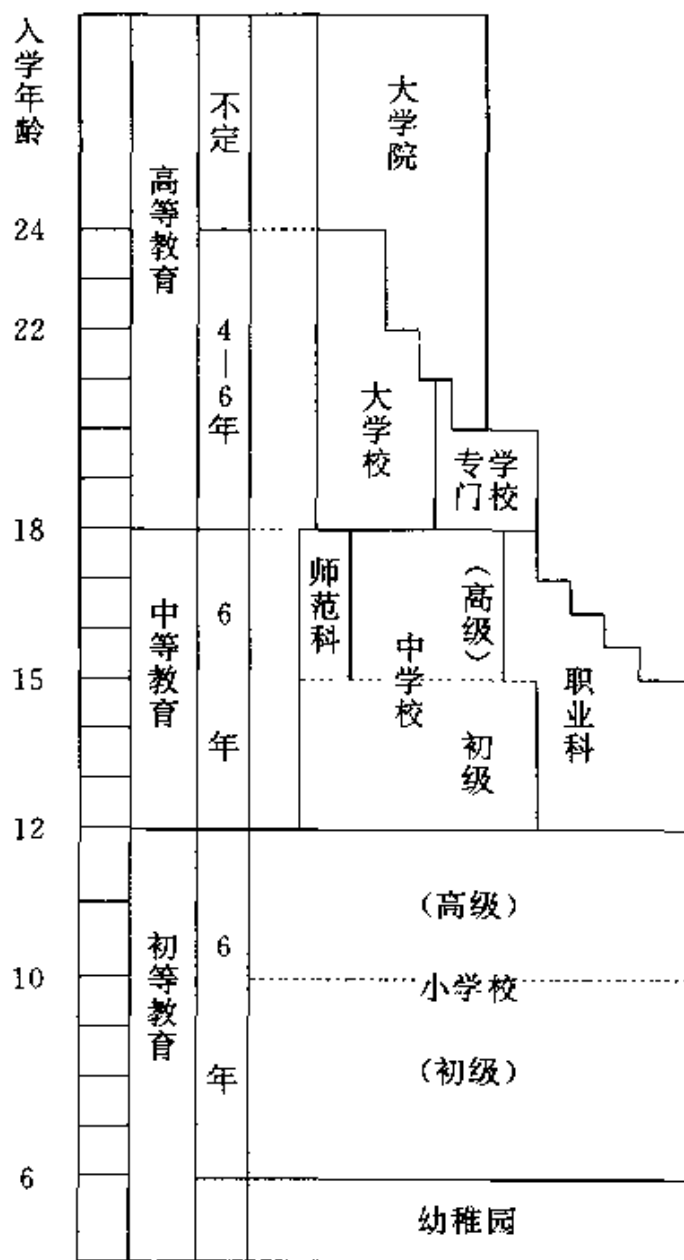


图 3 壬戌(1922年)学制七条标准及系统图

资料来源：《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 32 页。

新学制提出七项标准作为学制制定的指导原则,是针对旧制的实弊提出的,说明新学制制定的目的就是要克服旧制的“不管社会需要,不管地方情形,不管学生个性”^①的弊端。与1912年壬子学制相比较,它有以下特点:(1)小学由旧制的七年改为六年,比旧制减少一年;(2)中学制度是新制的精粹,和旧制相比,中学由旧制的四年一贯制改为初高两级各三年的三三制,由旧制的单一的升学预备改为升学与谋生兼顾,由旧制单一的普通中学改为初中为普通中学,高中为分科中学,由旧制的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并规定在高中实行选科制;(3)大学取消预科实行选科制;(4)注意根据地方情形,允许灵活采取措施,对旧制的整齐划一的弊端有所克服,比旧制前进一大步。

这一新学制是“五四”前后我国将近十年教育改革的总结,也是学习美国当时一些州已实行了十余年的六三三制,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结晶,是教育界根据我国实际教学,长期酝酿,集思广益的综合成果,“颇有独到之处”^②。该学制在后来实行中也碰到许多实际困难,如规定采用选科制,其用意是为了学生个性易于发展,但学校“因经济拮据”,“不能彻底实施,而且发生种种流弊”^③。新学制颁布三年后,初中毕业学生该升高中了,但“各省区设高级中学者,尚属寥寥”,致使“学生无级可升”^④。尽管如此,新学制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国民党统治时期虽几经修改,但基本沿用此学制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二) 杜威教育理论对新学制的影响

1. 新学制略去了教育宗旨。1919年4月,教育部召集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是由教育部指聘的66位教育界知名人

① 朱叔源:《改良现行学制的意见》,《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3期。

② 陶行知:《我们对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新教育》第4卷第2期,第127页。

③ 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第94页。

④ 《教育部通电新学制之变通办法》,《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5期。

士,其中包括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在审议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时,与会众人认为该宗旨已经过时,不合民本主义的潮流,提出把教育宗旨改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①。同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第五届年会,讨论革新学校教育方法,改革旧学制等问题。杜威前往参加,并作了《教育上的实验态度》的讲演。杜威认为教育目的从属于教育过程,目的在于培养适应环境的人,反对任何外加的教育目的。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会议通过“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的议案,认为“从前教育,只知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如何教,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施教者,不应特定一宗旨或主义,束缚受教育者。‘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二语,经本会讨论,认为适合教育本义”^②。可见,这一点与杜威强调培养学生“养成智慧个性”、“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如出一辙。教育宗旨由忠君爱国转变为强调健全人格和共和精神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表明中国教育开始注意个性发展与社会改革的结合。教育部在1922年制定新学制系统改革令时,根据上述教育团体的建议,在改革令中略去教育宗旨或教育目的,而只提出教育标准七条。这种改变表明杜威的教育目的论已发生了实际影响。

2. 新学制系统采取了美国六三三制度。其所公布的七条教育标准(见图3)中,第四、六、七条是尽量照顾实际情况的意思,第一条“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是杜威教育理论中学校即社会,要求学校教育反映社会发展,适应社会需要培养人才之主张的反映;第二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又是杜威在华着重讲授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直接陈述;第三条“谋个性之发展”则不仅是杜氏倡导儿童个性自由发

① 舒新城主编:《现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113—120页。

② 《中华教育界》第8卷第6期。

展,教育即生长的主张之表现,而且是其教育哲学的重要观念;第五条“注重生活教育”自然也是杜威教育哲学的因袭,杜威强调教育就是生活,应把社会生活的内容当作教育的主要内容,强调学生应当同学校外的生活连贯一气。这七项教育标准充分反映了杜威的教育主张。

3. 新学制课程改组以儿童为中心。1922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济南开会,讨论学制改革与课程改组。胡适曾参加此会,会议对新学制建议的第四条是:“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在改革学制时必须特别注意儿童的个性差异。因此中等与高等教育必须采选课制。而对于所有小学的分班与升班必须采弹性原则。”胡适评论说:“在1923年颁布1919年修正的新课程中,儿童为学校的中心这一观念是特别注重的。杜威哲学的影响很容易从课程改订中看出。”^①从高中普通科文、理两组的课程设计和学分分配情况(见表30)就可看出这种影响。从

表 30 高中普通科文、理两组课程设计和学分分配表(1922年)

高中普通科文科组学科和学分分配表

科目	公共必修课							分科专修课					纯粹选修课	
	一、 国语	二、 外国语	三、 人生哲学	四、 社会问题	五、 文化史	六、 科学概论	七、 体育 甲、 卫生法 乙、 健身法 丙、 其他运动	必修的				选修的		
								特设语文	心理学初步	伦理学初步	社会学之一种			自然科学或数学之一种
学分	16	16	4	6	9	6	10	8	3	3	4 (至少)	6 (至少)	32 (或更多)	30(或更少)

^① 胡适:《对于新学制的感想》,《新教育》第4卷第2期,第188页。

高中普通理科组学科和学分分配表

科目	公共必修课							分科专修课						纯粹选修课	
	一、 国语	二、 外国语	三、 人生哲学	四、 社会问题	五、 文化史	六、 科学概论	七、 体育同第一组	必修的					选修的		
								三角	高中几何	高中代数	解析几何大意	用器画			(选习两种,每种六学分)
学分	16	16	4	6	6	6	10	3	6	6	3	4	12 (至少)	30 (或更多)	30(或更少)

资料来源: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文、理两组课程整个设置和学分分配情况看,文理两组课程相差悬殊,特别是文科组理科课程仅占8%,而理科组文科课程也占了40%,重文轻理的倾向较为严重;必修课偏重基础理论知识的教育,而选修课则侧重应用知识的普及,两组必修课所占学分都少,表现出重应用轻基础的特点,这两组的选修课比例太大,过多注意了学生主动性的发挥,儿童中心主义又比较突出。由此可看出,这次学制的课程设置重文轻理,重应用轻基础,突出儿童中心主义的特点是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集中反映。

4. 实用主义的新教学法被采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会议建议以杜威的主张为改革教学法的指导原则^①,在1921年的会议中,全国教育联合会主张在小学推行设计教学法^②。设计教学法是杜威

^① 《教育杂志》1919年第11期。

^② 《教育杂志》1921年第11期。

的弟子克伯屈根据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创立的,它主张由学生自发地决定学习目的和内容,在学生自己设计、自己负责实行的单元活动中,获得有关的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调教师的任务在于利用环境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选择活动所需的教材等。这种方法比较重视个人的需要与个性发展,注意学生的兴趣和爱好,重视发展个人的创造才能,是杜威儿童中心主义、倡导儿童个性自由发展、教育即生长等理论的实际运用,在南京、苏州、南通以及北京均有一些学校提倡并实行^①。设计教学法的广泛推行,使杜威教育理论被具体注入到实际教学中,杜威的影响也随之深入到了各所学校(但由于这种方法贬低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妨碍学生获得系统知识,对学生智力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三十年代后就不多采用了)。

5. 杜威式实验学校纷纷成立。以杜威在芝加哥所创设的实验学校为模式,中国有许多实验学校在杜威访华后纷纷设立。第一所实验学校便是俞予夷所主持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他首先采用设计教学法,根据儿童中心的原则改组课程,使南京高师附小转变为中国第一所杜威式实验学校,而且这所学校渐渐成为杜威式实验学校的范本。各地小学教育人士纷纷前来该校参观,回去后对这种新教法新课程加以模仿,使各地小学多少具有实验性质。而若干省份著名的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甚至都改称为实验学校或直称为杜威学校。这些学校根据杜威的教育理论组织教学,广泛重视儿童本位的观点,采用设计教学法,把杜威教育理论贯彻到具体教学工作中去。

6. 杜威学生自治的主张,作为德育的一种教育措施得到广泛提

^① 周鸿志:《关于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影响的研究》,《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倡。根据其提倡的儿童个性发展,儿童中心观念和教育即生长等理论,杜威在华讲演中推许学生自治制度^①。在他的影响下,全国教育联合会在1920年曾经建议推广学生自治实施的准则。在其1922年的会议中,重新肯定学生自治为德育的目标之一^②。于是在各级学校学生自治得到提倡,改变了过去学生完全受管教的被动地位。各级学校纷纷设立学生自治会,布置学生自治活动的环境,如开设“学生银行”、“商店”、“邮局”、“市政府”等,搞所谓“学校社会化”,让学生在活动中培养责任心和自治能力,学生自治盛极一时。张伯苓领导下的南开学校把学生自治与学生社团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学生团体自治活动内容上分两类,一类是有关学问生活的,如各学科的学会;一类是非学问生活的,如学生自治会等事业性组织,新剧团等娱乐性组织等。对于学生团体开展活动,学校尽量提供方便,或资助或安排活动场所。据1922年统计,学校共为社团活动安排265次会场,除7、8月暑假没有集会外,每月平均26.5次,最高月达43次^③。而张伯苓也认为学生成立学会、团体,有利于他们“共同生活”,“发展集合性及作事心”^④,形成共同的集体观念,使“他们的精神容易团聚,他们的责任也容易个人分担”^⑤。同时,学生有了自己的小团体,“可借此作发展个性的机会”^⑥。张伯苓高度评价学生社团的作用,提出“他们的力量可以超过本校的管理员。这种令人惊奇的业绩,我敢说是我们南开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南开的教育方法”^⑦。学生自治的盛行甚至趋向

① 杜威讲《学生自治》,《新教育》第2卷第2期,第163—166页;讲《学生自治的组织》,《晨报副刊》,1920年第9期,第16—19页;讲《自动与自治》,《晨报副刊》,1921年第5期,第3—6页。

② 见 Woodhead, H. G. W. ed., *China Year Book*, The Tientsin Press, 1923.

③ 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④ 王文俊等主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

⑤⑥⑦ 同上书,第85—86页。

极端,以至成为“五四”以来学潮的策动力之一,而且曾有人将学潮归咎于杜威的教育学说。^①

从上述情况可见杜威的教育学说在中国的影响是普遍而又深入的,正如胡适在杜威离华时说:“自从中国和西方接触以来从没有一个外国人像杜威对中国思想有这样大的影响。”^②

三、杜威的追随者对新学制的影响

杜威教育思想通过对参与制定学制的主要人物及教育界颇有影响的带头人思想的影响,对学制和中国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直接参与制定学制的人举不胜数。笔者拟以被推为学制会议主席的蔡元培、新学制主要起草人胡适及与会并颇有影响力的陶行知,还有虽未直接参与学制制定,但在教育界举足轻重,率先投入实施学制的张伯苓等为对象加以说明。

蔡元培是较早接受并宣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之一。从1912年起,他就一再通过文章和演说,向国内教育界介绍杜威,说他创造的“实用主义尝力言学校教课与社会隔绝之害”^③,是“即工即学主义”,经过试验,“很有成效”,鼓励教育界“试试杜威博士的新主义”^④。在他任民国教育总长后,为制定民元学制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并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作为五育之一。他说当时中国国家穷,失业人很多,世界上又在“武力”和“财力”上展开竞争,武力自卫也得发展财力,于是从“美洲德费伊(杜威)派学说中,吸取了‘实利主义’教育观点”,认为这个“创于美洲,而近亦盛于欧洲”的实

① 蒋梦麟:《西潮》,第128—129页。

② 《胡适文存》第1集第2卷,第535页。

③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3页。

④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利主义教育,也是中国教育“当务之急”^①。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内时,十分称许平民教育的教育平等,说“平等者,破除阶级而非消灭个性……解放个人之束缚,而一任其自由发展”^②。在新教育改革中,蔡元培认为要不要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是新旧教育的根本分歧所在。他说:“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③,指出新教育是尚自然和展个性,是以儿童为本位的。他赞成做教师的决定教育方法时不自存成见,而是站在儿童地位去体验^④,教育儿童要根据各人的个性,去帮助他们作业^⑤,要用从做中学的办法,让儿童通过工作和活动得到知识学问^⑥。蔡元培作为学制会议主席,在主持制定学制时,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带入学制中。新学制的七项标准虽为胡适所改定,但同时也体现出作为会议主导者蔡元培的思想倾向。然而,蔡元培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教育并不因其弊害甚多就持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而主张“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⑦。他在充分肯定西方教育长处的同时,也不失冷静,曾指出“小学教育既以遵循天性、养成人格为本义,则于身、心两方面,决不可有偏废,而且不可不使为一致之调和”。他还清楚地认识到实用主义“以致用诸科为足尽教育之能事”^⑧,摒弃修养心性的弊病,欲以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格教育来弥补这一点,这正是其融合中西教育思想的体现。他在对待中西教育问题上采取的平和态度,既不彻底否定中国旧教育,也不偏爱外国教育,而主张相互取长补短的客观态度,超然于时人之上,对引进吸取外来文化教育极具借鉴价值。

① 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教育论集》,第42页。

②③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④ 同上书,第174页。

⑤⑥ 同上书,第175页。

⑦ 同上书,第210页。

⑧ 同上书,第412页。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从师于杜威,对“杜威的多谈科学少谈宗教的更接近机会主义的思想方式比较有兴趣”^①,受实用主义思想影响很大。他几乎全盘接受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并大力宣扬。他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写道:“我这篇所说杜威的新教育理论,千言万语,只是要打破从前的阶级教育,归到平民主义教育的两大条件。对于教育制度,杜威的两大主张是:(1)学校自身须是一种社会生活,须有社会生活所应有的种种条件;(2)学校里的学业须和学校外的生活连贯一气。总而言之,平民主义教育的根本观念是:教育即生活,即是继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要使经验的意义格外增加,要使个人主宰后来经验的能力格外增加。”^② 胡适以杜威理论为指导思想,观察分析和研究教育问题。当他看到内地办学多半不顾实际生活需要,“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干涉”,便竭力强调教育必须与实际生活需要密切配合,“切莫注意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③。胡适提倡杜威教育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反映在他参与起草的壬戌学制上。从胡适所改定的学制“标准”中可以看出,其所列七项标准中竟有四项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在整个学制中也有充分体现。如加强职业教育,实施选课制和弹性制,下放大学预科至高级中学等都是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要求而提出的,实际上也是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实践的直接影响。胡适从杜威儿童中心主义与学校即社会的基本观点出发,对有关选课制和弹性制的规定十分赞赏,他说:“新学制第四条云:‘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采用弹性制。’……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他的弹性。他的第三第五条是‘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

①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②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③ 胡适：《归国杂感》，《新教育》第4卷第2期。

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这就是弹性。学校的种类加多了，中等学校的种类更多了，使各地方可按照各地方的需要与能力，兴办相当的学校……中国这样广大的区域，这样种种不同的地方情形，不同的生活状况，只有五花八门的弹性制最适用。”^①

杜威的中国弟子中最富于创造性的是陶行知^②。陶是杜威的中国信徒中第一个有着自己的一套教育理论和实践，并第一个探索着把杜威的思想从城市里的大学扩大到乡村学校的人^③。他的晓庄试验是运用杜威的教育观点进行的教育实践，使杜威教育思想普及到许多模仿它的师范学校和乡村学校中。起初，陶行知自称是把杜威的教育理论作为“文明园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到中国来的东洋车夫之一”，后来发现“此路不通”，因此，“把杜威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④。杜威所要面对和所要解决的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而陶行知面对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把杜威的办法搬到中国来解决普及教育的问题行不通，于是在碰壁后，对杜威的东西加以改造，提出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从全盘推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到翻了半个筋斗变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找到了他自己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方法^⑤，为此，陶行知花了10年时间。此间，他代表中华教育改进社被推为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起草委员，并将杜威思想带到了学制中。他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新学制和师范教育》等文章中极力主张以“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

① 胡适：《对于新学制的感想》，《新教育》第4卷第2期，第188页。

② John K.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 - 1985*, Cambridge, Harper & Row, pub, 1986, p186.

③ 周洪宇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9页。

④ 《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⑤ 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p93.

合事业学问需求”^①,富有“独创”性作为制定学制的原则,同时考察“社会个人之需要能力”,“应社会与个人的需要”^②,使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更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这些思想,“在制定学制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虑和尊重”。因此,陶行知“对这个学制还是比较满意的”^③,认为“新学制比现行学制优点甚多”^④。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在直接应用杜威理论碰壁后,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批判地吸收杜威理论中合理因素,从而走上了一条自己开辟的具有鲜明人民性和中国特色的道路。在思想上逐步摆脱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从改良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教育界颇有影响并率先试行新学制的伟大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对推广杜威教育思想和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张伯苓先生也曾在哥大亲受杜威教诲,“他的教育实践是提倡学校要联合社会,书本知识要联系实际,发展个性以及崇尚自然,明显地受到杜威教育理论的影响”^⑤,特别是学校的自然科学课程,基本上是按杜威思想指导进行的。如高一的普通化学强调“注重日常生活中关于化学之普通事实,藉以引起研究化学之兴味”。物理课规定“使学生了解其周围之自然环境与其生活之关系,且更使之能知利用自然,改造环境”,“养成学生有科学之态度,使之思想有系统,观察正确,判断忠实,同时更培养其独立之创造能力”^⑥。这些体现杜威思想的教学指导思想,如创造性思维能力,科学文化知识和联系实际生活与自然,发展个性,献身科学的精神,也正是南开办学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指

① 陶行知:《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新教育》第4卷第2期,第130页。

② 陶行知:《评学制草案标准》,同上刊,第132页。

③ 董富勇、胡国枢编著,《陶行知传》,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④ 《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191页。

⑤ 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第55页。

⑥ 《南开学校中学部一览》,天成印字馆1929年版。

导思想的引导和张先生的带领下,南开率先试行新学制,将“南开现制种种缺憾……皆一举而扫空之”,强调“学校造就人才,务使学有所用”,“普通各科,职在预备;职业各科,务求实用”,并采用分科制、选科制和学分制,“南开新制,易稿数次,会议十数,学者之理论,专家之经验,社会与个人之需要,均面面顾到”^①。经过这样的教育改革,南开的教学迈上了现代教育之路。南开上述教学指导思想和率先扫空旧制采用新制,使学生不仅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而且受到科学理性精神的陶冶,使学生具有视野开阔、基础厚实、适应性强及后劲足的优点。南开历史上涌现出一批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不能不说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四、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及其局限

(一) 原因

杜威教育思想在五四运动前后得以广泛传播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 它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进步性和实用性,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资产阶级教育改革的需要。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既需要反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思想,又需要进行改革的理论指导。杜威的教育思想以反传统为目标,强调教育必须适应儿童身心的发展。这显然有助于冲决封建教育的网罗;杜威把教育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认为自由教育是建立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为正在摸索前进的中国的改革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2. 杜威来华之际,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杜威教育理论的来源——康德、黑格尔、斯宾

^① 喻传鉴:《南开学校之三三制课程》,《新教育》第4卷第5期,第864、871、873页。

赛、达尔文思想已经被介绍到中国,这为杜威思想的传播作好了铺垫。加之,杜威关于在做中学的思想与王阳明所倡导的“知行合一”说颇为相似,这就为中国知识界接受杜威的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 杜威来华之前,他的中国弟子和一些报刊已经对杜威本人和他的思想作了不少介绍和宣传。蒋梦麟创办和主编的《新教育》以“个性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主旨,“拥护杜威教授在他的《民主与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张”^①。该刊第三期为“杜威专号”。杜威的中国弟子胡适、刘伯明、蒋梦麟都在专号上发表文章介绍杜威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哲学。胡适还作了四次关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演讲。

4. 二十世纪以来,美国在华的势力日益加强,文化影响随之而扩大,这也为杜威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缺陷及局限性

在看到杜威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它的缺陷和局限性。

1. 首先是杜威教育理论本身的缺陷。杜威主张教育即生长,教育无目的,其实生长本身何尝不是一种目的,更何况杜威一直把教育作为建设理想民主社会的手段,从而在理论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总是要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任何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必然要求有一与其政权性质相适应的教育宗旨,规定相应的培养目标,培养适合其需要的人才。美国是一个没有封建传统的国家,相对于欧洲而言,等级观念淡薄,社会流动性大,又有一个数量很大的中间阶层,阶级分化和对立的状态容易被掩盖。杜威鼓吹平民教育或民主教育是美国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也是中产阶级在教育方面的一种理想。这一理论很适合中国改良主义者的口味,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政权更替频繁,没有一个号令全国政府,无暇顾及这

^① 蒋梦麟:《西潮》,第118页。

类长远建设的问题,故而被接受下来。所以一当北伐结束,国民党政府开始巩固政权,立即着手废止教育无目的论的提法,代之以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①

为了贯彻教育即生长的主张,杜威在中小学教育中实行从做中学的活动课程和设计教学法。对于各门学科的知识积累及其系统组织结构没有给予充分地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有系统地学习知识和推理训练。“儿童从开设模拟商店和银行确可学到不少关于数学的知识,可是单靠这些,儿童得不到所需的对数学的深入了解。他们从扮演一出戏中确可学到某些历史知识,但这不能代替对历史的系统学习。这种学习太漫无目的,而所学到的只是东鳞西爪,不能把握基本原则。”^②

2. 实现杜威教育主张的前提之一,是必须有较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不但要有丰富的知识和教学经验,而且能融汇贯通杜威的思想,因时因地制宜将杜威的理论原则付诸实施。此外还需要有充分的教学设施。在物质条件优越,教育水平较高的美国尚难以满足杜威的要求,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不啻于缘木求鱼。

3. 杜威的追随者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缺乏正确的态度与方法。杜威在华的弟子并没有把握住杜威理论精髓——联系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杜威将原来对立的一些范畴,如儿童与课程、学校与社会纳入他所创立的体系使之相互包容、联系。他在强调一个方面的时候,从未忽略与之相联系甚至相对立的另一个方面。例如他在强调儿童兴趣、独创精神和满足其个性发展要求时,并没有忘却纪律、权威和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4页。

② Boyd H. Bode; *Modern Educational theories*, N. Y., the Macmillan Co., 1932, p. 150-151.

教师的主导作用。杜威的中国弟子对他的联系原则大多没有真正的领会。在实践中往往因为走极端而碰壁。

杜威的弟子和追随者在移植杜威思想时存在着拿来主义的倾向。引进模仿多,借鉴融和少,创造转化更少。模仿作为一种特殊的学习手段不能全然摒弃,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学习手段,因为国情不一样,各自的条件不同,别人的东西绝不是通过模仿而能对自己完全适用的。因此,向别人学习的最佳方式应该是借鉴,即以他人之事为镜子同自己对照比较,以取长补短,也就是立足自身,主动选取对自己有用并适用的东西,摒弃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然而,二十年代的中国教育从体系结构、教育宗旨、基本观点到教学方式、教育教学内容都倾向于模仿,一味引进,不加选择,不加摒弃,将杜威教育思想中合理的、不合理的,有益的、有害的全都吸收下来,使教育取得近代化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学生知识缺乏系统性、学习上放任自流、教师作用遭贬低等严重问题,给我国教育的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4. 中国固有的社会环境也注定了杜威教育思想难以在中国开花结果。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逐渐有所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比重日益增长,但就总体而言,中国仍然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家,人口90%以上是农民,传统的生活习惯也是以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社会秩序为背景而形成的。而杜威教育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杜威的中国追随者们却无视这些差别,全面否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旧教育传统,一味地模仿美国,全盘引进资本主义的教育。由于基本上缺乏维持这种资本主义教育的社会经济基础,这种全盘引入的教育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必然会暴露出各种矛盾和问题。

杜威教育理论的实施是要以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全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与重视为前提的,而当时中国社会政治不安定,特别是因军

军阀混战而内乱频发(据统计,从1912年到1928年的17年间,主要的内乱就发生了11次,直接波及的省次就有83个)。这种混战直接冲击民众的生活,民众对学校教育缺乏信心,教育也因军阀混战陷于混乱。内乱频发导致军费剧增,教育经费无保障,据统计,国家军费的比例占总支出的72%,教育经费只不过占1%^①,甚至连这点少得可怜的经费也常被占用,教育遭到极大破坏。

5.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站到了杜威的对立面,使杜威的影响逐渐削弱。杜威及其门徒将极有效力的批评旧文化传统的方法交到中国知识分子手中,却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取而代之的新思想和价值体系,使其可根据这一体系来订立政治与社会改造的方案。“和杜威的广泛的社会哲学相反,共产主义理论供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号称科学的、也是以唯物主义的和反形而上学主义解释人生的一种体系,也赋予了青年优秀分子一种历史性的既定任务”^②。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便开始输入自己的哲学和政治体系,把民主和自由的口号转为自己的口号,逐渐赢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

五、杜威教育思想在华传播的启示

杜威教育思想得以在二十世纪前期广泛传播于中国,并留下深刻影响,至少给我们带来如下一些教训与启示:

第一,文化教育的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教育的改革与引进必须与社会经

① 阿部洋:《舒新城的中国教育近代化论》,《华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

② Franz H. Michael and George E. Taylor, *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 N. Y., Henry Holt, 1956, p. 232-235.

济政治发展相适应,寄希望于单方面的改革,不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还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二十年代引进的资本主义教育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阻碍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状况成了发展资本主义近代教育的绊脚石,仅通过教育改革来改革全社会只能遭到失败。教育现代化改革的深化,只有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同步进行,才能有所作为,有所前进。

第二,教育的现代化与文化教育交流,既要借助传统优秀文化的支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放眼世界,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结合中国实际,使之本土化。任何一种文化,如果它要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着,其最基本的就是必须保存其独特性,否则,就只是历史的陈迹,而不能作为现实的文化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起作用。对待外来东西的正确态度和方式只能是民族化,即把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合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养料和转化契机。继承民族文化并不意味着兼收并蓄,而是批判地挖掘,积极地创新。这种继承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继承本国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二是断承已经民族化了的外来文化。遗憾的是,当年我们引进杜威学说时,把中国值得保存和发扬的东西连同整个传统教育抛在一边,对传统否定过多。正所谓“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历史发展证明:没有积累就无从继承,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和创新。这就是成功的经验,也是失败的教训。

第三,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必须有强烈的时代感,只有及时了解别人最新的研究成果,才能站在别人的肩头上攀登,尽快赶上和超过别人。同时也应看到,教育不同于其他科学技术,教育的对象是人,人的培养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等特点,一旦失误,不但误人子弟,而且危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对外来的学说,必须在全面、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鉴别、选择和取舍,要由点到面,

作科学的试验和评估,决不能急于下结论,决不能一哄而上,大起大落,必须把握好快与慢之间如何“适度”的问题。二十年代对杜威教育理论的引进便是采取片面追求短期效果的急功好利的态度,追求轰动效应,不利于深入了解当时西方教育改革的历史和理论基础,不利于认识我国教育潜在的一些根本问题和建设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因而对杜威学说的实施产生了误解、曲解。

第四,二十年代杜威对华产生的影响与我国对其学说引进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跨文化交流中的结合点问题。所谓结合点,简单地说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容点和互补点,其核心问题就是异质文化在本土化中的生长点。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只有在本土文化中找到生长点,才能生根、开花、结果,最终被接受下来,融合进来,成为本土文化的新的营养和有机成分。就是说,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结合,不是照搬而是一种选择,不是叠加而是重构,不是焊接而是熔铸,不是同化而是内化,不是改造而是创新。探索和把握跨文化交流的结合点,始终离不开各文化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取向及其在确定结合点中的判断和选择功能。任何一个文化主体在确定跨文化交流结合点时,都要自觉不自觉地遵循文化主体的选择性和文化发展客观规定性的统一。任何违背这个统一性的做法,不仅容易使跨文化交流走进误区,而且往往阻碍本土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发展。这在二十年代引进杜威学说过程中是有充分体现的,不加选择,不加融合地被直接引进的杜威学说,还来不及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土壤中找到生长点便被全盘接受下来,致使其在中国本土固有的社会环境的土壤中无法开花结果。中国人从近百年来探索中西文化交流中清楚地看到,对不同文化结合点的认识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把是否有利于本国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否有利于推动人

类的和平和发展,作为跨文化交流的结合点的标准和依据。根据这个标准,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都要吸收,这是中国文化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一次崭新的更高层次的超越。

杜威教育学说传入的历史反思,给予我们一个十分深刻而珍贵的启示,这就是:立足本国,面向世界,超越传统,创新领先,是我国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立足本国国情,继承民族传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发展对外文化交流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以消极的防范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是应该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开放的胸襟,面对挑战,广采博取别人的长处,实现自身的变异和革新,以获得与外来文化抗衡的力量,真正保持自身的独立和生存。

第八章 美国私人基金会与中美文化交流

第一节 美国现代私人基金会

一、兴 起

美国现代基金会是美国私人财富集中与欧洲慈善事业传统相结合的产物。随着美国大企业的兴起,现代基金会出现于十九世纪末,正式形成于二十世纪初。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年)、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 1839-1937年)和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 1863-1947年)分别于1911年、1913年和1936年创办了以他们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进行了规模巨大、范围广泛的捐赠活动,对国内外的社会福利、文化、科学、教育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私人财富的进一步积累和集中,基金会有了长足的发展。1913年美国开始征收所得税,对非赢利机构实行免税政策,鼓励了基金会的发展。1969年对基金会投资收入征税,七十年代,新建基金会数量显

著下降。经过税率调整,八十年代又有所回升。

表 31 美国基金会及独立基金会成立情况与总资产情况

单位:个,千美元

时 期	各类基金会		独立基金会	
	数 量	总 资 产	数 量	总 资 产
1900 以前	48	178 915	44	157 659
1900-1909	23	410 759	17	154 243
1910-1919	77	5 553 397	55	3 874 947
1920-1929	166	6 012 530	126	4 664 581
1930-1939	198	20 036 259	178	19 857 368
1940-1949	744	18 128 114	642	16 322 884
1950-1959	1 790	28 589 968	1 395	21 310 032
1960-1969	1 389	10 966 637	1 146	9 747 696
1970-1979	790	9 779 604	634	8 625 529
1980-1987	1 095	6 644 987	883	5 102 907
资料不全者	295	638 777	263	592 640
总数	6 615	\$106 939 947	5 383	\$90 410 487

资料来源: *The Foundation Directory* 1990(12th Edition).

二、概 况

(一) 性质、类别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的规定,私人基金会是在美国州和联邦政府注册,符合联邦所得税法 501(C)(3)项所列举的条件,享受免税待遇的机构。基金会是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拥有自己的资金(个人的或

公司的),设有托事会或董事会管理捐赠项目。这些项目的设立是为了帮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事业或服务于其他公共福利活动。采取的方式是向其他非营利机构捐赠^①。基金会可划分为4种不同类型,其特点可概括如下:

表 32 四种类型基金会的一般特征

基金会类型	说 明	资金来源	决策活动	赠款要求	报 告
独立基金会	为了帮助社会、教育、宗教或其他活动的独立的捐赠组织	一般来自单一来源如个人、家庭、个人集团。捐赠限于可以减免税者	可以是捐献者或捐献者家庭成员决策或委托银行、托事人代为决策;也可由独立的董事会、托事部决策	捐赠范围广泛,但可有专门的赠款方针,仅向专门领域捐款。约70%基金会仅向当地捐赠	送国家税收局的报表(990)必须公开。少数基金会分别印发年度报告
公司基金会	与提供资金的公司有密切联系的法律上独立的捐赠组织	捐赠来源于营利公司。当公司利润下降时,得自每年的捐赠中保存少量资金	由公司官员及非公司个人组成的董事会决策。也可由地方公司官员决策	赠款往往与公司活动及公司所在社区有关。	同上
经营基金会	将其资金用于研究或提供直接服务的组织	资金来源单一,适合最大限度的减免税收	通常由独立的董事会决策	赠款项目少。一般限于与本基金会直接有关的项目	同上

^① *The Foundation Directory* 1995, 17th Edition, Compiled by Foundation Center New York, 1995, p. vi.

(续表)

基金会类型	说 明	资金来源	决策活动	赠款要求	报 告
社区基金会	公众发起的组织,向某一社区或地区的社会、教育、宗教、慈善事业赠款	有众多捐款者。通常适合最大限度的减税	由代表社区各个方面的董事会决策	赠款通常限于本社区的慈善机构	国家税收局990 报表,公之于众。许多基金会出版该会指南及报告

资料来源: *The Foundation Directory 1995* (17th Edition).

(二) 组织机构和人员

基金会的领导机构是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或托事会(Board of Trustees),拥有合法权力,对基金会的活动负有终极的责任。董事会的成员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兴建基金会家族,如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家族的成员,只有1—2人;第二类是企业家和银行家;第三类是学术界的代表。有些基金会还有新闻界的代表。人数多寡不等。多数大基金会的董事不付报酬。在领导机构之下,通常设工作机构,由专职人员组成。基金会通常对聘用的专职工作人员的学历有较高要求,且需有专业工作的经验。为了节约开支,基金会尽量缩减专职工作人员的名额,专业咨询依靠组织临时的专业委员会解决。有国际项目的基金会往往设有驻外国的办事处或代表。专业性强的项目由有关专家出任代表。基金会的主席是行政首脑,一般均为董事会成员。

(三) 资金来源与资助方向

根据196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慈善事业资金的来源,来自基金会的仅占8%,来自企业与慈善馈赠的各占6%,来自个人捐赠的高达80%^①。基金会的资助方向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1964年,资

^① Warren Weaver: *U. 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Their History, 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Record*, New York, 1967. p. 63.

助宗教事业所占比例最高,占全部资助的 49%。其次是教育,占 17%,再次为福利事业占 14%,卫生占 12%,其他 8%^①。七十年代末,资助方向有所变化,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事业成为主要受益者。

表 33 1976 年至 1980 年主要领域获基金会赠款情况

(根据 1980 年抽样指数制作)

	1980			1979			1978			1977			1976		
	赠款数量	赠款金额 (百万美元)	所占百分比	赠款数量	赠款金额 (百万美元)	百分比	赠款数量	赠款金额	百分比	赠款数量	赠款金额	百分比	赠款数量	赠款金额	百分比
教育	5 067	\$ 313	26	4 651	\$ 301	28	3 669	\$ 222	27	3 022	\$ 192	25	2 753	\$ 203	27
卫生	3 229	262	22	2 974	252	23	2 684	190	23	2 469	188	24	2 055	153	21
福利	7 201	321	27	6 046	246	23	4 859	200	24	4 592	160	21	3 774	174	23
文化	3 081	149	13	2 921	147	13	2 139	111	14	1 989	99	13	1 781	114	15
科学	2 379	121	10	2 349	121	11	1 594	81	10	1 744	113	15	1 421	91	12
宗教	633	25	2	546	22	2	452	16	2	460	17	2	335	12	2
总数	21590	\$ 1191	100	19487	\$ 1089	100	15397	\$ 820	100	14276	\$ 769	100	12119	\$ 747	100

资料来源:基金会指南(1987年)。

表 34 私人基金会赠款细分表(根据 1980 年抽样指数制作)

		赠款额(美元)	百分比	赠款数量	百分比
文化 活 动	一般类	23 762 428	2.0	534	2.5
	艺术与建筑	36 277 014	3.0	498	2.3
	历史	16 876 510	1.4	328	1.5
	语言文学	9 753 803	0.8	227	1.0
	传媒通讯	26 987 020	2.3	492	2.3
	音乐	23 439 983	2.0	610	2.8
	舞剧	23 697 126	2.0	602	2.8

① Warren Weaver, *U. 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Their History, 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Record*, New York, 1967. P. 65.

(续表)

		赠款额(美元)	百分比	赠款数量	百分比
教育 活动	一般教育活动	18 951 152	2.0	444	2.5
	成人与继续教育	9 183 695	0.8	128	0.6
	中小学	36 321 149	5.0	1 053	4.9
	高等教育(普通教育)	198 304 497	16.7	2 949	13.7
	职业教育	3 670 572	0.3	145	0.7
卫 生	一般活动	4 524 588	0.4	116	0.5
	医药卫生教育	63 758 605	5.4	553	2.6
	医药保健	146 611 811	12.3	1593	7.4
	医学研究	59 209 996	5.0	610	2.8
	精神健康	11 246 647	0.9	357	1.7
	公共卫生	13 549 063	1.1	265	1.2
宗教		28 718 935	2.4	718	3.3
科 学	一般活动	5 495 545	0.5	53	0.2
	自然科学	69 970 847	5.9	1 322	6.1
	社会科学	67 977 493	5.7	1 182	5.5
福	一般活动	55 252 765	4.6	1 889	8.8
	工商与就业	25 874 641	2.2	810	3.8
	社区活动	67 820 185	5.7	1 507	7.0
	咨询	6 056 773	0.5	187	0.9
	环保	36 616 832	3.0	587	2.7
	平等权与法律服务	29 303 435	2.5	584	2.7
利	娱乐	35 808 927	3.0	718	3.3
	农业发展	5 459 992	0.5	84	0.4
	城市发展	30 299 992	2.5	445	2.0
		1,190 799 798	100%	21 590	100%

资料来源:基金会指南(1987年)。

国际事务一直是美国私人基金会关注的方面,卡内基国际和平捐助基金的建立、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福特基金会在印度的活动是比较突出的例证。《基金会指南》设有专栏说明各基金会的国际兴趣。《指南》1995年版收录了7 292个基金会的资料,对亚洲有兴趣的基金会24个,对中国和蒙古有兴趣的11个,对中国有兴趣的8个,

三者合计共有 43 个基金会会有资助亚洲国家和中国的意向。

三、评 价

对基金会的评价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动机,二是它的效果和影响。当然这二者是有联系的。从动机方面看,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继承了谴责大企业破坏美国国计民生,斥之为强盗大王(Robber Baron)的传统。认为大公司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逃税,牟取更大的利润,同时也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外部形象。菲迪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在《富豪和超级富豪》一书的第十章“慈善事业的面面观:免税基金会”中表述了这种观点^①。第二种意见是完全肯定基金会的动机是乐善好施,或出自宗教动机,或来自美国为公众义务工作的传统,或为了报答邻里乡亲早年的帮助。代表作为本节引用过的沃伦·维弗尔主编的《美国慈善基金会:历史、结构、管理和记录》(1967年版)。有一位研究者将慈善活动的善良动机概括为:(1)行善是为公;(2)行善是上帝的意志;(3)行善是好的企业行为;(4)行善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活动;(5)行善是为了利他;(6)行善是一种报答;(7)行善是家庭传统^②。第三种意见认为,询问慈善事业的动机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初始的动机应该同后来的动机与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考查,基金会的资助方针千差万别,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总的说来,基金会与总统、国会、新闻媒介一样,必需满足选民和用户的需要和要求。^③

关于基金会活动效果的评价同样有三种与动机评价相类似的意

① [美]菲迪南德·伦德伯格:《富豪和超级富豪》,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② Russ Alan Prince et al. *The Seven Faces of Philanthropy*, San Francisco, 1994.

③ Barry D. Karl and Stanley N. Katz: *Foundations and Ruling Class Elites Daedalus*, Winter 1987, p. 38—39.

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基金会是保守力量的代表,它的资助在国内外都起着阻挠和延缓急剧社会变革的作用,仅仅有助于点滴的社会改良^①。基金会在海外的活动被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意思是“使用政治和经济力量,以牺牲本土文化为代价,抬高和推广一种外国文化”^②。人们熟知的例子是美国电影。第二种意见认为基金会对发展中国家的资助,有助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对基金会活动的评估报告多持此种看法。第三种意见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

第二节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美孚石油托拉斯的创办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百万富翁老约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ion Rockefeller Sr. 1839-1937年)于1913年建立的。老洛克菲勒本人所受教育有限,但他一直将教育视为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他早期的一项慈善活动就是建立“普通教育委员会”,改善和扩大美国南部黑人受教育的机会。此后,在他的资助下,1884年专门为黑人妇女建立了斯派尔曼学院(Spelman College),1889年捐资100万美元建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是老洛克菲勒将宗教和企业的组织形式应用于教育的一个尝试。其宗旨是“增进全人类的幸福”,最初捐款350万美元,1919年增加到1800万美元^③。此后,该基金会将公共卫生、医学教育和农业

① *Philanthropy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The Found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Robert F. Arnov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8.

② *Harper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edited by Alan Bullock et al.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8, p. 411.

③ Kenneth W. Rose and Darwin H. Stpleton; *Toward a "Universal Heritage":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1884 - 1913*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vol. 93, No3, (1991/92), p. 549.

作为资助的重点项目,兼及人文、社会科学。

一、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二十世纪初筹建的。1917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医学预科生;1919年后本科正式开学。洛克菲勒之子(John D. Rockefeller, Jr, F 简称小洛克菲勒)1921年9月亲自来华代表他的父亲、洛氏基金会和中国医学委员会(China Medical Board, 简称为CMB)主持了极为隆重的学校落成典礼。1941年12月日本占领该校。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仅成了居于亚洲领先地位的医学院,而且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医学院之一。1947年10月协和才重新正式开学。1951年1月医学院由人民政府接管。在这三十多年期间,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全部费用都来源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且几乎一直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直接参与管理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对中国引进西方的先进医学知识和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立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在美国医学教育改革浪潮的影响下创办的。

老洛克菲勒的助手、浸礼会传教士弗里德利克·盖茨(Frederick T. Gates)在推动洛氏基金会致力于美国医学教育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问题。许多来华的传教士曾写信给洛克菲勒申请资助,老洛克菲勒给了他们不少钱。随着申请资助中国项目的增加,盖茨和小洛克菲勒开始筹措建立一个国际范围的慈善基金会,并且决定加强对中国情况的了解。1906年,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贾德森(Harry P. Judson)和神学教授伯顿(Crnest De Witt Burton)一起给盖茨写了一封信,建议在中国创办一所美国大学。于是盖茨决定派一个由伯顿率领的教育委员会前往中国进行考察。盖茨的建议由小洛克菲勒转

达给他的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以后,洛克菲勒同意为这次考察出资2万美元。小洛克菲勒在给他父亲的信中清楚地叙述了伯顿此行的目的与即将成立的洛氏基金会的关系。^①

根据洛氏基金会的调查,1913年时,中国约有500人在学习西医。当时中国共有244所医院、446名西医,平均每个医院还不到2名医生。而且当时中国的医学院校的教学质量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勿庸质疑,教会和其他机构目前的医学教育水平还是很低的。”^②

中国当时的现实需要和洛氏基金会的目标相结合,促成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诞生。它是在洛氏基金会几次派专家来华进行详细的考察和审慎筹划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09年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伯顿和张伯林(Thomas C. Chamberlin)组成的“东方教育考察团”对以中国为重点包括印度、日本的远东地区进行了考察。针对中国当时医学校教育水平低和医生缺乏的情况,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医学教育。“只要可行,应该至少在中国的广州、上海、汉口、成都建立组织完善、设备优良的医学院校”^③。由于时机尚不成熟,该考察团的建议并没有立即付诸实现。1913年春,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成立。刚刚诞生的基金会需要开拓其在国内、国外教育、政府、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活动范围。洛克菲勒资助的国际卫生委员会在美国南方努力消除钩虫病的工作中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促使盖茨重新考虑致力于发展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可能性。基金会的另一成员杰若美·格林(Jerome D. Greene)也是推动这一事业发展的重要人物。1913年12月在格林的再三建议下,基金会董事会决定召开一次中国问题

① 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32.

② John I. Bowers: *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917-1951*. New York, 1972, p. 52.

③ 同上书, p. 30.

专题讨论会。1914年1月会议正式召开。参加者均为当时中国问题和医学问题专家。经过详细的讨论,同意基金会对中国医学教育投资并派一个考察团来华进行广泛的考察。这是洛氏基金会派出的第一次中国教育考察团,成员有贾德森、哈佛著名医学教授皮博迪(Franeis Weld Peabody)、美国驻汉口领事罗吉尔·格林(Roger S. Greene)。该考察团1914年4月抵京,用四个月的时间分头或集体访问了北京、天津、济南、汉口、长沙、九江、南京、苏州、上海、香港、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和台湾等地,对中国的医学院校和医院进行了详细地调查。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他们在调查报告中详述了洛氏基金会对发展中国医学教育事业应采取的措施,提出在北京利用伦敦传教士协会(London Missionary Association)的“协和医学堂”建立一所新的高水平的医学院。洛氏基金会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于1914年11月设立“中国医学委员会”(China Medical Board,旧译中华医学基金会)以主持其在中国的事业。同年12月,该会在纽约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向一些中国医学毕业生、女护士提供赴美留学奖学金。并责成勃特立(Wallace Buttrick)谋求与在华传教士协会的合作。1915年以2万美元购得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并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会。董事会于1916年1月在纽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在纽约州立大学立案,可向毕业生授予博士学位。与此同时,洛氏基金会与中国医学委员会组织第二次医学教育考察团来华再次进行深入的考察,团长是勃特立,团员为西·弗莱克斯纳和韦尔士(Willian H. Welch)。他们于1915年8月从美国动身对以北京为重点的我国许多地区进行了考察。他们的报告认为:(1)当时中国的医学教育水平太低;(2)所有医学校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设备都很差;(3)学生的预备教育不够;(4)用中文教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他们建议:(1)为了培养高水平的医学人才,必须用英文教学,因为英文是进行世界科技交流所必需;(2)学生的入学条件应尽可能

如美国第一流医学院的要求,要在正规中学毕业后至少再读两年预科,内容应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数学、英文和中文;(3)要选聘有教学能力并能做科学研究的专职师资,而这类人才是不能用当时教会医学院和医院那样的低薪所能吸引得到的;(4)他们认为不可能在当时任何一所医学校(包括“协和医学堂”)的基础上改造提高,以达到最高水平的要求,因此要办一所够得上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医学院就要从头开始;(5)要同时办一个护士学校。^①

1916年1月,第二次中国教育考察团向中国医学委员会呈交了他们的调查报告。1916年4月,洛氏基金会拨款100万美元用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筑和设备费用。同年6月,年仅28岁的麦克林(Franblin C. Mclean,又译麦克莱恩)被选聘为第一任校长,并立即来京就职。北京协和医学院就这样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

(二)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特点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美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学校的办学方式、教学、科研等工作,具有鲜明的特色。

1920年4月,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办学方针问题,洛氏基金会在美国纽约盖内农庄举行了一次会议进行深入讨论。最后会议接受了麦克林的建议,决定医学院的办学宗旨应为:(1)可与欧美最优秀的医学校相媲美的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包括:本科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教师和临床专家的毕业后教育;临床医师的短期进修教育;(2)提供科学研究机会,特别是有关远东的特殊问题的研究;(3)附带传播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常用知识。以这一宗旨为指导,北京协和医学院形成了自己的医学教育特点。

1. 以培养第一流的中国医学人才为目标。阿·弗莱克斯纳关于

^①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编:《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1917—1987)》,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美国医学教育的调查报告,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产生了直接影响。1914年,洛氏基金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教育考察团成员均是当时弗莱克斯纳的支持者和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参加者。他们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医学院校设备缺乏,教学水平很低。中国医学委员会批准了第二次教育考察团提出的要在中国创办一个第一流的医学院的报告,并由该医学院帮助提高其他在华医学教育机构的教学水平。小洛克菲勒在1921年学校落成典礼的讲话中,强调“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高级师资、医师和科学研究人才,同时要举办进修教育为全国的教会医院和其他医院的医生提供进修的机会,并希望这一学校能以其示范作用促使中国其他地方开办更多类似的学校”^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协和”在教师选聘方面坚持选聘有较高科学研究和教学水平的人员。韦尔士认为“在教师的选择上,对教师科研能力的重视应该与对他们成为优秀教师的重视相同”^②。在学生入学和学习方面,坚持严格的录取标准,实行淘汰制。学校计划每年招生30人,实际上历年招收名额都不满30人。投考的学生要先读完三年医预科,学完大学物理、化学、生物、数学,还要学习英文和中文。入学考试十分严格。录取时还要参考预科各门课程的成绩和教师的推荐。入学后课程紧张,并实行淘汰制。第一年和第二年因学习成绩差或其他原因被淘汰的学生往往占入学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或更多。^③

“协和”的标准不仅与美国的学校等同,而且还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们。“协和”的第一批预科学生入学前都曾受过大学教育。1926年预科停办以后,在“协和”的学生入学前几乎都取得了大学学士学位。相比之下,1932年时美国的多数医学院则只要求学生入学前有

①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第10页。

② Mary B.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p. 40.

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第16页。

两年的大学教育。

由于严格的入学标准,“协和”的招收人数一直不多。从1924年至1943年共毕业313人,平均每年不足16人。对于这个问题,中美两国的评论颇多。有人曾认为,中国人口多而医学人才缺乏,以“协和”优越的人力和物质条件应扩大招生名额,以期尽早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但是,多数人认为该校应着重培养高水平人才,而人数过多则难免降低教学质量。

2. 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科研实践能力。“协和”的创办者认为,“课堂讲授虽是必要的,但不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所占时间不超过总学时的1/3”^①。讲授是为了介绍课程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知识,突出重点,更重要的是给学生启发诱导,为其解难释疑。当时进入“协和”的学生在入学前多数接受过一定的大学教育。他们已经有能力阅读教科书、讲义及参考书,能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学习、消化和吸收课程的内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藏书十分丰富,1941年估计有7.5万册,曾被誉爲亚洲第一。学生入学后便要求学会利用图书馆,学会检索文献资料,并且对教科书和重要文献要能去粗取精、提纲挈领,写成摘要或文献综述。

建校之初,“协和”的创办者即强调实验室和临床实践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在临床实践的前期阶段,学生就有机会学习一些进行科学实验研究的基础知识。第二和第四学年均有一部分时间安排学生参加科学实验。学生还可以利用选修时间或假期,根据个人的兴趣到各科室自选课题或参加教师的实验研究。时间虽不长,但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可以学习选题、设计、收集资料、分析结果和写论文的步骤和方法,为其以后进行实验室和临床研究打下了基础。最重要的不是使学生在短期内就有新的发现和创新,而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独

^①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第17页。

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3. 教学、科研并重。协和医学院在坚持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的同时,该校的医教人员在医学研究方面也曾做出不少贡献。在学校创办之初,科学研究就被定为其重要任务之一。选聘人才时,曾明确要求教学人员必须同时具备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能力。选定课题时,则强调当时我国所特有的重大和迫切的医药卫生问题。从1919年至1925年,他们在中国、美国、欧洲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科研论文就达300多篇^①。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的主要医学杂志如《中国医学杂志》(中、英文版)、《中华生理学杂志》等的重要学术论文多来自“协和”。当时“协和”的不少研究成果是世界水平的科学贡献。例如:

关于“北京人”的发现研究(步达生 Davison Black 与裴文中、杨钟健合作)。

关于麻黄素的发明和研究(陈克恢、Schidt 等)。

关于我国中药学名著《本草》的翻译介绍(伊博恩、Bernard Read 等)。

关于我国常见寄生虫病——疟疾、血吸虫病、丝虫病、阿米巴病、中华支睾吸虫病、黑热病等的调查研究(Faust, Meleney, Young 等)^②。

此外还有许多关于临床诊断治疗经验的报告。这里所列仅为一部分代表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它们对于我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对世界医学的重要贡献。

4. 医学教育、研究面向全社会。协和医学院从事的公共卫生事业就是一个例证。建校之初,公共卫生学即受重视。早在1923年,当时的第一任公共卫生学教授格兰特(John B. Grant, 又译兰安)就主

^① Mary B.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p. 80.

^②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第28页。

张在中国要特别重视公共卫生教育,并认为在全社会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才是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医疗卫生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因此,1925年学校即与当时北京市政府警察局订立协议,合办东城“内一区第一卫生事务所”,在这一区开展公共卫生工作,同时作为学校学生(医学生和护士学生)的实习场所。从1926年起,每班学生都要用一段时间在这里进行实习。在二十年代后期,晏阳初等在河北定县创办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决定把公共卫生作为乡村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普及文化教育和农村经济建设并重。姚寻源(协和医学院1925年毕业生)被邀于1929年至定县主持这一工作,建立了县卫生院,开展了疾病调查和门诊医疗工作。1931年陈志潜(协和医学院1929年毕业生)继任。他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全县(约40万人口)的医疗卫生体系,把医疗卫生工作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进行生命统计、预防接种、卫生宣传和培养农民卫生员、新法接生员的工作。从1932年起,学校安排每班学生(第四学年)分批到定县进行约一个月的学习,使他们对农村问题有所了解。通过对城市和农村公共卫生的学习和实践,学生对医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关系增加了认识,避免把知识局限于医院医疗的狭小范围。^①

5. 综合的教育体制。在美国医学教育改革浪潮的影响下,洛氏基金会筹建的协和医学院基本上采用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办学模式。由大学为医学院提供学生来源,由与医学院密切联系的医院为学生提供实习基地。由于当时我国教会办的或公立的各综合大学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不够理想,因此“协和”决定自办医预科。1917年9月开始利用原“协和医学堂”的部分校舍招生。医预科的学制为三年。1919年有5人从医预科直接升入本科。同时,从1917年起,中国医学委员会每年拨款资助我国各地一些综合性大学,以加强其自

^①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第18页。

然科学的教学条件,使其能培养合格的医预科学生。受到资助的学校先后有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南大学、东吴大学、湘雅医学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由于上述学校能够培养合格的医预科学生,医预科 1925 年停办,部分教师调往燕京大学。后来燕京大学成为“协和”学生的主要来源。所有医预科学生均须经入学考试合格才能被录取,不能直接升入本科。“协和”医预科从 1917 至 1925 年共招收学生 205 人,升入本科的 100 人,最后从本科毕业的 84 人^①。“协和”严格的培养标准,我们可从这个数字中窥见一斑。“协和”医预科虽然仅仅存在了八年,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学校在理科基础课程上表现出较高的水平而且强调学生的实验能力。当时的中国各院校在它的影响下,理科教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作为权宜之计开办的医预科学校不仅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对亚洲其他地区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②

第一、二次洛氏基金会来华的“中国教育考察团”均曾强调在开办医学院的同时,也要设立一个高级护士学校以培养高级护理人才,提高护士教育和护理工作水平。1919 年 6 月,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安娜·沃夫女士(Arna D. Wolf)受聘担任护校领导工作。1920 年 9 月护校开学招收了第一班学生 3 名。

协和医院是协和医学院直属的教学医院,是临床教学的实习基地,因而也是学校的一个组成部分。1921 年医院即开始收治病人。医院为临床各科齐全的综合性医院,设有:内科(包括儿科、神经精神科、皮肤科)、外科(包括骨科、泌尿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眼科、妇产科和放射科等。床位设计原为 250 张(后稍有增加),足供每班不超过

①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第 9 页。

② Mary E. Ferguson: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i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 Chronicle of Fruitful Collaboration, 1914-1951*, New York, 1970, p. 39.

20 人的教学和实习之用。本科高年级学生 1921 年秋季已进入临床见习。各临床科的主任为各科教授,主治医师为各科的副教授、讲师和助教,还有总住院医师、助理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均轮流在病房及门诊工作。1920 年至 1921 年度医院有住院医生及实习医生 72 人,病房中已有男女护士工作^①。新中国成立前,全院职工人数(包括医生、护士、行政和后勤各部门)增加到了约 700 人。^②

(三) 影 响

协和医学院在中国三十多年时间里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一流的医学人才,给中国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协和”的办学模式为我国今天多数医学院校所接受,它们都建有自己的附属医院作为教学和科研的基地,为了提高学生素质也采用了预科教育的方式。

协和医学院的目标是为中国培养一流的医学人才。“协和”就是围绕这一目标制定教学标准、进行课程设置的。从 1924 年至 1943 年从“协和”毕业的学生共有 313 人^③。由于抗日战争和接踵而至的中国内战无法获得有关 1934 年以后毕业生的详细资料,所以这里只介绍 1924—1933 年“协和”前十届毕业生对当时中国医学产生的影响。

根据 1937 年对 1924—1929 年六届毕业生的职业调查,“协和”的医学教育基本上达到了洛氏基金会提出的为中国培养医学带头人才的目标。据调查结果,这些人的职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 医院院长、地方卫生部门负责人和城市卫生管理委员会成员。共 56 名毕业生中有 10 人属于这一范畴,他们分别在不同机构中

①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第 9 页。

② 同上书,第 29 页。

③ Mary B.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p. 108.

担任领导职务(见表 35)。^①

表 35 协和毕业生出任领导职务情况

姓 名	毕业时间	职 务
黄克刚	1928	南昌江西省医院院长
贾 魁	1926	保定河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方颀积	1927	江西省卫生委员会委员
姚寻源	1925	云南卫生局局长
李廷安	1926	上海公共卫生委员会委员
陈志潜	1929	定县平教会公共卫生科长

2. 医院、医学院、国家卫生机构中各部门的负责人。属于这一类的有 11 人。例如湘雅医学院有两个系的主任是“协和”的毕业生。医学系主任是 1926 年毕业的杨济时,妇产科主任是 1929 年毕业的李瑞麟。

3. 医学院教授。此类人数最多,共计 21 人。其中 14 人留在“协和”任教。就职的其他机构还有湘雅医学院、岭南大学、南京海军医学院、上海国立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等。

综上所述,到 1937 年,1924—1929 年毕业的 56 名学生有 42 名担任中国医学界的领导和骨干职务。其他的 14 名,7 人自办诊所行医,2 人在医院工作,4 人是公共卫生机构的成员,1 人未行医。1930—1933 年期间“协和”又有 60 名学生毕业,在 1937 年他们的职务不如前六届学生显赫。不过仍有 2 名医院院长和 3 名医学院系主任。他们大致可以按工作单位分为三类:(1)在医院工作的 11 人;(2)11 人受聘于国家公共卫生机构;(3)37 人就教于医学院。^②

^① Mary B.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p. 128.

^② 同上书, p. 125—129.

从上述十届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出协和医学院所培养的人才对传播西方医学知识和发展我国医学事业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协和”跟其他医学院校作一个比较,也许会更好地理解它的作用。以济南的齐鲁医学院为比较对象,齐鲁医学院是当时教会创办的最好的教会学校,1915—1935年共培养出313名学生。根据1935年的统计,齐鲁医学院只有9%的毕业生成为教师;“协和”毕业生成为教师的却高达51%。这说明“协和”在中国医学领域起到了培养举世公认的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另外,“协和”毕业生私人行医者仅占6%;而齐鲁医学院的却占到38%^①。这就是说,“协和”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成为医院、医学院、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而其他医学校的作用则主要是为中国的日常医疗服务培养人才。由此“协和”在中国医学界的影响可见一斑。

北京协和医学院对我国医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旧中国。在新中国医学界的一流专家学者当中,“协和”毕业的占相当大的比例。1955年中国科学院公布的9名生物医学领域学部委员当中有7人曾经是“协和”以前的教授或毕业生。建国后中国医学会主要仍是由以前协和医学院的人员组成的,副会长林巧稚、钟惠澜、胡传揆均毕业于“协和”。中国医学会出版《中国医学杂志》等其他医学刊物也主要是由前“协和”的人员负责编辑的。钟惠澜从1950年至“文化大革命”一直担任《中国医学杂志》的主编。1962年该杂志的26名编辑中有19人是前“协和”的教授或毕业生。解放后,中国医学界的领导工作也主要是由“协和”培养出来一流的医学专家承担的。1933年的“协和”毕业生黄家驷是我国的胸外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学奠基人。从1959年起,他担任过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名誉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医学会副会长等职,多次参加制订我国医学发

^① Mary B.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p. 130.

展计划,为促进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协和”的毕业生林巧稚、吴阶平、严镜清等知名医学专家也是我国医学界的著名领导人物,他们为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洛氏基金会资助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对促进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和发展中国医学发挥过重要作用。“协和医学院在中国现代医学发展史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培养了许多质量较高的人才,对我国的医学教育、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发展都曾起到很大的作用。‘协和’的历史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几十年欧美医学对我国医学的重大影响。它在教育方针、指导思想、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长期实践经验对于我国当前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地方。”^①

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

(一) 晏阳初与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

享誉海外的我国著名教育家、世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的奠基人晏阳初在国内却鲜为人知。晏阳初 1893 年出生于四川一书香门第,在父亲的教导下先后在私塾、教会中学接受启蒙教育,后来经香港赴美留学深造。1918 年他在耶鲁毕业后的第二天即整装赴法国战场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持的为华工服务的工作。在法期间,晏阳初为华工做代写家信和翻译、传达、代购物品等工作。在工作中,他发现华工这些被西洋人轻侮和蹂躏的“苦力”并不愚笨粗鲁,只是由于贫穷和缺乏读书的机会才不识字。他们虽然苦却蕴藏着无限的潜力。他首先创办了华工识字班,后又自编了适应华工学习需要的常用汉字《千字课本》,在华工中广为推广,形成了识字运动。晏阳初在法的这

^①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前言。

段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下定决心,终生为苦难同胞服务,教他们读书识字,使他们有扬眉吐气、发挥才智的机会。1920年晏阳初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后,便启程回国。回国后,目睹阔别多年的祖国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各种状况,他深感推行平民教育刻不容缓,便立即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之中,积极宣传和推动平民教育。自此,晏阳初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他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在中国长期的教育与社会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并把它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理论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杰出贡献。

活跃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包括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在内的乡村建设运动历时长久、规模宏大而且流派众多、主张不同、做法各异。它反映了当时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试图用改良主义改革中国社会的勇敢尝试,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对这一运动一般都只用简单的政治概念去衡量,一概予以否定。晏阳初当年在国内从事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科学评价,反而被加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军事管制时期,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被视为反动组织和进行“奴化”教育的反动学校,因而被接管。过去出版的一些教育年鉴和教育史著作以重庆市军管会宣布的结论为依据,对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多持批判否定的态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晏阳初领导的这一事业重新得到了公正的评价。1986年7月11日中共重庆市委以在《重庆日报》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乡村建设学院”平反,恢复名誉。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早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就曾对平教运动发表过一些意见。虽然不尽同意其某些理论,但对平教会的事

业和工作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热情的肯定^①。1985年9月邓颖超会见晏阳初时也曾称赞他解放前在国内从事的教育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他的学生有些为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②。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村改革和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仍富有启发作用和社会现实意义。因此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绩和进步。然而对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积极参与和支持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这一历史事实却缺乏研究,很少有人提及。为了弄清洛氏基金会与当时乡建运动之间的关系,有必要首先叙述一下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经历了文字教育、农村建设和县政建设三个阶段。1920年晏阳初回国以后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支持下,以满腔热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游历了19个省,对各省的平民教育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完毕以后,他很快就根据中国的民情和国势提出了推广平民教育的办法并决定立即推行。他先后在长沙、烟台、嘉兴等不同地区实验、宣传平民教育,推动城市平民识字运动,全国反应非常强烈。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总会在北京成立。平教会成立后,河北省保定地区二十个县开始提倡乡村平民教育。晏阳初为推动这一运动步行到许多乡村,实地体验。他认识到“乡村的精神和物质都是今日中国的主干,也是中国未来的基础”,“在乡村推行平民教育较城市更多便利”^③。于是平民教育的重

① 堵述初:《毛泽东会见记》,载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5—400页。

② 参见1985年9月21日《人民日报》《邓颖超会见晏阳初博士》。

③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77页。

点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

平教会建立之初主要从事教农民识字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晏阳初进一步了解到农民所经受的各种痛苦,深刻地认识到要办农民教育非对整个农村改革不可。因此他决定一方面以文字教育作为工作的基础,一方面以农村建设作为工作的目标,农民教育与农村建设联环进行,改造农村,中国社会基础才能巩固。中国的县不仅是行政区域的单位,也是一个社会生活单位。如果在一个县进行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研究实验工作,可以把所取得的成果因地制宜地向其他县推行,甚至一个省、乃至全国,达到改革中国社会的目标。晏阳初及其同仁经过两年的选择与考虑,1926年决定以河北定县作为实验研究的中心。经过1924年至1929年在保定地区,京兆、清河以及定县翟城村的实验与社会调查,晏阳初对平民教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识字教育仅是一种基本教育,其目的不在使民众识字,而在使其达到整个生活改造的目标……中国的民众当然以农民为先……他们——大多数的民众在哪里,我们就应跟到哪里。所以要做第二步的工作,即农村建设”^①。1929年晏阳初举家迁往定县。平教会机关与全体成员也同时迁往定县,平教运动的重点发生了第二次转移,即从平民教育转向乡村建设,开始了堪称壮举的“定县实验”。

乡村建设是平民教育的一个新阶段。数百名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博士、教授,如陈筑山、熊佛西、翟世英、陈志潜、李景汉等等,离开生活舒适的大都市,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他们认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确实是救国建国的一条途径,于是便放弃舒适的生活和升官发财的机会,以无比的信心苦干实干,相信这一实验的成果不仅对中国大有益,而且对世界其他各国农民生活的改造也将有积极的贡献。

根据社会调查得出来的结论与建议,针对中国农民“愚、贫、弱、

^①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第390—391页。

私”四大疾病，“定县实验”的主持者采用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教育方式，进行了文化、经济、卫生、政治四个方面建设工作的研究与实验。在文化方面，采用办报、编辑图书、无线电广播与文学、戏剧、绘画等形式为人民的智力和精神提供滋养品，并为人民娱乐服务。在经济建设方面，他们总结了农业生产中土办法的科学性，使它们容易被农民接受，作为改进生产的一种方式。他们对动植物品种进行了研究改良并且训练农民从事科学种田。他们还对比县的工业活动进行了调查研究，改进机器操作，引进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的技术和设备。农民训练所按农历安排课程时间表，派教师挨村进行教学并由表证员负责田间指导，演示如何实际掌握操作技术。卫生建设方面，1930年定县平教会社会调查组与公共卫生组共同做了定县医疗卫生情况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开展了卫生健康实验工作。他们在定县按照行政三级单位村、镇、县建立了医疗制度，提供了三个类别的医疗服务：村卫生保健员、乡镇保健站和县保健中心。县政建设中，平教会决定与国民党政府合作进行县政建设。1932年12月全国内政会议结束后，县政改革成为乡村建设的中心议题。经过不懈的努力，1933年河北省成立了政治社会研究院。晏阳初被聘为研究院主席，平教会其他有经验的人员也被聘负责研究院的工作。

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研究工作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壮举。到三十年代初，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全国各地的欢迎。1933年，来自四川、内蒙、广东、云南等地到定县参观、访问的不下3000人次。他们大多数人，是为了把他们研究的定县乡村建设计划，试图在他们所代表的机关团体的所在地加以实施”^①。平教运动二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海外的影响就日渐生隆。1925年7月，晏阳初出席了太平

^① 《晏阳初文集》，第171页。

洋关系学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该学会最初由基督教青年会经过1919—1924年各有美国青年会的商讨,决定以太平洋各国人民的问题作为讨论主题,于1925年7月在夏威夷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总干事韦尔博士(Dr. Ray Lyman Wilbur)为执行委员会主席。晏阳初在会上作了《中国—建设力量——平民教育》的报告,获得了各国代表的一致赞扬,可谓“一鸣惊人”。檀香山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支持中国的平民教育。这可以说是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继续发展的关键环节。从此平教会的若干工作才有经费可以进行。1926年韦尔博士赴日本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顺便访问了中国。他认为中国之行使他感到最愉快、最有兴趣的是亲自看到了中国平民教育的推行情况。1927年7月太平洋关系学会举行的第二次会议,韦尔博士连任该会主席,再度赞扬了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1928年晏阳初曾返美接受母校耶鲁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多次演讲为平教运动募集资金。韦尔博士与其他友人积极帮助晏阳初此举,使他募捐获得成功,并扩大了平民教育在海外的影响,得到了众多海外友人的慷慨相助。晏阳初此行募得50万美元,定县实验因而能够按计划进行,取得卓有成效的成就。

(二)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1928—1929年晏阳初在美国募捐期间,就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会晤了小洛克菲勒夫妇,他们应允捐助中国的平民教育。此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其在华援助的方向进行了改革,由注重医学与自然科学转而兼顾中国的农村建设运动。此举为晏阳初的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提供了精神上的鼓舞和财力上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为解决晏阳初久为苦恼的人才缺乏问题开辟了一条途径。

洛氏基金会对华援助由医学和自然科学教育向乡村建设的转变是与其自身政策的变化有关系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兴起的进步运动使洛克菲勒受到了来自各阶层的攻击。内幕揭发者不断

披露有关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贿赂政府官员、操纵政治机器、谋取暴利的丑闻。为此洛氏基金会最初向美国国会申请合法注册登记时,被国会断然拒绝,直到1913年洛氏基金会才得到纽约州法律上的许可注册。因为社会科学总是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自基金会建立之时起,尽管基金会内部对是否资助社会科学有所争论,洛氏基金会还是竭力避免这一“危险”的举措,早期资助主要对准医疗卫生和医学研究领域。洛氏基金会资助社会科学的政策是与洛克菲勒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分不开的^①。最初洛氏基金会卷入社会科学研究完全出于实用的目的,例如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国家经济研究署和政府研究院的资助。二十年代洛氏基金会对社会问题研究的投资不断增加,主要是低廉的住房问题和种族关系问题。一战以后,美国经济出现了一段极度繁荣的“新时期”,这对基金会来说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充满了希望,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建立自愿的、非政府的机构使美国社会发生他们所希望的变化,摆脱贫困。赫伯特·胡佛总统上任伊始就寻求美国私人基金会的帮助,召集了一些非常杰出的科学家研究美国的社会状况,进行政策研究,为自己的一些主要社会改革计划提供基础。这种社会研究正是美国私人基金会梦寐以求达到自己目标的方式。他们希望通过其所资助的社会研究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在政府的努力下,建立“没有贫穷、没有战争”的社会。这便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华援助政策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

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中国为洛氏基金会海外捐赠提供了机会。三十年代初,晏阳初倡导的平教运动以生机勃勃的“定县实验”为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目标与

^① Barry D. Karl and Stanley N. Katz: *The American Private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1890—1930, reprinted from “MINERVA” Vol. XIX, No. 2, Summer 1981, p267.

洛氏基金会政策转变的指导原则不谋而合。1931年洛氏基金会副总裁冈恩(S. M. Gunn)从巴黎返回纽约的途中,在中国停留了七周,他从广州至沈阳参观了四十多所学术机构、医院、政府机关,并会晤了中国和外国在华的各界人士130多人,而且在洛氏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的鼓动下,他还特别参观了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定县实验”,以及农村社会学研究实力较强的燕京大学和农村经济学、政治学研究实力较强的南开大学。在华为期七周的参观和与各界人士的会晤给冈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基金会不能忽略世界上这一重要地区。”^①

冈恩的初次中国之行使他强烈地意识到:医学、公共卫生和农业的改进只是中国全国发展计划中个别的、分散的部分;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必须坚决以中国的机构为基础,做一些进一步深入、发展的事业。1931年9月8日冈恩向基金会主席麦逊(Max Mason)提交了此行的正式报告。报告以较长篇幅、坦率地分析了他所参观过的中国机构的优点、不足之处和前景。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冈恩认为:洛氏基金会的对华政策就中国的重要地位来讲是不妥善的;根据他的调查结果,基金会必须对远东予以更多的注意。

冈恩的报告激起洛氏基金会主席麦逊的强烈兴趣。征得董事会的同意,他委派冈恩作为基金会的特使于1932年10月再次赴华,负责为基金会提出一项新的对华援助计划。经过15个月的详细观察与研究,冈恩于1934年1月向基金会主席和董事会提交了一份长达97页的报告。一个月后他返回美国,进一步向基金会阐述他提出的富有远见的提案。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晏阳初倡导的乡村建设,虽然“定县实验”生

^① James C. Thomson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28.

机勃勃,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仍处于集中研究时期,还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美好愿望的象征。要实现晏阳初将“定县实验”成果推行全国、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目标,还相去甚远,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私人机构与官方机构缺乏合作。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始终是以私人团体的身份进行的,竭力避免政府部门的干预。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部门重叠,相互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竞争激烈,他们的工作毫无效益可言。乡建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人才。1936年经济学家何廉写道:“中国的乡村经济建设,多数工作是由未受过充分训练的人员进行的。”^①冈恩第二次来华期间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乡建工作主要是掌握在抱有无限美好愿望的人手中。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专门的训练。即使乡建的先驱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学术经历也是有限的:晏阳初接受的是政治学教育;梁漱溟是一位哲学教授。第三个问题是学校、乡村和地方政府之间缺乏直接的、持续的联系。虽然个别高等院校已开始使自己的研究面向全国的实际需要,如金陵大学农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学术知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另一个问题是缺乏足够的资金。面对来自于各个方面的问题,乡建谋求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已不可能。他们只能另寻出路。乡建运动的继续发展不能再仅仅进行另一个实验县的工作,而是要将“定县实验”的成果推广全国。这样的任务和目标必须寻求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大量的资金,培养一大批专门人才。

冈恩第二次在华期间,不仅征求了来自各界著名人士的建议,而且还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乡村建设规划进行了研究。1934年1月,冈恩向基金会提交了题为《中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报告。它是了解三十年代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

^① James C. Thomson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p. 123.

冈恩在报告中提出：洛氏基金会在医学领域的长期努力并没有植根于中国广大的农村。他写道：“虽然基金会沿着当时看起来很重要的方向毫无疑问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坚信那个计划不再与时代相一致，或者说不再是我们所发现的最好事业。”^①北京协和医学院“尽管在其本领域内非常重要，但它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却是有限的。”^②冈恩对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当时的教育制度论述之后，提出洛氏基金会对中国的援助应改变方式，对中国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要采用一种综合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应向着晏阳初及其他乡村建设改革者所开拓的方向迈进。冈恩的报告接着讨论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情况。他指出“如果说中国的自然科学比较微弱，那么，必须承认社会科学更弱”。通过对大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得不到充分发挥自己所学知识的情况、特别是海外留学生回国后学无所用和学非所用的情况进行分析后，冈恩建议基金会取消海外进修奖学金，转而协助中国建立若干高等研究中心，并给予本地奖学金。

冈恩的报告第十节题名“国家重建”，再次强调基金会应改变对华援助政策，需要一个新的能够“提高中国农村人口的教育、社会、经济水平的计划”。他通过对定县、邹平、无锡等地的实地考察，发现中国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第一，各地的乡村建设缺乏相互之间的合作。第二，缺乏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即使有二三个机构正注意这种情况，也只是讲授理论而已。冈恩因此认为洛氏基金会应抓住机会，承担起为乡村建设培养实用人才的责任。

冈恩接着在报告中详细论述了他所提出的“华北计划”。所谓“华北计划”即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协调并支付费用给予以下六个机构：燕京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平教会、华北工业协进会。

^{①②} James C. Thomson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p. 131.

这些机构在工作中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相互合作,共同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同时训练人才,学习理论与实际工作并重。估计每年约需 30 万美元。

冈恩向洛氏基金会董事会提交了他的报告后,董事会接受了该报告,并任命由弗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等组成的评议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的研究。1934 年 12 月董事会投票表决同意了冈恩的报告,并拨款 100 万美元作为中国乡村建设三年的实验费用,翌年 7 月该计划正式付诸实施。1935 年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研究推广时期。

1935 年 1 月,冈恩在基金会评议委员会成员弗斯迪克的陪同下再次来华对乡村建设进行调查。根据此次调查结果,7 月基金会开始实施其计划。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所得到的款项最多共 15 万美元。定县实验的成功已使它通过培养人才向全国推广的机会成熟,其目的在于使这一经验广泛地推行全国。平教会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培训委员会。洛氏基金会授予教育、卫生、地方行政、农业、经济学等 37 个当地奖学金。定县成了乡建的中心实验室和人才培养中心。他们还提出了向全国推行的措施,并且在一年内就开始实行把“定县实验”向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许多县推广的计划。“华北计划”的第二部分资助给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共 37 500 美元。当时在何廉领导下的南开大学经研所,其教学与研究已开始注重乡村建设问题,并加强了与平教会的合作关系。以定县作为部分研究生的培养基地,经研所制定了二年制研究生培养计划,目的是为乡村培养合格的管理人员。“华北计划”另一部分资助给了燕京大学,共计 77 326 美元。燕京大学具体负责教育和自然科学,由定县、南开大学派代表参加燕京大学组织的专门委员会,加强、协调相互之间的合作。剩余的款项给予了金陵大学农学院、国家农业研究局等机构。

1936 年“华北计划”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效果,其标志是在北平成

立的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晏阳初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强烈感到把教学和学生与乡建问题直接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决定扩展合作机构,建立定县、济宁两个实验基地。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对各合作机构的任务进行了分派:(1)平教会负责“联环的农村改造工作”及“平民文学”;(2)清华大学负责工程;(3)南开大学负责经济与地方行政;(4)燕京大学负责教育和社会行政;(5)协和医学院负责社会卫生;(6)金陵大学农学院负责农业。1936—1937年的研究训练工作,教育、社会卫生及农业以定县为基地,经济、工程、社会行政、民政以济宁为研究区域。洛氏基金会在华北乡建协进会成立的第一年共给予了289个奖学金,其中公共卫生类106人,农业54人,护理32人,农村教育23人,农村经济学和社会学21人^①。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的合作计划为来自全国最好的公立或私立高校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在专家教授指导下使他们在学校接受的知识训练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的机会,并很快收到了明显成效。华北乡建协进会的创立第一次使乡建所迫切需要的合作和必需的资金得到满足。

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成立以后,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在湖南、四川等华中、华西地区推广。1936年夏,在定县实验工作照常进行的情况下,平教会南迁至长沙,以便就近指导华中、华西的实验工作,推动乡建运动的推广发展。1936年7月,湖南衡山实验县举行了成立典礼,开始因地制宜地在“定县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实验工作。10月,衡山乡村师范学校开学。该校的课程安排完全依据平教会多年从事乡村工作的实际经验与体会又几经考虑制定的。当然与旧有的课程也有所不同,显示出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的特色。同年10月,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了一个设计委员会,拟实行以省为单位的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及其同仁领导进行了全省范围的社会调查,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中

^① James C. Thomson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p. 144.

国的一大创举。四川省设计委员会还对新都县进行了集中调查,选定该县为实验县。新都实验县的工作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1)整顿公安,清丈土地;(2)调整乡村学校区划;(3)实行卫生保健制度与农产品改良^①。1936—1937年可以说是乡村建设运动大发展的一年。

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除与定县密切合作以外,对济宁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工作也做出了许多贡献。该研究院设文化、经济学、社会行政、农业、工程、社会卫生和教育七个部,目标是为乡建培养专门人才、学生和村民。随着华北局势的恶化,研究院的工作始终笼罩着一种紧迫感。然而研究院的工作成果却是喜人的。到1937年,经过两年的学习和实地实践,10名第一批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1936年入学的8名研究生也已开始接受这种训练。同时,来自协进会几个不同合作机构的本科生也在该院注册登记,接受实地训练。当时乡建运动对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非常需要。10名硕士生和23名本科生毕业后马上便供职于从事乡建的私人或政府机构。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炮轰了华北乡建协进会的中心之一南开大学。几个月后,整个“华北计划”已处于崩溃的状态。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了许多优秀的中学、大学继续推行其中国计划。除了燕京大学在日战区存在下来以外,南开、清华、平教会、华北乡建协进会都迁往中国西南地区。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改名为全国乡村建设协进会,与平教会合作继续其人才培养计划,先是在贵阳,后迁至重庆。战时洛氏基金会为中国的乡建仍然每年拨款30万美元。到1942年,基金会已为乡村建设捐助了190万美元。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乡村建设计划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1943年基金会的拨款终止。

晏阳初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意在通过改良的方式达到挽救中国

^① 《晏阳初传》,第382—389页。

的目的。由于个人以及时代的局限性,晏阳初与积极参加乡建运动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农民获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中国农村面貌才为之焕然一新。可是,他们的满腔热忱不能不令人钦佩。他们所参加的乡村建设运动对三十年代的中国产生过一些积极的影响。在实践过程中所取得的如县镇乡医疗卫生制度等许多宝贵经验在解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曾被采用。晏阳初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也仍然具有启迪和现实意义。

洛克菲勒基金会卷入乡村建设运动对促进参加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和乡村建设的研究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使一些大学加强了以前自己完全忽略的问题的研究;(2)突出强调了乡村建设的质量问题;(3)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为中国的乡建培养了众多的年轻人才,1937年乡村建设协进会共培养出10名硕士研究生,23名获得学士学位的本科生,还有142名受过专门培训的大学生。所有这些人毕业后均供职于当时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机构。(4)给予当时中国乡建运动的倡导者以道义上的支持。当然,作为一个外国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努力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的根本问题缺乏认识,它寄希望于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合作,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农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让耕者有其田。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把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这样洛氏基金会赞助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就没有抓住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

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私立南开大学于1919年2月由严修、张伯苓在天津创立。在南

开大学早期创立和发展时期,私人捐款和团体资助是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包括美国等外国机构和友好人士的捐款。对南开大学资助最多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太平洋关系学会。后者主要补助该大学的东北研究会和经济研究所,其捐助金额所起作用虽不比洛克菲勒基金会,但对经研所一些专题项目的研究工作是有帮助作用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给其在北京创立的协和医学院提供合格的学生来源,虽然曾于1917年开办医预科,同时也从1917年起通过中国医学委员会每年拨款资助全国各地一些综合性大学以加强其自然科学的教学条件,使其培养合乎要求的医预科学生。资助主要用于学校所需的建筑、设备、教员薪金等。因此,三十年代以前洛氏基金会对南开大学资助的主要对象是理科。1923年3月,基金会捐助了科学馆建筑费10万元,馆中设备费25000元^①。洛氏基金会对南开大学经研所的资助始于30年代初期(资助数额详见表36)。

表 36 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南开大学一览表

时 间	款 额 (元)	用 途
1923	125 000	科学馆建筑及设备费
1923	1 127	理科
1924	2 900	理科
1925	4 110	理科
1926	6 800	理科
1927	5 400	理科
1928	8 500	理科
1929	2 600	

① 校庆特刊编辑委员会:《南开四十周年校庆特刊》,第27页。

(续表)

时 间	款 额 (元)	用 途
1932	8 000	理学院
1932	60 000	经济学院
1933	60 000	经济学院
1934	60 000	经济学院
1935	37 500	经济学院
1936	45 000	经济学院
1937	40 000	经济学院

资料来源：南开大学校史资料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年度报告。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是我国早期著名的经济学家何廉。他从长沙湘雅学院毕业以后,1919年便赴美国留学,先在加州波模楼学院学习,后就读于耶鲁大学研究生院,1926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在美期间,他曾是著名经济学教授欧文·费暄(Irving Fisher)所设指数研究所的得力助手。1926年秋,何廉学成回国,应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任经济学教授。

何廉到南开大学时,年仅三十,风华正茂,在文商两学院先后担任过经济学原理、财政学、公司理财、货币银行学、统计学、高级经济统计学等课程的教学。1926年他抵达南开以后,便赴京、宁、沪走访了各主要大学,以便熟悉中国大学当时的经济学教学工作和搜集教材。根据自己的考察和教学体会,何廉深感当时中国大学经济学教学存在问题,有必要加以合理化改革,并提出了具体措施。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是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何廉建议、得到张伯苓校长赞助于1927年秋正式成立的,何廉任委员会主任。1927—1928年度学校预算拨款5000元作

为经费。同年中华教育基金会补助 4 000 元,还由美国耶鲁大学的费暄教授捐助了 500 美元^①。“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之创设,旨在为我国社会经济问题作实际解决之准备,兼以谋我国社会科学之发展。研究范围以社会经济方面之重要问题为限,研究方法注重实地调查。其工作约分为二途:一为研究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一为经济统计之编制与分析。”^②委员会设立之时,由于经费紧张,工作范围比较狭窄,进展也比较缓慢。1929 年,先后获得太平洋关系学会及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评议会的资助,经费稍加宽裕,工作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由各种指数的编制与城市工业的调查,兼及乡村工作和乡村经济的研究。例如,东北移民区域的农业经济研究即于此时着手。由于工作的展开,1929 年初何廉又邀请他在耶鲁的同学、经济学博士方显廷来南开任经济史教授,兼任委员会的研究主任。

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后,随着工作的展开,经费开支大量增加,深感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同时在工作中,何廉感到委员会专门从事研究,不能兼及教学,达到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宗旨。为了力求发展,打开新的局面,1930 年春根据何廉提出的建议,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与文学院经济系合并成立了经济学院。1934 年按照政府教育部大学组织法,经济学院改称商学院,另设商学院科学研究所经济学部(简称经济研究所)。经研所除训练工作外,继续研究工作。此时人事设备俱臻完善,研究成果不断刊行发表,已成为国内著名的学术机构之一。

研究所经费,由于教学工作和调研工作的扩大,开支不断增加。大学经费每年拨给 10 万元,不足部分需要寻求新的来源。这个来源主要靠金融界、实业界以及个人资助。洛氏基金会的资助是其中主要一项。

^{①②} 《南开经研所一览》,民国二十九年六月。

1931年冈恩第一次中国之行期间,对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进行了考察。他是经过费喧教授向洛氏基金会社会科学部主任介绍何廉及南开大学经研所工作,然后在社科部主任的力荐下来访南开的。何廉当时正在上海,接到方显廷的电报后,即刻返回天津会晤了冈恩。他向冈恩详细介绍了南开大学经研所的工作以及将来的工作计划和面临的困难。冈恩在天津逗留数日,对研究所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了解。他经验丰富,富于想象,通情达理,很快抓住了研究所存在的关键问题,动身之前对何廉说:“你们在这个发展阶段中的问题是个定期增加财政支援的问题,我会给你想办法,你尽管推行你的计划好了。”^①通过他的推荐,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研究所一笔为期五年的资助(1932—1937),每年1.5万美元,并增加了毕业生赴国外继续学习深造的奖学金数量。洛氏基金会对南开大学经研所的拨款最多时高达经研所预算的三分之一,为研究所工作的开展带来了非常必要的稳定性^②。这些资助对于当时资金紧张的经研所开展和扩大研究工作的范围无疑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获得较为稳定的经费来源以后,南开大学经研所研究工作的范围得到扩展,渐渐扩大至乡村工业。对乡村工业的调查研究始于1932年冬。他们选择河北高阳县为调查中心,并涉及附近清苑、安新、任丘等县。到1934年春,高阳一带调查工作完成后,又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宝坻县乡村工业调查。此项调查研究的成果包括《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等出版的专著,以及先后在该所定期刊物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如《高阳土布工业的组织现状和改革的建议》、《从一般工业制度之演进观察高阳土布工业》、《高阳及宝坻两

^① 何廉:《何廉回忆录》,中译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② 《何廉回忆录》,第50页。

个棉织区在河北省棉织工业上之地位》等文。此外,关于一般乡村工业的论著,比较重要的,有《中国之乡村工业》、《浙江省之乡村工业》(英文本)等。

以何廉、方显廷为代表的南开大学经研所的经济学家认为:“近代工业之发展,实与农业有相互之关系,我国本系农业国家,研究工业经济而不及农业经济将有舍本逐末之讥。”^① 1929年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资助下,经研所开始对东北移民区域农业经济进行调查,派人员赴东三省移民区域调查农业经济。洛克菲勒基金会十分赞赏南开大学经研所的研究工作,中国的农村问题对它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使南开大学经研所在农业经济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扩展,主要的研究工作有:(1)山东移民原籍的农业经济调查;(2)静海典当业调查;(3)河北省西河棉区棉花产销调查;(4)山东农产调查;(5)四川省稻米产销调查。

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设非兼等并顾,亦不足以窥社会经济之全貌。”^②所以,南开大学经研所特别注重地方行政与财政的研究,主要以赋税制度的研究为主。1931年,南开经研所开始从实地调查入手,进行地方政府研究。他们以河北省为中心,对该省县行政上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初步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发表了《河北省十一县赋税概况》一文。对河北省县政概况调查完成后,南开大学经研所征得河北省政府同意,以静海县为集中研究地点,进行县政专题研究。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工作,同时静海县所存的档案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研究人员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分析,并将所得成果发表,有《河北省包税制度》、《县地方行政之财政基础》、《河北省静海县之田赋及其征收制度》、《河北省田房契税性质之

^① 《十年来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一日印,第4页。

^② *Annual Report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35, p. 327.

检讨》等。静海县政专题研究的成果阐述了近百年来县政府的演变情况,以及其组织与职权各方面的变更。然而此项研究仅限于县政府,而县以下的乡镇政府则未能涉及到。定县所存年代较为久远亦比较完整的档案正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当南开大学经研所在静海县研究工作结束后,将全部人员移往定县,与河北省县政建设院合作,对该院所在地定县的县行政与乡镇行政进行调查研究。经过16个月的努力工作,定县档案分析工作才得以完成,所得的研究成果在该所定期刊物上发表,有《河北省定县之田房契税》和《河北省定县的田赋》等文。

社会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密不可分。南开大学经研所在对高阳织布工业调查结束后,便在这一区域内开始作社会调查,以便了解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的过程。在高阳县的社会调查工作注重以下三个方面:(1)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原因;(2)工业发展对社会的影响;(3)城市与农村的差异。

1935年7月,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实施其以中国农村建设为主题的“华北计划”,向南开大学经研所拨款37500元。经研所决定“将其研究生教育及研究工作扩至乡村建设问题,并与平民教育运动密切合作”^①,而且制定了详细的合作计划。经研所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除了研究工作外,经研所的教务工作也由本科生教育扩大至研究生的培训。1935年,南开大学经研所同其他社会团体合作制定了学制为两年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并开始招生,第一届共招收了11人,1936年第二届录取了9名。这两班学生除中途离校者2人外,共有18名。研究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合作运动、地方行政、地方财政。他们在学习完课程以后,必须根据所学专业进行8个月的实地调查,并就此撰写出毕业论文。南开大学经研所培

^① *Annual Report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35, p. 327.*

养经济学高级人才研究生,在当时国内尚属首创。在随后的十几年里,除因日本入侵华北和南开大学复校停招两届外,研究生培养一直未曾间断,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洛氏基金会所提供的稳定财政资助。所培养的研究生毕业后多供职于国内外学术机构或经济部门。1936年4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与另外四所大学及平教会组成了“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何廉当选为会长。该协会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经费,目的是为了适应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需要,进行乡村建设实验,为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实习基地。南开大学经研所负责地方财政与行政、农业合作、土地经济。协进会选定山东济宁县作为一实验县。协进会接管该县县政工作后,便开始实施协进会的农村建设方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在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干部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实际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济宁实验工作陷入停顿,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迁至贵州省,改名全国乡村建设协进会,何廉仍任会长,方显廷任秘书长。在贵州省政府的支持下,协进会在定番县创办了一所乡政学院,并以定番县为基地继续进行农村建设实验。乡政学院的经费仍由洛氏基金会赞助。乡政学院的工作于1940年迁川后结束。

综上所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从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以满腔的热忱和辛苦的劳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南开大学经研所成为一所饮誉国内外的学术机构,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经济学流派。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其提供了稳定的经费,经研所在农村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1)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解决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2)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为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措施;(3)促进了现代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4)培养了一些杰出的经济学人才。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无疑推动了南开大学经研所的发展。如果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其发展也许会遭受更多的挫折和磨难。不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并非是决定性的,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其《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一书中指出的:“虽然南开得到了庚子赔款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些补助,但是它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靠中国人的自力更生以及私人捐助”^① 获得的。

四、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新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根据自身资源和面临的新形势,对该基金会的资助方向进行了调整。1951年将原有的国际卫生部与医学科学项目合并,减少资助公共卫生方面的金额,资助项目的重点放到人口研究、国际关系、法学和政治哲学方面。对艺术、历史研究和农业方面的机构继续予以资助。六十年代,正式建立人口研究资助项目,对于各种不同的以改善种族关系为目的的机构也给予资助。1968年,该基金会举办了以《战胜饥饿的战略》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旨在制定在世界上消灭饥饿的规划。从七十年代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以及一些地区性组织合作,力图增进对第三世界国家人口问题的了解。进入八十年代,该基金会确定了三个主要资助领域:(1)以科学为基础的国际发展项目,目的是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来减少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贫困、疾病、营养不良、非预期妊娠和文盲,重点为全球环境的改善、农业、卫生和人口科学;(2)艺术和人文学科;(3)机会平等项目(1983年建立)。通过美国国

^① 转引自南开大学校史编辑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内城市扶贫,保证少数民族集团的基本权利。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28年为支持北京协和医学院而建立的中国医学委员会,自1980年起恢复了对我国公共卫生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的资助项目重点放在农业科学。

表 37 1993—1994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与中国有关项目

时间	资 助 单 位	资 助 项 目	金额(年限)
1993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人口学研究生出国培养费	\$ 58 700(当年)
1993	芝加哥跨文化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批评研究	\$ 50 000
1993	华盛顿中国研究中心	使在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能回国讲学、研究,以加强与本国同行的联系	\$ 225 000
1993	波士顿发展研究所	建立第一个中国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研究工作,为国家制定环境和资源保护政策提供依据	\$ 120 000
1993	宾夕法尼亚大学水土系统与技术研究中心	为中国农村能源建设项目培养8名管理和项目评估人员	\$ 50 400(当年)
1993	田纳西大学能源、环境和资源中心	海南省统一使用电力资源项目,云南省生物电力项目	\$ 20 000
1993	中国水稻研究所(杭州)	将改进稻作的新战略付诸实施	\$ 110 000
1993	中国科学院	用分子标记跟踪稻种中的雄性不育基因	\$ 38 700
1993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供稻作细胞培育方面的访问学者研究用	\$ 15 000
1993	复旦大学	稻作生物技术(染色体图谱)研究生奖学金	\$ 54 600
1993	同上	稻种染色体图谱研究费	\$ 50 000
1993	辽宁农业科学院	作物遗传基因图谱博士后基金	\$ 42 100

(续表)

时间	资 助 单 位	资 助 项 目	金 额(年限)
1993	上海农业科学院	稻种培育研究	\$ 60 000
1993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高粱生物技术博士后基金	\$ 16 000
1993	华南农业大学	稻种基因多态性研究	\$ 38 700
1993	同上	重要稻种基因多态性与同功酶研究	\$ 30 000
1993	犹他州立大学	中国新无融合生殖稻品系特点研究	\$ 28 000
1993	浙江农业大学	抗稻叶枯萎蛋白质研究(与中国水稻研究所合作)	\$ 77 000
1993	同上	稻作生物技术博士后基金	\$ 67 200
1993	中国科学院	供发展生物研究所开设胚胎学实验室用	\$ 200 000
1993	康乃尔大学	与浙江医学科学院合作研究计划生育临床技术	\$ 51 750
1993	上海社会科学院	计划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出生率的影响	\$ 25 000
1993	上海医学科学院	国际临床流行病学网络培训项目	\$ 35 000
1993	同上	上海各县临床流行病学/卫生经济学合作研究	\$ 25 000
1993	同上	用于华山医院工人呼吸失常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	\$ 10 000
1993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流行病学和生物统计学研究	\$ 18 000
1993	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改进避孕方法与培训地方计划生育专业人员相结合的可行性研究	\$ 73 000
1993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	俄国远东与中国东北乌苏里江流域土地利用	\$ 225 000

(续表)

时间	资 助 单 位	资 助 项 目	金额(年限)
1993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农村生态系统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 90 000
1993	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中国与二十一世纪项目	\$ 35 000
1994	北京农业大学	稻种的耐盐碱机制	\$ 50 000
1994	北京儿童医院	儿童运动神经细胞轴突急性病变可控案例研究	\$ 39 500
1994	北京医科大学	男女生殖系统中 water channel 研究	\$ 30 000
1994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研究改进避孕方法与培训地方计划生育人员相结合的可行性	\$ 21 500
1994	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环境和发展领导人员培训项目	\$ 57 400
1994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疫苗生产设施的设计与计划	\$ 950 000
1994	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中国委员会	能源战略与技术合作	\$ 130 000
1994	中国水稻研究所(杭州)	杂交稻杂种优势的遗传与分子基础研究	\$ 40 100
1994	同上	稻种杂交优势基因图谱研究	\$ 25 000
1994	中国科学院	在广州华南植物研究所经过细胞组织培育研究印加稻雄性不育诱导和发展的新因素	\$ 50 000
1994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不同稻种光周期敏感雄性不育研究	\$ 50 000
1994	中科院遗传研究所	稻种基因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图谱的完成和应用	\$ 60 000
1994	同上	稻种基因传递研究	\$ 60 000

(续表)

时间	资 助 单 位	资 助 项 目	金额(年限)
1994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稻种黄矮病毒	\$ 60 000
1994	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避孕方法研究与人员培训	\$ 200 000
1994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稻种蜡质基因表达调控研究	\$ 60 000
1994	俄亥俄州春田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	世纪之交的中国:问题、挑战与议程(会议费)	\$ 15 000
1994	台北环境保护管理局	城市跨地区伊蚊属蚊子的控制(会议费)	\$ 18 000
1994	山东农业大学	建立有效的稻种转化系统与抗虫害生物工程	\$ 40 000
1994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能引起稻种超敏反应致敏物的研究	\$ 50 000
1994	上海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与健康服务讨论会	\$ 17 000
1994	上海医科大学	国际临床流行病学网络内的转换活动第二阶段	\$ 33 050
1994	沈阳农业大学	中国高粱品系抗蚜虫基因分子图谱研究	\$ 40 000
1994	华南农业大学	稻种雄性不育基因与恢复生育力基因分子图谱研究	\$ 20 000
1994	斯坦福大学粮食研究所	中国改革研究。以稻作生物工程私有化、常规研究系统、种子工业为重点	\$ 67 600
1994	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改进避孕方法与培训地方计划生育人员相结合以提高农村计划生育系统的水平(与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合作)	\$ 233 470

(续表)

时间	资 助 单 位	资 助 项 目	金额(年限)
1994	宾夕法尼亚大学	中国能源建设项目:100个农业县的能源开发	\$ 125 800
1994	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研究中心	为中国计生委在中国农村进行计划生育实验提供技术援助	\$ 86 510
1994	华西医科大学	国际临床流行病学网络内的转换活动第二阶段	\$ 85 000
1994	中山大学	改良稻种的技术转让	\$ 30 000
1994	同上	稻种中具有广泛适合性基因的分生物学研究	\$ 30 000

资料来源:Grants for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 *Grant Listings* 1995, edited by Foundation Center, New York, 1995.

从上表可以看出,1993、1994两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中国的项目每年在30个左右。1993年直接资助中国有关单位的项目21个,资助美国研究中国单位的项目9个。资助总金额193.915万美元。占该基金会当年捐赠1155项的0.2%,占捐赠总金额的17%^①。1994年直接资助中国有关单位的项目26个,资助美国有关单位的项目5个。总金额为277.493万美元。比1993年该基金会对有关中国项目的资助的总金额增加了43%。资助的方向很集中,一是稻种研究,二是计划生育与人口研究,可以说抓住了中国发展中的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资金,已经独立出来的中国医学委员会对我国医学教育的资助重点也很突出。

^① *Foundation Reporter*, 1996 edited by Foundation Center, New York, 1996. P. 1162.

表 38 1990—1994 年中国医学委员会对我国医学教育机构的资助

项目 与金额 单位	年份 (\$)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合计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跨学科研究(5 年用)	460000	临床流行病学信息分析(3 年用)	156000	75 周年校庆学术活动费	60000	增进中国医学图书馆的合作机制研讨会 30000	1. 实现与有关单位联网 950000 (为期 5 年) 2. 医学、护理学、公共卫生学教学基金 680000 (为期 5 年) 3. 医学研究 200000 (为期 5 年)	2 536 000
北京医科大学	医学遗传学跨学科研究(5 年用)	700000	医学、护理学、公共卫生学教学基金 500000, 与协和、中山合用	1. 出国留学人员基金 800000 (5 年为期, 与上海、西安、华西合用) 2. 家庭看护学教学与社会实践 200000 (为期 5 年)	200000 (为期 3 年)	医学研究 200000 (为期 3 年)	血管医学研究 400000 (为期 5 年)	2 800 000	
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医学教育研究中心			急救医学 600000 (5 年用)	1. 认知技能评估 570000 (为期 5 年) 2. 生物医学研究				1 370 000	

(续表)

项目/年份 与金额 (\$) 单位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合计
			200000(为 期5年,与 中山合用)			
湖南医 科大学			预防与治 疗不当研 究 120000 (为期5年)			120 000
九江医 学院		1. 对医学 院本科生 进行能 力评定 250000 (5 年用)。 2. 医学图 书馆设备 与图书购 置 192000 (为期5年)				442 000
上海医 科大学		1. 肾病研 究 400000 (5年用) 2. 外科手 术与康复 350000 (5 年用) 3. 公共卫 生学院 800000 (5 年用)		1. 早期肝 癌研究 450000(为 期5年) 2. 医学研 究 200000 (为期5年)		2 200 000

(续表)

项目 与金额 (\$) 年份 单位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合计
中山医 科大学		1. 鼻癌跨 学科联 合研究 1178000 (为期5年) 由湖南医 科大学管 理 2. 行为医 学 455000 (为期 5 年) 3. 教学音 像资料的 制作与推 广 250000 (为期 5 年) 4. 医学、 护理学、公 共卫生学 奖学金 300000(为 期 4 年)		遗传学咨 询网络 200000(为 期 5 年)	1. 环境与 职业保健 555000(为 期 5 年,与 新加坡大 学合作) 2. 医学、 护理学、公 共卫生学 教学基金 470000(为 期 5 年)	3 408 000
华西医 科大学		本科生教 学评估 209000(为 期 5 年)		1. 医学研 究 200000 (为期 5 年) 2. 放射医 学项目 425000(为 期 5 年)	1. 以社区 为基础的 老年学研 究 370000 (为期 5 年) 2. 医学教 育与研究 的全国 性会议 100000	1 304 000

(续表)

项目 与金额 (\$) 单位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合计
西安医 科大学		环境对骨 骼与牙齿 失常的影 响 484000 (为期5年)	1. 医学教 育项目 455000(为 期5年) 2. 子宫颈 癌、乳头瘤 病毒分子 流行病学 研究 375000(为 期5年)	医学研究 200000(为 期5年)	护理学高 等教育 990000 (为期6 年)	2 504 000
浙江医 科大学		本科生教 学评估 280000(为 期5年)				280 000
合计	1 160 000	6 404 000	2 780 000	1 905 000	4 715 000	16 964 000

资料来源: *Grant Listings 1991—1995* edited by Foundation Center, New York.

中国医学委员会对我国医科院校的赠款呈上升趋势,1990年的赠款总额为116万美元,1994年增至471.5万美元,4年间增加了3倍多。从接受单位看,受益最多的单位是中山医科大学,4年来接受赠款340.8万美元,其次是北京医科大学,接受赠款总数为280万美元;北京协和医学院位居第三,接受总金额为253.6万美元。

第三节 福特基金会与中国

福特基金会是由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 1863—1947

年)和他的儿子艾德塞尔(Edsel Ford)于1936年,针对美国有关财产累进税的新立法,为了避免丧失财产而建立的。最初,资产仅2.5万美元,三十年代末增加到3000万美元^①。捐赠对象主要是福特的家乡密执安州的教育和慈善机构,迄于1950年,每年资助的总金额不超过100万美元。基金会的创建者福特父子于1943年(艾德塞尔先于其父去世)、1947年先后去世,根据他们的遗嘱,基金会获得大量股票遗赠。总资产猛增至4.74亿美元。1953年福特基金会的总部迁至纽约,迅速成长为全美最大的基金会。1954年总资产为25亿美元。流动资金在6000万美元至1亿美元之间。当时美国总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基金会只有六家。1954年该基金会的支出达6800万美元,比名列第二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出高出4倍,比名列第三的卡内基公司的支出高出10倍^②。到九十年代,该基金会的总资产达66亿美元(1994年)。年支出(1994年)在3.4亿美元以上。^③

福特基金会的宗旨是为了发现国家和国际上的重大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向政府及民间机构提供捐款,资助各种研究、培训、试验和发展项目,对感兴趣的领域起到推动作用。福特基金会感兴趣的领域在五十年代有5个方面:(1)和平建设(海外发展、国际研究与培训、国际事务);(2)加强民主制(公共事务);(3)改善人民的生活(经济发展和管理);(4)改善教育设施,丰富文化;(5)个人行为与人际关系(行为科学)^④。八十年代以来,该基金会感兴趣的领域扩大为:(1)城市贫困化;(2)乡村贫困化

① Francis X. Sutton: *The Ford Foundation: The Early Years Daedalus* Vol. 116, No. 1 p. 43.

② Dwight Machonald: *The Ford Foundation: the men and the million* New Jersey, 1989, p. 3-4.

③ *The Foundation 1000*, New York, 1995, p. 940.

④ Richard Magat: *The Ford Foundation as Work, Philanthropic Choices, Methods, and Syles* New York, 1979, p. 18-19.

及资源问题；(3)人权与社会正义；(4)政府管理与公共政策；(5)教育与文化；(6)国际关系；(7)生育健康与人口。

福特基金会从促进国际谅解、维护世界和平的观点出发,对中国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从1952年起至1979年间,该基金会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投入资金4 000多万美元,资助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中国语言的培训项目。1953年,该基金会向104名年轻的美国亚洲和中东学者提供在国内外进行研究的资助。研究东亚的学者25人,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10人,其中如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 1927年—)、牟复礼(Frederick Wade Mote 1922年—)、惠廷(Allen Suess Whiting 1926年—)后来都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①。该基金会在1955年的年度报告中特别指出,美国关于中国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与实际需要很不相称。有鉴于此,该基金会认为“中国研究领域理应得到支持”。为此,该基金会除了向芝加哥、斯坦福两校的高级汉语培训项目提供经常资助外,还资助哈佛大学22.7万美元、哥伦比亚大学42万美元供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经济之用。1956年以后,又将资助的范围扩大到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密执安大学和康乃尔大学。与此同时还资助包括康乃尔大学在内的12所美国高等院校派遣研究生到台湾学习汉语。1966年以来,该基金会一直为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参阅本志第四章第五节“民间友好组织”)提供赠款。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福特基金会开始直接资助中国学术机构与相对应的美国学术团体的交流。交流的项目集中在经济、法律和国际关系三个领域。我国贫困地区的开发也是该基金会重点资助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中国重点资助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在美国主要接受资助的单位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

^① *Ford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53, p. 106—109.

术交流中心和温洛克国际农业发展研究所。基金会董事会 1983 年会议回顾和总结了该基金会 1979 年以来在中国的资助活动,重申重点资助的领域是经济、法律和国际关系。同时做出了三项决定:(1)将资助和联系的范围扩大到社科院和农科院以外的单位;重点大学和部委所属的研究机构;(2)将资助中国对外学术交流的地理范围扩大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3)将资助的重点放在提高中国专业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能力上。

几经周折,经我国国务院批准,1988 年 1 月福特基金会在北京建立了办事处,大大加强了同中国有关单位的直接联系,扩大了它在中国的影响。

一、对美中友好组织的资助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均建于 1966 年。从这两个美中文化交流组织建立之日起,福特基金会一直不间断地向它们提供活动经费。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是美国的两个有很大影响的全国性的学术机构,积极开展对华学术交流活动,也不断地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前和恢复外交关系的初期,两国的学术交流主要是通过上述四个友好组织进行的。福特基金会对他们进行资助的具体情况如下:

表 39 福特基金会对美中友好学术团体的资助项目选要

(1981—1994 年)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81	美国科学院	中美经济学家长期交流	305 000
1982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	美国代表团访华考察中国妇女劳动力的作用	25 000
1983	同上	中国史学家参加辛亥革命讨论会	5 342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82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	美、中高级学者短期互访	194 000
1982	兰德公司	与中国社科院联合在北京召开政策分析与决策研讨会	30 000
1983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	继续支持该委员会主办之中美著名学者交换项目	200 000
1983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	中国社科院非洲专家访问美国非洲研究中心	21 029
1984	美国科学院	研究中国与欧洲、日本的科学与教育交流	25 000
1986	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	与中国社科院合作总结近期中国与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发展	75 000
1986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	中国拉美、东南亚、中东问题专家访问美国	112 000
1986	同上		25 000
1987	同上	中国研究人员赴美与美国学术界和决策者讨论美国经济制度	75 000
1987	同上	中美领袖人物国际问题研讨会	15 000
1987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	中美学者关于苏联经济与对外政策的研讨班	21 500
1988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	活动经费	147 000
1989	美国科学院	考察中国的美国学研究	17 300
1990	同上	经济发展政策研究	801 500
1990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	同上	174 000
1990	同上	国际关系	50 000
1990	美国科学院	国际研究	13 200
1991	同上	中国政策支持下的经济发展	1 300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1	美国科学院	教学与奖学金	150 000
1991	同上	文化遗产保护	50 000
1991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	国际关系	40 000
1991	同上	国际研究	14 600
1992	同上	中国学生和学者导向培训项目	126 000
1992	同上	中美关系研讨班	56 000
1992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	中国国际关系人员培训、研究与学术交流	300 000
1992	同上	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	246 000
1993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	中国学者和官员访美	50 000
1993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事处用	81 337
1993	同上	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	63 150
1993	同上	法学领域与中国的学术交流、人员培 训和研究	1 000 000
1993	同上	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	490 000
1993	同上	中国社会学的能力建设项目	270 000
1994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	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导向培训项目	63 000
1994	同上	在中国举办国际会议	75 000
1994	同上	中国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专家访美	25 000
合计			6 731 958

资料来源: *Grant Listings*, compiled by Foundation Center, 1981—1994, New York, 1981—1995; *Ford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85, 1988, 1990, 1991.

二、在经济领域的资助

经济领域的资助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为了加强中国主要综合性大学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此项资助始于1985年,由福特基金会和中国国家教委联合办理,组成了一个双边委员会。中国方面参加的单位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7所学校的代表;美国方面则是一个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中国方面委员会的主席是人民大学的黄达教授。美国方面的主席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和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在委员会的指导下,分别在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举办为期一年的硕士讲习班,培养西方经济学的师资。这个项目还包括资助在华的短期培训,资助中国学者到北美各大学进修和研究。

第二个项目是资助经济改革重点课题的合作研究以及有关的应用经济学的培训。研究课题包括收入分配,国有企业效益,城市土地利用和管理,工资改革,贸易及价格体系,技术变革及经济增长,自然资源价格及国民收入核算。参与基金会资助项目的人员主要是国务院所属机构(如国家计委、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和北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学家。除了与研究有关的培训项目外,基金会还资助中国研究人员到西方高等院校学习应用经济学,到美国“思想库”实习。

表 40 经济方面资助项目选要(1981—1994年)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8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单位不详)	中国农业经济学家出国培训	200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81	布鲁金斯学会	中美学者关于东亚经济问题的讨论会	25 000
1981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	举办中美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学术讨论会	15 000
1982	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订购经济学方面期刊	18 490
1982	哈佛大学	准备中国灌溉管理方面的专著	20 000
1983	美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	在中国举办农业经济学家培训	290 000
1985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	在美国大学中攻读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学术讨论会	7 500
1985	福特基金会	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项目管理费	80 000
1986	普林斯顿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	12 500
1986	福特基金会	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项目管理费	61 338
1987	普林斯顿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	12 000
1988	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	同上	27 800
1988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所	研究费	38 000
1988	福特基金会管理项目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会议费)	25 000
1988	同上	经济学图书、期刊采购(供中国研究中心用)	25 000
1988	中国国务院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费	60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88	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费	282 250
1988	上海社科院	经济学研究费	100 000
1989	中国社科院	与美国公共管理研究所合作研究土地的利用和管理	158 000 1 年半, 补充费
1989	同上	与美、日学者合作研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155 000 2 年半资助
1989	中国国务院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研究自然资源价格与国民收入计算	60 000
1989	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与世界银行合作研究农村土地问题	190 000
1990	中国社科院	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研究	806 900
1990	中国计量经济学会	同上	10 000
1990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 (多伦多、俄亥俄)	同上	35 800
1990	福特基金会管理项目	中国的经济改革	25 000
1990	乔治·华盛顿大学	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研究	106 000
1990	海南省政府	同上	65 000
1990	中国国家环保局	同上	50 000
1990	中国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同上	100 000
1990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同上	505 000
1990	塔夫特大学	同上	13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0	美国国际志愿组织理事 会	中国农村社区发展	23 000
1991	中国社科院	经济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主要商 品价格、城市土地利用和管理、 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767 500
1991	加利福尼亚(戴维斯) 大学	政策支持下的经济发展	40 000
1991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	同上	270 440
1991	中国国家环保局	同上	220 000
1991	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 研究中心	同上	77 000
1991	四川省林业局	同上	35 000
1991	中国国家计委经济研 究中心	同上	74 000
1991	云南社科院	同上	39 000
1991	上海市政府外国投资 委员会	投资政策分析	30 000
1992	美国农业经济学会	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展望(会 议)	12 000
1992	北京大学	跨国公司的合作研究	40 000
1992	中国发展研究所	中国经济改革的综合设计研究	48 000
199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供社会森林网络与通讯用	150 000
1992	中国社科院	对外交流基金,促进学术交流	300 000
1992	同上	经济研究所与美方合作从事中 国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研究	167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2	中国社科院	金融和贸易所中国商品市场研究	50 000
1992	同上	住房改革合作研究	48 000
1992	同上	中国价格制度合作研究	20 000
1992	俄亥俄中国经济学会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回国讲学及其他活动	25 000
1992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的金融改革	70 000
1992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	35 000
1992	同上	中国寻求现代化(会议费)	28 500
1992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方面的学者访问和交流	30 000
1992	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中国税收和财政制度研究	45 000
1992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	应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访问与交流	59 000
1993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国沿海发展战略	25 000
1993	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中国的公共税收和财政制度研究	99 000
1993	中国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合作研究	140 000
1993	同上	中国西南经济发展国际会议	50 000
1993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中印合作研究农村发展	25 500
1993	中国发展研究所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	100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3	中国经济学家学会 (科罗拉多州)	中国经济改革会议	50 000
1993	中国社科院	中国企业集团的研究	99 500
1993	同上	中国农村妇女迁徙	30 000
1993	中国经济学家学会 (科罗拉多)	青年经济学家在中国讲学及其他活动	15 000
1993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中国政策分析家应用经济学培训项目	70 000
1993	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大学	从区域角度看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经济发展和政治关系	75 000
1993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改革(会议费)	70 000
1993	中国国家统计局	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人员培训与研究	51 500
1994	北京大学	为在北京的新政策研究机构在 国外工作的中国经济学家提供 生活费	150 000
1994	同上	为归国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 建立新的研究中心	52 000
1994	中国经济学家学会 (科罗拉多)	乡镇企业产权问题国际会议	41 500
1994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国际讨论 会	29 000
1994	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沿海发展战略合作研究	10 000
1994	南开大学	1994年联合国国际人口和发展 会议	46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4	南开大学	1994年联合国国际人口和发展会议	44 000
1994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中国政策分析人员应用经济学培训	138 500
1994	同上	同上	110 500
1994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学家的培训	370 000
1994	同上	中国著名大学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	49 000
1994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九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国际会议	66 000
1994	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中国银行制度的改革	100 000
1994	同上	天津劳动力重新部署和社会安全问题	54 000
1994	同上	非正式移民社区的出现	53 000
合计			8 497 018

资料来源:同表 39。

三、在法学教育、立法和司法建设方面的资助

为了促进中国的法制建设,福特基金会在法学教育、立法和司法建设三个方面提供资助。法学教育交流项目自1983年开始。参加这一项目的中方单位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还有华东和西南两所政法学院。联合主办单位为中国国家教委和司法部。资助的交流活动包括为中国学者和法学图书馆工作人员提供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机会,举办各种讨论

会,邀请美国法学专家来华讲学,交换中、英文有关法律的资料,资助中国研究美国法律的中心。中国方面协调交流事宜的是北京大学张国华教授为主席的委员会。美方委员会的主席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兰德·爱德华(R. Randle Edwards)教授。这个项目除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外,还得到鲁斯基金会、秦河基金会、美国新闻总署和一些个人的财政支持。

另一个项目重点在于促进中国的立法进程。基金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局和其他负责起草主要法律、法规的单位提供出国考察、邀请国外专家来华以及获得国外法律资料的资金。1989年以来,此项目促进了行政法、新闻法、版权法、出版法、票据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社团法的研究和起草工作。与此同时,基金会还资助了在中国及国外进行立法起草方面的培训。

第三个项目是对司法人员的培训。基金会从1989年起资助由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教委联合主办的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该中心设有本科生、研究生和在职培训的项目。资助主要用于研究、师资和交流。

表 41 法律与法制改革资助项目选要(1981—1994年)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81	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院学生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法律研讨班	10 000
1982	夏威夷大学	美国中国法律专家出席在华举行的会议	35 000
1983	哥伦比亚大学	美中法学学者交流、学术会议、双方法学图书资料购置	575 000
1983	同上	筹划与中国的法学教育交流(会议费)	55 736
1987	同上	加强中国的法学教育与研究,重点为研究生教育,含研究和会议费	350 000 (2年)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89	哥伦比亚大学	加强中国的法学教育与研究,重点为研究生教育,含研究和会议费	800 000 (2年)
1990	中国出版法研究中心	立法研究与交流	16 655
1990	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	聘请外国专家讲学、派代表团前往日本、苏联了解法院情况和法官的作用,派遣7名年轻法官赴美、加、西欧和前苏联学习	200 000
1990	中国全国人大法律事务委员会	立法研究与交流	183 000
1990	中国国务院立法局	同上	85 000
1990	北京大学法律系	法律服务	42 750
1991	中国政府	立法研究与交流	35 000
1991	中国法律学会	法律服务	11 300
1991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服务	50 000
199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同上	20 000
1991	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	同上	200 000
1991	中国华夏学院	法律服务	28 000
1991	中国全国人大法律事务委员会	立法	6 000
1991	纽约大学	中国的法律服务	28 000
1991	北京大学法律系	社会正义与法律服务	151 750
1991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权、教育奖学金	200 000
1992	北京大学法律系	行政诉讼法的研究与会议	20 000
1992	中国政法大学	外国法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100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2	中国政法大学	行政决策的再思考,调查与会议费	11 000
1992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权法研究	150 000
1992	同上	法律、经济学与社会发展研讨班	10 000
1992	中国国际法学会	国际法的教学与研究会议	40 000
1992	同上	同上	10 000
1992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所	比较宪法研究与会议费	47 000
1992	同上	宪法研究、研讨班,出版	44 000
1992	中国人民大学	第一部权威性法院判决集的编辑	50 000
1992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人员的法律条例研讨班	18 000
1992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	加强中国的法学教育与研究	625 354
1993	中国中央检察管理研究所	扩充研究人员,开展合作研究	100 000
1993	中国社会科学院	保护人权的调查研究	51 000
1993	同上	运用法律保护妇女权利	50 000
1993	中国基层政权部	地方管理的研究和出版	110 000
1993	北京大学法律系	宪政研讨班	65 000
1993	同上	行政法研究与全国性会议	30 000
1993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电话热线与网络	72 000
1993	中国政法大学	刑法程序中保护人权的比较研究	75 000
1993	中国人民大学	比较宪法国际会议	33 000
1993	同上	司法案件报告的编辑	100 000
1993	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	司法培训与研究	132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3	武汉大学	人权的法律服务研究与出版	30 000
1994	北京大学法律系	行政法的研究和出版	40 000
1994	中国中央检察管理研究所	研究人员发展与比较研究	100 000
1994	中国政法大学	翻译和出版外国法学著作	135 000
1994	同上	在刑法程序中保护人权的国际会议和出版	37 000
1994	北京民燕(音)法律事务所	中国第一家公共法律事务所	75 000
1994	中国社会科学院	供法学研究所促进以法律保卫妇女权利的研究、培训、出版与活动	120 000
1994	同上	人权研究、资料及出版	75 000
1994	同上	同上	54 000
1994	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	研究与培训	78 000
1994	中国基层政权部	地方管理的研究培训和资料、出版	205 000
1994	哈佛大学	当代中国的法律、权利与社会变迁	55 100
1994	横向市场研究与政策分析	迁徙者社会经济权利研究、研讨班及其他活动	25 000
1994	中国全国人大法律事务委员会	立法程序和立法权威的定位,比较研究与出版	168 000
1994	中国 SDX 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宪政和公共政策问题学术评论半年刊	60 000
合计			6 283 645

资料来源:同表 39。

四、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资助

福特基金会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资助集中于中国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国际战略研究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高等院校方面主要是3所设有国际政治系的学校,即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这3所大学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协调中方活动。美方由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的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教授任主席的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作。纽约的国际教育研究所负责行政管理事务。该项目资助的活动包括中国学者赴美进修、美国学者到中国短期讲学和进行学术考察访问、举办各种会议和图书馆建设。除福特基金会外,资助这一项目的还有麦克阿瑟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鲁斯基金会和洛氏兄弟基金会。

对地区研究的资助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资助的形式主要是给予中国学者个人进修和研究的奖学金,资助中国地区研究的专家与外国同行进行专业交流。

表 42 国际关系方面资助项目选要(1981—1994年)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81	哥伦比亚大学	与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国际关系讨论会	11 620
1983	南加州大学	中国军事力量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影响(会议费和图书费)	15 000
1984	夏威夷太平洋论坛	美中对外政策分析(会议费)	30 000
1985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中美学者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研讨会	25 000
1985	中国国际教育研究所	每年 20 名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访美	600 000 (5 年)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86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	学术交流	15 000
1986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合作研究)	42 000 (2年)
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与其他国家的前苏联、东欧研究中心交流	101 000 (2年)
1989	同上	中国与亚洲经济关系合作研究第三阶段	53 000
1989	同上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经济关系	50 000
1989	同上	中国学者访美	11 000
1989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	中国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者和学生赴美奖学金与南京大学合用	27 000
1989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供研究人员发展国际交流和派代表团出席马来西亚的国际关系会议的补充费用	35 000
1989	塔夫特大学	中国经济政策研讨会	8 580
1990	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	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人员培训与交流	593 000
1990	香港岭南学院	和平与安全	26 000
1990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关系	34 000
1990	南京大学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同上	29 150
1990	中国国务院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同上	11 000
1990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同上	36 5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0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研究	20 000
1990	暨南大学	同上	20 000
1991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国际经济学与发展	25 000
199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同上	35 000
1991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同上	8 000
1991	香港岭南学院	同上	20 000
199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国际关系	28 100
1991	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	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人员培训与交流	330 000
1991	同上	同上	130 984
1991	暨南大学	同上	70 000
1991	北京大学	同上	28 000
1991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同上	98 000
199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合作(会议)	48 000
199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国际交流活动	50 000
1992	中国关心全球事务研究所	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	50000
199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赴俄罗斯和中亚学术访问各一人	35 000
1992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东欧、俄罗斯、中亚研究所国际交流活动	124 000
1992	同上	美国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50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展中国家、东北亚地区研究(会议费)	46 000
1992	同上	中国与欧洲的关系研讨班	22 000
199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支持与南京大学合办之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250 000
1992	普林斯顿大学	关于中国的军备控制与环境	39 000
1992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美关系讨论会	10 000
1992	上海社会科学院	人员发展与国际交流	125 000
1993	北京大学	从区域角度看中国的国际关系	25 000
199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国际交流活动	40 000
1993	中国关心全球事务研究所	发展与安全方面的中国专家访美	20 000
1993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东亚安全与发展国际会议	15 000
1993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与欧洲关系的研究与国际会议	50 000
1993	南京大学	资助国际关系方面的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	17 600
1993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5个东南亚研究所的联合活动	110 000
1993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的国际交流活动	50 000
1993	同上	资助美国学图书出版	50 000
1993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人员发展与国际访问和交流	75 000
1993	伊利诺大学	支持美、中关于非洲研究交流项目	55 000
199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东北亚安全与发展国际研讨会	20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亚太地区安全与发展国际会议	50 000
1994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	国际交流活动	20 000
合计			4 013 534

资料来源:同表 39。

五、对农村发展的资助

自 1989 年起,福特基金会开始资助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领导小组所组织的研究和培训工作。基金会提供资金与温洛克国际农业发展研究所合作在云南省进行高原地区管理的研究、培训及实验。实验工作是由云南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领导小组负责协调,由政府部门、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共同参与进行的。此外,福特基金会还对贫困地区的妇婴保健的研究、培训和实验工作提供资助。

表 43 农村发展资助项目选要(1989—1994 年)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89	温洛克国际农业发展研究所	中国云南高原管理制度	340 000
1989	中国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领导小组	水土保持管理(云南高原管理项目 YUM)	42 000
1990	同上	同上	18 446
1990	云南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同上	196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0	檀香山东西方文化与 技术交流中心	中国水土保持管理	12 310
1991	檀香山东西方文化与 技术交流中心	中国水土保持管理	41 200
1991	中国科学院	中国水土保持管理	48 600
1991	云南省贫困地区经济 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同上	110 000
1991	温洛克国际农业发展 研究所	中国云南高原管理	471 000
1991	温洛克国际农业发展 研究所	同上	13 200
1991	云南社会科学院	同上	39 000
1991	云南省森林局	同上	89 000
1991	中国国务院贫困地区 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聘请美、中两国专家评估当前扶贫效 益,制定长远规划	50 000
1992	中国科学院	与山区扶贫有关的国际会议及其他活 动	115 000
1992	同上	中国西南地区 Swidden 农业系统中生 物多样性	98 000
1992	同上	云南省本土的土地和资源管理系统	65 000
1992	云南地理研究所	当地土地和资源管理	20 000
1992	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所	同上	10 000
1992	云南省贫困地区经济 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云南省高原研究、人员培训与实验	227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2	中国国务院贫困地区 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扶贫研究国际顾问委员会及有关农村 扶贫的人员培训	74 000
1992	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	在云南建立计划生育工作组	26 000
1992	河南妇女干部学校	供编写河南、云南两省妇女生育卫生 教材用	161 700
1992	中国卫生部	云南省爱滋病防治的社会经济意义	22 500
1992	西方公共卫生集团 (加州、伯克力)	评价云南省乡镇生育卫生需要及支持 省和地方的顾问组	250 000
1993	加利福尼亚(戴维斯) 大学	云南北部农村贫困、少数民族和高原 环境研究	101 000
1993	温洛克国际农业发展 研究所	云南省高原管理制度人员培训	218 000
1993	云南省贫困地区经济 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云南省高原发展的研究、人员培训和 实验	297 000
1993	云南省林业局	在云南省建立村庄森林管理制度的研 究、试验和人员培训	195 000
1993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 研究所	云南省家庭花园的调查	51 000
1993	同上	通过社区重建保护林区	40 000
1993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ABT 协会	用于云南省农村保健财务的社会科学 研究与人员培训项目	258 000
1993	泰国江美(音)大学	考查与泰国湄公河省份和云南发展及 经济交流有关的泰一中政策问题	30 000
1993	北京医科大学	改善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生育健康研 究、培训和与该项目有关活动	115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3	昆明医学院	改进云南生育健康的研究、培训和课程建设	87 000
1993	云南省公共卫生局	改善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生育健康研究、培训和与该项目有关活动	82 000
1993	西方公共卫生集团 (加州,伯克利)	改善中国贫困地区生育健康的研究、培训和与该项目有关的活动	298 000
1994	中国社会科学院	改善社区组织并使贫困地区农村妇女能获得信贷	110 000
1994	云南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云南省高原发展研究、人员培训和实验	500 000
1994	斯坦福大学	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和人员培训	27 000
1994	菲律宾国际乡村重建研究所	共同努力将云南高原管理经验制度化	75 000
1994	中国国际女子学院	生育健康与妇女研究以及在河南和云南的教育活动	102 000
合计			5 125 956

资料来源:同表 39。

六、对文化、教育、卫生、环境保护方面的资助

除以上项目外,福特基金会还资助文化、教育、卫生以及环境保护领域的一些项目。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周文中教授主持的美中艺术交流中心所从事的促进两国文化艺术交流的活动。九十年代以来,妇女问题、生育健康、环境保护成为福特基金会感兴趣的领域。

表 44 文化、教育、卫生、环保方面资助项目选要(1987—1994 年)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 额(\$)
1987	哥伦比亚大学	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中美表演艺术家互访、演出	500 000 (5 年)
1990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教学与奖学金	307 500
1990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同上	11 000
1990	上海社会科学院	同上	150 000
1991	哥伦比亚大学	文化遗产保护	20 000
1992	美国性教育者、咨询者、治疗者协会	预防性病和爱滋病在中国传播的技术援助	15 200
1992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计划生育伦理学问题研讨班和出版物	50 000
1992	哥伦比亚大学	云南省少数民族艺术文化交流	450 000
1992	马萨诸塞州长弓集团	天安门中国档案项目电视系列	145 000
1992	美国麦克尼尔/莱尔摄制公司	“未知的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献系列片的研究与试制	25 000
1992	旧金山公共传媒中心	中国计划生育的组织发展与技术援助	148 000
1992	中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研究所	生育健康问题研究	90 000
1992	塔夫特大学	中国人才流失问题研究	50 000
1992	WGBH 教育基金会	1949 年以来的中国史(文件集)	250 000
1992	同上	同上	67 000
1993	河南妇女干部学校	中国妇女口述史	48 000
1993	中国妇女干部管理学院	人员培训和培训班	74 000
1993	中国国家环保局	环保电视系列	25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3	中国国家环保局	环保电视系列	20 000
1993	北京大学	有关妇女问题的研究和出版	73 000
1993	天津师范大学	同上	35 000
1993	中国国家环保局	森林资源清查	85 000
1993	同上	中国环境问题的国际委员会	75 000
1993	同上	关于环境的电视系列	25 000
1993	同上	同上	20 000
1993	四川省林业厅	重建长江流域森林的管理	140 000
1993	中国农村妇女杂志	《中国农村妇女知识大全》(重点在生育健康)	20 000
1993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海外学者回国资助	60 000
1993	中国社科院	妇女在中国社科院中的作用	18 000
1993	波士顿外国记者中心	中国女记者培训	34 000
1993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中国生育健康的培训	82 000
1993	健康专用技术项目 (西雅图)	中国男性参与计划生育合作研究	98 300
1993	中国全国妇联研究所	生育健康研究	50 000
1993	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男性参与计划生育合作研究	84 000
1993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改进避孕方法与培训地方计划生育人员相结合以提高农村计划生育系统水平的咨询工作	32 500
1993	同上	同上,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	82 000
1993	北美中国社会学家协会	当代中国性别问题的国际讨论会	30 000

(续表)

年份	单 位	项 目	金额(\$)
1994	北京农业大学	中国农村妇女面临的与政策有关问题的研究	40 000
1994	北京妇女研究会	中国农村妇女面临的与政策有关问题的研究	35 000
1994	中国妇女干部管理学院	人员培训和培训班	50 000
1994	中国工运学院	劳工热线	13 000
1994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民协会的文献工作、研究与论坛	46 000
199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保护森林活动的网络和新闻通讯	75 000
1994	中国妇女健康网络	为中国男子和妇女制作和出版性健康教育资料	122 000
1994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农民协会的文献工作、研究与论坛	42 500
1994	中国社会工作师协会 京伦家庭中心	北京性教育、家庭生活和安全住宅网 (咨询、培训和会议)	71 600
1994	马萨诸塞州长弓集团	中国档案项目、天安门电视系列项目	100 000
1994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农民协会的文献工作、研究与论坛	87 000
1994	中国农村妇女杂志	《中国农村妇女知识大全》(重点在生育健康)	53 000
1994	天津师范大学	农村妇女面临的与政策有关问题的研究	50 000
合计			4 337 600

资料来源:同表 39。

据不完全统计,1981—1994年福特基金会对我国大陆及有关研究的捐赠数额近3500万美元,其中经济方面的数额最多,为849万多美元;其次是对美中友好学术团体的捐赠为673万多美元;第三位是对中国法律与法制改革方面的资助在628万美元以上。三者合计占上述捐赠总额的61%强,其余38%强用于中国农村发展(扶贫),文化教育、卫生、环保,国际关系研究等方面。

第四节 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

一、美国的中国学

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和汉学(Sinology)都是指中国以外的国家对中国的研究。前者含义广泛,包括对中国各个方面的研究以及对中国的综合研究;后者专指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比欧洲晚得多,而且深受欧洲汉学研究的影响。裨治文于1832年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可以看作美国中国学的开端。来华的北美传教士是最早的一批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人员。1842年美国东方学会成立,出版《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并建立了东方文献图书馆。卫三畏的《简易汉语教程》、《中国地志》、《中国总论》分别于1842、1844、1848年相继问世。这些都是美国中国学形成的标志。了解人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经验,掌握全球状况,以满足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需要,这是西方中国学研究的共同之处。为此,美国大学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开始在高等学校设立汉语课程,建立教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哈佛大学独领风骚,率先于1870年开设中文课。接踵而来的是耶鲁大学在卫三畏的主持下,于1876年开设汉语课程,并成立了东方学图书馆。此后,哥伦比亚大学、芝加

哥大学、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竞相效仿,成为美国培养中国语言和中国学人才的基地。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美国的中国学独立发展时期。研究中国的机构纷纷建立。迄于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共90个,其中39个建于1920—1940年间。比较重要的如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建于1925年(参阅本志第四章第四节)。该学会曾于1931年在中国的上海和杭州举行年会。其所出版的《太平洋事务》和《远东概览》发表过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成果。三十年代中期,该学会倡导对中国的粮食供应、人口增长和土地利用开展研究。卜凯的《中国的土地利用,1919—1933年》,托尼(R. H. Tawney)的名著《中国的土地和劳工》都是由太平洋关系学会资助出版的,对研究中国的现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建于1919年,是美国全国性人文学科民间团体的联合组织。二十年代末,曾两次召开促进中国研究的会议,并成立了促进中国研究的常设委员会。哈佛燕京学社(参阅本志第二章第三节)1928年成立,很快成为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中心。该学社的东亚图书馆是美国收藏中文书刊最多的图书馆之一。收藏重点是清末到民国初年的文献。国会图书馆的中文部建于1927年,收藏丰富,为全美之冠,三十年代中期馆藏已近15万册。在此期间,美国自己培养的研究中国的学术队伍也已初具规模。赖德烈、拉铁摩尔、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elbur 1908—)、顾立雅(Herrie Glessner Creel 1905—)、恒慕义等人的成名之作均在此期间问世^①。后起之秀费正清等人已崭露头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个转折点。由于战争需

^①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1929年)、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1934年)、韦慕庭:《中国的乡村政府》(1934年)、顾立雅:《中国的诞生》(1936年)、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1943—1944年)。

要,语言培训的任务大大增加,了解中国现状成为当务之急。这就促进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逐步完成从以书面语言为主到以口语会话为重点、从单一学科(语言文学)到多学科(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学)、从重历史到重现状研究的转变。地区性综合研究趋向得到加强。这个转变,在语言人才培养方面,耶鲁大学一马当先,与美国空军签定协议,用新的教学方法强化口语和强调阅读当代文献,培养汉语翻译人才。哥伦比亚、哈佛两校则成为开创中国地区性综合研究中心的先驱。学术组织方面的表现就是远东协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的成立(1941年)和《远东季刊》的出版。远东协会于1956年改名为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出版的刊物也更名为《亚洲研究杂志》。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于1958年建立亚洲研究委员会,成为向中国和亚洲研究提供资助的一个重要渠道。

美国国会于1958年通过的《国防教育法》对于加强高等院校中国语言教学具有重要意义。该法令规定,增加包括中文在内20种外国语的教学和背景研究基金的拨款。私人基金会和高等院校也随之增加对中国学教育和研究项目的投入。加大投入的直接后果是开设中文课程的高等院校数目和选修中文课的学生人数剧增。

表 45 美国高等学校开设中文课和学习中文学生数量增长情况

单 位 数				学 生 数	
年份	本科生	研究生	NDEA *	本科生	研究生
1960				1844	
1965	78	31	19	2561	798
1968	108	35	28	4090	971

* 国防教育法中心

资料来源:John M. H. Lindbeck; *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Pra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71. p. 48-49.

1964—1969年间,美国在中国学领域授予博士学位的学校从12所增加到23所。1960—1969年共培养了412位博士。

为了开展研究工作,收藏中文书刊的图书馆及其藏书量也在增加。据1969年1月的统计,中文藏书在15万册以上的图书馆有6个。一些学校还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一个以语言为工具、历史为桥梁、沟通过去和现在、多学科交叉、研究现当代中国的中国学开始形成。

在这个框架之下,从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以及法学、医学等不同学科和专业角度研究中国当代问题。各个领域中国问题专家与同行之间的联系形成了许多专业组织、研究项目,并组织了许多学术会议,使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出现了新局面。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是一个新的推动力。据1989年的资料,美国研究中国的大小机构在1000个左右,可划分为:(1)政府系统;(2)工商业系统;(3)高等院校系统;(4)学会、协会和其他民间团体系统。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助理教授以上或相当水平的有1800余人。资助中国学研究的基金会、奖学金、补助金机构有代表性的124个。美国刊载研究中国问题文章的期刊比较重要的有225种^①。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解,经历了费正清等倡导的西方施加影响、中国作出反映的模式;现代化理论的应用;世界体系论;正在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在研究方法上从走马观花到下马看花的转变也正在进行。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以图书馆为依托。收藏中文资料具有特色的中文图书馆在100个以上(含加拿大)。最重要的中文书收藏中心有13个。情况如下:

^① 孙越生、陈书梅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表 46 北美主要研究型图书馆中文文献收藏情况

单位:册

馆名	建立年份	中文文献量	收藏特色	其他
国会图书馆 亚洲部	中文部建于 1927 年	368081(1969 年) 461000(1975 年)	方志、善本书、清史资料 和 1949 年以来出版物最 为丰富。方志 4000 种, 中文善本 2000 种	该馆亚洲部藏有亚洲语 言资料 130 万
哈佛燕京图书馆	1928 年	296185(1969 年) 336023(1975 年) 380000(1984 年)	975 年印行的佛教经 卷,十四—十九世纪手 抄本 1128 种、41074 卷,方志 3525 种	共藏书 61 万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1926 年	175737(1969 年) 230000(1975 年)	中医书 1160 种,1620 卷,为西方此类书最大 收藏者	全馆藏书 209 478 (1969 年) 347 750 (1975 年)
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	1936 年	166308(1969 年) 246000(1975 年)	明代北版大藏经(套 色)一套,李崇同所藏 1644 年以前刻本和抄 本。宁波天一阁和徐乃 昌藏书及各名家评注 本	东亚藏书 212 579 (1969 年) 284 625 (1975 年)
哥伦比亚大学斯塔尔东亚图书馆	1902 年	164691(1969 年) 250000(1975 年)	家谱 1500 种,方志 1650 种,16794 卷,在 西半球占第三位	274 465 (1969 年) 353 212 (1975 年)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	1947 年	160000(1969 年) 200000(1976 年)	1867—1902 年傅兰雅 在江南制造局译书百 余种,约 2500 册。江亢 虎全部藏书 1.2 万册	290 000 (1969 年) 367 669 (1975 年)

(续表)

馆名	建立年份	中文文献量	收藏特色	其他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理查德·鲁道夫东方图书馆	1919年	142230(1969年) 186980(1984年)	主要收藏为东亚艺术、考古、历史、文学、佛教、语言,人文和社会科学	东亚藏书 192 907 (1969年)
康乃尔大学沃森藏书室		133592(1969年) 195071(1975年)	以近代史料为多。有中国及周围地区珍本书11300册,地图近20万幅,英使马格尔尼出使北京的书信稿件	东亚藏书 148 764 (1969年) 225 542 (1975年)
耶鲁大学东亚藏书室	中文资料收藏始于1878年	107579(1969年) 221705(1975年)	太平天国时期资料,容闳、容夔藏书	东亚藏书 163 822 (1969年) 350 000 (1975年)
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图书馆	1919年	99556(1969年) 156709(1975年)	1948年以来,收藏二十世纪出版的中文图书,特别是中共党史资料。藏有中国学家艾山克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藏书(托派文件)	东亚藏书 145 551 (1969年) 全部藏书 (刊)150万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1947年	98636(1969年) 150000(1975年)	中国西南地区资料。包括美人类学家骆克收集之我国纳西族经典4000余部、藏书300种	东亚藏书 132 328 (1969年)

(续表)

馆名	建立年份	中文文献量	收藏特色	其他
密执安大学 亚洲图书馆	1947年	97109(1969年) 194102(1975年)	中文善本有《易经》321种。英国档案局的中国档案缩微复制品3014卷,包括1815—1912年中英政府来往书信,1759—1951年大使馆、领事馆档案,1848—1957年的机密文件	东亚藏书 195351 (1969年) 308491 (1975年)

资料来源:孙越生等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第611—629页。

John M. H. Linback; *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p. 69.

综上所述,就研究机构之多、队伍之大、资料收集之丰富和研究成果的数量而言,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最重要的国家。这同美国的综合国力和美国的外交战略有密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民间机构,特别是私人基金会和私立大学,在促进中国学的发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基金会对中国学的资助

据估算,美国在中国学的研究和教学活动及工资拨款有一半以上来自私人基金会^①。这个估计是有根据的,因为美国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在私立大学进行。私人基金会的资助是私立大学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一般而言,私立大学比州立院校有更多的机会和自由

^① 孙越生等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第587页。

从事非应用性的人文学科研究,他们有较为悠久的、古典的、宗教的学术研究和向海外传教的传统。如前所述,有些私立院校很早就有了研究非西方语言文化的教师,并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而大多数州立院校和州议会,缺乏远见,认为对中国或亚洲的研究是国家的事情与本地区无关。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通过前,中国问题的研究和教学资金完全来自基金会的捐赠。

表 47 美国高等院校中国学外部资金来源(1933—1970年)

单位:美元

基金会	1933— 1945年	1946— 1957年	1958/1959— 1970年	合 计
洛克菲勒基金会	741 047	492 459	278 261	1 511 747
卡内基基金会			1 739 000	1 739 000
福特基金会		2 986 009	23 821 201	26 807 210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			50 000	50 000
亨利·鲁斯基金会			45 000	45 000
基金会合计	741 047	3 478 448	25 933 462	30 152 957
国防教育法中心			4 800 000	4 800 000
国防外国语奖学金			8 950 000	8 950 000
国家科学基金			250 000	250 000
国家人文学科基金			40 000	40 000
其他			1 000 000	1 000 000
美国政府合计			15 040 000	15 040 000
总计	741 047	3 478 448	40 975 442	45 192 957

资料来源:John M. H. Linback: *Understanding China*, p. 79.

从上表可以看出,1933—1970年间私人基金会向美国中国学研究提供的援助占外来资金的67%,来自政府方面的资助只占33%。从上

表还可以看出,福特基金会是美国中国学教学与科学研究的主要支持者。在不到 40 年的时间里投入的资金达 2 680 多万元,加上对其他国家中国学的资助,总金额近 3 000 万美元。^①

表 48 福特基金会支持中国学研究赠款分布情况(1952—1969 年)

单位:百万美元

年 份	美国国内赠款(包括 外国地区奖学金平均 每年 107 000 美元)	国外赠款	合 计
1952—1958	3.127	0.030	3.157
1959	0.126	0.100	0.226
1960	3.025	—	3.025
1961	4.452	0.020	4.472
1962	3.267	0.401	3.668
1963	1.371	0.130	1.501
1964	0.492	0.553	1.045
1965	1.757	—	1.757
1966	1.642	0.018	1.660
1967	6.560	1.063	7.623
1968	0.699	0.465	1.164
1969	0.432	0.020	0.452
实际总合	26.95	2.80	29.75

资料来源:John M. H. *Understanding China*, p. 79.

鉴于急需训练有素的学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的重点是那些已经拥有基础资源、能够从事多学科研究的院校,也包括一些全国性的学术组织。

^① John M. H. Lindbeck, *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p. 79—80.

表 49 1959—1969 年间接受中国学研究赠款的单位

单 位	金 额
哈佛大学	\$ 2 913 000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2 745 000
密执安大学	2 525 000
哥伦比亚大学	2 039 000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	1 800 000
华盛顿大学	1 742 000
康乃尔大学	1 363 260
外国地区奖学金项目(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管理)	641 800
普林斯顿大学	580 000
耶鲁大学	375 000

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学的资助是在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早在 1959 年 6 月,在该基金会资助,并参与策划下,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理事会在纽约附近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对现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会上成立了以“促进当代中国研究为宗旨”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JCCC),1982 年改名为中国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 JCCS)。此委员会由学者组成,负责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协调和资助工作。在它的推动下,研究领域扩展到法律、贸易、国际关系等方面。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一些新的学术组织,如:中国经济委员会、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所属中文研究资料委员会。为了推动各大学开设有关中国的课程和开展研究工作,福特基金会推行了一项关于大学研究现代中国的发展规划(1959—1960 年)。这个规划最初选中哈佛、哥伦比亚、加利福尼亚(伯克利)、西雅图华盛顿 4 所大学建立起中国研究中心。其条件是,具有东亚研究传统,有规模较大

的图书馆,有对苏联研究可以支持对中国的研究,能开设汉语初、中、高级课程,能在5个以上学科开设有关中国课程。后来又增加了耶鲁、密执安、芝加哥、普林斯顿、康乃尔、斯坦福等6所大学。大的研究中心每年经费25万—325万美元,小的研究中心每年经费2.5万—6万美元。

卡内基财团对中国学研究的赠款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范围与赠款数量不断增加。接受卡内基财团补助的大学有:亚利桑那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例如,1960年拨给亚利桑那大学10万美元,用于开设东方学课程,特别是教授汉语和日语,以及教授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法律和历史。哈佛大学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历史的综合研究计划是五十年代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的一项最大的计划,得到卡内基财团的资助。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福特基金会以外对中国学进行资助的最大的基金会之一。如前所述,1933—1970年该基金会对美国国内的中国研究资助总额达1 511 747美元,1958—1970年对美国国外的同类资助达366 075美元。其资助项目如,拨给国会图书馆10万美元以上,用以购买中国和日本的图书;资助亚洲研究协会在1951年设立中国思想委员会研究儒学;帮助中国台湾有关单位研究甲骨文和汉简等。其最大的赠款用于有中国研究中心的各大学的研究基金,本科生、研究生的奖、助学金,图书购置以及学术著作和参考资料的出版工作。

亨利·鲁斯基金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 INC.) 1936年建于纽约。《时代》周刊的奠基人和总编辑亨利·鲁斯和他的夫人是基金会的捐赠者和创办人,其目的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父亲、长老会来华传教士、前燕京大学副校长亨利·温斯特·鲁斯(Henry Winsters Luce)。亨利·鲁斯于1967年辞世,基金会接受了他的大部分遗产。1994年总资产为473 951 681美元。其子亨利·鲁斯为第三任

基金会主席。基金会的宗旨是增进美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其最感兴趣的领域为：高等教育、基督教在中国。对中国学的资助通过三个渠道进行：(1)资助关于亚洲事务的专项研究计划；(2)鲁斯学者计划；(3)为美国国内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提供资助。

表 50 亨利·鲁斯基金会资助中国学研究项目选要(1978—1994年)

年份	接受单位(或个人)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1978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	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研究项目及研讨会)		成果为《不确定的年代：中美关系1947—1950年》(1980年)
1983	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	视觉艺术交流的研究	45000	
1985	邹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	文化大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		该书于1985年出版
1986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	建立中国学研究生第一年奖学金	150000	2年用
1986	研究型图书馆小组(加州、斯坦福)	美国6所高校图书馆及国会图书馆所藏濒危中文研究资料的保存	30000	
1987	普林斯顿大学	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中国基督教大学史	30000	项目主持人 Prof. John F. Wilson(约翰 F·威尔逊教授)
1987	普林斯顿神学院	编纂美国大学图书馆、档案馆所藏有关基督教在中国资料学术指南	75000	

(续表)

年份	接受单位(或个人)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1987	堪萨斯大学	中国基督教史项目博士后奖学金	150000	3年用,项目主持人 Daniel H. Bays (丹尼尔 H·贝斯)博士
1987	布鲁克林学会	中美关系研究	150000	3年用
1987	伊利诺大学	分析与出版有关中国的统计资料	225000	3年用
1988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	进一步支持对中国基督教大学研究	180000	3年用,项目名称为中国社会中的中西大学
1988	哈佛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国家、社会与中国农村家庭变迁	240000	3年用
1988	哥伦比亚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中国农村家庭	200000	3年用
1988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举办 1839 年以来中国革命史全国会议及出版事宜	80000	
1988	同上	完成费正清教授的两个研究项目,剑桥中国史与罗伯特·哈特日记	25000	
1988	芝加哥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文化革命后的中国	225000	3年用
1989	纽约美国自然博物馆	劳费尔所收集的中文善本书编目	55000	
1989	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首都华盛顿)	美国对华及东南亚政策研究	180000	3年用
1989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革命史研究	150000	2年用

(续表)

年份	接受单位(或个人)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1990	研究型图书馆小组 (美国)	12所美国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善本书联合目录	175000	3年用
1990	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大学	儒学基督教徒,中国基督教皈依者宗教、伦理著作翻译	25000	
1991	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的宪法与人权	225000	3年用。人权研究中心、法学院和东亚研究所联合发起
1991	哥伦比亚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比较研究	150000	
1991	康乃尔大学东亚研究所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的企业、文化与国家,1840—1949年	150000	
1991	哈佛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商代早期文明的考古调查	150000	3年用
1991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二十世纪上海的城市文化与社会发展	150000	3年用
1991	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的公民社会	150000	3年用
1992	胡佛战争、和平与革命研究所	台湾多元政治的出现 1986—1992年	30000	
1992	芝加哥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城市与农村家庭生活	150000	3年用
1992	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大学	从基督教观点看晚明宗教与文化:严廷瑞(1562—1628年)主要著作的研究和出版	30000	

(续表)

年份	接受单位(或个人)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1993	斯坦福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四川流动人口、劳工、妻子和妇女	30000	
1993	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云南婴儿生存研究	150000	
1993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云南婴儿的生存	140000	
1994	克莱蒙特-麦克堪那学院	燕京的经验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会议及出版	50000	
1994	哥伦比亚大学中美艺术交流中心	中美城市比较研究	100000	2 年用
1994	康乃尔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云南白族的佛教与民间宗教	160000	3 年用
1994	俄亥俄州立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的政治、法制改革与农村管理	130000	3 年用
1994	研究型图书馆小组(美国)	中美中文善本书的编目与注录	120000	2 年用
1994	阿克隆大学(俄亥俄)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毛以后的市镇发展	120000	3 年用
1994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	160000	3 年用
1994	马里兰大学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上海艺术(1850—1930年)	100000	3 年用

资料来源 *Grant Listings, 1986—1995, compiled by Foundation Center, New York. Walter Guzzardi JR.: 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 A History: 1936—1986,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1987.*

从上表不难看出,鲁斯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不算多,每个项目资助的金

额不少,集中在人文学科方面。在中国学的领域里,他们之所以对于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题目最感兴趣,主要是由于鲁斯家族的宗教传统。正如基金会主席鲁斯第三所说:“基金会的项目反映了鲁斯家庭三代人的广泛兴趣。”^①老鲁斯,中文名路思义,是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夫妇二人于1898年来华,在山东登州地区传教,先后参与创办齐鲁、燕京两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并曾出任两校的副校长,在筹款方面颇有建树。至今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原燕京校园)还有一座鲁斯亭,留为纪念。亨利·鲁斯生于山东,回美国受教育,后成为美国报业巨子,对中国始终念念不忘,保持着一种中国情结。他创办的《时代》周刊,一直以相当大的篇幅报道中国的情况,对于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塑造中国的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在美国关于鲁斯的研究又多了起来。人们注意到他在世时曾强调,多样化可以使世界更安全,应本着这个精神进行太平洋两岸的对话。他生前最后一篇演说认为东方和西方的两种不同的制度可以兼容,两者都要一同走向未来。至于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采取何种生活方式,则难以预卜^②。这比他在四五十年代极力鼓吹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大不相同。鲁斯基金会不仅是鲁斯家族财产的继承者,也是其精神遗产的继承人。其所资助的项目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基金会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有过作为,而且在继续做出贡献。据《美国奖、助学金名录》(含加拿大)的统计有36个。《美国中国学手册》则介绍了124个。后者包括了我们在上面列举的几家比较重要的大基金会。

① “Introduction.” 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 Inc. 1983 Report (New York, 1983), 2.

② Henry Luce; Toward Compatible Systems (February 1, 1967) in *The Ideas of Henry Luc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K. Jessup, New York, 1969, p. 214-215.

表 51 其他美国资助中国学研究的基金会

单位名称	资助内容	资助数量 (美元)	申请条件	发起单位
路易斯·哈克尼中国艺术研究奖学金	能反映中国文化的中国绘画,将中国艺术论著译为英文	8000	申请者必须为美国公民,且有过3年以上中文训练者	美国东方学会密执安大学
亚洲文化理事会、亚洲艺术研究基金、全国与中国学术交流项目	供美国学者、研究馆员、文物保护工作者研究、出访用,对现代中国进行深层次的考察和研究		提出与资助方针相符的申请报告,申请者必须为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	亚洲文化理事会、鲁斯基金会赞助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
美中合作研究项目	美中学者合作对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美中关系方面的课题进行研究		申请者必须是美国的高等院校	亨利·鲁斯基金会
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东亚史奖金	对研究1800年以来中国本土、东北、西北、越南、朝鲜、日本的杰出历史著作给予奖金		申请期限,每年5月15日,不限地区	美国历史协会
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和研究金	通过《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哈佛燕京图书馆帮助和支持哈佛对东亚的研究,对哈佛大学远东语研学系进行财政补贴		资助形式包括博士奖学金,访问学者资助,撰写论文资助。只限于人文社科	
雅礼协会教师、研究生交流和研究项目	宗旨为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对人员交流进行资助		美方限于耶鲁的医科与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师和学生	

(续表)

单位名称	资助内容	资助数量 (美元)	申请条件	发起单位
纽约斯塔尔基金会	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亚洲地区研究。为亚洲基金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协会、雅礼协会的主要赞助者	1993年赠款;华美协进社450000美元 中国国家文物局515000美元		主要捐赠人康内利阿斯·斯塔尔 长期在中国经商,开设保险公司

资料来源: Foundation Grant Index, 1990 - 1995, Published by The Foundation Center, New York. Grant Database 1995 - 1996 (CD-ROM).

从《基金会指南》提供的资料看,美国基金会对于资助与中国学有关项目的兴趣正在增加。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如何从整体上评价美国私人基金会在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仅就我们目前能接触到的材料看,这不仅取决于基金会资助的动机、方针、数量大小、资助的方向和重点,而且同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情况有关。在中国人民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基金会对于两国的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是弊大于利。因为就整体而言,它起的作用是延缓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化进程,而这种急剧的变化既是中国现代化所造成的,又是进一步现代化所必需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否认它具有任何积极意义。事实上,当时进行的点滴的社会改革与科学、教育、文化的建设工作都是中国现代化的生长点。这些生长点在社会条件发生根本变革之后,才有可能充分显示出它们的积极作用。在中国人民取得政权,全面展开现代化建设之后,美国私人基金会重新进入中国,在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第九章 北美文学在中国

第一节 北美文学开始传入我国

一、维新变法时期北美文学的传入

戊戌变法的前后,中国思想界对西学初步开放,在各种西方政治、经济、自然、科学思想及著作大量传入中国的同时,西方的文学著作与其思潮也随着进入中国。美国文学在其中所占的比重要低于欧洲文学,这主要体现在所译介作品的数量少于欧洲作品,对作品及作家的分析也不够系统化。这是因为美国文学在当时尚不如欧洲文学成熟,影响力也不及欧洲文学深广。早期译介到中国的美国文学作品,多描写美利坚新兴民族在新型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生活情景,充满对新大陆和人生的赞美和歌颂。

据吴富恒考证,最早译成中文的美国作品,有美国“文学之父”之称的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年)的代表作《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这与《中国翻译简史》的作者马祖毅的说法一致。但另据施咸荣文章的介绍,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年)传颂一时的诗作

《人生之颂》(A Psalm of Life)是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据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的考证,该诗早在晚清同治年间即由翻译官出身的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译出初稿,由清廷户部尚书董恂改为七绝,作者朗费罗的名字也意译为长友。后来这首诗还抄录在扇面上,由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满回国时,带给了朗费罗,朗费罗又把它作为珍品陈列在他自己的书桌上。朗费罗这首歌颂生命的名诗可称之为是中美文学交流的先声。^①

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于戊戌变法前后发动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白话文运动等文学改良运动。梁启超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以新型小说来改造全民族的道德、宗教、风俗、人心、人格,要求文学成为振奋民族精神,塑造民族新性格的途径之一。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坛上各种译自西方的文章、著作不断出现在报章刊物上。美国的文学作品也在此时被大量翻译引进到中国。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中译文载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10月22日《申报》,题为《一睡七十七年》^②。其后林纾译过欧文的《旅行述异》(Tales of Travellers)、《推掌录》(Sketch Book)和《大食故宫余载》(A Chandra),先后于1906年和1907年出版。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第7期上刊载了一份《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列出该年出版的80种翻译小说中,美国小说有22种。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半月刊,商务印书馆发行,创刊于1903年,1906年停刊),其中所刊载小说中有吴榛译的马克·吐温的小说《山家奇遇》和威士的小说《回头看》^③。光绪年间,上海的《东方杂志》发行伊始就以连载的形式

① 施咸荣:《美国文学在中国》,《翻译通讯》1983年第12期,第13页。

②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99页。

③ 同上书,第286—287页。

不断刊登译自美国的绣像小说、侦探小说等。

二、林纾的译作及成就

这一时期翻译美国小说成就最大的当首推林纾。1897年开始,林纾大量译介西方文学名著,震动了中国思想界与文坛。他先后翻译过美国13位作家的17种作品,其中华盛顿·欧文的3种,斯托夫人(Hu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年)的长篇小说1种,欧·亨利(O·Henry William Sydnew Porter, 1862—1910年)的短篇小说13种^①,都对我国早期思想界和现代文学有着特定的意义。华盛顿·欧文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美利坚民族的作家,通过风土人情、民俗民情、自然景色,以及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感想和思索,反映了美国当时日益高涨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欧文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将一个新兴民族的蓬勃向上的精神传播给一个面临政治改革与思想启蒙的古老民族,给中国的社会增添了一丝生气。至于林纾译的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黑奴吁天录》,其成就在中国文学界更是有口皆碑。林纾自己在译著的跋中谈到:1900年前后,美国资本家掀起了新的排华浪潮。在美华工被监禁,被屠杀。他感到,“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因此他翻译了斯托夫人描写美国农场主奴役黑人的小说,以儆醒人心。译著问世后,思想界反响强烈,流传很久。一位署名灵石的患者在《读黑奴吁天录》中写道,他读这本小说时“涕泪沆瀣,不可仰视,孱弱之躯,不觉精神为之一振,且读且泣,且泣且读,穷三鼓不能成寐”^②。中国广大的读者主要通过这

^① 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6—419页。

^② 张俊才:《林纾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期,第155页。

部译著,才开始了解了美国南北战争前广大黑奴的悲惨状况。一些有识之士还把美国黑奴的遭遇与当时中国人民所处的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联系起来,加以宣传,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1903年,署名醒狮的诗人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说:“依微黄种前运事,岂独伤心在黑奴?”1907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不满清廷的腐败,在东京组织了春柳社,宣传民族自强,曾把林纾译的《黑奴吁天录》改编为五幕剧,在东京本乡座公演,该剧后来也在上海及中央苏区瑞金演出过^①。《黑奴吁天录》这部名著的中译本对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林纾所译的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也为中国人译介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开一代之先河。欧·亨利是美国作家中最早用短篇小说描写现代美国城市社会中普通下层小人物生活的作家之一。林纾所译几篇都着重记叙美国城市中穷苦人的辛酸与悲哀。将这样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使我们较早地从文学作品中领略到当时美国人的生活,而这些作品也暴露出了资本主义早期就存在的弊病。林译小说对“五四”作家文学倾向、文学道路的选择,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五四”时期从事创作的文学家多数都从林译小说中吸取过营养,像郭沫若、鲁迅都直接受到启发。林纾用半白话文、用流畅的文笔译出不同作家的作品及风格,为中国早期小说文学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取得的最显著的成果之一,就是它引发了中国的文学革命,从观念、内容、形式诸方面对中国文学实行了彻底的革新,具体表现为在文学观念上倡导表现人生,反映时代精神;在文学内容上主张现代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在形式上则完全摒弃了文言文和传统僵化的文学格式,改用白话文写作,并广泛吸收外国多样化的文学形式和手法,以表现现实生活。

^① 施咸荣:《美国文学在中国》,《翻译通讯》1983年第12期,第14页。

第二节 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对北美文学的引进

“五四”文学革命加深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使中国文学登上了世界文学的大舞台。五四运动期间及其后的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涌现许多作家积极从事外国文学的引进工作。从这一时期起,我国作家对美国文学也开始了全面的接触,译介和研究也更加全面和深入。有的作家专门翻译美国小说,有的开始从小说、诗歌、戏剧等不同行当对美国文学进行了全面的接触,有的从事美国诗歌的鉴赏和创作理论的探讨。戏剧工作者们则初步尝试了美国著名剧作家作品的上演。更有一些中国作家在自己的小说、诗歌、剧本等创作中模仿自己熟悉和喜爱的美国作家的创作风格,吸收美国作家创作中多样化的手法,以丰富自己的创作力和感染力。

一、小 说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先驱鲁迅曾于1906年与周作人一起翻译、编辑并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在该书的第二册里收集了翻译的美国作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年)的小说《黄金甲虫》。后来鲁迅在对美国友人的回忆里承认爱伦·坡的作品早期对他有过影响这一事实,在《〈夏娃日记〉小引》中,称赞过坡的主张自我和注意发挥自己的个性。

二十世纪初至二十年代,美国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年)在其早期作品《屠场》、《煤油》、《煤炭王》等小说中反映了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艰辛悲惨的生活,深刻地揭露了垄断资产阶级的贪婪、腐朽及工业化社会对人性和人生的压迫、扭曲。

鲁迅注意到辛克莱的作品“对中国文学青年有启发和教益,并称赞辛克莱的文学论极新,极大胆”。^①

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年)是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界中民主传统的继承者,他的作品表达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坚信理性和正义的胜利。《野性的呼唤》这部小说描写了一只受过严格训练的牧羊犬返回自然的经过,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小约翰·引言》里说过:“《野性的呼唤》是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看的书,于是不知不觉,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在给江绍原的信中也曾谈到“杰克·伦敦的作品恐怕于中国的现在也还相宜”。^②

马克·吐温是美国杰出的幽默讽刺小说家,他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幽默讽刺作品,写出了美国“民主社会”的真相。鲁迅曾请冯雪峰找人把吐温的小说《夏娃日记》译出,并特为中译本写了《小引》,文中指出:“在南北战争后,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年)先就唱不出歌来,因为这之后,美国已成了产业主义的社会,个性都是铸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了。如果主张,就要受迫害。”鲁迅分析了马克·吐温的幽默,决不是为幽默而幽默,而是对美国社会的反抗和嘲弄,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的缘故了。^③

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同情并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她长期深入我国各地进行采访和报道,反映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活动。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特地请她撰稿并在编辑后记里向读者推荐史沫特莱。

在鲁迅看来,美国文学虽然比较年轻,但在世界文坛上却已经产生了不少杰出作家和诗人。他说:“只要一翻美国文学史,便知道美国

① 时萌:《鲁迅(域外小说集)的启蒙意义》,《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第78页。

②③ 同上书,第71—72页。

出过爱伦·坡、霍桑,出过惠特曼,这是美国人民的光荣与骄傲,我们应该认真不懈地把他们的优秀作品输送进来。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茅盾是位在国内外都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作家。在他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活中,写作了大量传世的小说作品,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作家的优秀作品,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从而对世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茅盾早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期间,翻译评论各国的小说和戏剧作品。1916年他出版的头一部译作是美国的卡本脱著的科普读物《衣》、《食》、《住》^①。此后茅盾在对西方文学的广泛研究和译介中,本着博览尽取、穷本溯源的方针,把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爱伦·坡是美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一位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他的小说创作中充满着对情节的神秘安排,对人物心理的深刻分析,及对现实生活的象征性讽刺。坡的作品集中体现了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流派。茅盾曾翻译了他的小说《心声》^②。茅盾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坚持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以真实、典型化地描写社会和人生为主旨,对西方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偏爱,茅盾还翻译了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德莱赛(Theodore H. A. Dreiser, 1871—1945年)的小说^③。德莱赛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大师,他在自己的小说中运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个人物典型,对美国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描绘。

五四运动时期,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另一位文学巨匠郭沫若对外国文学及美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过重大贡献。在郭沫若多年来的创作活动中,无论在思想内容和形式上都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郭沫若从少年时代起,从大量阅读林纾编译的外国小说开始,对

① 曾逸,《走向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

②③ 张中良,《论茅盾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特点》,《茅盾研究资料》,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201页。

西方文学深感兴趣。他到成都高等学校读书时,读到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作《箭与歌》,据他说:“一个字也没有翻字典的必要便全懂了。那诗使我感觉到异常地清新,我就好像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的一样……使我悟到了诗歌的真正的精神”,这也就是他的“诗的觉醒期”。^①

青年时期的郭沫若在日本留学,开始直接阅读外文版的外国文学名著。当他在九州帝国大学读二年级时,他无意中买到了一本日本作家有岛武郎著的《叛逆者》,其中介绍了美国的大诗人惠特曼,这就又触发他对惠特曼的诗歌《草叶集》的深爱。据他回忆说:“惠特曼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到一阵暴风般的煽动”;“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②正是惠特曼诗歌中自由奔放热情的风格打动了郭沫若,而充溢在惠特曼诗行中的歌唱民主、自由、正义的激情,更加激发了郭沫若要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献身,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投身中国无产阶级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革命运动起了激励作用。

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是郭沫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最多的时期。在美国文学方面,郭沫若翻译过惠特曼的诗,但没有出版,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郭沫若在日本用“易坎人”的笔名翻译了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三部长篇小说:《石炭王》(1928年乐群书店出版)、《屠场》(1929年南强书局出版)和《煤油》(1930年光华书局出版)。辛克莱是美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郭沫若翻译他的作品是因为“他是坚决地站在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但他也觉得“他除暴

^① 成仿吾:《郭沫若选集英文版序》,《郭沫若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② 《郭沫若文集》第11卷,第143页。

露之外不能决绝地更前进一步”。由于这三部小说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还是给我国的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①

五四运动之后,二十世纪的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的小说界出现过不少的作家,他们潜心研究当时流行于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的作品,有的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体现出自己所喜爱的外国作家的风格。

小说家王统照以描写农村题材小说见长,在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前期,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刻画了我国北方农村的经济崩溃和阶级对立,从而达到了他的文学创作的高峰。1934年王统照赴欧洲考察西方的文学艺术,广泛接触了欧美文学各流派,对美国作家爱伦·坡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爱伦·坡小说中充满着神秘、怪诞、恐惧的形象和描绘,王统照却赞赏他的诗歌小说,技巧无不精美,认为他的作品“所示的印象更见沉实、鲜明”^②。1935年王统照创作了长篇小说《春花》。小说描写五四运动退潮期,北方省会的一群学生的分化,小说还刻画了这些出身不同、性格不同、归宿不同的青年的内心变化,书中间或采用一些富有象征的意象,以小虫落入蛛网,比喻有志青年为封建家庭所羁绊;以伤鸟找到故巢,形容信念破灭而遁入空门的青年的心境。作者在该书的自序中表示,他已经不满于“纯客观的写实主义”,他要透过社会的侧影来把握人物的心理和个性^③。《春花》就是王统照在客观写实中杂进主观的抒情和朦胧的象征的产物。

另一位小说家施蛰存最初从翻译外国小说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此后又开始了模仿外国作家,其中被模仿的作家中就有美国的爱伦·坡,但作品中缺少生活气息和特色。1928年施蛰存的《上元灯》集出版,标志着作者从单纯模拟外国文学手法发展到同自己的生活

① 戈宝权:《郭沫若与外国文学》,《郭沫若研究》,第152、155页。

② 曾逸:《走向世界文学》,第182页。

③ 同上书,第183页。

积累相结合,这才造成了他的独立的小说家的名声。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外国文化修养和背景及作者生活于其中的江南人情风俗画。在人物心理和故事情节的编排上,爱伦·坡在故事写作上震撼人心的感情效果、气氛与色彩的渲染、充沛的诗意、各种病态的怪异心理的表现,在施的《梅雨之父》、《善女人的行品》、《小珍集》里都有所展现。甚至爱伦·坡用极不寻常的写法创作的侦探推理小说,如《毛格街血案》,也会使人联想到施蛰存的怪诞的《凶宅》。^①

以写作《南行记》著称的小说家艾芜,在描绘自然时使人感到他不仅在客观地写自然,而是格外注意自然景物如树林和河水对人物情绪的微妙影响及自然和人的情感交流;在艾芜描写流浪汉生活的短篇小说中,也总是用力去表现自然本身的魅力,似乎在他的心灵天平上,自然和人同等重要。在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的小说《野性的呼唤》中,这种人与自然的交流也随处可见。艾芜在他所写的《文学手册》中也将杰克·伦敦、舍武德(Robert Sherwood, 1876—1941年)、安德森列为自己喜爱并受到过影响的作家。^②

1935年至1936年,郑振铎主编了大型文学丛书《世界文库》,摘译收集了世界各国的许多著名小说作品,全书共12册,7个分册上收集了美国小说家的中短篇小说14部,其中不乏名篇,有欧文的《妻子》、《鬼新郎》,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年)的《步福罗格太太》、《牧师的黑面纱》,爱伦·坡的《亚西尔之家的衰亡》、《发人隐私的心》,马克·吐温的《败坏哈德兰堡的人》,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 1843—1916年)的《四次会晤》,欧·亨利的《东方博士的礼物》、《一位忙经纪人的情史》等^③。这些小说中四部均由陈家

① 曾逸:《走向世界文学》,第282—283页。

② 同上书,第244—245页。

③ 郑振铎:《世界文库》,上海生活书店1935—1936年版,第二、三、四、七、八、九、十一册。

麟翻译,其余均为蹇先艾翻译。这几部小说分别代表了美国小说在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及几位作家的个人风格。从早期欧文、霍桑的浪漫主义,爱伦·坡的浪漫主义加象征派和心理分析笔法,马克·吐温的现代主义与讽刺幽默,亨利·詹姆士的表现主义心理分析,直到二十世纪初欧·亨利的批判现实主义。《世界文库》对美国小说的介绍确如编者所期待的让中国读者领略到了美国小说的风采。

三十年代,我国还翻译过很多美国当代的短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描写美国城市中普通人的生活现状的作品,内容多写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风土人情,人与人的情感交往及感触;第二类写个人的特殊遭遇及在生活中的挣扎奋争;第三类写华人移民在美国的经历与感慨。这类的作品数量很多,大部刊登在三十年代发行的一些期刊、丛书上。从我们接触到的两种资料《世界文学读本》^①和《西风》^②杂志上,我们仅能列出极少的例证。属于第一类的作品有《西风》上的《父亲的后悔》、《贤父教子论》、《出狱的大学生》、《老处女制造厂》、《私生子》,《世界文学读本》上的《两个医生的故事》、《爱之更生》、《碾煤机》。第二类有《西风》的《医院疗疾记》、《疯人院》、《视死如归》、《世界文学读本》的《Ahcho 与 Ahchow》、《50 年前的故事》、《捕鼠》。第三类有《西风》的《美国的小华侨》,《世界文学读本》的《阿金的泪》等。这些小说虽不出自名家,但所描写的小人物的生活琐事,向人们展现了市井百象,构成了美国的市民文学,使中国读者领略到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里特别是都市生活的风貌。

四十年代早期,马克·吐温、德莱塞、斯坦贝克(John Ernst Steinbeck,1902—1968年)、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年)的作品相继被翻译。抗战末期开始出版的“晨光世界文学丛

① 梅花馆主:《世界文学读本》,上海新文化书社1932年版,第三、四册。

② 林语堂、黄嘉德:《西风》1935年第1—4期。

书”，到解放前共出版了 17 种，其中包括卡静（Alfred Kazin，1915 年）的《现代美国文艺思潮》，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 年）的《华尔腾》，舍伍德·安德森的《温斯堡俄亥俄》，德莱塞的《珍妮小传》，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及爱伦·坡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 年）的小说集，朗费罗的诗集等。

二、诗 歌

与小说相比，“五四”以来中国诗歌创作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同样的，美国诗歌对“五四”后几十年中国诗坛的革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初期，虽然一批成熟的现实主义作家已经确立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主流，但仍有许多作家向往浪漫主义，无论是诗歌还是其他别的文学表现形式都普遍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与抒情色彩。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注重感情的自然抒发、流露，注重艺术的想象，形式上则提倡不受韵律限制的白话文。

美国浪漫主义诗歌泰斗惠特曼的诗歌创作《草叶集》恰逢此时传入我国。《草叶集》歌颂人、自然、劳动，但总的主题是歌颂民主和自由，把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国作为民主与自由的化身来歌颂。《草叶集》突出地歌颂了自我，抒发人的力量，肯定人的活力，诗人笔下的自我表现出粗野、强悍、充满生机，在开发新大陆，建设新生活的劳动中与自然达成和谐。《草叶集》用热情的语言歌颂大自然。在诗人看来，一切自然事物，无论是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山岳，还是脚下的青草，水中的小虫，都有其目的性，都在无时无刻地做着向上的运动，孕育着完美的种子^①。人们通过劳动解放了自然的力量，凝结成

^① 宁倩：《美国文学名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4 页。

现代物质文明,创造了世界和历史。《草叶集》充满着爱国、人道和独立的民族意识。

在诗歌形式上,《草叶集》冲破了美国诗歌因袭的形式,创造了自由体的诗歌形式。这种波浪涛涛的自由体,大量采用重叠诗句、平行句和夸张的形象的语言,使用一些劳动人民的语汇和少量的外来语构成有节奏变幻的语句,产生了丰富的形象表现力和雄辩的说服力,给人以直观的、完整的美。^①

中国诗人们从惠特曼的诗中看到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度中来自人与自然的蓬勃向上的力量,使他们为之振奋,坚定了他们在中国争取自由民主的信念,而惠特曼那行云流水般流畅、激越的语言更在中国诗人们的身上产生一股强烈的震撼力,促发他们直抒胸臆,表达对理想的追求,对美好的赞叹。总之,惠特曼的诗从内容到形式都迎合了五四时期中国诗人在思想观念上,在表达形式上的需求,亦使他们找到了新的社会形势下诗歌这一文学形式发展的道路。因此在“五四”及其后的二三十年间,中国诗坛上很多文人在诗歌创作中大胆效法惠特曼,中国诗界一时出现了创作自由体诗歌的热潮。

郭沫若除翻译介绍美国文学作品之外,更进一步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仿效着自己崇拜的外国作家,并同时把仿效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个性紧密地、自然地、生动地结合在一起。他在《创作十年》一书中称自己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是惠特曼式的,而且是正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这时他“作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他认为这是他“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惠特曼的诗对郭沫若的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影响,从他的诗《凤凰涅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中都可以看出来。惠特曼在十九世纪的中后期用诗歌赞颂内战中为粉碎奴隶制而战的民主战士和事业;二十世纪初

^① 宁倩,《美国文学名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5 页。

的郭沫若学习惠特曼的自由无韵诗体,以昂扬的语言、恢宏的气势写就自己的诗集《女神》,来概说“五四”的战斗精神。

爱国主义诗人闻一多早年留学美国,较深入地接触了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回国后在所写诗集《死水》中,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最有光彩,奔放炙烈,有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他的另一诗集《红烛》中的《太阳吟》、《忆菊》等也同样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对于这一方面所受到的外来影响,闻一多谈到过的诗人中,还特别称赞过惠特曼的诗。^①

著名诗人冯至的诗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性格,他兼收并蓄地吸收了优秀的外国诗歌里那种富有哲理、充满细腻情感和丰富想象的艺术风格,和向往光明、自由与个性解放这些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冯至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中的《满天星光》、《狂风中》里的那种要“另把这满天的星斗安排”,“用天河的水,另洗出一种光明”的热烈追求,又能使我们想到惠特曼《草叶集》中浸淫着的战斗和进取的精神。^②

诗人艾青是在外国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开始从事诗歌创作的。法国的象征派,英美的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旧俄罗斯作家与十月革命诗人的诗风对艾青形成一种综合性影响。其中,惠特曼的雄浑和宽广就像最深沉的底色一样出现在诗人背后。惠特曼的诗稿接触整个日常现代生活,他的平等思想使他嗜好用形象的充分列举来产生累积性的艺术效果。排比的爱好有时也给艾青带来过于松散和重复过多的缺憾。然而惠特曼的主要影响仍然促使那时的诗人们对民主坚定而热情地讴歌与向往。^③

比郭沫若、艾青晚一些迈进诗歌创作领域的何其芳也直接受到

① 曾逸:《走向世界文学》,第372页。

② 同上书,第444页。

③ 同上书,第478页。

惠特曼诗的影响,且效果尤为显著,因为他能在自己诗艺已趋于成熟的时候,将《草叶集》里繁富的思绪和自由的体式在他那里加以很好的中国式的改造。何其芳注意吸取惠特曼作品复杂的内涵,把新我与旧我的矛盾、个人与革命集体的关系等,作为自己诗歌的旗帜。从组诗《夜歌》中所歌唱的飘入脑际之窗的“众多的云”、《解释自己》所解剖的“赤裸裸的自我”和《多少次啊,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中所投向的草地——大自然的怀抱等,人们都可以联想到惠特曼的《自己之歌》、《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大路之歌》等诗篇。何其芳所受惠特曼的影响表现在其诗中自然的韵味、爽朗的情调和开放的思考方式。“何其芳的一首抒情诗《生活是多么广阔》是写给新时代青年的,其中稍稍留存了惠特曼《从巴门诺克开始》一诗的印记,但何其芳的诗更显丰满凝练,不像惠特曼作品那样松散、浩繁。《生活是多么广阔》一诗确实也贯穿着中国传统诗歌的‘血脉’,但又完全是新型的,它是在《草叶集》一类自由诗的薰染下写就的。”^①诗歌形式上的“自由体”与格律体是不可偏废的两极;无条件地推崇自由体必然导致诗歌的过分散文化;一成不变地严守某些格律,则反而会出现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那种僵滞现象。何其芳正是从惠特曼那里学到了打破旧框框的方法,但又逐步克服着散文化的倾向,所以有所成就。

二十世纪以来,欧美盛行意象派诗歌,而在美国则更是盛极一时。意象派诗歌强调从画面入手,诗与画、音乐有着密切联系,往往是情、景、音的交融。同时强调抛弃传统韵律,重意象的新奇,重诗的多层次意义,思维跳跃大。意象派否定了格律诗的硬性节拍,既保证了自由诗的弹性节奏,又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适于表达复杂多变的思想,戏剧性的内心独白,因此为现代派诗人所乐用^②。意象派诗歌从

^① 曾逸:《走向世界文学》,第538—539页。

^② 何海伦:《美国现代诗欣赏浅谈》,《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2期。

其诞生起就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而传入中国,而意象主义诗风第一次是通过胡适吹来的。

胡适曾于1910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当时正值意象派在美国的鼎盛时期。他当时非常注意美国诗界的意象主义运动,认为“意向派是对西方传统诗歌繁琐堆砌风气的反叛”。他的《留学日记》1916年12月25日那一页剪贴了一张《纽约时报》书评版登载的《意象派宣言》,这份宣言的主旨为:(1)对事物无论客观或主观的,要直接处理。(2)废除一切表达不起作用的词字。(3)节奏方面采取乐句,而不是按节拍器来创作。胡适对此宣言批注说:“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正是在意象派的启示下,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革命的八点主张,主要内容为:强调运用日常用语,使诗的语言通俗化,主张诗的格律上要有更大的自由,也强调直接描写事物^①。胡适提出的诸条件与意象派创作原则颇多相似之处。胡适还刊发了意象派诗歌领袖之一、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年)关于诗歌要具体意象的主张,提出写“具体性”,“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象的新诗,倡为白话新诗运动”。^②

当时中国文坛上正在进行提倡新小说、白话诗的文学改良运动,并持续发展为五四时期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在借引进美国的意象派诗歌来为中国的白话新诗开拓道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树立起新型现代诗歌的典范,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新的发展方向,进而配合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还创作了他的《尝试集》(1920年),这篇作品尽管艺术成就不高,但毕竟说明意象派诗歌对胡适的影响。与胡适同时期留美的梅光迪不无讽刺地说:“所谓白话诗者,纯拾自由诗(Verselitre)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

^① 白航:《朦胧诗的冲击波》,《星星》1986年第11期,第107页。

^②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义(imagism)之余唾。”^①

闻一多早年留学美国时熟读意象派的作品，并见过意象派主帅之一的罗韦尔。五四时期还产生过一批受意象派影响的诗作，如沈尹默的《月夜》，胡适的《湖上》，刘大白的《秋晚的江上》，王统照的《湖心》和闻一多的《秋色》，而康白情则是“创作上最接近意象派的诗人”^②。意象派诗歌的传入使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深受启迪，并因此促进现代白话诗在中国的推广，对新诗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十年代意象主义诗风再次传入中国，施蛰存曾主编《现代》月刊，介绍过意象派及代表诗人。与其共同倡导意象主义的还有徐迟、邵洵美、陈夕水、刘延陵、赵景深等。他们都曾在当时出版的《现代》杂志、《乐群月刊》、《新文艺评论》和《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介绍美国新诗运动和意象派主要纲领。《现代》杂志第五卷第六期还被辟为现代美国文学专号。邵洵美写道：要动作更自由，要声音更准确，要光亮更透明，这是意象派诗。他还认为意象派运动的最大意义就是充分表现了幻想在诗里面的重要。邵洵美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现代美国诗坛概况》^③。徐迟 1943 年 6 月在《中原》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美国诗歌的传统》，提出：“论内容，它许可了题材选择的绝对自由，因为它把更大的注意放在形式创造之上……而第一次欧战的战后文学却正是极尽形式创造之能事的。意象派主张描绘鲜明、坚实的形象，从这样的形象中便可以塑造出意象或神像来。”^④

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卞之琳受惠于西方现代诗最多，受惠于中国古典诗歌也最多。他经常成功地用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

① 流沙河：《意象派一例》，《星星》1984年第9期，第95页。

② 赵毅衡：《意象派简介》，《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4期，第74页。

③④ 刘岩：《意象派诗歌与中国》，硕士论文，第3页。

技巧改造西方现代派的意象。卞之琳的许多诗歌作品在新诗的韵脚的变化上做出了比任何新诗人更多的试验,特别引入西方高韵、抱韵、内韵等丰实了诗的音韵,这体现了诗人卞之琳对庞德所提倡的从被冲淡的自由诗回复到韵脚与规律诗节的赞同。^①

三、戏 剧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戏剧界逐渐注意并意识到了现代戏剧这一文学形式在世界文坛上的显要地位及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作用。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者们一致主张引进欧美先进的话剧艺术改造并摒弃中国传统戏剧中陈旧、僵化的表现形式。中国文坛上随之出现了翻译外国剧本和译介外国戏剧理论文章的高潮。这一时期在我国剧坛占主导地位的流派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新浪漫主义。在早期传入中国的欧美剧作中,美国戏剧所占比例很少,有1914年出现的剧本《中篝》(作者是查尔斯·克莱恩),讲述一名性格软弱的青年被迫违心地承认自己是杀人犯的故事^②;还有一部是喀拉客·尼琪的《聋人唇语学》^③。直到1918年《新青年》杂志刊出宋春舫的《近代名剧百种目》所列13国58位剧作家100种剧目中并未单独列出美国剧作家,只是在“English”栏下载有穆迪(W·V·Moody,1869—1910年)的《长别离》。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上出现由霞瀛翻译介绍美国戏剧的文章《近代戏剧论》,作者是美国的高曼女士(Emma Goldman,1869—1940年)。该文主要介绍了美国名剧《捷径》(后译为《梅罗香》)。1919年茅盾首次在《学生杂志》上发表

① 曾逸:《走向世界文学》,第498、523页。

② 《七襄》1914年第4期。

③ 《小说月报》第5卷第6期(1914年11月25日)。

《近代戏剧家传》，介绍了美国四位剧作家：托马斯（Augustus Thomas, 1857—1934年），著名作品有《亚立桑那》、《坏时辰》，茅盾认为他文字是好的，艺术也很精，但欠缺新思想；费趣（Clyde Fitch, 1865—1909年）也同样缺乏新思想，但善为喜剧，描写纽约上流人之生活维妙维肖；对于穆迪，茅盾着重分析了他的杰作《长别离》布局之巧，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很相近；对于麦凯（Percy W. Mac kaye, 1875—1956年），茅盾更看重他的理想，并介绍了他的《草人》。^①

二十年代，中国戏剧界在受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6—1906年）影响形成社会问题剧高潮的同时，也开始介绍发生在欧美的剧场革新运动。剧场运动在美国起步虽迟，但声势浩大。1921年5月创刊于上海的《戏剧》月刊在创刊后不到一年刊载过五篇关于美国剧坛的报道。其中，伊登（Horace A. Eaton）著、汪仲贤译的《美国最近组织的小剧场》，狄格斯（Dudley Digges）著、汪仲贤译的《美国的剧场公会》较详细地介绍了对美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小剧场运动^②。其他报刊杂志上还发表了莫西斯的《美国小剧场史》、冯国英的《美国的剧场协会》和陈治策的《欧美各国的近代小剧场运动》。1921年陈大悲参考美国有关小剧场运动的几本论著，撰写长文《爱美的戏剧》并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有针对性地对中国剧坛现状作了分析，并对中国话剧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强调剧本的重要性；在戏剧的综合艺术特点中强调舞台监督——导演的重要性；反对名角制、台柱制，强调集体合作的舞台演出；表演上反对类型化、脸谱化的分派制，力主学习西方的现实主义演剧等等。由于美国小剧场运动初期是以业余演剧姿态出现并成就辉煌，因而被称之为业余戏剧活动。对这一现象，陈大悲更是推崇备至，奉

① 雁冰：《近代戏剧家传》，《学生杂志》第6卷第7—12号，1919年7月—12月。

② 唐沅：《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为楷模^①。陈大悲的爱美的戏剧号召,在中国获得了切实而广泛的回响。爱美的剧团在此理论指导下,成云起之势,为中国话剧建设造就了大批剧作家、演员、导演和观众。

美国在小剧场运动期间,涌现出像匹兹堡的卡内基技术学院戏剧专科的实验小剧场,贝克(George Pierce Baker,1836—1935年)教授主持的哈佛大学戏剧系第47工场及美国其他大学的一些实验剧场,以致戏剧史家认为没有对大学实验剧场所做工作的通盘考察,谈美国小剧场运动的历史就会是不全面的。在美国小剧场运动影响下的中国话剧建设中,也出现了薄伯英、陈大悲等创办的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等先后主持的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田汉主持的南国艺术大学——南国社,欧阳予倩主持的广东戏剧研究所及他们各自配备的演出剧场。这些边开展教育边实行教学公演的机构,从理论到实践,从教育到演出体制对中国话剧的建设都是系统的科学的奠基性工作。^②

美国小剧场运动对中国戏剧创作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确立了戏剧艺术中导演的重要地位。洪深曾师从贝克教授,在哈佛大学第47工场系统地学习过戏剧理论、戏剧表演、导演等知识。1923年回国加入上海戏剧协社,他担任导演执导了《泼妇》、《终身大事》、《回家以后》、《少奶奶的扇子》等剧作^③。执导中实行男女同台合演,严格排演制度,指出演员的表演及剧中对话、动作、表情、化妆、布景等均要忠实传达原作风格和精神。1924年,洪深排演《少奶奶的扇子》采用美国小剧场演出中大量采用的厢式舞台布景,增强了舞台的立体感、纵深感。

① 田本相:《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234—235页。

② 同上书,第236页。

③ 同上书,第237页。

前文提到的《戏剧》月刊的第二卷第二期,还于1922年2月登载汉波的《纽约观剧第一记》,文章认为美国现在的戏剧尚处模仿时代,稍有价值的剧本,多半是由外国输入的。作者还在文中提到美国舞台上讥讽中国人的情况。稍后《戏剧》月刊第二卷第三期发表谢星朗译的《黑人演黑人编的黑人戏》,介绍了柯恒、底克生、闵什和其他一些黑人的作品。出版于1921年7月的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上的《1921年海外剧场消息》,刊载的全是美国剧场消息。文中提到莱斯(Elmer Rice, 1892—1967年)与修斯(Hatcher Hughes, 1883—1945年)合编的《醒起,菊纳杉》,并介绍了奥尼尔(Eugene O'Neill, 1888—1953年)及剧作《不同》。^①

1927年5月30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子戒的《现代美国剧》,这是我国最早对美国戏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考察的论文,认为美国十九世纪戏剧没有发展的原因在于:演员与剧场经理于剧场没有影响,美国剧的缺点在于它的主题时间太重,空间性太狭,它的构造重于技巧,轻于实质,人物常不能加重主人翁的描摹;对话用方言,方言是时时变迁的。^②

1929年5月,由欧阳予倩、胡春冰编辑,广东戏剧研究所发行的《戏剧》月刊在广州创刊,第一卷第四期刊登内森(G. J. Nathan)著、春冰译的《美国戏剧家概论》,对当时美国剧坛的状况进行了相当清晰、有力的概括。该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专论奥尼尔和其刚上演受到批评的剧作《发电机》,内森认为瑕不掩瑜。第二部分介绍了作者认为次于奥尼尔的一些作家如安德生(M. Anderson, 1888—1859年)、霍华德(Sidney. Howard, 1891—1939年)、格林(Paul Green)、劳伦斯(U. Lawrence)等10位剧作家,说这些人中有的曾表现出光亮的

① 刘思远:《美国戏剧在中国》,南开大学硕士论文,第7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斑纹,也偶尔创作出一两本性质真正的戏,但后来他们是闪电的戏剧家而不是持久的。在第三、四部分里,作者泛泛地写了许多剧作家,或为昔日明星,或为刚露头角的人,尚未表现出一鸣惊人的兆头。^①

《戏剧》杂志1929年7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二期分别刊登了春冰的《美国剧场的昨日》和《英美剧坛的今朝》。在后一篇总目下分列出美国最近剧和美国本季最佳十剧,重点介绍了巴瑞(Philip Barry, 1896—1944年)的《休假日》、莱斯的《隧道》及奥尼尔的《发电机》,多是内容简介,只谈及巴瑞的对话非常生动,说他讨论社会问题,加些机智、滑稽与创造,使人不觉得他是在传教或是革旧剧场的命。^②

另外,可查证到的一些短篇剧作还有《下午七点钟》,阿尔迪斯(Mary Aldis)著、汪仲贤译,载《文字》旬刊四期,1921年6月版;《上帝的手指》(独幕),维尔特著(Percival Wilde)、沈性红译,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二期,1922年12月版;《急变》(独幕),倍尔内特(Dana Burnet)著、思远译,载于《小说月报》十五卷五期,1924年5月版;《住居二楼的人》,辛克莱著、顾均正译,载于《小说月刊》第十九卷第十期,1928年10月版。

二十年代,中国剧坛上一批留美学者还发起过一场国剧运动。国剧运动的倡导者们早年向往西方戏剧,留美后,广泛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戏剧理论,视野开阔了。祖国传统戏剧文化的内在潜力与先进的外来文化影响在他们身上,生发出一种文化回归倾向,使他们确定要走爱尔兰民族戏剧复兴之路,以新型理论和表演管理方式复兴中国传统国剧。国剧运动的倡议是由几个留美戏剧先驱在美国开始发起的。当时在卡内基戏剧学校学习戏剧教育的余上沅在纽约发起成立中国

① G. J. Nathan 著,春冰译:《美国戏剧家概论》,《戏剧》第1卷第4期,1929年11月。

② 刘思远:《美国戏剧在中国》,第9页。

戏剧改进社,参加者有林徽音、梁思成、梁实秋、顾一樵、瞿士英、张嘉铸、熊佛西、熊正汉等人,并希望日后建北京艺术剧院。后余又与赵太侔、闻一多和熊佛西等人求得纽约华商的捐助,在大同公寓演出了《杨贵妃》、《牛郎织女》,引起了出乎他们意料的热烈反响^①。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等回国后,建立北平艺术剧院的计划虽未能实现,但在1925年经与教育部协商,乘美专复校之际促成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之创立。洪深称其为中国戏剧运动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因为一向被人视为小道的戏剧,这时开始列入中国大学之林,并使戏剧教育在中国走上大道^②。但艺专的教学常被人指责为复兴旧戏。在经济的压力和艺术观念不同而引起的矛盾中,艺专只维持了一年便失败了。

三四十年代,我国翻译出版的美国戏剧剧本和报章杂志上的评论文章,数量有增加、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对美国戏剧状况进行论述的文章有:

林疑今的《现代美国文学评论》,于1931年4月发表于《现代文学评论》,文中的第三部分专论美国戏剧,并重点谈到奥尼尔毫无粉饰地暴露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悲惨的社会。文章还特别介绍了美国左倾作家辛克莱(Upton Sinclair)及剧本《贼》、《地狱》、《歌囚》,米歇尔·高尔特(Michael Gold,1893—1967年)的《罢工》、《金钱》等。该文还谈到了莱斯的杰作《街景》、巴莱(Barry Phillip,1896—1949年)的《假日》具有漂亮的对话和巧妙的讽刺;柯尼勒(Mac Connolly Green)的《绿草地》以优美的结构,丰实的内容赢得了1930年度的普利策奖。^③

蔚人的《美国文坛倾向》,载于1936年的《东流》第二卷第三期,

① 田本相:《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第269页。

② 同上书,第272页。

③ 唐沅:《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第1249页。

其中对美国戏剧只提到了奥德茨(Clifford Odets, 1906—1963年)的《醒来吧歌唱》和《等待勒夫梯》等剧上演的情况。

云绛发表在《中央时事周报》第四卷第五期的《美国文艺界之现状》，集中论述了美国普罗(即“无产阶级”之音译)文艺，特别是普罗戏剧的状况。文章谈到普罗戏剧在美国之变为重要是近二三年的事，莱斯的《裁判日》与《两个世界之间》，与约翰·霍华德·苗森(John Howard Lawson)的《温和的妇人》均为名篇，而更突出的还有乔治·斯克莱尔(George Sklar)、保罗·彼得斯(Paul Peters)的《史梯芬多》，这个剧本在社会意识与戏剧技巧术上，都是空前的，可称为普罗戏剧方面从来未有的作品。^①

三十年代还出现过关于美国戏剧的长篇专论：钱歌川的《美国戏剧的演进》，在《新中华》杂志上从1933年9月开始分三期连载。这是一篇美国戏剧的简史，全文分六部分：(1)英国殖民时代，(2)独立革命时代，(3)南北战争时代，(4)新剧怀胎时代，(5)新剧勃兴时代，(6)新剧隆盛时代。文章叙述了美国戏剧从新英格兰清教时代历经对清教思想束缚的摆脱，合众国一次独立战争，二次国内战争，进而由浪漫主义走向现实，到以奥尼尔为代表的鼎盛时期。穿插在文中的还有对各阶段的重要人物的叙述，如马凯(S. Mackaye)、霍华德(Bronson·Howard, 1842—1908年)、托马斯、穆迪及奥尼尔、莱斯、格拉斯佩尔(Susan Glaspell, 1882—1948年)等。

1934年《现代》杂志的《美国文学专号》(五卷六期)发表了顾仲彝的《现代美国的戏剧》一文，文章侧重对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戏剧的评介。作者认为二十世纪初美国戏剧由英雄的闹剧转化为浪漫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社会道德观反映到戏剧中，戏剧转入新阶段，具体分为：写实主义戏剧和描写荒野民间生活的戏

^① 刘思远：《美国戏剧在中国》，第16—18页。

剧。顾文认为,美国一般戏剧家的思想较落后,因此戏剧中的冲突往往滞后于时代。对于描写荒野民间生活的剧作家,作者只在结尾处谈到,涉及到的剧作家只格林一人。^①

四十年代,处在战乱之中,评介美国戏剧的文章较少,影响较大的有孙晋三的《参战后的美国剧坛》,刊于1944年重庆《戏剧时代》杂志。作者介绍了1940—1944年美国剧坛状况,重点提到了作家海尔曼(Lillian Hellman, 1905—1984年)、萨洛扬(Willam Saroyon, 1908—1981年)、海明威、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 1896—1955年)及怀尔德(Mackaye Thornton Wilder, 1897—1975年)等。作者高度赞扬了美国戏剧界站在民主立场上,坚决一致反对法西斯的战斗精神。

关于奥德茨,张骏祥于1942年在《文艺先锋》第一卷第二十三期上发表了题为《美国当代剧作家克利福·奥德茨》的长文,对奥德茨进行了评介。文中共介绍了《等待勒夫梯》、《失乐园》、《醒来吧歌唱》、《乘风追月》及《天之骄子》等五部剧作。作者认为奥德茨的戏带给观众现代都市的速度、敏感和神经质;极端的悲痛常隐藏在外表的极平凡的事件里;在引起观众发笑的同时也会引起怜悯。而这一点恰是美国现代悲剧的关键性特征。

1944年,美国评论家沃特斯(Richard Watts)的讲演稿《现代美国剧作家及其作品》,经作家黄谷柳记录翻译发表在《戏剧时代》上,对当时资料缺乏的我国文化界简直是雪中送炭。沃特斯除了通报奥尼尔的最新写作情况外,还介绍了其他作家的简况,如萨洛扬、海明威、舍伍德、安德森、贝尔曼(S. N. Behrman)、莱斯、奥德茨、怀尔德及女作家海尔曼、布丝(Clare Boethe)和克罗萨斯(Rachael Crothers)等,并简明评介了他们的代表作,加深了中国文化界对美

^① 刘思远:《美国戏剧在中国》,第19—20页。

国同仁的认识。^①

三四十年代,我国文化界翻译出版了许多美国剧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在四十年代末由于美国文化界和政府中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大力推动,更使这一事业发展到高潮。

三十年代为配合我国左翼戏剧运动,钱歌川、关英存和缪一凡分别译出了辛克莱的剧作《地狱》,《天然女》和《文丐》。

翻译家冯亦代在四十年代译过数部美国进步作家的剧作。1943年,他以“楼风”为笔名翻译并由重庆东方书社出版了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剧中描述加利福尼亚两名农业工人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终因外界压迫和自身原因而遭毁灭。1942年他翻译出版了海明威的《第五纵队》。这是海明威唯一的剧作,是根据作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亲身经历写成的。1945年由他翻译、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尔曼《守望莱因河》也是一部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的剧作,此剧因深刻揭示了人的心灵,获得极大成功。1944年重庆美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冯亦代翻译的美国左派剧作家领袖奥德茨的《天之骄子》,剧中描写一位天才小提琴家为迅速成功而从事拳击、最终招致毁灭的故事。^②

三四十年代较重要的翻译剧本还有:侯鸣皋译的《民主元勋——杰佛逊总统传》,文建出版社1946年出版;傅又信译的《爱国者》,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唐锡如翻译的费奇(Clyde Fitch)的《真话》,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该剧阐述了讲真话的重要性;贺孟斧译的考克兰德的(Jack Kinkland)的《烟草路》,1944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

① 理查德·沃特斯著、黄谷柳译:《现代美国剧作家及其作品》,《戏剧时代》第四卷第4.5期,1944年6月。

② 刘思远:《美国戏剧在中国》,第33页。

四十年代末,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晨光世界文学丛书”收入 18 种美国小说、戏剧、诗歌和文学批评著作。其中剧作 4 部,即奥尼尔的《悲悼》,荒芜译;勃尔曼(S. N. Behrman)的《传记》,石华父译;舍伍德的《林肯在依利诺州》,袁俊译;萨洛扬(William Saroyan)的《人生一世》,洪深译。^①

从五四伊始至四十年代末中国文化界一直在不断地翻译、上演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的作品。1922 年 5 月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五期的“海外文坛消息”栏首次向国人介绍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称其是美国戏剧界的第一人才。胡逸云在 1924 年 8 月 24 日《世界日报》周刊之六上写了一篇简评《介绍奥尼尔及其著作》。1924 年 1 月,余上沅由美发回文章发表《今日之美国编剧家阿尼尔》,介绍了《天边外》、《琼斯皇》、《安娜·克里斯蒂》、《毛猿》、《最初的人》,称赞他的作品编剧精绝,有生气,富有创新。1929 年 1 月《新月》第一卷第十一号发表了查士铮的《剧作家友琴·沃尼尔》,同年《戏剧》第一卷第五期发表了胡春冰的《欧尼尔与〈奇异插曲〉》,1930 年 12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古有成翻译的独幕剧集《加力比斯之月》,包括奥尼尔早期描写海上生活的七个独幕剧,1931 年 1 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古有成译的奥尼尔的成名作《天边外》。1931 年中华书局以“英汉对照文字丛书”的名称出的钱歌川译注的《卡利浦之月》。1934 年洪深、顾仲彝合译了《琼斯皇》,马彦祥译了《卡利比之月》,袁昌英译了《绳子》;1936 年王实味译的《奇异的插曲》,王思曾译了《红粉飘零》(1938 年),怀斯译的《天长地久》,范方译了《早点前》(1939 年)。四十年代以后,聂鑫译了《安娜·桂丝蒂》(1948 年),朱梅雋译的《梅农世家》(1948 年),荒芜译的《悲悼》(1949 年)。到四十年代末,共发表出版了奥尼尔的 17 部戏剧,上演剧目 9 部,其中有些如《天边外》、《奇异的插

^① 刘思远:《美国戏剧在中国》,第 34—36 页。

曲》、《悲悼》等都一译再译。^①

奥尼尔为中国戏剧界所接受,首先是由于他的剧作中的现实主义文学倾向,奥尼尔创造出如何将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与现代艺术融合之路,用现代派的艺术技巧,表现美国特定社会、政治、文化条件下人们的现实生活和遇到的问题,及人物复杂、真实的内心世界。奥尼尔对中国戏剧的另一魅力,则是其剧中显示的大胆的探索与实验的高超艺术手段和技巧。他的风格变化之快常令批评家措手不及,他在《大神布朗》中大量使用面具,曾使人们震惊不已。但两年后,他又在《奇异的插曲》中大量使用旁白和独白,再一次使人们瞠目结舌。^②

奥尼尔对中国戏剧的影响,还表现在我国戏剧家在自己创作中对他的模仿。奥尼尔的《琼斯皇》于1920年写成并上演。1922年洪深写出了《赵阎王》,1923年宋伯颜写成《宋江》,1929年谷剑尘写成《绅董》,构成了一组中国式的《琼斯皇》群像。《琼斯皇》写黑奴在白人强权文明薰染下,精神扭曲,荒岛称王,后遇土著反叛,逃亡中恢复善良本性,精神崩溃被杀。全剧分八场,一、八两场写人物出逃原因及成果,二至七场描写出逃情景。而三部中国剧中都有主人公赵阎王、宋江、纱厂经理范之琪等作恶后神情迷乱中出逃。这三部剧无论在情节构思,背景设计,还是在人物内心的刻画等诸方面都是对《琼斯皇》的模仿。^③

在中国剧坛上受奥尼尔影响最深,吸收奥尼尔创作经验最成功的当数曹禺。

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恋情》主人公艾比、《悲悼》中主人公克利斯

① 刘海平、朱栋霖:《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310页。

② 汪又群:《奥尼尔创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③ 田本相:《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第397—398页。

丁与曹禺《雷雨》中的繁漪同是为追求个人自由和爱情而非理性地走上极端的女性。琼斯皇与《原野》中的仇虎也同属于自我分裂、自我矛盾,集美与丑、正义与邪恶于一身的形象。《琼斯皇》表现两种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意识侵蚀下的悲剧人物,《悲悼》表现陈腐变态的传统意识对人物正常生活欲望的压抑,《原野》则集中表现封建精神统治对被压迫者的精神异化^①。在人物形象和性格塑造方面,曹禺可算是深得奥尼尔的精髓。

曹禺在学习奥尼尔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手法方面也是值得称道的。《琼斯皇》中瓦解琼斯自信心,催他命的是土人战前举行的原始宗教仪式图腾舞蹈的鼓声,《原野》中则是富有中国传统宗教迷信色彩的鼓声(在最近修改本中,改为庵里招魂的木鱼磬声),红灯与叫魂声,猛烈地摇撼仇虎的心灵,使他的心灵彻底瓦解。^②

曹禺从奥尼尔戏剧中借鉴表现主义技巧,在《原野》中,人物的独白、幻觉处理、场景布置、音响效果及根据人物意识流动组织戏剧动作的结构方式,都受到《琼斯皇》的启迪而又加以充分消化吸收。正因如此,他在《原野》的创作中能在《琼斯皇》基础上有所发展,使之更符合生活的逻辑,也更适合观众的欣赏习惯。他在森林一场中加进了金子,使《琼斯皇》中的独白在这里变成了对白,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效果。

第三节 一九四九年以来我国对美国文学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系统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专事外国

① 田本相:《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第405—406页。

② 曾逸:《走向世界文学》,第641页。

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及对作家和文学思潮、流派的评价研究。但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整个世界处于东西方冷战之中,中美两国因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思想、文化方面隔阂很深。对美国文学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低于对俄苏文学和英国文学的研究。

一、前苏联对我国北美文学研究的影响

五十年代我们对美国文学的研究工作是在前苏联的影响下进行的。对现代、当代作家基本上是以政治态度决定取舍,着重介绍、赞扬进步作家,如法斯特(Fast Howard)、马尔兹(Albert Maltz)、迈克·高尔德、菲利普·庞诺斯基(Phillip Bonosky)等。对于像奥尼尔、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等地位重要而又倾向复杂的作家有所涉及,没有全盘否定^①。对待现代派文学缺乏深入研究,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对古典文学,只局限于肯定那些现实主义作家及作品,缩小了研究的范围和视野。当时对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焦点多集中在马克·吐温、德莱塞、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对在美国影响力深远的浪漫主义文学我们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介绍得也不多,只有像朗费罗、惠特曼等一二位进步作家被详尽地介绍给中国读者。1955年底,周扬在《草叶集》出版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表达了积极继承外国古典文化遗产的意向,宣称“《草叶集》是属于美国人民大众的,也是属于世界进步人类的”。并从内容和形式上肯定了惠特曼的诗作,指出其在思想上与我们相通的地方^②。全国各大报刊也先后发表了20余篇评介文章,翻译出版了两种惠特曼评传。楚图南在三十年

^① 施威荣:《美国文学在中国》,《翻译通讯》1983年第12期,第14页。

^② 黄梅,钱满素,王又国:《英美文学研究五十年》,《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3辑,第433页。

代选译的《草叶集选》也重新校订出版。上述文章一致肯定惠特曼在思想内容和诗歌形式创新方面的价值,称惠特曼为“民主诗人”或“人民诗人”。^①

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成了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一大批文学名著得到翻译出版。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马克·吐温的9部小说都在这期间翻译出版。它们是:张友松译的4部:《汤姆·索亚历险记》(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密西西比河上》(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子与贫儿》(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镀金时代》(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常健译的4部:《败坏哈德兰堡的人》(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傻瓜威尔逊》(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外,还有:叶维文译的《在亚瑟王朝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朱复译的《冉·达克》(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蒋一平译的《神秘的陌生人》(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马克·吐温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文化界受苏联文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中国读者对马克·吐温所独创那种以幽默讽刺来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狡诈、又以轻松幽默的基调歌颂年轻生命的风格特别偏爱。

这一时期,杰克·伦敦的几部名著也先后翻译出版,其中有:蒋天佑译的《野性的呼唤》(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裘柱常译的《海狼》(1953年新文艺出版社),许汝译的《雪虎》(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吴劳译的《马丁·伊登》(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万紫、雨宁译的《热爱生命》(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属于现实主义小说并得到出版的还有《欧·亨利小说集》(王仲年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

^① 《民主诗人瓦尔特·惠特曼》,《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9辑,第39页。

社),诺里斯(Frank Norris, 1870—1902年)的《章鱼》(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深远而悠久,但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能被译介出版的作品却很少,笔者所找到的材料中只记载有: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年)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长篇系列小说皮袜子传奇故事集之一》(金福译, 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霍桑的《福谷传奇》(杨立信译, 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年)的《白鲸记》(曹庸译, 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

与翻译出版这些作品的同时,只偶有零星短文介绍或在译文的前言后记中对作品及作家作一些评价,得到较多研究的仅有惠特曼和德莱赛。评论德莱赛的文章一般着重指出他的作品如何揭发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有关惠特曼的文章有杨耀民的《惠特曼——歌颂民主自由的诗人》和华中一的《惠特曼与格律诗》及《记惠特曼与格律诗》等。^①

二、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潮与北美文学研究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我国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与前苏联的分歧公开化,文学研究领域对前苏联亦步亦趋的现象停止了,但“左”的思想倾向仍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对外国文学特别是美国文学研究裹足不前。

1960、1961年文学界提出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而认定文学中的修正主义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外国古典文学所鼓吹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在历

^① 黄梅、钱满素、王又圆:《英美文学研究三十年》,《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3辑,第436页。

史上的进步作用到六十年代的中国已转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利因素。对美国文学一时间只研究进步文学和右翼文学代表赛珍珠等人,中间部分几乎只限于马克·吐温一人。

1962年文学界的提法有所改变,要求把批判地吸收外国优秀的文化成果当做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并决定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古典和当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重要理论著作。1963、1964年一些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但很快就遭到“左”倾思潮的非议和抨击,到1965、1966年外国文学研究就被迫停止了。

纵观1960—1964年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黑人文学得到充分肯定。《世界文学》当时还出了黑人文学专号。主要文章有黄星圻的《在斗争中成长的美国黑人文学》,施央千的《一股革命的火焰在燃烧——读反映美国黑人生活与斗争的文学作品》,李文俊的《战斗的美国黑人文学》等。黄星圻的文章具体叙述了美国黑人文学从早期的奴隶制下奴隶渲泄情感的悲歌、圣歌、历经内战洗礼涌现出的歌唱自由,控诉蓄奴制的黑人诗歌、散文,内战后黑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出现,直到二十世纪美国黑人二十年代的文艺复兴,哈莱姆派艺术的产生,三十年代起黑人社会问题小说的盛行,以及五十年代形成了黑人现代派文学这一段漫长的发展历史。文中介绍的二十世纪以前的黑人作家有诗人惠特斐尔德(James M. Whitm Whitfield)、小说家马丁·狄兰尼(Martin R. Delany)、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契斯纳特(Charles Waddell Chesnutt)、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及杜波依斯(William E. B. Dubois)。进入二十世纪后的黑人作家有发起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的文艺理论家詹姆士·魏尔顿·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和阿兰·洛克(Alain Locke)、哈莱姆艺术的倡导

者、白人作家卡尔·范·维琪顿(Carl Van Vechten)及追随者黑人作家克劳德·麦开(Claude McKay)。对于三十年代黑人进步文学,作者认为成就最大的当数诗人兰斯顿·休士(Langston Hughes, 1902—1967年)。作者认为,二战后美国黑人文学中出现了一股以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为代表的追求纯艺术自然主义、颓废主义的逆流。对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黑人进步主义作家,作者则满腔热情地加以赞扬,这些作家及作品有:劳埃·布朗(Lloyd Brown)的《铁城》,描写三个共产党员在狱中为营救一个被无辜判处死刑的黑人青年而进行的斗争;雪莉·格雷汉姆(Shirley Graham)的传记《黑人罗伯逊》;约翰·基伦斯(John O. Killens)的《杨布拉德》,写美国南部黑人地带一个工业城市的一家黑人工人的命运;老作家杜波依斯的《黑色的火焰》,反映黑人从1870年起为争取平等而作的顽强斗争;及新作家朱利安·梅斐尔德(Julian Mayfield),弗兰克·伦敦·布朗(Frank London Brown)和剧作家罗兰·汉斯伯雷(Lorraine Hansberry)等。其中汉斯伯雷的剧本《太阳中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1956)写美国普遍存在的住宅方面的种族隔离问题,该剧在百老汇上演,并大获成功。^①

李文俊的文章介绍的也是五六十年代美国几位黑人作家的作品:杜波依斯的《黑色的火焰》三部曲中最后一部《有色人种的世界》,最终向人们提出黑人的问题不仅仅是争取“投票、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争取使用自己所创造的财富的权利”;作者还介绍了以写过《杨布拉德》而著名的黑人小说家约翰·基伦斯推出的新作《于是我们听见了雷声》,该作品通过美国黑人青年知识分子桑德斯二战期间在美国军队中服役的亲身经历反映了美军中种族歧视的情

^① 黄星圻:《在斗争中成长的美国黑人文学》,《世界文学》1960年第2期,第135—145页。

形。戏剧方面,李文俊在文中谈到了女作家罗兰·汉斯伯雷的《太阳中的葡萄干》和黑人剧作家奥西·戴维斯的剧本《优胜的波利》。这两个剧本都讽刺了白人对黑人的歧视。诗歌方面,李文俊叙述了老诗人兰斯顿·休士出版的新诗集《问问你的妈妈》,诗人以幽默诗的形式,对种族歧视提出了抗议。他还介绍了休士编选的美国黑人诗集、黑人画史、黑人民间文学集、非洲文学选集,以及休士的讽刺小说《辛波尔》三部曲,《为自由斗争》即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历史。^①

1961年王佐良发表文章《疾风劲草——谈谈五十年代美国几位进步作家的几部优秀小说》,文章介绍了包括黑人文学在内的五十年代美国几位进步作家对阶级斗争这一主题的反映及作品的艺术成就。王佐良认为美国五十年代进步小说继承了十九世纪马克·吐温、诺里斯,二十世纪初杰克·伦敦、德莱塞等创立的用小说揭露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进步传统,并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关于黑人文学,文中也分析了劳埃·布朗的《铁城》,约翰·基伦斯的《杨布拉德》,杜波依斯的《黑色的火焰》,还有马尔兹(Albert Malltz)的《短促生命中漫长的一天》,描写狱中对黑人的迫害。王佐良的文章还介绍了描写外国移民在美国生活情景的小说,如菲利普·鲍诺斯基(Phillip Bonosky)的《燃烧的山谷》,写的是在美国一个立陶宛移民聚居的矿区,移民工人深受资方剥削,钢铁公司要扩充,就强迫工人搬出他们借债买下的小屋。又如另一位作家菲利普·斯蒂文孙(Phillip Stevenson)用拉司·劳伦斯(Lars Lawrence)的笔名写的《种子》三部曲,是写墨西哥人聚居在边城被矿业公司逼迫拆迁,引发冲突,遭到镇压的故事。另外斯蒂芬·海姆(Stefan Heym)的《高尔兹镇》,描写匹茨堡区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斗争场面,斗争中还出现了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人领袖甘乃第,其思想逐渐接近共产主义世界观。

^① 李文俊:《战斗的美国黑人文学》,《光明日报》1963年9月8日。

贝西(Alvah Bessie)的小说《非美国人》记录了美国统治阶级利用国会调查委员会的传讯、法庭审问和伪证镇压进步分子,特别是共产党人的行径。在艺术手法上,王佐良主要肯定了这些作品在以写实的笔调刻画生活和斗争的画面,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功。^①

第二类,主要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现实主义小说。文章大多在作者的生辰或逝世纪念日发表。

1960年马克·吐温逝世五十周年,报刊发表了一批介绍和评论文章。老舍在纪念会上作报告《马克·吐温——金元帝国的揭露者》。这篇发言从两个方面对马克·吐温加以评价,马克·吐温生活在美国内战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从自由资本主义跨进帝国主义的时期。这时美国统治阶级开始向海外进行掠夺性扩张与侵略,而马克·吐温能够在小说《美国权益的申请人》、《赤道旅行记》,杂文《对华和约》、《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等作品中对美国侵略者打着和平旗帜侵华、侵菲律宾的行为进行无情揭露。老舍称之为进步人类反对侵略战争,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有力武器。老舍先生重点肯定马克·吐温作品有力地揭发了资本主义的虚假文明。《竞选州长》以美国自由竞选为题材,以讽刺的文笔告诉读者所谓选举自由实为玩弄各种阴谋诡计的自由。《镀金时代》展示出一幅政府官吏、法院议会和新闻界中贪污盗窃的画面。《汤姆·索亚历险记》揭示出维护资产阶级道德的加尔文教派用清规约束别人,任自己腐化堕落的虚伪习性。《败坏了哈德兰堡的人》描写某镇19位首要居民既想获不义之财又想保荣誉的伪善心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反对奴役黑人为主题,描写白人少年哈克和成年黑人吉姆之间的真挚友情,赋予吉姆可贵的品格,高尚的情操,是对当时恶意歪曲黑人形象的大胆

^① 王佐良:《疾风劲草——谈谈五十年代美国几位进步作家的几部优秀小说》,《世界文学》1961年第1期,第95—109页。

挑战,是对黑人自由生存和权利的维护。老舍将马克·吐温的幽默总结为:吸取了西部民间幽默文学的丰富营养,并运用民间幽默故事中特有的极度夸张、鲜明对比、悲喜剧交错等手法卓有成效地鞭挞了丑恶的美国资本主义文明。^①

周珏良的文章《论马克·吐温的创作及思想》,分析了马克·吐温的一系列作品《王子与贫儿》、《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傻瓜威尔逊》、《镀金时代》,得出结论:马克·吐温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君主制统治,反种族歧视和压迫,痛恨资本主义贪婪残忍,反对帝国主义对别的民族侵略掠夺等思想倾向,并带有浓厚的人民气息。^②

陈嘉的文章《马克·吐温——美帝国主义的无情揭露者》,着重肯定了马克·吐温是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资本主义虚假文明的揭露者。

1962年欧·亨利诞生一百周年时,王佐良撰文《一位善于讲故事的作家》。文章在分析了欧·亨利几部名篇的基础上,概括出欧·亨利创作中的特点:背景多是纽约,人物大半是小职员、流浪汉、窃贼、警察、贫穷孤单痴心的女孩子;情节无不引人入胜,结构无不干净利落,技巧上的最大特点在于重偶合、故事结局常出人意外;在故事情节的编排穿插中注意气氛的渲染,以增强作品的效果;对社会的残酷黑暗,喜用嘲讽的笔调。王佐良的文章基本上代表了国内文艺界对欧·亨利的评价。^③

第三类,对现代派文学和赛珍珠等作家采取批判的态度。

① 老舍:《马克·吐温——金元帝国的揭露者》,《世界文学》1960年第10期,第127—132页。

② 周珏良:《论马克·吐温的创作及其思想》,《世界文学》1960年第4期,第126—137页。

③ 王佐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作家》,《人民日报》1962年9月11日。

1960年《文学评论》发表徐育新的《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同年第9期的《世界文学》同时发表李文俊的《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视》^①和思慕的《猫头鹰的诅咒》^②。这些文章都将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及其作品作为反共反华势力的代表进行了尖锐地批判。李文俊的文章认为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在对农民王龙一生经历的描写中，歪曲了中国农村中阶级压迫的实质，把中国农民和城市贫民写成一群暴徒，把地主阶级腐烂透顶的行为，硬加在中国农民的头，还把帝国主义走狗的奴才心理说成是中国全体人民固有的品质。赛珍珠的小说《年轻的革命者》写青年高生在北伐军中当兵时的所见所闻，这部小说把中国人民反对剥削压迫者的革命战争说成是人民之间自相残杀的行为，而革命军队不过是为广大人民所切齿痛恨的匪军。李文俊和思慕的文章都对赛珍珠的另一部小说《北京来信》进行了分析批判。小说写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善良、忠于职守的大学校长杰拉德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受到歧视迫害以至被穿制服的人暗杀。李文俊和思慕都认为，《北京来信》把中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说成是种族歧视，是要在美国人和西方人中间挑起对新中国的仇恨。

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的美国开始盛行，我国文化界在当时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批判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文章有《腐朽的文明，糜烂的诗歌》、《文学艺术的堕落》及戈哈的《垂死的阶段，腐朽的文学》等。其中戈哈的文章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垮掉的一代”的文艺作品是崩溃的精神、爵士音乐疯狂的节拍和宗教上神秘的极乐境界的混和物。“垮掉的一代”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加深，政治制度愈加反动、腐朽，文化和社会生活瓦解，理想和道德观念破

① 李文俊：《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视》，《世界文学》1960年第9期，第95—128页。

② 思慕：《猫头鹰的诅咒》，《世界文学》1960年第9期，第129—135页。

灭的形势下产生的,其作品中浸透了资产阶级的没落意识。“垮掉的一代”的哲学体系是自我扩张式的唯我主义,宗教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存在主义;文学上则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种种颓废派有着血缘关系,是集西方颓废文学的大成,又是它们的恶性发展。^①

袁可嘉的文章《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对美国现代派诗歌的主要流派及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其中有一战后意象派的庞德、休姆(Thomas Ernest Hulme)、希尔达(Doolittle Hilda)、杜里格,二十年代庞德的新古典主义诗作,三十至四十年代卡明斯(E. E. Cummings)和克兰(Hast Crane)的超现实主义,五十年代奥尔森(Charles Olson)为代表的放射派及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为首的垮掉派诗歌,并从中总结出现代派诗歌艺术的突出特点:思想知觉化,联想自由化,象征隐秘化,意义晦涩化,反理性,尚蒙昧。袁可嘉认为英美现代派诗歌是第一次大战以来日趋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日趋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的缩影。^②

海明威也是当时被介绍过的美国作家。董衡巽的文章《海明威浅论》对海明威及其作品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文中通过分析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太阳也升起了》、《第五纵队》和《钟为谁鸣》,认为海明威作为美国迷惘一代的作家代表,在前两部作品中表达了对战争的诅咒,但又表现出面对战争的残酷无能为力的悲观情绪;而在后两部小说中写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应被列为二十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海明威的作品中特别是后期的《老人与海》,塑造的硬汉形象活生生地表现了知识分子那种不满于现实、孤僻高傲的精神面貌。董衡巽的文章还总结出海明威艺术风格的最大的特点是含蓄。具体体现在作者把哀怨、忧伤、绝望、悲愤、激昂和讥讽凝结在

① 戈哈:《垂死的阶级,腐朽的文学》,《世界文学》1960年第2期,第147—157页。

② 袁可嘉:《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第65—85页。

简单、迅速、重复描写的动作中,蕴涵在行文自然的叙述里和简洁的对话中。文章对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也进行了介绍,即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是形象,深藏海里的八分之七是感情^①。

1966至1977年中国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美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基本停止。

三、对北美文学研究的扩大与深入

1977年后,“文革”结束,我国在思想理论和文化等领域实行全面的拨乱反正。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禁区的冲破,对美国文学的研究重新展开,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

美国文学的研究者们有的从文学史的角度对美国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完整的综述,有的对美国文学中的某些名家和作品作专题性的评论。

属于文学史类的著名著作有董衡巽、朱虹、施咸荣、李文俊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这部书按不同的历史时期分阶段,根据小说、戏剧、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对美国历史上各种有代表性的文艺思潮、文学创作倾向、作家及作品进行了概括性描述。全书按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章节,在每一章开头简述该章所属历史时期内社会文化思潮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然后再具体、详细地介绍每一位作家及作品。《简史》共有上、下两册。上册起自美国独立后开始产生美国人自己的文学,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作者认为内战前的美国曾于1815—1865年出现过第一次文学繁荣,其间浪漫主义为主体,出现了华盛顿、欧文、库柏、霍桑、麦尔维尔等小说家,也出现了爱伦·坡、拉尔夫(James Ralph, 1695—1762年)、爱默生、朗费罗、惠

^① 董衡巽:《海明威浅论》,《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第48—64页。

特曼等大诗人。这些作家以民主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美国社会中大众生活为题材,创造了富有美利坚民族特色的文学,它也标志着美国文学开始以成熟与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①。《简史》的下册,共有两章,分别介绍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六十年代第二个时期美国文学的发展状况。作者认为美国在1914—1945年间出现过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学繁荣。众多文学流派、作家和作品的涌现,表现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精神世界方面的问题。一次大战后资产阶级传统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思想失去昔日的光彩。来自欧洲的现代主义流派、象征主义、主体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表现主义等传入美国。

诗歌方面以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年)、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诗人首次提出诗歌创作口语化、新节奏、题材自由、表现意象、坚实与清晰和高度集中等六条标准,并在诗歌写作中不断实践意象派理论。^②

小说方面德莱赛继续创作着描写现代生活的新现实主义作品;亨利·詹姆斯的心理分析小说则开了美国后来意识流小说的先河。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质,促发了参战作家写出一批厌战、反战的小说,海明威把这种厌恶、迷惘、悲观情绪发展到了顶点,成为以怀疑、彷徨、悲观和失望著称的迷惘的一代作家的代表。同时代的作家,安德森用小镇居民的彷徨和不安表现一个病态的社会;菲兹杰拉德在绚丽的文体中流露出悲伤;福克纳用丰富的想象开始创建一个新旧交迭时代的南方的艺术世界;托·沃尔夫

^① 董衡巽、朱虹、施咸荣、郑士生:《美国文学简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9、151—158页。

^② 董衡巽、朱虹、施咸荣、李文俊:《美国文学简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用殷切而又惆怅的心情诉说着年轻一代的憧憬与梦想。^①

戏剧领域中的奥尼尔以内心独白、梦境、潜台词在舞台上探索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奥尼尔的成名作《毛猿》富有幻想和象征的意味,通过主人公荒诞离奇的经历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危机,致使有的人无法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归属。^②

《简史》认为以上这些是美国在二十年代的文学主流。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学则呈现多样和庞杂的特点,左翼文学与畅销文学,南方文学与主流文学形成并存的局面。

《简史》的第五章谈的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文学^③。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对现存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产生怀疑,促进各种新思潮诞生;战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超工业社会,造成一面是物质上的相对富裕和舒适,一面是精神苦闷、彷徨的社会现象,由科技、管理等人员组成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要阶级,他们及其家庭成员成为当时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大战结束后,一度占领美国文坛的小说主要是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战争小说,诗歌运动中出现了继往开来的中间代诗人;戏剧方面出现了阿瑟·密勒和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向旧传统进行反叛和挑战的垮掉的一代的文学。六十年代,美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对现实丧失信心,对作家的创作思想产生影响,出现诗歌中的自白派,戏剧中的荒诞派,及小说中的后现代派。七十年代,美国的诗歌无重大发展,戏剧在走下坡路;小说出现相对的繁荣。在艺术方法上,现实主义又受到重视,不同流派进一步相互渗透;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又出现了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结合。二战后的犹太文学继承和

① 董衡巽、朱虹、施威荣、李文俊:《美国文学简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92页。

③ 同上书,第355—364页。

吸取欧洲文学中的养料,植根于美国的现代文明和社会现实,采用现实主义与其他流派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取得较大成就。两位犹太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和辛格(I. B. Singer)在七十年代获诺贝尔文学奖。

《简史》对美国不同时期文学的综合介绍与分析虽比较概括、简洁,但仍不失为国内最为系统、完整的研究美国文学发展史的专著。

另一部由常耀信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为指导思想与分析准则,把美国历史上出现的诸多现象按发展顺序加以分析和介绍,全书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且与美国的历史文化发展联系起来,从殖民地时期写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常耀信的《美国文学简史》与国内同类专著相比独具特色:在书的思想体系中,作者把美国殖民地时期产生的清教思想作为美国文学思想发展的主线,贯穿于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学中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至超验文学等流派的分析。作者在介绍美国文学的重要流派、现象及作家、作品的同时,向读者介绍了美国评论界的不同看法,并在书的注释和详细的参考书目中列出相关的参考资料,为读者提供了作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和资料来源^①。全书用英语写成适合英语学习者使用。

宁倩的《美国文学名家》对美国自建国后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二百年间出现的28位名作家进行了介绍。作者在书中循美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顺序,对美国文学史上各主要流派代表作家的身世、历史、发展道路、主要作品及作家的思想观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叙述和分析。从整体上看,《美国文学名家》虽把侧重点放到对作家的描写上,但仍可称得上是一部美国文学简史。

钱满素编写的《美国当代小说家论》,收集了国内23位作者对美

^① 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页。

国从二战后的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 24 位经历了一定时间考验,被公认为既有独创性、又有代表性的作家的评论文章。编者按作品中的主题来划分作家,第一类为注重自我探索和自我实现的后物质主义,但又带有精神空虚。代表作家有约翰·契弗(John Cheever)、欧文·肖(Irwin Shaw)、索尔·贝娄、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乔伊斯·卡洛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等。这些作家在写作上常常运用传统的方法。第二类主题的作品常以超现实的方式表现超验世界的问题,大部为奇思异想的产物。所谓超验世界的问题是对人类的抽象思考,特别是科学发展对人类的影响。这类小说是六十年代黑色幽默出现后形成气候,现已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小说新形式。主要作家有:威廉·盖狄斯(William Gaddis)、库尔特·冯尼格(Kurt Vonnegut)、约翰·巴思(John Barth)、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等。其中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尼格的《五号屠场》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统一。另有一类反战争主题的作品,如赫尔曼·沃克的作品《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说明反法西斯战争的必要性和意义。七十年代的美国黑人文学中涌现出阿历克斯·哈利的名著《根》,这是作者倾其 12 年心血写成的追溯美国黑人历史的小说。作品表明了在白人社会中感到没有根基的黑人终于获得了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在美国,自五十年代起还兴起过青年反文化文学,最早表现为五十年代的垮掉派青年,他们反对物质主义,反对中产阶级市民气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反对技术垄断的工业化社会。他们主张以反文化来代替社会改革,主要作品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的《毒品贩子》、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到了六十年代,青年反文化发展为社会反抗运动,出现了新左派和垮掉派的继承者嬉皮士等。新左派拒绝科学社会主义,认为人

情味的社会主义加上富于哲理的无政府主义更适合后工业化的美国。到了七十年代新左派又失去了影响,在文学上未留下什么直接的产物^①。钱满素的书还对美国犹太文学进行了概述,作品的主题多为边缘地位、自我本质危机、孤独、异化、归化、沉沦等在西方当代生活和思潮中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著名作家有索尔·贝娄、辛格、海勒、塞林格、欧文·肖等。美国的南方文学则是书中最后介绍的文学派别。南方文化在美国别树一帜是由它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特点所决定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方完成了内战后政治、经济重建,出现了以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年)为最高成就的南方文学复兴,其成就和影响及至二战后。出现了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沃克·珀西(Walker Percy)等作家,并分别形成三种创作风格,即:以描写南方风俗为主;以揭露南方某个特殊场景为主和把南方经验作为道德寓言来进行探索。《美国当代小说家论》使读者大致领略到了美国在二战后四十年间小说艺术发展的概貌。

廖可兑编著的《美国戏剧论文辑》收集了6位中国作者对美国现代戏剧史上5位剧作家和黑人戏剧所写的评论文章。编者在书的开头简述美国戏剧发展概况,并表明该书的编写旨在通过介绍分析美国各个时期戏剧界杰出剧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主要作品,使读者把握美国戏剧发展的主要脉络。按照廖可兑的划分,美国戏剧在十九世纪是以早期的浪漫主义和后期的现实主义为主流,并伴以印第安人和黑人戏剧的同期发展。二十世纪初美国吸取欧洲先进的戏剧理论,大胆采用科技知识,实行戏剧改革,终使美国在戏剧演出排演中诞生了自己民族的现代戏剧。三十年代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毛猿》盛行,成为美国现代戏剧繁荣的标志,奥尼尔在剧中运用了浪漫主义、

^① 钱满素:《美国当代小说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等创作手法,表现了一种对社会问题不满,但又无法理性地理解这些问题的心境。

二战期间,戏剧家莉莲·海尔曼的作品《小狐狸》、《守望莱茵河》获得成功。海尔曼作品的主题多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黑暗和坚决反对法西斯战争。

二战后成名的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以其代表作《欲望号街车》揭示美国妇女在社会中受污辱、被迫害并遭受舆论攻击的社会问题。

另一位在作品中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剧作家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长于抒发社会中小人物的苦恼,他们不满于现状,又无力摆脱。其作品《推销员之死》就很具典型性,主人公威利是位很精明的推销员,一心想凭借自身努力出人头地,几经奋斗,终无所作为,自杀而死。在这部剧作中,阿瑟·密勒运用表现主义创作方法说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小人物欲图报复,又无前途的悲剧。

荒诞派戏剧在美国的代表是爱德华·奥尔比(Edward Albee)。在奥尔比的笔下,社会现实多为丑恶,离奇,人都是像动物一样残忍、无理性,整个社会的前景是消极无望的。

六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黑人戏剧一般都短小精悍,为黑人争取自身权利起着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①

廖可兑的书简要地向读者介绍了现代美国戏剧走过的道路,可称得上是一部小型美国现代戏剧史。

前面我们列举的是中国“文革”后十年间对美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些成果。而在这十年间,中国文学界对美国文学研究的另一类成果是对文学作品、思潮或作家的专题研究。研究的侧重点分别为二十世纪前的美国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至三十年代起美国陆续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和作品;而

^① 参见廖可兑:《美国戏剧论文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取得最大突破的则是对美国六十年代起至七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作品及思潮的引入。

对于有进步倾向的作家重新出版了一些作品,如:霍桑的《红字》(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爱伦·坡的《金甲虫》(198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马克·吐温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98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竞选州长》(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及其它故事》(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惠特曼的《草叶集》出了多种版本;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珍妮姑娘》、《天才》(此三部书均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美国的悲剧》(1986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及辛克莱的《屠场》(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对这些作家及作品的研究,视野更开阔,内容更丰富。

宋兆霖的文章称库柏与欧文是采用民族题材、写出民族风格的美利坚民族文学的先驱和奠基人。库柏的几部名著分别创立了美国早期小说的体裁。《间谍》是美国历史小说的楷模;《拓荒者》创立起美国独有的边疆小说;《水手》则是美国最早的航海小说。这些小说的主题都是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歌颂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战争中的英雄。^①

美国作家爱伦·坡及其作品,自建国以来很少受到文学界的重视,甚至被认为是反现实主义的典型。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客观地重新认识爱伦·坡,一些文章对爱伦·坡的遭遇、创作思想、风格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爱伦·坡生前虽在美国小有名声,但受到同时代其他作家的蔑视,长期被清教传统的北方所歧视和排斥。与此同时,法国的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年)及后来的象征派超现实主义诗人却对爱伦·坡推崇备至。进入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坡在美国评论界地位直线上升,许多后起的小说家深受其影响:海明威在作品中表现出听从个人性灵的驱使;福克

^① 宋兆霖:《美国文学的奠基人》,《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第40—44页。

纳被认为接受了由坡传下来的心理恐怖；现实主义作家德莱塞认为坡是首屈一指的和最伟大的文学天才，其小说《美国的悲剧》中第42至47章里的梦魇似的氛围，心理分析的语言，读起来就像一篇坡的故事^①。针对国内“文革”前有人指责爱伦·坡的作品反动，王齐建认为坡的作品一未公开涉及政治，二未对资本主义歌颂升平，因此称其反动不妥，应对其重新评价。坡的作品题材上思路开阔，飘逸，勇于拓荒触禁，有一种地道的美国开发精神。主题方面，爱伦·坡将西方传统的爱与死变为罪与死，并将两者统一于恶。坡的很多故事就是这种恶的形象的图解。坡在一百多年前就在作品中表现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坡在形式风格方面的重要特征是想象、印象与效果的统一。王齐建称坡上承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下启现代主义，是三大潮流的交汇点，因此，其作品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表现力^②。改革后十年间，我国各学术期刊和杂志共发表关于爱伦·坡的研究文章十多篇，王齐建的文章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各家之说。

对与爱伦·坡同时期的另一位作家霍桑的研究，也比先前更见深刻。程星的文章，揭示出霍桑通过自己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来做着一个关于新世界的美国之梦，既从过去，从传统，从社会规范，从一切人类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在《教父的面纱》、《红字》、《七角楼》等小说中，霍桑表现的主题是人性的异化与人格的分裂，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主人公常陷入两种针锋相对的冲动和无休止的交战之中^③。另一篇熊玉鹏的文章，总结出霍桑在《红字》中的创作特长：在精细入微的心理分析中注重环境，索物抒情，景随情迁，情景交融，把抽象的心理写得具体可感，开创了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和心理分析小

① 王齐建：《试论爱伦·坡》，《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6辑，第317—318页。

② 王齐建：《首要目标是独创》，《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第1—94页。

③ 程星：《霍桑：寻求美国之梦》，《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第29—37页。

说的新时代。^①

马克·吐温历来被我国评论界视为美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李淑言的文章对马克·吐温作品的思想倾向进行了前后分期,前期对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引起的生活改善、物质文明、思想活跃是称赞的,对社会中政治弊端虽也讥讽,但笔调是以幽默嘻笑为主,这些在《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都有体现;马克·吐温的后期作品中对帝国主义的愤懑、谴责、讥讽是其主调^②。作者张廷琛则研究马克·吐温在一系列涉及中国人的问题上的态度。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许多华人劳工在美国受到白人虐待、歧视,吐温为此写作评论文章,讥讽小品,短篇小说攻击种族主义,批评美国政府对华人的政策,为华人争取权利。十九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列强大肆掠夺、侵略中国。马克·吐温同情中国人,公开发表演说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自称是中国的义和团员,抨击美国侵略中国是无耻的行径。对于那些来华进行文化渗透的西方传教士,吐温也斥责为满口虔诚的骗子,实际上像海盗一样地掠夺中国人民。^③

惠特曼被中国评论界一致推崇为美国浪漫主义、民主诗人。作者王希苏深入研究了惠特曼反对奴隶制的立场,得出结论:无论在战争中或战争后,惠特曼仅从维护共和国统一的角度来认识这场战争,从来没有把它看成是解放黑奴的革命途径。作者张禹九从惠特曼的一百来篇散文中捕捉到惠特曼对内战中伤员的同情,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开掘出惠特曼抒情言志的另一种文学体裁。^④

董衡巽对德莱塞作品的评价也摆脱以往的简单化,程式化,认为

① 熊玉鹏:《〈红字〉浅论》,《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第24—28页。

② 李淑言:《也谈马克·吐温》,《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第26—28页。

③ 张廷琛:《马克·吐温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4辑,第284—309页。

④ 王希苏:《谈惠特曼反对奴隶制的立场》,《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3期,第136—139页。

德莱塞文笔滞重是事实,但善于描绘广阔的社会生活,塑造典型形象,刻划内心活动,试图从本能和观察出发表现生活中悲剧的方面,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腐化与堕落。^①

以上所举研究成果给人以一种全新的科学、客观、令人信服的感觉。

新时期里我国文学界对一战后美国文学的研究重点围绕着当代的几位小说家。

小说家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年)被公认为美国一战后迷惘一代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被重点介绍给中国读者。这部小说从某些侧面表现了美国一战后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这段时期即爵士时代的美国社会风貌。小说的主题是鼓励个人奋斗的美国梦的幻灭,主人公盖茨比出身贫寒,从小幻想靠个人奋斗出人头地,可当他发财之后,却情场失意,被情敌陷害失去性命。盖茨比的结局,形象地说明了战后迷惘的一代对美国梦幻灭感到的悲哀。^②

海明威也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作家深受中国评论界的重视。他的战争题材的小说,他在文学创作中遵循的冰山原则得到人们一致肯定,特别是他的《老人与海》更被认为是把冰山理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丰富多采的潜台词,使小说的题材具有象征的性质,加深了作品的内涵,故事中人与大海和鲨鱼的搏斗象征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事的主人公那种虽败不馁的乐观主义精神是人类未来胜利的保证。^③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美国出现了“南方文学”这一流派,福克纳

① 董衡巽:《美国现代文学述评》,《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第7—8页。

② 李习俭:《美国梦的幻灭》,《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第123—128页。

③ 刁绍华:《试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4期,第33—41页。

是这一流派的代表者。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对他评论很多,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福克纳评论集》。人们一致认为,福克纳是美国突出的现代派小说家之一。在题材方面,福克纳创造了一套“约克纳帕塌法”(Yoknapatawpha)世系,对二百年来美国南方社会作了写照。作品中描写了南方种植园主世家飘零子弟的精神苦闷,像如何对待祖先传下来的有罪的历史负担,如何保持自己精神的纯洁性,何处寻求精神上的出路等,都是福克纳不断探索的问题。艺术手法上,他广泛使用意识流、时序颠倒、对位式结构、象征隐喻等手段。但作品中也存在着对暴力和性变态心理描写。小说《喧哗与骚动》描写了南方种植园主世家康普生家族四位飘零子女在家族败落的景况下过着懵懂、苦闷、堕落的生活,作者以此象征人生充满了喧哗与骚动。^①

六十年代美国作家中获得较大声誉的当数索尔·贝娄,我国文学界总结了索尔·贝娄的主要特征在于他反映了当代文学中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潮流相互交织的倾向^②。在贝娄的创作中体现为以弗洛伊德心理学和存在主义作为思想基础,创作方法上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贝娄的几部小说分别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摇摇晃晃的人》写经济萧条下犹太青年的精神压抑和苦闷;《受害者》写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间微妙关系的受害者;《雨王汉德森》描写一个古怪的美国百万富翁到非洲探险的故事;《赫尔索格》则表现六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的精神压抑和磨难,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精神状态。^③

① 李征戎、武国强:《南方望族没落的一曲挽歌》,《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第28—31页。

② 陈焜:《索尔·贝娄——当代美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世界文学》1979年第4期,第195页。

③ 毛信德:《美国当代现实主义的主要发言人——索尔·贝娄》,《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2期,第67—80页。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1951年)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小说从二十年代起在美国成名,但我国对他的研究在八十年代才开始,且研究作品的数量也不多,已有的评论公推刘易斯是美国新现实主义的开创者,首开用纪实笔法描写中产阶级普通人日常生活之风。他的小说《长街》被认为将以往文学中充满浪漫情调的郊野变成了醒醒的市侩习气的滋生地,将具有反传统精神的城市青年女子,改造为世俗女子。另一小说《巴比特》塑造了另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一个富有追求的个性被社会制度所扼杀,成为思想空虚、毫无个性、庸俗的人。巴比特也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个生活自满、思想贫乏的艺术典型。刘易斯在1947年写的《王孙梦》也被认为触及了美国社会和军队中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并把黑人知识分子作为正面人物加以歌颂,对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充满了信心。^①

美国的现代派小说到六十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评论家董鼎山主张六十年代的作品有新现实主义与黑色幽默(讥讽、荒诞、科幻手法)两个主流,并逐渐走向七八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②。属于黑色幽默派作家及作品被中国评论界介绍得最多的是约瑟夫·海勒和库特·冯尼格。

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描写充满狂妄、荒诞的内容,读来犹如幻想世界,却又奇异地适合当代美国^③。书中的当代世界是一种有组织的混乱,有结构的疯狂,人在这荒谬的世界上痛苦绝望,不得解脱。作者在题材的处理上采用丑角的冷漠来应付一切,视荒谬的人生为一场痛苦的现实,在绝望中发出大笑。^④

① 潘庆龄:《辛克莱·刘易斯和他的王孙梦》,《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第45—48页。

②③ 董鼎山:《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小说》,《读书》1983年第10期,第125页。

④ 王齐建:《存在主义与美国当代小说》,《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4期,第13页。

小说家冯尼格比较关心重大社会问题,作品广泛地涉及了社会制度、战争的疯狂性、种族歧视、环境污染、物质主义对人的统治、劳动者被当成机器等^①。《自动钢琴》怀疑未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贬低人的思想;《黑夜母亲》写一位同盟军情报员充当德国广播员,成为公开为恶,隐蔽为善的悲剧人物;《五号屠场》也描述了战争的荒谬;《泰坦星上的海妖》、《猫的摇篮》剖析各种宗教的实质是以无害的谎言去安慰痛苦、不幸中的人^②。冯尼格所用的科幻小说手法更是使黑色幽默的技巧别开生面,作家本人借此表达对社会黑暗的愤怒和悲痛。

“文革”后十年间,我国文学界对美国二战后诗歌的发展进行了追踪研究。陈焜的文章介绍了美国二战后三十多年来流行的诗歌派别:战后年轻一代诗人们受有机的自由诗体理论影响,在诗歌实践中坚持形式受主题制约,受艺术家的感受制约;黑山学院派主张诗的形式由主题的动力和诗人的呼吸来决定;而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重视的是毫无拘束地表现他们异化感情,及他们对美国现代社会的抗议;六十年代美国流行新左翼和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思潮,提出一切以理性为依据的东西都是人类压迫机制或压迫本能伪造出来的进行自我压迫的工具。但人一旦抛弃科学与理性又会陷入苦恼。这种思潮在诗界的产物就是自白派诗歌;七十年代末,美国诗坛上出现新超现实主义派,体现在诗歌上的特点是高度的神秘色彩,企图采用极端的手术来医治对于文明的不满,这种诗歌代表的倾向是抛弃身外的世界,从心理—政治领域退出,而躲进所谓无意识的,唯我的宗教情绪冲击之中。^③

① 陈焜:《黑色幽默,当代美国文学的奇观》,《世界文学》1980年第5期,第273页。

② 张子清:《冯尼古特和他的小说》,《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第49—54页。

③ 杨熙龄:《美国现代诗歌举隅》,《世界文学》1979年第6期,第293—301页。

何海伦的《美国现代诗欣赏浅谈》将意象派诗歌与中国诗歌加以比较,找出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年)诗作中对中国古诗中起兴手法的运用,及其他意象派诗作在所描绘画面和诗歌韵律、音节诸方面与中国传统诗的相似之处^①。向飞的文章详尽介绍了美国“自白派”诗歌。这种诗歌流派产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由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1816—1891年)首创,诗歌的特点是自我剖白,坦诚真露。作者在诗中诅咒战争、蔑视丧失人性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惋惜正义被遗忘、揶揄龌龊丑恶的灵魂,发泄他们对人生厌倦愤懑及悲观孤独的情绪。^②

新时期最初十年里,我国戏剧界、文学界对美国戏剧开始了深层研究,美国从二十年代起直到二战后出现的著名戏剧家及作品,大部分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有些专题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突破。奥尼尔多年来被中国评论界肯定为美国现代戏剧的杰出代表,他的表现主义思想倾向和他在剧作中娴熟运用的象征笔法,成为中国研究奥尼尔的集中焦点,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对他的人生哲学进行了深层探索。其中夏茵英的研究很有特色^③。夏认为奥尼尔的人生观经历了一个从不可知主义,发展为勇于反叛社会,积极有为,努力抗争的乐观主义,再到抗争失败,趋向存在主义的过程。熔于其间的还有古希腊的命运观念、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各种意识。这些观念在奥尼尔创作的三阶段都有体现:早期的《东航卡迪夫》、《加勒比斯之月》、《漫长的归途》中都是些被神秘之力戏弄、逆来顺受兼梦想型人物。中期的《毛猿》、《琼斯皇》等一批剧作中赞扬的是积极入世,乐观进取,反叛社会,努力改造,自我奋斗的

① 何海伦:《美国现代诗欣赏浅谈》,《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2期,第20—23页。

② 向飞:《神圣的痛苦,辉煌的绝望》,《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第92—98页。

③ 夏茵英:《奥尼尔人生哲学之探索》,《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第76—81页。

精神。后期作品趋向表现主义,但又不至于像后者那样阴郁、低沉,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安娜·桂丝蒂》中的大海给人以迁徙之便,鱼虾之利,亦会吞食人的生命,制造不幸。《更庄严的府邸》里的一扇门始终未能为西蒙打开,使他彻底摆脱世俗进入和平幸福的王国。夏茵英的研究给人以严谨、合理、恰当之感,确实将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戏剧界更有人通过上演美国剧作对美国戏剧进行体验与研究。七十年代末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密勒访问中国,与中国话剧界合作,亲自导演自己的剧作《推销员之死》,此剧由北京人艺著名演员英若诚出演主人公威利,演出获得很大成功。评论家董乐山认为,密勒四十年代名剧在中国的上演使其成了中国剧坛红人,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在美国剧坛冷落多年后的东山再起。^①

综观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文学界对美国文学的全面介绍与研究,确实是硕果累累,无论从引入的作品,向读者评介的作家,还是研究者采用的治学方法,思考问题的角度都呈现出异彩纷呈,风格独特。对传统的美国文学不再是以简单的政治尺度去衡量并加以全面的肯定或是否定;对现代派文学也不再视若祸水拒之千里。代之而起的是研究者在思想解放的条件下,对每一个文学流派、作家及作品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加以全面、客观的分析。对同一流派的作家据其独有的个人生活道路和背景,挖掘各自的思想倾向和创作特色;对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也要参照各自的创作背景总结出这些作品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对不同的文学流派则客观、科学地概括其特点和艺术主张,并找出不同派别之间的承继关系和联系。这就为美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① 董乐山,《创唯陈言之务去的新风》,《读书》1986年第10期,第66页。

第十章 中国文学艺术在北美

第一节 中国古典诗歌与庞德

埃兹拉·庞德(Ezra Loomis Pound 1885—1972年)是二十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和最有争议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他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海莱城,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州的汉密尔顿学院读书,在瓦巴施学院任教,1907年赴欧,旅居西班牙、英、法、意大利。他是文学上意象派运动(1912—1914年)的领袖,主编意象派文集(1914年),对二十世纪的英、美作家如叶芝、艾略特、乔伊斯、弗罗斯特、海明威有重大影响,故有现代诗鼻祖之称。后来着迷于货币改革运动,撰有《钱是干什么的?》(1939年)。二战期间,庞德在意大利广播电台上为法西斯摇旗呐喊,意大利投降后被美军逮捕,送回美国,以叛国罪被控。羁居首都华盛顿圣·伊利沙白精神病院,直到1958年才被释放,返回意大利。庞德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懂中文,却是一位中国古典文化的崇拜者。他在不列颠图书馆看到著名的汉学家、牛津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理雅格(James Legge 1815—1897年)翻译的“四书”“五经”,诵读再三,爱不释手,因无钱复制,败兴而归。后来终于购得一部便宜的上海版,随身携带,爱不释手。庞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最初了解主要来自十八世纪欧洲启蒙学者的著作。他对现代社会的不满,使他憧憬过去。他认为伏尔泰的《路易十四史》一书以关于中国的一章为结尾是正确的。庞德还把《大学》所载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做自己的座右铭。中国汉字所具有的象形、表意功能使他赞叹不已。他经常在他的诗作中加进一些汉字,表明他对中国文化的崇敬,加深读者的印象。

1913年庞德被美国东方学家范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1853—1908年)的遗孀选中,为其夫整理遗稿。庞德发现笔记本中有唐诗和《诗经》的译稿。这些译稿是在日本学者的帮助下译出的。庞德从中选了17首,其中包括王维的《渭城曲》、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等名篇,略加润色,于1915年在威尼斯以《中国》(Cathay)的题名出版,售价20先令。后来被艾略特收入《庞德诗选》,得以广泛传播^①。这部诗集以其清新的格调和意象,融翻译和创作于一体而享誉诗坛,经久不衰。艾略特称庞德为“当代中国诗的创新者”^②。卡尔·桑德堡说:“庞德大概是世界诗坛之冠”,“读了诗集《中国》,令人感到在人类精神上中国和我们近邻”。费兹杰拉德(Robert Fitzgerald)于1941年写道“有了诗集《中国》,中国瓷器就不再是必需的了”^③。庞德创造了一个美学上的奇迹。他把范诺罗萨笔记本上零散的诗句改写成才气焕发、具有永恒魅力的诗章;将千余年前惜别、旅途艰险、关山阻隔、边塞烽烟之类的中国题材与一战后人们对战争的痛苦回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特殊的心理效应。

庞德的名作——长诗《诗章》(The Cantos)是“1915年以后庞德

① Ezra Pound; *Selected Poem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 S. Eliot, London, 1934.

② 同上书, p. X VI.

③ Hugh Deme; *Good Deeds & Gunboats. 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Chinese Encounters*, San Francisco, 1990, p. 78.

的思想日记”。它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在精神上追求“超验”，揭示神明的力量，启迪个人；其二，是在智性上寻求全球性的智慧，以维护公民秩序，实现世界大同^①。全诗由120章组成。其中有12章引用了孔子的著作、中国的诗歌，甚至直书中国的表意文字。第13章援引孔子关于“长幼有序”的论述。第49章引用中国古典诗歌与舜王时的《卿云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②。第52章是《礼记》的意译。从53章起用9章篇幅简述中国自尧、舜、禹至清乾隆的中国编年史。其中，第55章叙述唐代历史，用汉字大书“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表现了诗人渴求应用儒家的政治原则实现天下大治的愿望^③。庞德深深服膺儒家以德服人的政治原则，热爱中国诗歌所表现出的意境。他相信中国和古希腊一样也能在西方引发一场文艺复兴。

《诗章》是庞德用半生精力写成的不朽之作。为了熟悉儒家经典，他翻译了《大学》(1928年)、《中庸》(1947年)和《论语》(1950年)，并在译者注中说明了他自己的理解。他指出，孔子比任何哲学家都重视政府的必要性和政府的管理作用。“中国的统治者遵循孔子在《大学》中所总结的原则，中国就得到安宁，否则，王朝就会衰落，混乱就会发生”^④。庞德认为，《中庸》是孔子的形而上学，该书由形而上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三个部分组成^⑤。在《论语》这部儒家的经典里，庞德发现了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表述方法的不同。他指出，亚里士多德用90%的时间讨论什么是错误，儒家的经典采取正面陈述的办法，读起来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庞德还引用伏尔泰的话来说明孔子学说的世

① *Major 20th Century Authors* Vol. 3, New York 1991, p. 2393.

②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 A New Directions Book, New York, 1991. p. 245.

③ 同上书, p. 290.

④ *Ezra Pound Confucius,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Great Digest, The Analitics*, New Directions Book, New York, 1969. p. 19.

⑤ 同上书, p. 95.

俗性。庞德强调,《论语》表明:“孔子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是龙,不带任何超自然的色彩,但具有非凡的见识”^①。虽然庞德借助于前人成果和他自己广博的语言知识,动手翻译了部分儒家经典,但是“四书”“五经”的里雅格译本仍然一直是他须臾不可离身的读物。美军士兵将他押送回国时,这部儒家经典就在他的行囊中。庞德称他从关押他的军用帐篷里看到的山为泰山。当他被关在华盛顿的圣·伊利沙白医院里时,他孜孜不倦地翻译了《诗经》三百篇。后来,他告诉朋友说,《诗经》的翻译工作使得他在精神病院里没有发疯。^②

美国的诗歌以中国为题材由来已久,对于“中国皇后”号的航行,诗人菲利浦·费利欧(Philip Freneau 1752—1832年)有过这样的描述:“芬芳的茶叶由此而到来,无需英王的认可。还有那包金的瓷器和精美的工艺品。”^③在朗费罗的诗里对南京富丽堂皇的宝塔有过生动的描绘,赫姆士为中国使节访问波士顿写下了欢迎的诗篇。惠特曼在《草叶集》里向中国人民发出过良好的祝愿。然而,真正能从中国的古典诗歌中吸取营养,获取灵感的,要属庞德。《诗经》三百篇和李白、王维等人的千古绝唱,在很大程度上也因庞德的诗作而得以传诵北美和英语世界。

第二节 中国古籍善本在北美

中国一向以历史悠久、典籍丰富著称。古籍善本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原因,一大批古籍善本在1949年以

① *Ezra Pound Confucius, The Uwobling Pivot, The Great digest, The Anaticts*, New Directions Book, New York, 1969. p. 191.

② *Hugh Deme: Good Deeds & Gunboats*, p. 84.

③ 同上书, p. 185.

前流往国外。除了日本,美国是收藏中国古籍善本最多的国家。如本志第八章第四节所述,美国收藏中文图书最多的图书馆有,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斯塔尔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康乃尔大学沃森藏书室、耶鲁大学东亚藏书室、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等。加拿大的中文藏书主要集中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多伦多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也是收藏中文古籍善本最多的地方。据粗略估计,各馆收藏的中文线装原本古籍约70万册,不及上海图书馆所藏古籍的一半。然而,各馆所藏古籍善本却达9000部之多。其数量远远超过欧洲(英、法、德等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收藏善本在1000种以上的有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馆、普林斯顿葛思德馆。

北美图书馆收藏中国古籍的主要渠道:

1. 清政府赠送。本志第一章第二节曾介绍1869年清廷与美国政府机构第一次交换图书的情况。此后,清政府又于1904年将参加路易斯安那购买百年纪念博览会的2000多册图书赠国会图书馆。为了答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清政府派唐绍仪为特使,赠给国会图书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共5040册(同文书局石印本)。

2. 派专人到我国收购。植物学家施永格(Walter T. Swingle 1871—1952年)于1915至1926年间3次到中国采购中国农业、类书、丛书、地图和方志6.8万多册。其中方志达1500种之多,为国会图书馆收藏方志奠定了基础。曾多次来华进行生物调查的植物学家约瑟夫·罗克代国会图书馆收集了一批西南各省方志。1933年国会馆通过王文山的介绍,购得山东潍县高鸿裁所藏山东各县方志180种。1934年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 Hummel 1884—1975年)来华购得近8000册中文图书。

美驻华公使馆海军上校武官义理寿(Irvin Van Gillis 1875—

1948年),为美国葛德思建筑师购买了古籍图书10.2万册。其中,仅乾隆木活字版(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原本就购得4套。在此过程中,每购得一种都有笔记。我国著名目录学家、版本学家王重民(1903—1975年)高度评价这份笔记,认为“在注解中,他几乎没发生一点错误”,并指出,所购图书与国会图书馆的藏书很少重复。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于1929年收购慕学勋私人藏书约4万册,其中有宋、元、明刊本300种,抄本、稿本70种,共4182册,后又增购1万册于1935年一并运回。

3. 利用日本战败的机会,大量在日本收购私人藏书。日本是中国以外收藏中国古籍最多的国家。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裘开明(1898—1977年)在二战后两次赴日购得各类古籍善本,仅明代所刻经日本人重新装帧的善本书就有百余部。美国国会图书馆也从日本藏书家手中买到1500部古籍图书。其中善本书在200种左右。中国台湾的齐如山所藏戏曲小说1000多种,李宗侗所藏名人手札也分别于1962年和1974年为哈佛燕京馆和芝加哥东亚馆购得。

4. 个人转让、赠送。美驻清廷首任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年)将他在华期间所收集到的汉、满文图书转让给国会图书馆,其中有一批太平天国文献。曾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任教的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年)将他所藏全套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中文教科书和科技图书赠给该校东亚馆。继傅兰雅之后在该校任教的江亢虎离任时,也将其藏书1.3万余册捐给伯克利。此外,如耶鲁东亚馆的早期中文藏书系我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所赠,其中有一套《古今图书集成》。孔祥熙曾向耶鲁东亚馆赠书1000册。该馆又获得简又文教授所赠太平天国藏书320种,640册。

美国图书馆所藏中文珍、善本书举要:

1. 宋元刻本:美国各馆所藏超过百部。

国会图书馆有宋版书十一部,如:宋绍兴间刻本《后汉书补志》三

十卷；元刻本十四部，如：《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三十六卷；元大德间刻本《宣和画谱》残存十六卷。

哈佛燕京图书馆：宋刻《明臣碑传琬琰之集》一百零七卷；翁同龢五世孙翁万戈家传善本近百种，其中宋元本堪称全美第一，如宋杭州净戒院刻本《长短经》、宋明州刻本《集韵》、宋刻本《丁卯集》、《会昌一品集》等都是罕见的。

2. 明清刻本：以明为主。

国会图书馆：明人文集中较难得的：罗治《大月山人集》十二卷（天启刻本）、章升字《巢鹊楼诗集》一卷（万历刻本）、王公弼《抱琴居集》五卷（明刻本）。

哈佛燕京馆：藏明刻本一千四百种左右。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馆：藏明刻本约二百部。明弘治十年（1497年）铜活字印本《会通馆校正音释诗经》为他处所未见。

芝加哥大学东亚馆：明刊本经部图书全美第一，如王肯堂《尚书要旨》三十六卷，孙继有《尚书集解》十卷，国子监校刊《尚书集解》十卷。

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明永乐刊本御纂《神僧传》。

3. 稿本、抄本、档案：

哈佛燕京图书馆：明黑格公文纸抄本《明文记数》；明蓝格抄本《钦明大狱录》；满文档：如《八旗钮祜禄氏通牒》、《吉勒图堪等骑都尉诰命》；清初抄本《牧斋书目》；《嵩年奏稿》20册；清廷驻美公使梁诚档案，12册，内有关于粤汉铁路、抵制美货、华工出国、华侨、中美贸易、留学博览会等方面的来往文书、公函电报等。

国会图书馆：清内府写本《多尔衮家谱》、旧抄本《马相辑要》。

耶鲁大学图书馆：洪熙元年（1425年）抄本《御制天元玉历祥异赋》。

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稿本《宋明兵制备览》、抄本《三朝要典》。

4. 方志、族谱：

国会图书馆收藏方志四千种,家谱三百种。

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三千八百五十八种。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馆藏族谱一千零四十一一种,约一万册。为中国以外所存族谱最完备之特藏。

盐湖城族谱学会:1918年入藏第一部中国家谱,1960年开始用缩微胶卷大规模复制世界各国所藏中国族谱以来,已成为收集中国族谱和地方志最完备的机构。该会藏有中国族谱缩微胶片五千种,地方志六千种。九十年代他们又完成了对台湾250多个地区的私藏家谱二万余种和地方志五千一百一十二种的摄制。

5. 丛书、类书:

《永乐大典》:国会图书馆41册,康乃尔大学东亚馆6册,哈佛燕京馆2册,葛思德馆2册,共51册。

《聚珍版武英殿丛书》:哈佛燕京馆1套,葛思德馆2套。

《古今图书集成》:哈佛燕京馆、葛思德馆各藏一部。

太平天国刻本(共二十九种),纽约公共馆二十三种,国会图书馆十种。

6. 地图:

哈佛燕京馆:《大明九边万国入迹路图全程》、清代地图如《嘉峪关外安西青海合图》、《嘉峪关外镇迪化伊犁合图》。

耶鲁大学东亚馆:藏有反映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各式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北美收藏中文善本图书的图书馆除了反映馆藏的卡片目录外,还有三种以书志形式面世的目录三种,即王重民编、袁同礼修订的《国会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录》、《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善本书志》、《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藏明版书目》。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重民遗作《中国善本书提要》共收四千四百余种,其中一千六百余种系国会图书馆所藏。普林斯顿书目也出自王重民之

手,共收一千一百三十六部。从这些书志中,我们可以对北美图书馆的中文善本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①

第三节 中国文物在北美

北美人民收藏中国文物和艺术品始于十九世纪上半叶。从事“中国贸易”的商人和船长出于猎奇,从中国带回了一批中国工艺品、丝绸制品、瓷器和家具,并不具有学术和鉴赏价值,正如本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说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势头。仅在北美东海岸的海事和中国贸易博物馆中留下了一些痕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年)收集了少量中国瓷器、漆器和手工艺品带回美国(约200件,1917年起在纽约州塞拉库斯博物馆展出)。大约与此同时,卫三畏收集了50件中国瓷器。此二人均为美国第一代中国通,对中国文化有较多的了解。他们的收藏可以算得上是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收藏。佩里(Ma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年)的舰队敲开日本的门户后,北美人热衷于日本艺术品的收藏,直到日本政府颁布法令禁止珍贵文物出口,收藏家的目光才再度转向中国。

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此后十多年的政局动荡和军阀混战为国外收藏家提供了攫取文物的有利条件。众所周知,清朝皇室是我国艺术瑰宝的最大收藏者。仅绘画收藏一项,就在万件以上。远远超过了元、明的内府收藏。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开始,经八国联军的劫掠,

^① 本节主要参考文献:钱存训:《欧美各国所藏中国古籍简介》,《图书馆学通讯》1987年第4期;鞠德源:《美国中国学资料见闻札记(上、下)》,《百科知识》1988年11—12期;沈津:《美国所藏中国古籍善本书》,《中国文化》1993年第8期;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元气大伤。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就是在此期间被掠走，售给不列颠博物馆的。在溥仪退位后的十余年里，宫中珍贵文物或以赏赐赠予的名义或因监守自盗，大量流出宫外。1900—1920年间，是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时期，也是北美博物馆中国艺术品收藏形成时期。美国著名的东方艺术品收藏家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6—1919年)原为火车车厢制造商，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收集艺术品。他的兴趣从惠斯特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 1834—1903年)的铜版画转向南亚佛教艺术和日本绘画，最后转向中国绘画。1907、1909、1910—1911年间弗利尔曾三次来中国，访问过龙门石窟。他自认为是以科学态度，专程到北京寻访早期中国绘画的第一个外国人^①。他的9000件美国和亚洲艺术精品全部赠给以他名字命名的国家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该馆于1923年5月23日起向公众开放。藏品很快就增加到22000件，其中中国历代绘画1200余件，包括宋《睢阳五老图》中之冯平、王焕二人像，金李山《风雪松杉图》，南宋林廷贵(译音)的《罗汉浣衣图》(意译)等传世孤本。《罗汉浣衣图》是弗利尔本人于1902年得到的，属于该博物馆的早期中国收藏^②。出生在德国的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年)曾三次来我国东北和西藏地区考察，1915—1934年间任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人类学部研究馆员。他对汉代陶器情有独钟，兼及玉石，收藏颇丰。著有《汉代中国陶器》、《玉器，中国考古和宗教研究》、《中国瓷器的开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在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年)的劝导下开始收藏中国铜器、瓷器和绘画的。福氏原为美以美会传教士，先后出任汇文书院(金陵大学

① *Biographical Outline, Charles Lang Freer, Founder of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by Freer Gallery of Art Dec. 1, 1992. p. 4.*

②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Freer Gallery of Art Handbook,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 C. 1976. p. 48—49.*

前身)总监督和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监院,做过盛宣怀和端方的顾问^①,喜好中国绘画、铜器、瓷器和其他艺术品,其收藏于1935年留赠金陵^②。著有《中国艺术大纲》、《中国绘画》、《中国神话》。在加拿大的传教士中,怀履光(William Charies White 1873—1960年)主教以研究中国文化闻名。他作为中华圣公会的传教士于1897年来华,长期在河南传教。他的收藏兼有考古和艺术价值,后成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馆的中国藏品的一部分。此人著有《中国竹画选:关于1785年的一套墨竹画的研究》、《中国的庙宇壁画》、《古代中国的甲骨文化》^③。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美的主要博物馆都有可观的中国艺术品和其他收藏。

表 52 北美主要博物馆中国文物收藏情况(迄于1929年)

地点、馆名	中国藏品 (件数)	特 点	来 源
纽约 美国自然史博物馆	3 500	古代铜器、铜镜、汉代陶器	劳费尔博士在华采集
剑桥 哈佛大学弗格博物馆	458	代表性铜器、陶瓷、玉器、绘画	私人捐赠、该馆采集
波士顿 波士顿艺术馆	4 933	代表性器物、绘画、雕塑	私人捐赠
纽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5 500	瓷器、玉器、雕塑	购买私人收藏、私人捐赠
费城 宾夕法尼亚博物馆		陶瓷、绘画	费城博览会展品

①② David Shavit: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A Historical Dictionary*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1990, p. 183.

③ Benjamin March: *China and Japan in Our Museums*, New York, 1929, p. 20.

(续表)

地点、馆名	中国藏品 (件数)	特 点	来 源
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不足 1 000	中国早期代表性文物(供教学用)、石雕(含昭陵六骏中之两骏)、元代壁画	该馆采集
多伦多 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馆	大量	墓葬瓷器	怀履光捐赠
华盛顿 弗利尔美术馆	3 429	绘画、代表性器物	弗利尔个人收藏
芝加哥 芝加哥美术馆	约 1 000	铜器	私人收藏捐赠、借展
芝加哥 费尔德自然史博物馆	9 729	中国文化代表性器物、古代和宋代铜器	劳费尔博士三次来华采集
檀香山 檀香山艺术学院	781	代表性中国器物	私人捐赠
明尼阿波利斯 沃尔克美术馆	1 000	明清瓷器、玉器(含原故宫藏会稽山玉雕重 640 磅,清乾隆时期作)	同上
安阿伯 密执安大学人类学博物馆	8 700	菲律宾发掘的中国陶瓷、棉织品	该馆采集、挖掘、中国政府赠与(1885)
圣路易斯 市美术馆	577	瓷器、玉器	该馆购买

资料来源: Benjamin March: *China and Japan in Our Museums*, New York, 1929, p. 4-7, 34-113.

北美博物馆获取中国艺术品的一个重要渠道是经古董商人购买。卢芹斋(1880—1975年)开设的卢氏公司(1921—1950年)是最著名的古玩公司。卢是浙江湖州人,家富财资,经营工商业。太平天国时,家道中落。他曾在上海读书,20岁时赴法国。他曾参加孙中山领

导的革命活动,为了筹集资金,经营大豆贸易,兼及中国古玩,逐渐成为中国古玩专家。在法国巴黎、里昂地区他以低价大量购入 1860—1900 年间法军在华劫走的中国珍贵文物。后来他与浙江财团头人张静江合伙开古玩店,生意兴隆,除法国巴黎总店外,还在美国纽约、中国北京、上海等地设分店。卢本人每年经西伯利亚来华收购文物,主要是铜器、玉器、雕刻、壁画、古代绘画。卢与法国人玛丽亚·弗理斯(Marie Rose Fouris)结婚,有四女,贞妮·埃玛纽尔(Janine Emmanuel)为继承人,任法国总店经理。卢因热心慈善事业,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骑士称号。纳粹德国占领巴黎后,卢移居美国纽约。辞世后个人档案存纽约大学。卢本人的收藏很丰富,曾以个人名义参加伦敦博览会,并曾在纽约市多次举办铜器和玉器专题展览。卢与琉璃厂古玩商岳斌过从甚密,许多艺术精品都是经岳、卢二人之手及其亲属贩卖到国外去的。他们从中取利,自不待言^①。在北美经营中国古玩贸易的还有姚叔来的唐尼—英公司(Tony—ying and Company, Paris, London, New York,)山中商会(Yamanaka and Company, New York, Boston, Chicago, London.)。北美还有一批私人收藏家藏有中国艺术品。纽约市的医师兼医学文献资料出版商阿瑟·塞克勒(Dr. Arthur M. Sackler 1913—1987 年)是一位后起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家和鉴赏家,他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不应该属个人。他将所收藏的 1 000 件精品全部赠给美国国立史密森博物院,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艺术馆,馆址因国家林荫道两侧建筑林立,深入地下 57 英尺,于 1987 年向公众开放,与弗利尔美术馆上下呼应,颇具特色。其中国藏品以铜器、玉器、漆器和二十世纪中国绘画见长。塞克勒基金会于九十年代初捐款 300 万美元建成北京大学塞克勒美术考

^① 杨仁恺编著,《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4—255 页。

古博物馆,为中美文化艺术交流增添了一段佳话。^①

中国艺术品流入北美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工艺美术的图案设计,特别是地毯的设计方面。它改变了美国地毯图案、色调单一的状况,使之绚丽多采。美国陶瓷业的产品在造型、上釉、图案构思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受到中国瓷器特别是宋瓷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北美人认为“如果一个民族的艺术是珍贵的,其作品是精致的、巧妙的、天才的,创造这些艺术品的民族也一定是这样的”^②。它有助于北美人民增加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了解是毫无疑问的。思虑及此,痛失国宝的心情也可以稍稍释之于怀了。

第四节 梅兰芳访美

我国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1894—1961年)于1930年2月到美国进行了为时半年的访问演出,获得很大成功,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京剧有200多年的历史,表演上唱、做、念、打并重,多用虚拟性的程式动作。唱腔以西皮、二簧为主要腔调,用京胡、二胡、月琴、三弦、笛、唢呐等管弦乐器和锣鼓、铙钹等打击乐器为伴奏。经程长庚、谭鑫培等人的改革和发展,成为我国主要剧种,有传统剧目1000多个,深受我国人民喜爱。梅兰芳自十一岁登台,演青衣,兼演刀马旦。在长期的舞台艺术实践中,对京剧旦角的唱腔、念

① *News,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January, 1995. Thomas Lawton; *Arthur M.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 C.* 1987. p. 3, 11, 28. 参阅 Feng, Chengbo, *China's Museums Reveal a Dynamic Past as Well as Future* 一文插图。 *Museum News* Nov. /Dec. 1991, p. 19.

② Warren L. Coh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0. p. 84.

白、舞蹈、音乐、服装、化妆等方面都有创造和发展。来华的北美传教士能够欣赏京剧者为数不多。司徒雷登出掌燕京大学校务(1918年)移居北平后,曾在义演会上看到梅氏的演出。他立刻被梅的优雅的表演吸引住了。能欣赏梅的唱腔还是后来的事^①。这说明梅氏访美演出,能否为美国观众所接受起初并无很大把握。“百老汇从未听说过梅兰芳,梅兰芳也不了解百老汇”^②。这个难题由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一、教育家、戏剧家兼外交家张彭春(1892—1957年)解决了。张早年留学美国,攻教育心理,兼学戏剧,对古今中外戏剧均有所涉猎,了解百老汇,也懂得梅兰芳。在张彭春的建议和沟通之下,经过一年多的联系,梅兰芳于1930年2月在纽约第49街剧院首场演出,后迁至国民剧院。由于有张彭春和齐如山事先在宣传、介绍、翻译、剧目选择等方面的精心安排,梅兰芳演技超凡绝俗,演出一举成功。此后连续在首都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共演出72天,场场成功,轰动一时,在美国形成了“梅兰芳热”。

梅兰芳的访美班子由21人组成。演员7人,乐队8人,队伍精干。携带的剧目有《霸王别姬》、《贵妃醉酒》、《黛玉葬花》、《佳期拷红》、《琴桃偷诗》、《洛神》、《思凡》、《游园惊梦》、《御碑亭》、《晴雯撕扇》、《汾河湾》、《虹霓关》、《金山寺》、《打渔杀家》、《木兰从军》、《天女散花》、《刺虎》、《辛安驿》。每个剧本都经过了改写、压缩。美国的观众、文艺界、舆论界为梅兰芳一行的演出所倾倒。他们在这个古老的剧种面前感受到了中国艺术的深邃、高远。评论文章纷纷赞扬京剧“具有它独特的风格和规范,犹如青山一般的古老,……但它却像中国的古瓷瓶和挂毯一样优美”。“……使我为我们的

①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54, p. 86.

②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New York, NY, 1981, p. 150.

舞台和一般西方舞台上的表演感到惶恐谦卑。因为这是一种以令人迷惑而撩人的方式使之臻于完美的、古老而正规的艺术，相比之下我们的表演似乎没有传统，根本没有旧有的根基”。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于梅兰芳访美前两年在他所写的剧本《奇妙的插曲》里，首次在西方现代戏剧中使用“旁白”的手法，曾引起轰动。洛杉矶一家报纸刊登的评论文章从梅兰芳的演出中发现，这在中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不足为奇。梅兰芳将唱歌、舞蹈和表演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评论者赞不绝口。罗勃特·里特尔（Robert Littell）在《纽约世界报》上称赞：梅兰芳在舞台上出现三分钟，你就会承认他是你所看到的一位最杰出的演员。演员、歌唱家和舞蹈家结合在一起，它让人根本看不出这三种艺术的界限。梅兰芳的表演说明京剧艺术具有现实主义成分，这也是美国文艺评论文章注意到的一个重要方面。著名文艺评论家斯达克·杨（Stark Young 1881—1963年）写道：“中国的京剧常被说成是完全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性质上也彻底理想化。这在笼统的意义上来说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应当避免由此而导致错误的结论。梅兰芳的戏剧艺术并非完全没有现实主义的成份，它并不具有立体派绘画、抽象的阿拉伯装饰或几何舞蹈设计所具有的那种涵义。跟它确切相似的是中国绘画和雕刻。遗留在我们记忆里的是对它们的抽象化和装饰性的印象，但是我们往往对那种精确性感到惊讶；自然界，一片叶子，一束花朵，一只鸟，一只手，一件斗篷，都被观察得极为精确细微。同时我们也对它们那具有特征的细节所呈现的使人眼花缭乱的色彩缤纷标志感到惊奇。这种精确的标志绝妙地镶嵌在整个艺术之中，这种艺术臻于完美而理想，犹如梦境一般迷人。就拿他们的普通绘画和小型雕像来判断，中国人对这种结合着传统、规范和抽象样式的、机敏的现实主义而感到的喜悦，想必是相当强烈的。我们听到有人说梅兰芳的艺术完全是非现实主义的时候，应该记住上面所说的这一点。我们

还应该记住我们要向中国戏剧艺术学习的一点，不是需要非现实主义或其相反的东西，而是要学习它在每一部分中所运用现实主义的精确度。手势，念白，表演，甚至争论甚多的旦角使用的假嗓，以及动作等等，尽管都与现实有一定距离，但也可以说，这种艺术取得了一种风格上完整的统一。”对于梅兰芳个人的表演风格，评论者认为他是“艺术上端庄正派”的“风格大师”。舞蹈家一致认为，梅兰芳“舞蹈优美，表情细腻，节奏和谐”，“并非单纯模仿女子，而是以艺术手段再创造妇女的形象”。这些评论可以说明美国文艺界对京剧和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有较深入的理解，而不是一哄而起，人云亦云，表面接受。梅兰芳在纽约的一次欢迎会上说过：“现在要想求世界上的和平，最好就是联络各国国民的感情。若想各国国民感情的融合，最好是从美术和艺术来入手。因为美术和艺术是最富于感情的，是人人思想共同有的趣味，并且是不分国际的学问，所以拿他们来联络国民的感情，最容易收到效果……我以为这种见解极对，所以决意要往各国一游……”^① 他将自己和剧团看成是中国的文化使节，这个使命毫无疑问是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好。《太阳报》的理查德·洛克里奇(Richard Lockridge)写道：“梅兰芳达到了跨越语言障碍的境界。自穆易西(Alexander Moissi 1880—1935年)^②以后，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这位中国最伟大的演员的表演最能打动人之处或许就在于它的令人惊异的普遍性。你们会发现，目光，手势，摆动着的优美的身姿，以至他的声音的变化都使你能理解他的意思，虽然你一点也不懂他的语言。”^③评论家斯金南(R. D. Skinnen)说：“梅兰芳的艺术无疑超越了东西方之间所存在的障

①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6页。

② 意大利名演员，曾在纽约演出，当时他不会说英语。

③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 p. 152.

碍。”^①可谓一语中的。张彭春长期坚持的“完全不同的文化可以在本能层次上沟通”的理论，在这里也得到了证实。

第五节 华美协进社

华美协进社是一个以向美国人传播中国文化艺术为宗旨的民间团体，创建人是著名教育学家杜威和门罗(Paul Monroe)，1926年在纽约市成立。启动经费每年2.5万美元，来自庚款。初创时规定了四项任务：(1)传播有关中、美教育方面的信息；(2)通过交换教授和学生密切中美教育机构的关系；(3)帮助在美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培养美国学生对中国事务的兴趣；(4)激起美国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一般兴趣。首任社长是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自1928年起毕业于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孟志先生出任该社秘书，主持日常工作。因资金匮乏，1930年起改为以会员团体方式经营。该社的顾问委员会包括中、美两国文化教育界和商界的知名人物。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所长门罗教授出任董事长。公众领袖人物，克兰·穆锐夫人(Mrs. Murray Crane)和唐尼—英公司经理C. F. (姚)出任副董事长。董事有：太平洋关系学会名誉会长爱德华·卡特(Edward C. Carter)、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艾德温·塞利曼(Edwin R. A. Seliman)、纽约医学院院长爱德华·休默(Edward H. Hume)等人。^②

华美协进社改组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邀请并组织梅兰芳剧团访

① 以上未注出处者均见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载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第173—193页。

②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 p. 146.

美,收到很好的中国文化启蒙的效果,使普通的美国人认识到中国文化并非限于他们在纽约或旧金山华埠看到的中国杂碎餐馆、洗衣店、大烟馆和赌馆,中国还有像梅兰芳京剧这样的高雅文化。梅兰芳的表演激起了美国音乐工作者对中国音乐的兴趣。华美协进社为了满足美国的中国音乐爱好者的要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组成了主要由大学生组成的中国乐队,使用的乐器包括胡琴、琵琶、月琴、箫、笙等,演出的节目有十种乐器的独奏、合奏,京剧清唱,十七世纪的民歌。音乐会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的礼堂举行。听众座无虚席,演出前,由孟志对中国古典音乐作了简要的介绍。这是纽约市也是美国举办的第一次中国音乐演奏会,演出很成功。《纽约时报》作了肯定性的报道。美国著名交响乐队指挥利奥波特·斯托考夫斯基(Leopold A. S. B. Stokowski 1882—1977年)当时任费城交响乐队指挥,也出席了这次音乐会。会后不久他邀请孟志到他家里,讨论中国音乐。孟为之表演三弦琴直到斯的夫人催请他们就餐方才作罢。斯氏认为中国音乐可以丰富西方音乐,拟组团访华,专门考察中国音乐和收集有关资料,因“九一八”事变发生,未能成行。

华美协进社还经常邀请知名人士,举办演讲会介绍中国文化,如太虚法师主讲佛教文化;燕京大学的设计者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主讲中国建筑;张彭春介绍中国哲学;悉尼·甘布尔(Sidney Gamble)谈北平的社会问题。

表 53 华美协进社交换学者和艺术家名录(1928—1967年部分,按年份排列)^①

姓 名	职 业	备注
太 虚	厦门普陀佛教学院院长、中国佛教学会创建人	

^①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 p. 247—249.

(续表)

姓 名	职 业	备注
梅兰芳及其剧团	京剧演员	
甘博(Sidney D. Gamble)	社会学家、作家	
戴闻达(J. J. L. Duyvendak)	荷兰莱顿大学中文教授	
伯和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人类学研究馆员	
褚民谊	太极拳专家	
赵元任	清华大学、哈佛大学教授,语言学家	
孟禄(Paul Monroe)	教育家	
卡莱顿·瓦施伯恩(Carleton Washburne)	教育家	
茂旦(Henry K. Murphy)	建筑家	
陈衡哲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	
江亢虎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中文教授、中文系主任	
刘湛恩	沪江大学校长	
丁文江	中央研究院院长	
Y. H. 吴	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	
吴贻芳	金陵女子学院院长	
胡 适	哲学家、外交官	
苏菲亚·韩(Sophia Han)	北平大学音乐教授	
陶行知	教育家	
弗兰西斯·魏(Francis Wei)	华中学院院长	
利奥纳德 S. L. 徐(Leonard S. L. Hsu)	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冀朝鼎	新社会研究学院讲师	

(续表)

姓 名	职 业	备注
裘开明	哈佛燕京学社讲师、图书馆员	
李芳桂	耶鲁大学中国语言学教授	
张伯苓	南开大学校长	
郭泰祺	中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	
赛珍珠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W. E. 霍金(W · E · Hocking)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ity)	耶鲁大学文学教授	
洪维廉(Willian Hurng)	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	
柳无忌	南开大学文学教授	
梅贻宝	燕京大学校长	
卡林顿·古德里奇(L. Carrington Goodrich)	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	
戴爱莲	民间舞蹈家	
陈裕光	金陵大学校长	
王露西	华南学院院长	
Y · K · 姒	男中音歌唱家	
梁思成	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	
冯友兰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	
高之兰	女高音歌唱家	
毛爱莉	女高音歌唱家	
舒舍予(老舍)	小说家	
钱端升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	
何廉	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	
王其乾	风景画家	
张坤一	画家、书法家	

(续表)

姓 名	职 业	备注
吉姆西·T.F.刘(Timothy T. F. Lew)	燕京神学院院长	
沃尔特·C·娄德米尔特(Walter C. Lowdermilk)	美国农业部土壤保持专家	
阿玛尔·C·贝格维尔(Amer C. Begwell)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工程师	
麦肯齐(W. MacKenzie)	马里兰大学商学院院长	
葛德石	塞尔库斯大学地理学教授	
林语堂	作家	
恒慕义	国会图书馆东方部研究馆员	
张光直	考古学家	
查良钊	清华校友会主席(台湾)	
霍拉斯·H·F·贾尼(Horace H. F. Jayne)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恩内斯特·G·奥斯波纳尔(Ernest G. Osborne)	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学教授	
威廉H·基尔帕特里克(William H. Kilpatric)	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学教授	
曼莱·赫德森(Manley O. Hudson)	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	
赖德烈 Kemeth S. Latourette	耶鲁大学神学院传教学教授	
董作宾	考古学家	
C.L.夏	苏州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杨连生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洛夫(H. H. Love)	康乃尔大学作物栽培学教授	
钱伯·黄(Chanber Huang)	古典和声艺术家	
王亚春	上海艺术学院美术教授	

为了在纽约市普及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华美协进社还克服了重重困难,为纽约市公立学校教师举办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进修班。开设两门入门性质的课程,注册费每学期5美元。经纽约市政府批准,这两门课成为中小学教师在职进修授予学分的课程。在美国这是一个创举。到1943年,华美协进社已成为一个颇具实力和影响的机构,它管理着来自中美两国的250万美元的奖学金,协调遍布全美各地40个新闻和招待中心的工作,同时负责上述两门课程的教学组织工作。纽约总部只有两间办公室和5名专职工作人员。为了改善办公条件,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报刊企业家亨利·鲁斯(Henry R. Luce)向华美协进社捐赠了一栋可以设置展览厅、图书馆、会议厅和其他公共设施的房屋。1944年,华美协进社再次改组成为在纽约州立大学注册的一个教育机构,并迁入鲁斯赠给的新址——中国之家。8月27日华美协进社同时举办了三项活动:在纽约市政厅庆祝孔子2495年诞辰,招待所有来宾;全体会员参加的中国之家房舍献礼;为了庆祝华美协进社改组,举办三天展览和学术报告。在展览会上展出了精美的中国瓷器和文物。二战期间,华美协进社还组织了京剧俱乐部与合唱队。合唱队大唱抗日歌曲和我国民歌。在他们的影响下,两位著名的美国演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和玛格利特·斯皮克斯(Margaret Speaks)也唱起了中国歌曲,以表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罗伯逊最喜欢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斯皮克斯爱唱的是《四季歌》,这两首歌在他们的传播下,一时间风靡美国。

由于战时的需要,讲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先是在新泽西州利用暑假在一些高等学校里开设有关中国的课程,培训中学教师,战后,更扩大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康涅狄克州的一些大学。在成人教育中也有了这方面的课程。华美协进社为在美国普及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影响是深远的。

第十一章 “美国，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新时期中国人眼中的美国（1978—1990年）

第一节 中国的“美国通”

所谓中国的“美国通”，指的是那些研究美国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并向社会公众和领导层提供有关美国的信息和解释的专业人员。我们也可称之为“美国问题专家”。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大众（既包括高级领导也包括一般民众）所得到的有关美国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都是来自这些“美国通”的研究或报道。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领导层汇报有关情况，通过专业刊物向学术界报告研究成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播、影视、报刊、书

籍等)向广大公众介绍美国。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在中国人获取有关美国的信息过程中,这些“美国通”们起到了一个“解读器”的作用,从而在中国人形成对美国的认识方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大洋彼岸的美国一直怀有强烈的兴趣。据不完全统计,从近代到1990年,中国出版的有关美国的图书达9424部,其中,1949年以来出版的就有7210部^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不仅一般公众对美国感兴趣,而且高层领导以及政府各部门也迫切希望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而他们所依靠的正是一批中国的“美国通”。事实上,这些“美国通”们在制定和贯彻中国对美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中最著名的人物有乔冠华、龚澎、黄华、章文晋、韩叙、冀朝铸等,这些人参加了中美恢复外交关系谈判的全过程。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美国通”们的队伍有显著的扩大。今天,中国领导人可以从散布在政府各部门中的数百名美国问题专家那里获得各种有关美国的消息和情报。绝大多数中央一级的党政机关和研究机构都有专职部门和人员密切注意着美国的动态。许多大学建立了美国研究中心。各种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把不同专业的美国问题专家联系在一起。此外,十多名驻美记者每天向国内传回大量有关美国的新闻报道。

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基本上可分为四种类型,他们是:政府有关部门中的工作人员,专业研究机构中的有关人员,记者,大学教师。

一、政府机关中的美国问题专家

国务院所属各部委中有许多美国问题专家在工作着,其中外交

^① 黄安年:《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版的有关美国史译作纵览》,《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5期。

部、外经贸部、国家安全部、国防部等机构拥有的人数最多。在这些部门工作的美国问题专家在制定、贯彻和执行政策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为此需要高度了解美国，掌握有关美国的最新信息和情报。

二、专业研究机构

在专业研究机构中工作的美国问题专家起着某种政策顾问的作用。他们主要分布在五个单位：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有点类似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协调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国际问题研究并把研究成果上报给中央领导，此外也参与有关政策的起草和制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是外交部的主要咨询机构（国外称之为思想库）。它的主要研究成果呈送外交部，有时也送达更高一级的领导层。该所的美国室除完成自己的研究课题外，还定期向外交部北美司提供报告。有时也要为外交访问准备背景材料，偶尔还应某些高级领导人的要求从事特殊问题的研究。该所比较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有庄去病、潘同文、宋一民、叶玉安等。出版物为《国际问题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美国处主要研究美国国内问题，综合处则主要研究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等战略性问题。周吉荣、王宝清、任梅、顾关福等人是该所最优秀的国际问题专家。该所的出版物为《现代国际关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也是外交部所属的研究机构，尽管人员较少，但所取得的成果却是高水平的。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经常要

求该所就一些特殊问题提交报告。该所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是章嘉琳和丁幸豪。出版物为《国际展望》和《国际问题年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中国美国问题研究的学术中心。该所成立于1981年,目前也是中华美国学会的办公地点。美国研究所拥有一批引人注目的美国问题专家(总数约为40人),其中不少是由前所长李慎之从其他单位招聘来的。尽管该所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学术性研究,但它的专家们也常常被要求为高级领导人准备有关材料,李慎之本人就曾多次陪同中央领导访问美国。该所一些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包括:资中筠、陈宝森、张也白、董乐山等。出版的刊物为《美国研究》和《美国问题研究参考资料》。

在这五大机构之外,其他一些科研机构中也散布着一批美国问题专家。这样的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如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等等。尽管他们的人数不多,但同样为中国的美国研究做出了贡献。

三、新闻单位的驻美记者

第三类美国问题专家是国内各主要新闻单位的驻美记者,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新华社记者。新华社受中共中央(通过中宣部)和国务院的双重领导,它从1979年起向美国派驻记者(从1972年起向纽约联合国总部派驻记者)。这些记者的报道每天都出现在中国的报刊、电视和广播上,成为广大公众了解美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此外,新华社每天还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刊文章译成中文,分别登载在《参考资料》(供高级干部阅读)和《参考消息》上,其中《参考消息》的日发行量高达395万份,远远超过《人民日报》,成为中国国内发行

量最大的一份报纸。

四、高等学校研究美国的人员

近十多年来,中国高校中的美国研究得到蓬勃的开展。国内三大美国研究学术组织——中国美国史学会、中国美国经济研究会、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中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各高等院校。根据人员和机构设置等情况,有十余所大学构成了美国问题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在这些院校工作的美国问题专家,其研究成果大多具有高度的学术性,他们中的著名学者有杨生茂、丁则民、刘绪贻、汪熙、袁明、王辑思等。

总而言之,在以上四类机构中工作的美国问题专家构成了中国的美国研究队伍,他们是中国的“美国通”。这些人对美国的看法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而且对政府有关政策的影响力也不容低估。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看待美国的呢?

第二节 为美国画像

一、美国的政治

(一) 垄断财团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

中国大多数的美国问题专家认为,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垄断财团。其他政治因素都被认为是受到垄断财团的操

纵。但是,对这种状况何时在美国形成却有不同看法^①。黄绍湘认为自 1898 年美西战争起垄断财团就对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发生“影响”^②。刘绪贻认为垄断财团从“新政”时起即控制了美国政治^③。他指出,新政以来历届政府在政治上都受到垄断资本的牢牢控制,政府不能实行有损于垄断财团利益的经济政策。^④

国内关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经典著作或许要算篇幅近 500 页的《美国垄断财团》一书^⑤。这本由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撰写的著作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了中国人对美国垄断财团的想法。作者认为,垄断财团通过操纵资产阶级政党和选举并推举直接代表特定财团利益的政府官员来达到对“美国政府机器的控制”。在二战以前,这些财团基本上是家族性的,它们相互联系并集中于美国东北部地区。战后以来,美国垄断财团出现地区化、分散化的倾向,家族对财团的控制削弱了,各财团间的竞争不断加强。

然而,也有不少人由原来注意研究财团间的家族联系转到强调地区性财团——特别是南部和西部财团——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崛起上来。对地区性财团的政治影响力作了最详尽揭示的是由武汉大学曹绍廉教授编写的《美国政治制度史》一书^⑥。作者把财团分为四个地区:东北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南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并分析了每个财团的内部组成情况和它们对历届政府的影响。按照政

① 郝贵元:《1979—1982 年国内美国史研究概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 年第 10 期。

②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62—664 页。

③ 刘绪贻:《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列主义》,《兰州大学学报》1984 年第 3 期;《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世界历史》1983 年第 2 期。

④ 韩铁:《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⑤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美国垄断财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1 版,1987 年第 2 版。

⑥ 曹绍廉:《美国政治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治影响力，作者把美国垄断财团划分为以下几级：

在二十世纪，洛克菲勒财团拥有最大的政治影响力，几乎每届政府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它的控制。麦金莱、哈定、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等人都认为是得到洛克菲勒财团的支持才当上总统的。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这些由洛克菲勒财团创立的组织对美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制订发挥了重要影响。

摩根财团的影响力仅次于洛克菲勒财团。它被认为控制着共和党内的保守派，在格兰特、克利夫兰、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柯立芝、胡佛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影响较大。

梅隆财团和共和党关系密切。安德鲁·梅隆在哈定、柯立芝和胡佛政府中担任 11 年的财政部长，突出地表明了该财团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

杜邦财团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最为强大，并且通过对通用汽车公司的控制影响了多届政府的国防政策。

波士顿财团对美国的拉美政策影响最大，因为它在那里有大量投资。

中西部财团的影响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特别是在塔夫脱和胡佛政府时期。二战后由于财力衰落，它的政治影响力也下降了。

南部财团在战后伴随着石化、军火、高科技等工业的发展迅速壮大，政治力量也日益加强，约翰逊和卡特政府就是最好的例子。

西部财团主力位于加利福尼亚，其实力体现在国防工业、高科技工业和金融业当中。尼克松和里根四次当选美国总统体现了西部财团崛起后美国经济、政治力量的重大改组。

最后，作者提出，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美国政治力量发展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南部和西部财团的兴起，中西部财团相对衰落的

过程。

尽管许多美国问题专家同意上述看法,但对此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例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章嘉琳就认为,虽然垄断财团的实力有从东北部和中西部向南部和西部转移的倾向,但在政治上,东部财团——尤其是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仍保持最重要的控制力^①。他指出,没有东北部财团的支持,没有一个候选人能成为总统。约翰逊、福特、卡特和里根上台后都不得不满足东部财团的愿望,而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被揪住不放就是因为他忽视了东部财团的利益。

除了讨论阳光带财团的兴起外,许多中国学者还注意到了八九十年代以来各垄断财团之间日益增强的“相互渗透”。^②

(二) 行政部门的特殊地位

中国许多美国问题专家对行政部门在美国联邦政府中的地位、作用和运作情况十分感兴趣,这些人大多采用一种结构主义的方法,通过对各自功能和作用的描述,向广大公众介绍了行政机构中的关键职位和部门。他们写了大量关于美国总统^③、副总统^④、白宫办事机构^⑤、

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章嘉琳:《美国垄断财团出现重大变化》,《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6月25日。

② 甘当善:《战后美国垄断财团的发展》,《世界经济》1980年第6期;章嘉琳:《美国垄断财团实力和组合的若干变化》,《世界经济》1980年第9期;章嘉琳:《美国东部财团的新组合》,《世界经济导报》1983年8月1日。

③ 杨百揆,杨明:《美国总统及其选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赵浩生:《漫话美国总统选举》,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谭君久:《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刍议》,《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黄绍湘:《美国的总统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④ 桑生:《美国副总统是干什么的》,《环球》1987年第7期;石朝旭:《浅谈美国副总统》,《世界知识》1981年第9期;陆锦康:《美国的副总统》,《国外政治学》1989年第1期。

⑤ 陈其慧:《白宫三巨头的权势》,《环球》1981年第8期;潘世强:《美国总统的工作班子》,《国外政治学》1986年第4期。

国家安全委员会^①、国务院^②、国家安全局^③、中央情报局^④等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关于美国的教科书和手册中也对内阁和行政机构、文官制度以及州和地方政府作了详细介绍。^⑤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总统在联邦政府中处于支配地位,他既是决策者、高级职位的任命者、各种利益集团相互竞争中的仲裁人,还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不少有关总统制的介绍中流露出某种“总统至上”论的倾向,过高估计了美国总统的实际权力,也很少有人谈到分权制对总统的限制。^⑥

此外,中国人往往从美国总统推行的外交政策和对华关系的好坏上来评价他们。例如卡特被认为有些软弱,而里根则是一个强硬派。至于尼克松,由于他缓和了同中国的关系,所以尽管在美国受到尖锐指责,但在不光彩地辞职后仍然多次在中国受到欢迎。可以说,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道德上的污点没有得到如实地报道。

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们还探讨了美国政府内部各种试图对内外政策施加影响的派别。有人研究了“孤立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之间为控制美国外交政策而长期存在的竞争^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庄去病则划分出了更多的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意见派别,例如“鹰派”

① 殿宸:《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世界知识》1979年第17期。

② 介夫:《美国国务院和国务卿》,《世界知识》1980年第13期。

③ 辉:《迷宫依旧是迷宫》,《人民日报》1983年2月6日。

④ 晏烁:《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幕》,《世界知识》1981年第13期;于恩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场风波》,《人民日报》1981年8月7日。

⑤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美国政府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美国》,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⑥ 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李道揆是个例外,见他的《试论美国宪法的限权原则》,《美国研究》1987年第4期。

⑦ 金应忠:《浅析美国的所谓“国际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2年第10期。

和“鸽派”、“温和派”和“保守派”，以及“缓和派”、“中间派”、“超级鹰派”等等^①。

（三）美国政治的多元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意识到了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多元性，因此，他们把注意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各种社会思潮、国会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对政治的影响上来。

大约在1980年以后，许多中国人接受了在分析美国政治时所采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划分方法。大多数中国学者都同意八十年代美国的社会政治思潮正由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变，这表明了美国社会政治结构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青年学者温洋从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和哲学起源出发，对现代保守主义进行了分析。他提出，“新保守派”就其主张来说并不“新”，他们所强调的个人自由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实际上起源于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②。在保守派内部，温洋划分出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四种保守主义者和三种保守派政治家^③。就整个社会而言，美国存在：“暂时性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对改革具有“本能的反对态度”；“富有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反对社会变革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地位、权力和财产；“实用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仅在对本阶层或个人有利时才赞同社会变革；“思想上的保守主义者”，这些人反对变革纯粹出于思想原因。在政治家中则有：“极端保守主义者”，他们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中间保守主义者”，他们反对国家对社会和经济干预的不断扩张；“自由保守主义者”，他们力求通过选举和立法来引导社会经济变革。

① 庄去病：《美国的鹰派与鸽派》，《世界知识》1980年第13期；《从对外事务看里根政府的内部纷争》，《世界知识》1982年第7期。

② 温洋：《美国自由主义的演变》，《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10期；《新保守主义……“新”在哪里与“保守”在哪里》，《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9期。

③ 温洋：《何谓美国的“保守主义”》，《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5—7期。

伴随着对美国政治中各种思潮和派别认识的不断加强,中国人也逐渐注意到了国会的重要性。所有关于美国政治的书籍都将国会作为重要内容对待^①,一本关于国会的专著——《美国国会史》已经出版^②。许多人对越战以来国会的外交政策方面的独立作用日益增强较感兴趣^③。在对分权制的研究中,不少人注意到了1983年6月最高法院判决国会“立法否决”无效一事,以此为依据,他们认为,国会在越战和水门事件后争得的权力又逐渐为行政部门夺回^④。然而,总的来说,新时期中国人对美国国会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对于国会的组织、功能以及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的多重作用和分权与制衡机制中的重要性等问题还有待做进一步的探讨。

在对美国政治运作过程的了解不断加深的基础上,很多中国学者都认识到在美国政府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之外还有许多组织对政策的制订起到了作用。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各种思想库、基金会、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院外活动集团上。在分析中,中国学者毫无例外地都试图把这些组织划归到这个或那个财团的操纵中。

例如,资深美国问题专家庄去病认为,“当前危险委员会”的成员与加利福尼亚国防工业财团有密切联系,因此该委员会的许多主张是建立在扩充军备的基础上的^⑤。“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

① 见沈宗灵:《美国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杨柏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蒋劲松:《美国国会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庄去病:《美国国会和两党制度》,《世界知识》1979年第3期;张毅:《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112—113期;张也白:《美国外交决策的特点》,《美国研究》1987年第4期;孙心强:《论美国国会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与国会改革》,《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④ 任荣:《美国最高法院对总统权力所持的立场》,《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4年第4期;张毅:《美国白宫和国会权力斗争的起源和发源》,《人民日报》1983年8月25日。

⑤ 庄去病:《美国的鹰派与鸽派》。

会”这两个组织被认为是美国推行全球外交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和设计者,由于受到在世界各地拥有广泛经济利益的洛克菲勒财团的大力资助,所以他们十分强调三边和东西方关系问题^①。一些人认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得到了在中东拥有巨大利益的得克萨斯石油财团和贝克特尔公司的大量资助,因此在里根政府中通过其“代理人”——副总统布什、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提出了符合垄断财团利益的解决阿以问题的对策^②。胡佛研究所被认为是加利福尼亚金融财团、国际工业财团和保守派的主要思想库,并同传统基金会、现代问题研究所一道成为为里根政府提供官员和政策建议的主要机构^③。还有人指出,布鲁金斯研究所主要为民主党服务,而兰德公司则依赖于共和党人。^④

特殊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作为影响美国政治过程的一种重要的非政府因素,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⑤。在对各种院外活动的研究中,一些人认为,像“全国制造业者协会”、“商业圆桌会议”和“美国商会”这样的组织,其活动代表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像“美国农场主联盟”、“劳联—产联”和其他工会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美国消费者联盟”、“全国教育协会”这样的组织,其活动则与垄断财

① 志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世界知识》1979年第13期;庄去病:《美国政府背后的“三边委员会”》,《世界知识》1986年第13期。

② 吴天佑:《为里根出谋划策的思想库》,《现代国际关系》1982年第1期;李时培:《贝克特尔公司》,《现代国际关系》1983年第3期。

③ 陈兆纲:《美国行政改革的智囊……胡佛委员会的工作》,《未定稿》1986年第3期;章嘉琳:《里根,布什政府的智囊……胡佛研究所》,《国际展望》1989年第2期。

④ 宁力:《美国思想库对政策的影响》,《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4期。

⑤ 宋明江:《美国议院的座后客》,《世界知识》1979年第8期;刘之根:《美国利益集团的发展及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3年第12期;李道揆:《美国的利益集团》,《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5—6期;钱春之:《利益集团与美国政治》,《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团无关，它们是为了维护社会中某些特定人群的利益。毫无疑问，中国学者曾长期关注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①，而且对院外活动中出现的行贿受贿、营私舞弊等丑闻多次在报刊杂志上进行了详细述评^②。对于美国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美国所副所长李寿祺认为，这是“表明美国多元化的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标志。^③

还有一些中国学者通过分析政治行动委员会考察了院外活动对美国政治的影响^④。杨柏华教授在他那本广为流传的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教科书中，把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积极进行院外活动的政治组织称为“压力集团”，以区别于进行一般性社会活动的“利益集团”，例如工会和宗教组织^⑤。有人甚至注意到在美国的企业、政党、大众传媒和院外活动集团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政治顾问的现象，认为这进一步表明了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多元化倾向。^⑥

（四）关于美国式的民主

在八十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一直对美国的民主制——特别是所谓“两党制”——进行猛烈地抨击。请看下面一段典型的批评：

“资产阶级的‘两党制’是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一种最民主的制度？事实并不是这样。……这种两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完全是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产生出来的。……‘两党制’和整个资产阶级民

① 任一：《美国的“台湾帮”》，《世界知识》1981年第3期；李家泉：《美国：垄断资本在我国台湾》，《现代国际关系》1982年第2期。

② 路晓波：《政治行动委员会》，《世界知识》1984年第19期。

③ 李寿祺：《利益集团参政……美国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美国研究》1989年第4期。

④ 路晓波：《政治行动委员会》。

⑤ 杨柏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

⑥ 林小云：《“政治咨询专家”的崛起……美国竞选政治中的新动向》，《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7期。

主制度一样,仅仅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者的民主。资产阶级的‘两党制’丝毫改变不了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工人也不会由雇佣奴隶变为国家的主人。要根本改变人民的这种地位,就只有把‘两党制’和整个资产阶级制彻底废除,代之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民主。”^①

这是在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上登载的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评论。这种观点在报纸上也常常得到反映。例如《北京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竭力为两党制吹嘘,把反对党的存在说成是民主的标志;有反对党就有民主,没有反对党就没有民主。其实,两党制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得力工具。美国的总统选举,说穿了,就是在垄断资产阶级指定的两个代理人中挑选一个,不管你满意不满意——这就是两党制给美国选民享受的民主权利。”^②上海的主要报纸则认为,“资产阶级搞两党制,就像一个木偶演员手里拿着甲乙两个木偶,甲出场,乙退场,乙出场,甲退场,永远由其操纵着这个舞台。”^③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就对资产阶级的虚伪性进行过尖锐的批判^④。毛泽东也曾指出:“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⑤一些中国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⑥。由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赵宝煦和王邦佐编

① 郭用宪、阎志民:《怎么认识资产阶级的“两党制”》,《红旗》1981年第11期。

② 陈俊:《美国竞选种种》,《北京日报》1981年1月23日。

③ 余先予:《由‘象驴之战’想到的……谈资产阶级的两党制》,《文汇报》1981年3月13日。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列宁《国家与革命》、《论国家》等。

⑤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页。

⑥ 刘德斌:《试论美国两党制度的产生及演变》,《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黄安年:《美国资产阶级两党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保定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

写的两本广泛使用的政治学教材都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政党和选举都受垄断资产阶级的操纵，从而都成为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手段^①。武汉大学的曹绍廉教授也持同样看法^②。而由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的三位学者共同撰写的《美国两党制及其剖析》一书则对“两党制”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③。作者们指出，共和党和民主党就像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两只手，它们在政府各部门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但最终都依赖于同一基础——垄断资本。

在八十年代中国出现的几次政治风波中，一些人往往利用所谓“美国如何民主和自由”来制造舆论，对此，一些严肃的美国问题专家进行了批驳^④。或许没有人比柴泽民——中美建交后中国首任驻美大使——在1987年学潮之后的一次谈话更能说明他们的观点了：

“我在美国的日子，看到民主和自由确是十分动人的名词，到处标榜民主自由，一些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更是嘴上不离民主、自由一类的词汇，似乎美国是最民主的国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我在美国看到一些总统、议员之所以能够当选，无不是背后有许多大富翁在撑腰、出钱。这种竞选完全建立在美元基础上，每个竞选人都代表美国各地财团的利益。他们上台后都要为其财团谋利、说话，这还有多大的民主、自由呢？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统治方式，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服务的。”^⑤

那么，柴泽民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又是如何看的呢？

“美国一直标榜其言论自由，表面上看来美国的新闻似乎很自

① 赵宝煦：《政治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王邦佐：《政治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曹绍廉：《美国总统选举和有关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

③ 陈其人等：《美国两党制及其剖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④ 黄安年：《美国资产阶级两党制定不适合我国国情》。

⑤ 朱敏之：《柴泽民谈西方民主》，《半月谈》1987年第4期。

由,报刊、杂志多得惊人,报上整天争吵不休,辩论得很热闹。但实际上,报刊上刊登什么,不刊登什么,都有明确的选择。……美国报纸不允许任何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的言论广为宣扬。美国的报刊都是代表一些财团的利益。”

这段谈话可以看成是新时期大多数中国人对美国民主制看法的一个缩影。

二、美国的社会和文化

(一) 阶级和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观察社会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分析其中的阶级和阶级关系。在中国人看来,美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化和不平等现象。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大致划分出了三个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并对他们分别进行了研究。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规模有多大?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写的《美国》一书中指出:“美国有大小企业1 000多万家,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几百家巨大的银行、工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公司,它们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垄断了资金、原料、技术、动力、运输工具和销售市场。”^①

美国经济问题专家陈宝森提出了一种衡量美国资产阶级人数的方法。根据经典定义,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私有财产的人,而美国拥有个人财产的人为5 939万人^②。他根据人均收入把美国资产阶级分为四级:0.5%是“超级富豪”,另有5%“非常富裕”,9%是“富户”,剩下90%是“普通”资产阶级。“普通”资产阶级家庭占

^①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美国》,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228页。

^② 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600页。

有美国个人财富的 65.1%，其他 10% 的资产阶级家庭占有个人财富的 34.9%。0.5% 的“超级富豪”年均收入为 680 万美元，0.5% 的“非常富裕”的资产阶级年均收入为 179 万美元，“富户”的年均收入为 39.7 万美元，而“普通”资产阶级的年均收入为 3.9 万美元。^①

值得注意的是，陈宝森在这里使用了“普通资产阶级”一词。其实这不过是中产阶级的代名词。

中产阶级现在已被大多数中国人看成是资产阶级内部一个具有自身特性的阶层。然而在八十年代之前却不是这样，当时对美国社会作“非资即无”的两分法式的划分占据支配地位。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人开始发现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并非如此简单，尤其是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的存在。这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和思考。

什么是中产阶级呢？按照《光明日报》一篇文章的说法，“中产阶层是美国社会中人数较多的一个阶层……主要包括小企业主、小农场主、小商人、一般经理人员和中高级职员、医生、教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工资较高的技术工人”^②。这篇文章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构成状况，将美国人口 76% 划归为中产阶级，并探讨了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滞胀、税额增加和物价上涨对中产阶级的影响。

尽管多数人逐渐将中产阶级视为美国社会阶级中一个具有独立性的阶层，对此持异议的也大有人在。有人批评那种认为中产阶级不是剥削阶级的说法。在一篇典型文章中，作者认为那些不属于大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也是靠获得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而生存的，他们也参与了剥削，因此也应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③

① 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决策》。

② 冬梅：《美国中产阶层的境况和思想动向》，《光明日报》1980年5月24日。

③ 霍世涛：《试论中产阶级》，《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4年第4期。

可以想象得出,在中国学者对美国社会阶级的论述中,占篇幅最多的是有关无产阶级的地位问题。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学者就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争论的各方中,很多人都以美国无产阶级的状况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在讨论中大体形成了三派意见。第一派认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个绝对贫困化的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因此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不是一条“规律”^①。第二派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不仅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绝对贫困化”,而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②。第三派意见则体现了中国式的学术讨论中常有的妥协传统,认为对“绝对贫困化”一词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从狭义上来说,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明显改善;但从广义上说,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贫困化现象“经常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理论仍然是一条规律^③。显然,争论的焦点在于何为“绝对”,何为“相对”这样两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上。如果以工人的工资能否补偿劳动力价值作为是否存在绝对贫困化的主要标志,那么很多美国经济问题专家都认为,二战以后美国无产阶级存在着绝对贫困化的趋势。^④

对于美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中国人的关注由来已久。在美国反战运动和种族骚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六十年代,这

① 蒋学模:《绝对贫困化是间断出现的现象,不是规律》,《世界经济》1979年第1期。

② 王章耀:《有时绝对贫困化是一条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同上刊。

③ 杨时旺:《绝对贫困化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是有时而不是始终存在的现象》,《世界经济》1979年第1期。

④ 熊性美:《现在美国存在绝对贫困化,存在实际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的趋势》,《世界经济》1979年第1期;罗承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世界经济》1979年第5期。

种关注达到了高潮。或许对美国人来说，那种认为他们的国家在六十年代的动荡中已经处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边缘的看法简直不可思议，然而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正是这么预测的^①。随着中美关系趋向缓和，中国传媒对美国社会阶级冲突和斗争的报道并未停止，不过注意力开始转到罢工和工会运动上。

1976、1977、1978 这三年被认为是美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1976年，中国的新闻媒介广泛报道了美国汽车工人、煤矿工人、卡车司机、橡胶工人、公用事业工人、学校教师和护士等的罢工情况^②。1977年7月，新华社在一篇报道中说，“今年美国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美国钢铁、汽车、煤矿、铜矿、码头、电话、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烟草、屠宰、市政等行业的职工，连绵不断地掀起反对垄断资本转嫁经济危机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这篇报道还指出，“美国广大工人在反对垄断资本的同时，还明确地把斗争锋芒指向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少数工会头目，这是美国工人运动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③

这种对工会的评价并不是个别的。1980年《世界知识》上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工会长期以来已被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占有，他们同垄断资本家相互勾结，密切配合，共同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④

社会福利制度和工人工资的增加被看成是垄断资产阶级麻痹工人阶级、缓和社会矛盾的手段。有人指出，“垄断资产阶级推行广泛的

①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8年4月17日。

② 见1976年的《人民日报》。

③ 《美国工人坚持斗争，反对垄断资本转嫁危机》，《人民日报》1977年7月20日。

④ 冬梅：《美国的工会和工人运动》，《世界知识》1980年第9期。

社会福利政策,并不是出于什么‘善心’,而是垄断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和维护本阶级利益所要求的”^①。《工人日报》的一篇文章也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收入的增长并不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自动地、顺利地实现……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提高收入的主要手段……同时资本家也企图用高工资、高福利的办法来麻痹工人的阶级觉悟,平息斗争,以稳定社会秩序和保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②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新闻媒介和学术刊物上有关美国社会无产阶级斗争方面的报道和文章逐渐呈减少之势。显然,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美国社会的革命形势尚未成熟。

(二) 富裕社会中的阴影

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八十年代国内的报刊中有关美国社会生活状况的介绍和报道,就会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许多文章是以反驳问题的形式开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许多中国的年轻人都认为美国是一个天堂”,然后下面就是论证这不是事实。尽管有些文章失之偏颇,但必须承认,美国这样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国人的广泛关注和思考。

美国无家可归者的悲惨境遇尤其引人注目。中国读者从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对无家可归者的报道,而电视的普及则把这些美国流浪汉的形象呈现在广大中国观众面前。《人民日报》驻华盛顿记者袁先禄决定通过采访美国首都的贫民救济部门和贫民区来调查这一问题。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流浪者越来越多,当然和美国经济状况的恶化有关。大量黑人青年流落街头,是长期以来黑人失业率特高的结果。流浪妇女显著增

^① 姚廷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剖析》,《红旗》1982年第6期。

^② 孙尚清:《正确看待美国工人生活》,《工人日报》1980年3月11日。

加，还反映了美国家庭和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大批的廉价房屋被拆掉，改建豪华的新楼，使房租越来越贵，穷人住得起的房子越来越少。社会的富裕把更多的穷人推进了无家可归的惨境，这不是一种讽刺吗？”^①

《人民日报》另一位记者的报道则揭示这样一种十分矛盾的现象，即作为世界头号农产品生产国的美国却有那么多的人在挨饿^②。里根政府削减发放食品券和救济津贴的做法也受到了中国人的批评。^③

种族问题是中国人谈论美国社会的又一热门话题。中国人对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关心或许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在1979年以前，中国人对美国少数民族的悲惨遭遇主要是从他们需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下得到“解放”这一角度来认识的，所有书籍文章讲述的都是这个主题^④。说到底，种族问题在中国人眼里首先是一个阶级问题。

随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中国人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评论逐渐由政治性转向分析性。举例来说，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小马丁·路德·金一般不被看成是进步的政治力量，因为他主张非暴力运动，不赞同用社会革命的手段来解决美国少数民族问题。然而在八十年代，金牧师在中国也享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名誉”。金的生日被定为美国全国纪念日引起了国内大批有着金的生平事迹的文章的涌现。《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赞扬他为争取少数民族权利所做的贡献^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专家李道揆

① 袁先禄：《美国的贫困一瞥》，《人民日报》1982年1月5日。

② 戴增义：《美国贫困状况的新特点》，《人民日报》1989年11月4日。

③ 张亮：《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数增加》，《人民日报》1983年7月5日。

④ 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等编：《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简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⑤ 景宪法：《梦想和现实》，《人民日报》1986年1月16日。

撰写文章,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金的生平、思想主张以及他反对种族歧视,争取黑人民主权利的实践活动。^①

八十年代初期,三 K 党公开大肆进行种族迫害的行动引起了中国人对美国这一极右翼团体的注意^②。此后一些关于三 K 党的文章陆续揭露了它的不少活动及其在美国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一位记者报道了三 K 党在阿拉巴马州建立训练基地教授暴力战术的情况^③。《人民日报》在“答读者问”中指出,“三 K 党就是专门迫害黑人最猖獗、最丑恶的种族主义恐怖组织……党徒中有议员、高级官员和其他重要人物,并有大资本家给他们提供活动经费,所以,他们敢于横行不法、肆无忌惮”。^④

美国的家庭问题同样得到许多中国人的注意。很多关于美国家庭问题的文章都涉及到核心家庭的破裂。中国人往往对美国社会同居和离婚现象之普遍感到惊讶^⑤。家庭内的暴力现象,例如夫妻斗殴、虐待儿童、打骂家长等等,也受到关注^⑥。还有一些人对八十年代美国家庭中保守主义倾向的增强和传统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回归作了探讨。^⑦

关于美国社会中的青年人,一些人考察了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和新左派运动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温洋向读者介绍了六十年代美国的反主流文化——垮掉的一代、性解放、摇滚乐、嬉

① 李道揆:《争取正义乐队的指挥……小马丁·路德·金牧师》,《美国研究》1987年第1期。

② 王飞:《美国的种族主义新浪潮》,《人民日报》1981年1月9日。

③ 子般:《‘无形帝国’的新暴行》,《光明日报》1981年5月27日。

④ 《人民日报》1981年3月7日。

⑤ 金凤:《美国社会初探》,《人民日报》1979年7月12日;薛素珍:《当前美国的婚姻家庭状况》,《社会科学参考》1986年第24期。

⑥ 江继龙:《美国的家庭暴力》,《工人日报》1979年4月8日;温洋:《美国人的家庭观》,《理论信息报》1989年2月20日。

⑦ 刘绪贻、胡金平:《美国新右派初探》。

皮士等六十年代的象征^①。在关于“新左派”运动的文章中，他研究了这一运动的思想起源和种种表现。^②

此外，还有人探讨了美国青年犯罪的问题^③。1981年3月30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里根总统遇刺事件，凶手是仅19岁的欣克利。这一事件得到了中国众多传媒的广泛报道和评论。新华社驻美高级记者彭迪认为，欣克利是美国年轻人中的典型，他的行为暴露出美国社会的疯狂性和对青少年的摧残。^④

（三）游记中的美国

游记往往能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风貌，反映作者的观感。访问美国的中国人有写游记的传统。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作为学生、学者、劳工、外交官、移民以及探亲者，许多跨越了太平洋的中国人把他们对美国的印象记录下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放的大潮使众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亲眼目睹了外面那个精采的世界。在数以十万计的访美者中，许多人继承了他们先辈的传统，把自己的观感写了下来。或许这些各式各样的游记最能代表当代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了。

一般来说，发表的游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散见于各种报纸和通俗杂志上的文章，它们通常记录下作者对美国社会感触最深的某些印象；第二种是书籍，由于篇幅较长，作者可以详细阐述对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印象，而且还往往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因此更具研究价值。

下面让我们从众多的游记中挑选一些出来进行考察，看看不同

① 温洋：《反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群……嬉皮士》，《美国研究》1988年第4期。

② 温洋：《美国六十年代“新左派”运动》，《美国研究》第3期。

③ 孙南申：《美国的青少年犯罪》，《法制建设》1985年第5期；敬大力：《美国的青少年犯罪研究和青少年司法制度》，《青少年犯罪研究》1988年第11期。

④ 彭迪：《欣克利的青春》，《人民日报》1981年4月18日。

的中国人是怎样看待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的。

1972年美国总统一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美国报纸编辑学会”邀请了一个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美国。这个新闻代表团在1973年5—6月间参观了美国8个州的10个城市，行程2万里。他们访问了白宫（在那里受到了尼克松的接见）、纽约股票交易所、大公司的总部、工厂、农场、风景名胜，当然，还有报社。这是20多年来大陆上的中国人第一次亲眼目睹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来自国内各大新闻单位，他们发回的报道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关于“美帝国主义”的第一手材料。

尽管记者们的报道内容大多集中于所谓“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上^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谈到了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计件工资制以及美国人的外向性格（特别是儿童）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当然，他们也指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如“通货膨胀、犯罪吸毒、空气污染、种族歧视、贫富悬殊”等等。^②

1978年秋，正当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在两国首都秘密进行之际，第二个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这个代表团的日程表同样是丰富多采的，而且他们回国后发表的观感要比五年前的那个代表团广泛而全面得多。有人对美国的科学普及程度之高印象很深^③。也有人对美国交通和通讯设施的现代化——尤其是对美国人乘飞机和汽车旅行的频繁——感到惊诧。^④

这两个新闻代表团发表的访美游记使广大中国公众逐渐了解到一些美国社会的真实情况。随着1979年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机会访问美国，赴美留学的人数更是与日俱增。美国的城市景观往往首先给初访的中国人以强烈的心理震荡，正如我们

①② 萧航，张启昕：《和美国人民友好相聚的日子》，《人民日报》1973年8月3日。

③ 杨玉梅：《对美国科学普及的考察》，《人民日报》1978年10月6日。

④ 李延宁：《美国的民航、铁路和内河航运管理》，《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日；《美国的汽车和高速公路》，《人民日报》1978年11月3日。

在王若水的游记中看到的那样。此外，美国家庭的陈设也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感慨。让我们看看《经济日报》的一位副总编在参观了一户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厨房后所作的思考：

“我不知道，这样的厨房，在美国算是几等厨房，印象是科学、干净、方便。我想，这也许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厨房……五十年代末期，尼克松在美国展览会上通过一所厨房设备，宣扬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现在这个厨房就在我的眼前，我怎样来评价它呢？能说它不现代化吗？不能。它或许比五十年代的更先进了。能在我们的国家提倡这种标准的厨房吗？至少眼前不能。但是把我们的厨房设计得科学些、合理些、干净些，却是可能的。”^①

吴大琨，中国人民大学的美国经济问题专家，他的观感与众不同，1980年的美国之行给他留下的大多是消极印象。他在游记中列举了美国物价高昂、色情泛滥、种族歧视、青年失业以及同性恋等社会弊病。^②

报刊上常见的另一类游记是由那些定居在美国的美籍华人撰写的。这些文章一般来说调子都比较低，通常是劝服中国读者打消对美国存在的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多都是针对中国的年轻人的。其中最著名的或许要算是美国籍华人女作家於梨华在1980到1986年间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美国来信了》。1980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於梨华的第一封“来信”，这种做法在《人民日报》的历史上实为罕见。於梨华在文章中对美国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凭我二十多年住在美国的经验，我要向出来的朋友们说，千

① 张沛：《美国漫笔》，《国外归来》（一），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338—339页。

② 吴大琨：《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重访美国有感》，《世界知识》1980年第13期。

万呵！不要把美国幻想成天堂，更不要相信听来的传说，以为美国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地方。对于一时不出来的朋友，我要说，千万不要因为不正确及夸张的报道，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产生一种崇拜的心理。美国虽然工业先进，物资丰富，但在他们的大城市里，贫民窟有的是，饿死冻死的也时常听到，靠洋山芋过日的也大有人在。

这第一封“信”引来了潮水般的真正的“读者来信”。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於梨华不得不从1985年起写了第二个系列“来信”。这次於梨华显得比较乐观些，在“信”中她谈到美国社会中的两性关系并非那么混乱，而是更加平等；年轻人大多也不是颓废堕落的，他们“依靠自己，独立而且勤奋”。

书籍是发表游记的另一个主渠道。中国人最出色的访美游记之一是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写的。费孝通在四十年代曾访问过美国，并出版过两本观感^①。三十多年后的1979年，他故地重游，回国后同样出版了对这次访问的印象^②。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费孝通都把这次访问的印象同三十多年前的观感联系起来，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对二战后美国社会所取得进步的惊讶之情。现代美国社会的各个组成要素：汽车文化、人员的流动性、奇妙的电子通讯手段、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各式各样的耐用消费品等等给费孝通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作为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对美国的社会问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谈到了美国人性格上的扭曲和异化、人与人之间纯真友情的消退以及蔓延整个社会的“信仰危机”，还谈到了种族问题（包括黑人、美籍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城市中的贫困现象。不过总的来看，费孝通

① 费孝通：《初访美国》，三联书店1945年版；《美国人的性格》，三联书店1947年版。

② 费孝通：《访美掠影》，三联书店1980年版。

对美国的印象还是相当积极的。

国内新闻单位的驻美记者们也写了不少游记。新华社记者张海涛曾长期在驻联合国分社工作，回国后他出版过两本在国内较有影响力的游记：《美国——走马观花记》和《我说美国》^①。前一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向读者介绍了美国的历史、地理、政府机构等等。书中还以生动活泼的日记体记叙了作者在横穿美国大陆的旅行中所遇到的人和事，描绘了美国广袤的自然风光和各地的风土人情，笔调轻松而浪漫。然而他的第二本书《我说美国》却风格大变，书中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作了全面的批判，尤其猛烈抨击了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和人权”。

从1979年第一批大陆留学生进入美国大学校园算起，十多年来中国留美学生的人数已超过了10万人。他们中有不少人写文章讲述了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其中大多是对如何在美国生活作如实介绍：怎样买东西、获取驾驶执照、租公寓、上饭馆吃饭（包括点菜！）、打入当地中国社区、使用图书馆、打一份临时性的工作等等，其中有些事写得非常幽默。^②

在所有书籍类的游记中，有两本特别引人注目。一本是刘宗仁的《大熔炉两年》^③，另一本是王作民的《美国万花筒——社会·风光·人物》^④。两本书都对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作了全景式的描绘。由于这两本书都译成了英文，所以美国读者也对它们很感兴趣。

刘宗仁在适应美国社会生活方式上显然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

① 张海涛：《美国——走马观花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我说美国》，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② 见梁建中、黎小江编：《当代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庄晨立：《从大学校园里看美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刘宗仁：《大熔炉两年》，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④ 王作民：《美国万花筒——社会·风光·人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初到美国,他住在芝加哥北郊一户中产阶级人家,这家人的富裕生活引起了他的不少感慨。例如,在一次圣诞聚餐前的准备中,他偶然发现“有一个大纸箱里装的全是高脚玻璃杯,有一百多个”,女主人告诉他这是专门用来盛圣诞节喝的“鸡蛋酒”的“鸡蛋酒杯”。作者不禁叹道,“呵,这多么讲究!我们家喝茶、喝啤酒、白酒,统统用一种杯子。再说,一年就过一次圣诞节,喝一次‘鸡蛋酒’,这一百多个杯子也只能用一次。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总共才买了四只高脚杯”。^①

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刘宗仁产生了强烈的陌生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多少年来,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时候,我都一直偷偷地看美国《时代》杂志、《新闻周刊》、《读者文摘》,还有美国小说,总觉得自己对美国有所了解了。到了美国才发现,书上讲的和亲身经历的差别很大,对美国人的思想、兴趣,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英文中把这种感觉称为‘文化震惊’。”^②

他说得不错。综观全书,这种“文化震惊”确实比比皆是:技术发达、人道主义、个人独立、犯罪猖獗、医疗费用高昂、吸毒和色情泛滥,等等。作者最后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情”离开了生活两年的美国。

王作民的《美国万花筒》从所谈的问题来看,与《大熔炉两年》一书相差不多。不过由于她得到了美国几家大公司的资助,能够从东到西考察整个美国,所以她书中介绍的对象和事例更多一些,而且对美国社会更深层的文化价值观念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例如,关于美国的个人主义,她认为:“其实,美国人讲的个人主义,其本意是肯定个人的价值、尊严、权利和自由,既肯定你的主义,也肯定我的主义……所以,我认为应当谴责的是‘极端个人主义’,而不是个人的自由发

① 刘宗仁:《大熔炉两年》,第40页。

② 同上书,第123—124页。

展。”^①

对广大公众来说，这些游记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体裁，给他们带来了某种关于美国社会的相对完整的观点和看法，这在绝大多数新闻报道或学术文章中是看不到的，而且公众往往认为这些东西更真实，这也是严肃的学术文章难以做到的。一般来说，这些游记具有三个共同特点：第一，内容上具有高度的亲历性，也就是说，作者们对美国的印象主要受他们个人经历而不是受书本上的或道听途说来的情况的影响，而且趣味性很强，往往反映出中美两种社会、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第二，作者们对美国的印象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看法甚至相互对立；在钦佩、羡慕美国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对其存在的道德堕落、社会不平等、种族歧视等多方面的问题表示出强烈的反感。第三，作者们都很注意把观察到的情况同自己国家的情况相比较，这种比较有时是直接的，有时则是潜舍的，而作者自身的思想水平、观察能力和心理状况对这种比较的结果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① 王作民：《美国万花筒——社会·风光·人物》，第108页。

参 考 文 献

中 文

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输入中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梁碧莹:《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常耀信:《中国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

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孙越生、陈书梅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英文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urth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Michel Oksenberg and Robert B. Oxnam ed.: *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 -- 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1978.

Joyce K. Kallgren and Denis Fred Simon ed.: *Educational Exchanges, Essays on the Sino-American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Wang, Yi-chu: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66.

Wihma Fairbank: *America's Cultural Experience in China 1942-1949*, Washington D. C. 1976.

Hugh Deane: *Good Deeds & Gunboats, 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Chinese Encounters*, San Francisco, 1990.

Shih-shan Henry Tsai: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Warren I. Coh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ird E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0.

后 记

全书由冯承柏进行整体设计,拟定写作提纲。第一、二、三、四章和第十章由冯承柏执笔。其余章节的执笔者是:余力岩(第五章)、罗宣(第六章)、翁红仙、韩召颖(第七章)、冯承柏、李菊菊(第八章)、孙奕(第九章)。全书经黄振华进行文字加工和校对。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南开大学图书馆许多同仁的支持和帮助,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罗杰先生(Mr. Eugene A. Nojek)特地将他珍藏的费正清夫人维尔玛(Welma)女士著《美国在华的文化实验 1942—1949》(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1942—1949)一书借给我使用,特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冯承柏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五日